

上海钦赐仰殿道观道教文化丛书

陈莲笙大师，是当代道教杰出领导人之一，尤其是在正一派之中，年高德昭，极具威望。这不仅是因为他年过九秩，且曾担任过中国道教协会的副会长、顾问，以及上海道教协会的会长、名誉会长，而根本在于他在几十年的学道、行道、弘道历程中，成绩卓著，学问渊博，思想开明，是道教界很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刘仲宇
著

陈莲笙道长事略

弘道八十年

HONGDAO BASHINIAN



上海辞书出版社



弘道八十年

——陈莲笙道长事略

HONGDAOBASHINIAN

上海钦赐仰殿道观道教文化丛书

SHANGHAIQINCIYANGDIANDAOGUANDAOJIAOWENHUACONGSHU

上架建议：宗教传记

ISBN 978-7-5326-2669-4



9 787532 626694 >

定价：20.00 元

www.cishu.com.cn

易文网：www.ewen.cc

上海钦赐仰殿道观道教文化丛书

刘仲宇 著

弘道八十年

陈莲笙道长事略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弘道八十年:陈莲笙道长事略/刘仲宇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326 - 2669 - 4

I. 弘... II. 刘... III. 陈莲笙一生平事迹 IV. B95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2330 号

责任编辑 陆海龙 朱可宁
装帧设计 何香生

弘道八十年

——陈莲笙道长事略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华业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9.625 插页 2 字数 216 000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2669 - 4/B · 142

定价: 2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3812710



序一

陈莲笙道长是道教界卓有成就的一代宗师。

宗师降生于道教世家，成长在忧患之境。幼年入道，天资敦厚，智慧敏捷，少年有成；精通道典，擅长科仪；每上经坛，举止矫健，潇洒精灵。因夙有道缘，诚感天师道第六十三代张恩溥真人，拔授《太上三五都功经箓》，道行获得升华，在我教实属出类拔萃者，获得高度赞赏。宗师以严戒律己，宽厚待人；处世接物，谦逊和善，诚朴真挚，慈爱众生；教内尊崇，世人仰慕。

天运时变，草木随炎凉而有荣枯，宗教依治乱亦有沉浮。十年浩劫，偶遇社会动荡，时局背谬，是非不分，黑白混淆，宗教亦逢厄运。宗师邂逅此劫，身遇艰难；道侣云散，庙务终止；沦没尘俗，同众劳作；道根深固，心志坚贞，和而不流，始终不渝。天道循环，无往不复；历时有年，拨乱反正；云散日出，朗朗乾坤；正本清源，政通人和，文明盛世。

宗师重返道观，主持道业。因冲击严重，万丈高楼，平地再起，千里之行，从头举步。为了弘道育才，先后创办上海道学院，制定上海道教组织、宫观和教育一整套管理规则。为了使后人学有方向，效有典范，宗师凝聚真知，撰著《道风集》等大作文章。时逢戊寅之秋，中国道协换届之际，据其品德与才





华，还可继任。宗师知进退之道，明伸屈之由，礼让自谦，后其身而自处。高风亮节，其品德让政府领导及教内人等无不敬仰！此后宗师德望更加卓著，真可谓“后其身而身先”，乃证道者所为！

宗师已得长生久视之道，故年已九旬，而精神健旺，其道真可典型我教，其德足以垂范后昆。《弘道八十年——陈莲笙道长事略》一书，不但是对陈莲笙宗师一生饱经沧桑，对道家事业大起尘劳，勇猛精进，卓越成就的记载，而且对弘道、宣道，对道教事业今后发展及净化人间、构建和谐社会，都能起到积极作用。今草为序，以待来哲。

任法融

丙戌岁孟秋中元十五日



序二

1957年4月初，中国道教协会首届道教徒代表会议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在这次盛会上，我初识了来自上海的陈莲笙代表（当时我在会议办公室做秘书工作），那时他近40岁，是一百多位代表中较为年轻的一位，是上海道教界著名的“高功”和热情、积极的道教工作者与斋醮音乐的研究者。记得，在会议期间，他真诚地表达了接受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意愿；并对新时代、新风尚、新政局表示了热情的欢迎，充分体现了当时开明的道教界人士在新社会获得精神解放后的喜悦心情。这使我对陈莲笙道长留下了十分良好的印象。1958年夏，我奉调到中国道教协会办公室工作，当时任中国道协副会长兼秘书长的陈撷宁先生曾同我偶尔谈及陈莲笙道长，说他出生于道教世家，因家境贫寒及家学熏陶，自幼习道教斋醮仪典音乐，17岁便成为上海道教界的一位青年“高功”。尔后又际遇龙虎山天师道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受三五都功箓，并在修持上受到教诲，使他在科仪与德行方面，大有提高，成为上海道教界中佼佼者。陈撷宁先生称赞他聪慧而且敬业好学，为人朴实正直、谦逊宽厚，是道侣中的人才。由此，加深了我对陈莲笙道长的敬重。在以后的交往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每来京办事和开会，必专诚看望陈撷宁先生，礼仪甚恭，既研





究教务工作，也讨论道教学术，谈吐皆有见地。有一次陈撷宁先生与之交谈后，颇有感慨地对我说：“在道教处于低沉的现实情况下，如果能多出几位这样信仰虔诚、办事能干而又虚心好学的中青年人才，道教的承传振兴也就有望了。”现在看来，陈撷宁先生的预见已变成了事实。

“文化大革命”期间，道教界遭受了严重的冲击。于是，他被迫离开了道观，进入社会工厂劳动谋生，但他仍保持着一颗虔诚的“道”心，克服重重困难，尽力维护道教文物，并且努力为道友们的生产劳动谋得生计而奔波。在这段大家都十分痛苦的日子里，他经历了磨练与考验，依然保持“道”心和良知。在“文革”结束后，党和政府大力拨乱反正，全面落实政策，道教团体的工作活动得以恢复。陈莲笙道长毅然回到重组的上海道协。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上海道教界人士的信任和支持下，他担负起了恢复上海道教原有规模及开展活动的实际领导任务。面临的是百废待兴、百事待举，人力物力匮乏，各方面思想障碍极大，千头万绪，困难重重。也就是这个时候（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工作不久的中国道教协会派我去上海了解当时道教界的实际情况、学习工作经验，并向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转达希望落实政策、敦促被工商部门占住的宫观能尽快归还的请求，期望使道教徒有安身清修之处。在这段时间内，我目睹了陈莲笙道长辛劳而且细心、耐心的工作情况，他紧紧依靠当地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指导和协助，首先组织道友开展政策学习，解除道友们的“余悸不安”的思想疙瘩，使大家能尽快从“文革”的思想阴影下走出来，心情舒畅地致力于恢复道教原貌；紧紧依靠政府落实政策，尽快归还被占用的道观；同时还要经常走访散居各处劳动和生活



较困难的道友，设法请求地方政府予以救济。大家把希望寄托于他，他也把大伙的事放在心上。他不辞辛劳、任劳任怨地工作着。他修身处事的原则精神与工作精神，着实使我深为感动。还令我敬佩的是，在那困难时期，他充满信心和激情，组织长于道教斋醮音乐与坛仪的道友，开始重习经典、重操乐器，进行练习和活动，同时还和上海音乐学院的道乐研究者，合作进行对传统道家音乐的深入研究与系统整理、录音。这些行为，皆显示了他深远的见识、魄力与坚韧不拔的信心。随之而来的是，沉寂了多年的道坛，又播扬起了优雅的道乐之音。

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中，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政通人和，各行各业都得到腾飞拓展。在党和政府正确政策与法规的引导与大力支持、帮助下，同时也是在上海市道协领导人陈莲笙大师的实际而具体的带动下，上海的道教事业有了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发展，与全国各地道教状况比较，其成就也是最为突出的。相继收回、修葺了海上白云观、浦东钦赐仰殿、上海城隍庙等一批宫观；扩建了上海市道教协会机构；创办了弘道育人的上海道学院；创办了《上海道教》杂志以及研究道教文化的机构等等。陈莲笙大师还依据教义，从实际出发，集思广益制定了新的宫观管理规则；开展上海道教界与中外道教界的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他自己还老骥奋力从事道教经义与仪范方面的学术研究，写作了很多有新意的文章，比如所著《道风集》，便受到了道教界的广泛赞赏，成为青年道教徒所必读教材，他也成为了著名的道教学者。总之，陈莲笙大师为振兴古老的道教，特别是上海道教，付出了大半生的精力。他弘扬道风，育人重视道风，律己严守道风，生平洁身清廉，澹泊名利。1998年秋，在中国道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上，以自己年





逾八旬体弱多病为由，辞去了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常务理事的职务，建议由优秀的中青年道友接替他的岗位。显示了他谦虚、超脱、识大局、明进退、不居功、不恃能的道家高尚风格，受到当时与会代表的赞扬。

我同陈莲笙大师是老朋友，从1957年到2006年已近五十年。五十年前参与中国道教协会第一届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与工作人员中，至今犹健在的只有陈莲笙大师和我这个道教工作和道教学研究者。我们共同走过了这一段坎坷的、令人难忘的道路，内心深处凝聚着深厚的情感。在我的心目中，陈莲笙大师不论学道、修道、弘道，皆是诚心诚意、尽心尽力。处理教务，不论是依法维护道教的合法权益，加强道教自身建设及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方面，无不是上靠党和政府政策法规的指引与实际帮助，下靠全体道友同心以赴。自新中国建立后的“反帝爱国”运动，到新历史时期改革开放，营构新时代道教，无不是在“团结进步，爱国爱教”的旗帜下前进。陈莲笙大师堪称是上海道教实际的开拓者，是道教界爱国爱教的楷模。

在上海道教界祝贺陈莲笙大师九十诞辰和上海钦赐仰殿道观为其出版《弘道八十年》的时候，上海市道协的道友嘱我写几句以志庆。余虽年迈，记忆衰退，思维迟钝，但感情驱动，使我不揣浅陋，欣然提笔，谨以此表达敬佩之忱！

八十一岁老翁

李养正

于北京自适斋

2006年8月1日



序三

改革开放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重新贯彻落实，中国道教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开始进入它发展史上的新时期。在落实宗教政策、推动道教事业全面发展的进程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杰出的道教领袖，其中就有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就是名扬教内外的道教正一派领袖、德高望重的陈莲笙大师，他为道教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全部的智慧、倾注了毕生的精力，特别是他在道教宫观的修复、道教文化弘扬和道教人才培养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探索新时期道观管理和道教徒修养等理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对于推动当代道教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陈莲笙大师是一位杰出的道教领袖，他为现代道教加强自身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方面，在所著《道风集》中，致力于当代道教之发展，他在“原序”中说：“十余年来，余思之甚者，以当代道教之发展为最；十余年间，每有所思，即述之以文，随作随发。今有幸汇集成册，所述一言以概之，即当代道教之发展与道士之修养。”重点阐述了道教徒修养、道教宫观管理、道教与现代社会生活等三方面内容，对于加强当代道教道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他还致力于道教人才的培养。在上海市道教协会正式成立之后，他





就提出开办学校培养人才的设想。在他的积极倡导下，上海道教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培养道教专门人才的学校诞生了。实践证明，陈莲笙大师“重视人才、培养人才”的思想是很有远见的。目前，上海道学院已升级为全国性的道教学院，为培养道教人才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有人说陈莲笙大师是现代道教人才培养的开拓者之一，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开拓为现代道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种贡献决定了陈老先生在当代道教史上所占有的地位是继往开来的。

陈莲笙大师是一位著名的道教学者，他为现代道教学术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当代道教界“有影响的道教思想家”。他博学深思，勤于学习研究，对于道教文化十分重视。在他的积极倡导下，上海市道协成立了道教文化研究室，为研究道教文化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同时，他还发起创办了《上海道教》杂志，他在创刊辞中说：“今日研究道教文化，是我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充分反映了一位道教领袖致力于弘扬道教文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陈莲笙大师所著《道风集》是他毕生学道、悟道、传道的经验总结，是他对道教发展历史经验系统的总结。也就是在这两个总结的基础上，对新时期中国道教如何发展和道教徒应有的修持提出了新的思路，这是一位道门学者道教思想的集中体现。他在《道风集》中关于道教徒修养讲座及其系列文章是非常精辟的，其中既有爱国爱教和继承传统的思想，又有适应时代、适应社会的理论，更有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新的思想内容，提出了当今道教生存和发展的若干问题，并加以论述，提出独特的见解，为道教今后的发展和当今道教怎样来适应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陈莲笙大师的学术贡献还在于他对道教经典和道教科仪的整理、研究和继承，有力地



推动了道教经典的传播和道教科仪的传承。他还主编《道教大辞典》和合作主编《道藏要集选刊》(十册)等。因此,我们认为:对于今日的道教界来说,陈莲笙大师不仅是一位道教学者、道教领袖,更是一位道教思想家。

陈莲笙大师是一位爱国爱教的楷模,他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爱国爱教,以其赤诚的爱国之心和虔诚的爱教之情,为我们青年道教徒树立了榜样。他常常告诫青年道教徒,我们虽是一名道教徒,但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做一名爱国守法的好公民。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国家的昌盛,就没有道教的复兴,更没有我们道教的今天。他在所著《道风集》中,以满腔的爱国爱教之情倾诉着自己的心声,他通过新旧社会的亲身感受,深情地说道:我们爱国不仅要爱历史上的祖国,还必须爱社会主义祖国,爱国的具体表现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积极投入祖国四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在爱教方面,他指出“我们道门中人,作为道家和道教文化的继承者,不仅光荣,也感到责任重大”。在信仰上,要始终保持“道心要坚,道术要精,道戒要严”。所以,陈莲笙大师始终把“爱国爱教”和“奉道行事”作为道教徒的第一位修养。他不仅要求我们道教徒要自觉爱国爱教,自觉奉道行事,而且还要求我们道教徒要有为道教事业献身的精神。陈莲笙大师的这种爱国爱教思想,是永远值得我们当代道教徒学习的。

上海钦赐仰殿是上海最早恢复开放的一所道观,作为上海第一所恢复开放的道观,陈莲笙大师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道观的修复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修复伊始,道观几乎是破烂不堪,仅存的东岳大殿也成了危房。于是,时任上海市道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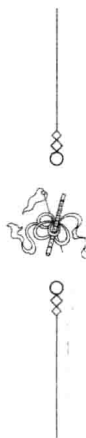
协会筹委会秘书长的陈莲笙大师，多次组织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有关专家、学者意见，然后制定有关修复方案。在他的关心指导下，至1987年11月第一期工程修复竣工，此后进行了第二期工程的修复。进入新世纪以后，道观又进行了整体改建，陈莲笙大师始终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即将修复竣工的道观，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就是如何进一步提升道观的地位和影响，为此建议道观冠名为“太清宫”。这种远见卓识为道观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钦赐仰殿道观能有今日之辉煌，实赖陈莲笙大师之功绩也。2006年10月，适逢陈莲笙大师90华诞，为表达道观全体教职员工对他的敬仰与感激之情，一致表示要为陈莲笙大师送上一份贺礼，于是就有了《弘道八十年——陈莲笙道长事略》一书的问世。该书全面阐述了陈莲笙大师从道、学道、弘道的经历，深入研究他的弘道历程，探索他的人生轨迹和道教思想，以对当代道教的发展有所启迪。

本书的作者刘仲宇教授，是一位著名的道教学者，长期从事道教学的研究工作，其著作文字流畅、语言生动活泼，加上他对道教学术研究的热情，他的研究理念、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都是富有特色的。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得到刘教授的指导与教诲，他严谨的学风和认真、踏实的治学态度，常令我钦佩。本书出自这样一位著名道教学者之手，当是值得推广的。不仅如此，此书的出版也是开道教当代人物研究之先河，尤其是研究陈莲笙大师的开创之作。因此，探索陈莲笙大师的人生道路和思想轨迹，对于当前中国道教的建设和发展，对于中国道教的未来走向，实有着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陈莲笙大师对当代中国道教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



思想和精神是值得我们继承与学习的，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正因为如此，将此书作为“上海钦赐仰殿道教文化丛书之一”向广大读者推荐，当是十分有意义的，也是很有价值的。

丁常云
戊子年初夏





序四

上海道教自秦代时金山就有供奉神仙的三姑祠，三国时期有道教徒活动的记载：东吴之际，孙皓在金山岛建金山庙；葛仙翁，陪吴王游吴淞江，潜水三日，吴王称善。东晋时，孙恩、卢循，由沪入海，唐朝时期，上海地区建立起多处道观，有查玉成在查山（今金山东北之遮山）炼丹。宋元时期，道观渐渐增多，分布于除今天宝山区之外的各区，特别是松江、嘉定及市区尤多。明清时期，上海道教有较大的发展。民国时期，由于上海城市发展较快，道教在这一地区的重大活动增多，在全国道教中的影响也超过以往。

解放后，上海道教得到了党和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宪法的保护。上海道教界爱国爱教，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7年3月上海市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拨乱反正，清除了对宗教的极“左”影响。1985年4月上海市道教协会正式成立，在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在陈老等前辈的积极努力和主导下，先后恢复开放了钦赐仰殿、白云观、城隍庙等著名道观；开办上海道学院，培养青年道士，创办《上海道教》期刊，整理和弘扬道教文化，并出版了《中国道教音乐上海卷》的录音带，拍摄完成了《中国道教斋醮上海卷》的录像带；同时



积极开展国际间的友好往来，发展与香港、澳门、台湾道教界的交往和联系，为保卫世界和平以及促进祖国统一做出贡献，在这一过程中，陈莲笙大师在其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重要作用，为上海道教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道教斋醮科仪是通过道士沟通神人，而音乐则娱神乐人，自古及今已逾1500余载，代代相传，延续不断。余从道已逾二十载，自投入道门便接受陈老的直接训导，其时陈老已逾古稀，但精神矍铄，颇具仙风，亲自为我辈讲授道教知识，传授斋醮科仪，特别关注道风建设，且身体力行，每日早晚功课不辍，对我们阐演科仪，从科仪的意义到口授心传的咒语，从基本动作到音乐的演奏，都逐一加以指点；为中国道教能薪火相传，健康发展，虽耄耋之年，仍赴青城、奔武当，与中国道协领导计议中国道教道士队伍的道风建设；为加强与海外道教的联谊，不辞辛劳，亲自率团前往香港、台湾、新加坡传扬道教文化。多年来，陈老与党和政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习近平同志接见时，陈老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我们道教最大的靠山！”这时，陈老已经九秩有一了。

丙戌之岁，适逢陈老九秩寿辰，钦赐仰殿道众感陈老之思德，遂发心愿，委刘仲宇教授特作此书以志陈老之不朽功德，以遗学道之后生。刘教授于道学研究成果颇丰，治学严谨，故所集资料详实，所述皆有稽可考。今此书付梓在即，遂作是序，以表对陈老之敬仰与钦佩。

史孝进



目 录

任法融	序一	1
李养正	序二	3
丁常云	序三	7
史孝进	序四	12

第一章	初入道门	1
第二章	行道于社会各阶层	16
第三章	天师授箬，终身奉行	37
第四章	在新时代的洪流中	47
第五章	走上道教界的领导岗位	67
第六章	呕心沥血，振兴道教	77
第七章	育新人弘文化	115
第八章	弘道四海	145
第九章	高风亮节，提携后贤	163
第十章	寿高德更高	172

附录一	陈莲笙弘道法语	189
附录二	陈莲笙弘道思想研究	223

后 记	287
-----	-----





第一章 初入道门

农历九月的上海，习习凉风吹拂着，让人稍稍感到了金秋的气息。春去秋来，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了。在这平常季节的平常日子里，在上海老城厢十多里外的一个平常的小乡村中，一家平常人家，却显得有些平常。这户人家姓吴，他们在这一天迎来了家族里的又一个新的小生命。一声宏亮啼哭，一个健康活泼的小男孩诞生了。家族上下都为他的诞生感到高兴。小男婴长得可爱乖巧，父母亲及家族上下的亲族都极其怜爱他。当然，男孩嘛，要给他取一个大名，于是他有了一个名字，叫良叙。

小良叙出生和幼年生活的村子，在今小木桥路中山南二路的“吴家浜圈”。那里离开老城厢有些远。他家的住宅是典型的江南农村的瓦屋，高门槛，木门，门很重，每当开门和关门时，都会发出沉沉的声响。门前就是一块场院。场院外边就是农田。那一片农田好大喔，远远望去，似乎看不到头。江南农民勤奋，农田从不空闲，一年四季长着庄稼：春天种下水稻，要是早稻，稻子收后又赶种晚稻，大秋晚稻收过后，又种下油菜，来年春天，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将田野装点成金黄的海洋。旱地里，常





常种着棉花，到了秋天，又到处可以看到水田里金黄的稻谷与旱地中白色的棉花相间的美景。那里水田多，水塘多，夏季的晚间，到处是蛙声一片，而这时，也是小孩子们高兴的日子，因为间种在菜地里的“甜芦黍”成熟了，可以隔三差五地跑到自家地里欣上几根，美美地啃上一阵子——这种看起来像高粱的玩意儿，青青的杆子却含着甘蔗般的甜汁，而且咬上去还比甘蔗更嫩。那是一个平常的江南农村。然而，在这里，却又透出点近代的气息。在那片田野的东边，有新建立的“**国立南洋中学**”，即今南洋中学。那可是近代上海学习西方教育体制建立的新式学校。它鹤立鸡群般地耸立在不知经过多少辈人开垦与耕耘的大地上，似乎昭告着新的元素正从上海的乡村生成。当然啦，这只是一个近代元素生成不久，与古老传统共生的时期。或



■黄浦江畔的小木桥路中山南二路是吴良叙的出生地，如今面貌大变，只是南洋中学（图左）风韵依存。



许也是一种象征罢，在吴家宅院的西边，便有一座“江境庙”。庙不大，但是香火不断。庙的大殿中间供奉当地的“老爷”，就是当地老百姓信仰的神明，两边就是十殿阎王、牛头马面，等等。古庙与新式学校相辉映，形成了与农作经济相配的精神生活模式。而再向东远望隐隐可见的老城厢，以及老城厢周边的“租界”，似乎有更多的近代经济活动，在文化上便有许多洋玩意儿向国人展现。这就是近代的中国，近代的上海。

吴良叙来到的就是这样这个世界。

吴良叙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一天，是1917年的10月25日，也就是民国六年的九月初十。

1917年，是人类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震撼了整个世界的苏俄十月革命就在吴良叙出生十多天后爆发了，并且从此对于中国人民的觉醒和中国革命的兴起，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

1917年，也是上海历史发展中重要的一年，尽管那一年发生在万里之遥的俄国的事，在以后的几年之后才在上海得到反响。然而，当时的上海从鸦片战争后被列为对外通商港口以来，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与壮大，成为远东地区的大都市，它不仅仅是对外通商的港口，更成为东西文化碰撞场所，西方文明从这里传入中国，使得中西文明在这里产生奇妙的碰撞，罗苏文在其《上海传奇——文明嬗变的侧影》一书的前言里写道：“前近代的上海只是江南古镇后起的一个模仿者……开埠通商则意味着上海已成为欧美环球海上贸易走廊在远东的一个新成员。上海正是从这个起点出发，率先划定外侨居留区界址，进而以一个远东新兴城市的姿态进入世界舞台……同时，它也成为近代世界文明主流输入中国的桥梁……”上海开埠后，凭借其相





对优越的通讯、交通、思想资源，取得近代中国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是近代教育、新闻、出版、戏曲、电影、广播等各种文化元素传播与发展，培育文化专业人才的基地。这里既传播着现代西方的宗教与文化，也有儒释道三教在这里和西方洋教分庭抗礼，自由竞争，为诸多文化资源的汇聚，思想名人的产生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和温床。

1917年，尽管当时的中国大部分地区陷入混乱与战火纷飞的困境，但是已经成为远东地区大都市的上海，却因半个多世纪的畸型发展而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又因其地靠东海的优越地理位置远离中原纷乱的战场，相对而言，也还较为宁静。

然而，这一些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大事，刚刚出生的吴良叙并不知道，而且当时的绝大多数人也都不知道，即使知道一点，恐怕也不清楚它们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一户平常人家的孩子，他的命运，也许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那样一种联系，未必直接可以感受。

对于吴良叙这个孩子来说，直接影响着他的前途和一生命运的，却是五六年后他父母作出的一个重大的决定：将他过继给姨妈家。

吴良叙在父母亲的呵护下健康成长着，他从小起就活泼可爱，聪明伶俐，学起东西来又敏捷过人，见过吴良叙的亲族无不喜欢聪慧的小良叙。父母亲把小良叙当作掌上明珠般珍爱着，用亲情亲切地浇灌着这颗幼芽。吴家人丁兴旺，小良叙有不少兄弟，他平时爱和兄弟们嬉戏玩耍，童年的小良叙顽皮却不捣蛋，和兄弟们嬉戏多欢快却少撒娇。直到四五岁，小良叙都承欢父母膝下，无忧无虑地过着幸福的幼儿生活。与吴家人丁兴



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姨父陈荣庆家，却没有一个男丁承继香火——他们也生过一个儿子，却没能养大。其他的办法也想过了，夫人却再没有生育。此事着实让他们伤心沮丧，心中像压着块大石头总是无法释怀。他们举目四顾，希望觅得一个男孩过继到膝下时，目光渐渐停在了小良叙身上。

按说，一般的习惯，如无男丁的家庭，要想过继个儿子续香火，首先都会在本家挑选，即在堂兄弟的儿子中选一位。而且当时陈家子侄辈也不乏人选，有些本家亲属，也希望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荣庆。然而，却都未成功。对于陈荣庆来说，吴良叙是连襟的儿子，虽是亲戚，却属于外家。为什么单单选中了他呢？这里有个缘故。

陈莲笙立嗣进入陈家，是他的姨母、陈荣庆的夫人夏三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夏三妹力主，才把外甥陈莲笙立嗣进了陈家。

原来夏家是法华镇上的大族。居住在今番禺路、淮海西路一带，沿着河边有一幢独立的新式石库门的洋房。夏家有三个姐妹，两个兄弟。兄弟做大米生意，在今复兴西路襄阳路附近开有米店。大姐嫁于韩家，曾有永嘉路半条马路的房产。二姐嫁于吴家。三妹嫁于陈家。大姐知书达礼，二姐和三妹尽管不识字，却也是大户人家出身。而陈荣庆则出身贫苦，因此，他夫人及夏家对陈荣庆一直保持有决定性的影响。而陈荣庆对于夏家特别是大姐也是言听计从。夏三妹决定力排陈家亲族过继侄子的要求，收养外甥作为儿子，陈荣庆便也接受。对于这一点，陈莲笙自己是最清楚的，因此，只要自己的生活过得去，特别是近二十年来，逢年过节都要给陈家亲族送钱送礼，以示不忘之意。这是后话了，搁过不提。





在当时，过继一个孩子，在家族中是一件大事，必须写下契书，而且要上告列祖列宗，至于知会近亲，同来祝贺，更是不能免的。待一切手续办妥，吴良叙正式成为陈家一员，而且明摆着是继承人的身份，这对于5岁的小孩来说，未免知道对自己一生会有多大的影响，但在大人眼里，却明白，这位小孩将会有一种与原来的生活环境大相径庭的生活前景。

陈荣庆将这位新过继来的儿子，取名为莲笙，于是昔日的吴良叙更名为陈莲笙。原来小良叙称为姨父、姨妈的，现在则正式改称为父亲、母亲，在方言里，便是爹爹、姆妈。

是年他5岁，时当1921年。

二

过继给陈荣庆为子，是陈莲笙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他从一个普通的百姓之家，进入到一个道门世家，以五六岁的年纪便开始受到道教氛围的熏陶和培养，从此与道教结下不解之缘。他正式入道门，还要晚几年，但是，这一年，却是他与道教结下不解之缘的开始。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了解陈荣庆在当时的上海道教界的地位，不过要说清楚，还得追述得更远一些，稍稍介绍一下当时上海道教的一些基本情况。因为，我们只有了解了当时上海地区道教的历史与状况，才能理解在这个大背景下陈莲笙的成长环境。

上海道教的师承最早可以追述到葛玄、葛洪。传说道教丹鼎派传人葛玄曾经在金山地区活动。晋安帝隆安五年（公元401年），孙恩率领农民起义军攻打沪渎，就是打着天师道的旗帜号



召广大农民加入义军行列的。道士葛洪传说曾经在华亭地区活动。最早在上海地区建立的道观是南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建立的仁济道院。唐太宗时，该院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受到唐太宗的重视，钦赐“仁济道院”的匾额，该道院也因之声名显赫，弘道之风大振。另有唐代道士查玉成在金山东北的遮山（又名查山）修炼金丹，现在还有炼丹室、浴丹井的遗迹。入宋以后，道观逐渐增多起来，散布于除今宝山区之外的各个地方，松江、嘉定和现今的上海市区的道观尤其多，道观总数达到了20余所。唐宋时期的上海道教，主要是茅山上清派的传人在这里传播活动，但同时，其他如正一派、宋代崛起的神霄派等也都有传播。到了元代，元成宗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被钦封为“正一教主”，兼领三山符篆。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上海发生“海堤崩”，一时生灵涂炭，刚受封的张与材天师命弟子“持符往劾之”，这是历代天师在上海活动首次记载。七年之后，张与材天师又于仁宗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亲自为上海地区的著名道观集庆宫撰写了《集庆宫瑞竹记》和《重建东岳行祠记》。之后历代天师、真人在上海的活动愈加频繁，对上海正一道的发展影响也更加广泛和深刻。随着元代全真道的鼎盛时期来临，全真道也传入上海地区。入清之后，道教在统治阶级心目中的地位日趋衰微，民间道教却逐渐活跃起来。清代上海地区创建的道观有73座，大多属于正一派道观，全真派道观则只有一座。及至进入民国之后，全真道在上海才有了较大的发展。^①

不过，这是从现今上海的整个地区而言，从行政上说，在

^① 张化：《上海宗教通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清代中期以前，上海只是一个县，清代后期上海升格为府，其辖地并不算大。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开始瓜分中国，上海是他们觊觎的重点，根据帝国主义列强与腐败的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上海出现了所谓“租界”。当陈莲笙出生时的上海，实际上是混合了所谓“租界”和华界的一个特别的城市。

从清朝到民国时期，上海道教有不少发展，而在这发展过程中，陈氏道教世家曾有过重要的地位，特别是陈荣庆，一度成为道教界的头面人物：他曾于清末，担任过上海道会司的道会一职。

原来，依清代对僧道的管理制度，“府道纪司都纪、副都纪；州道正司道正，县道会司道会，各一人（俱未入流）。遴通晓经义，恪守清规者，经予度牒。”^①陈荣庆担任的正是上海县的道会。当时各级道教管理机构，从其归属于朝廷、官府来说，是一种政府管理机构。但是，其他机构里各级行政官员，在清政府没有衰败以前，大多由“正途出身”的进士充当，而各级的吏员，则由熟悉刑名制度的人担任，或者由官员另聘请幕僚充当，他们通常被称为师爷。无论是官或吏，绝大多数是由儒生出身；但是僧道的管理机构负责人，却是由在一时一地有名望的僧人、道士充当。虽然注明此职“未入流”，即没有正式的官品，恐怕也未必能拿上奉禄，但是却是经过选拔，让通晓经义、恪守清规的道士担任，且给予正式的度牒，所以陈荣庆担任此职，很不容易。从政治地位上说，他系法律上和任命程序上都得到肯定的上海道教界的领导人；从声望上说，在整个上海的

^① 《清史稿》卷一百十六《职官三》，第3360页，中华书局版。上海地区在清代隶属松江府，设道会司一职。



道教界自然不同凡响。所以，他的社会地位在当时的上海道教界，是首屈一指的。而取得这样的地位，原因很难一下说清，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与他的家学渊源和自身努力分不开。

陈荣庆的父亲名叫陈岩松，是正一道本帮西南地区的一位著名法师。在其影响下，其子陈荣庆，也就是陈莲笙的父亲，从小也在浓厚的道教氛围中长大，是上海近代的著名道长。陈荣庆出生于1885年，歿于1967年，法名宏明，在家族的影响下，从小习道。1895年年仅10岁的陈荣庆拜上海火神庙的主持李祥和为师，并在该道院正式出家为正一派道士。李祥和虽然收陈荣庆为徒，但是作为火神庙的主持，平时的道场法事以及火神庙的管理占去了他大部分时间，真正教陈荣庆修习正一道斋醮符法的另有一人，名叫江筠亭。在他的教导下，陈荣庆诵读道经，研习书法、绘画，并修习斋醮科仪。据陈荣庆的长孙陈耀庭回忆说：“祖父是一个琴棋书画件件喜欢并且精通的道士，对于时事政治很少关心。因为耳朵很早就失聪，所以在我的记忆中，他一向沉默寡言，很少讲话。为了听评弹，常常需要将耳朵凑近收音机的喇叭。喜欢读报看书，从早到晚，常常手不释卷。对于后代读书，要求很高很严，我小时候出门和回家都要对家里供奉的大成至圣先师像鞠躬行礼，因为背诵古文错误，还吃过祖父陈荣庆打的手板。陈荣庆对于科仪，从来精益求精，后人常常对我说，陈荣庆在罡单上步罡踏斗的时候，那罡衣飘扬开来就像一朵花一样，飘逸潇洒。”陈耀庭印象中的祖父，当然已是中年时的形象，不过，由此也可以推测他年轻时的某些性格和风貌。

年轻的陈荣庆敏而好学，那些斋醮科仪与道经、书画对于天赋过人的陈荣庆来说并没有花费太多时间就熟练掌握，顺利成





为师父的得意弟子。这个阶段的修道为陈荣庆成为一代名道的修养打下坚实的基础，后来他也以善书、熟悉科仪声闻上海道教界。在陈荣庆才17、18岁的时候，师父李祥和羽化而去。作为李的嫡传弟子，又已精通斋醮科仪，于是年轻的陈荣庆顺理成章地成为火神庙的主持，承担起支撑师门的重任，并在清末任命上海道会司道会时，被选中担当此职。

在辛亥革命前数年，陈荣庆离开火神庙还俗了。当然离开火神庙也就意味着他不再担任道会一职，道会的职务由南市道士朱寿山担任。为什么会离开火神庙呢，据说他感觉在火神庙任职，杂事烦冗，无法专心修道、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便辞职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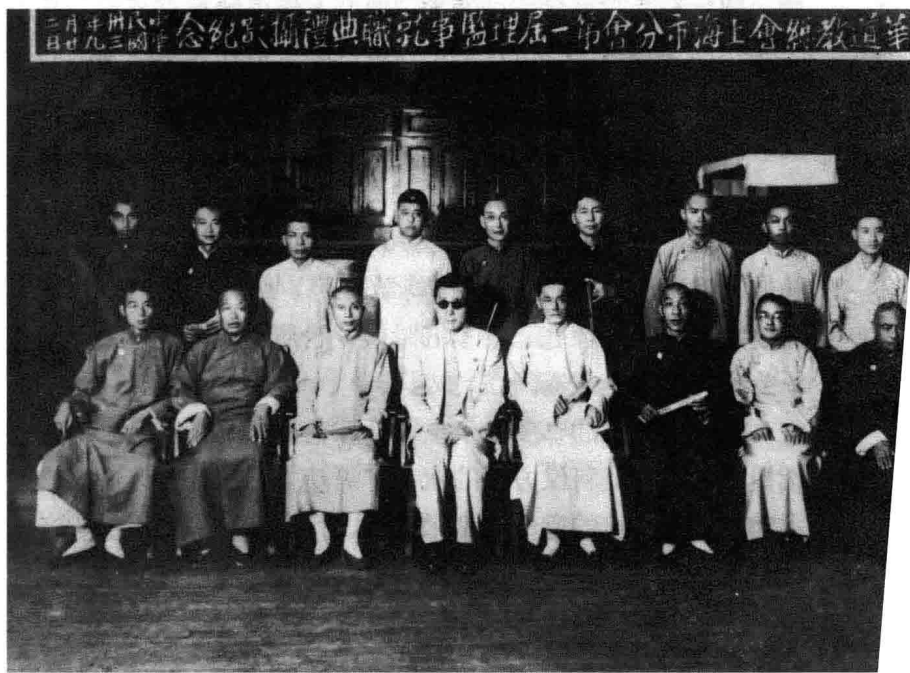
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后，清朝由民国所代替，政治体制大变，常带来个人命运的大变化。不过，陈荣庆却仍然活跃在上海道教界，只是这时的活动环境却与原来有了很大的差别。

在清代，或者更早的时代，除了各个道派的内部组织系统，并没有全国性的综合各道派又超越了各道派的组织；张天师虽说总领三山符篆，其权威却是由朝廷赋予的，至于统领各地方道教的道纪司、道会司，实质上是一个官方的机构。清朝乾隆年间以后，张天师的地位下降，表示朝廷对于道教的兴趣大为降低。清同治年间，朝廷又下旨，龙虎山正一真人即民间俗称的张天师不得入京朝觐，这样实际上宣布了道教在最高统治者眼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待进入民国，受当时的时代思潮所推动，更受到客观社会环境的影响，道教界开始寻求建立自己的统一组织。然而，由于民国时期一度军阀混战，道教界内部因为道派隔阂，所以尽管有志之士出面倡议建立统一的教会组织，消除各个道派独立山头、各自秉承一方的分散局面，以图振兴衰



微的道教，但是这样的努力在民国时期并没有成功。正因为此，道教界在面对当时的政府和其他强势社会力量时，往往处于被挤压甚至于遭欺凌的地位。上海地区的道观多有被占作他用的事情发生。做一个道士，在半殖民地时期的上海滩，并不好过。

陈荣庆离开火神庙，还俗回家时才20多岁。回家后，他娶了妻室，因为亲生子嗣没有育成，如我们前文提到的那样，收陈莲笙为子。陈荣庆虽离开了火神庙，却因其在道教界的名气继续在活动。他拜虹庙(即保安司徒庙，地处英租界中心地带，当时的主持是正一派道士张维新)的高功张成照为度师。又在新



■中华道教会上海分会合影。前排左3为陈荣庆



闸路上创办清虚道院，收徒传道。陈荣庆一生收徒20多名，凭其在道教界的影响力，他又担任在上海地区成立的历届道教会的调解委员，负责协调教内各派的教务关系，处理教内矛盾。

当陈莲笙进入陈家时，已经是1921年，辛亥革命已经过去十年，也就是说离开陈荣庆解职道会司道会的职务也过了十余年。这时的陈荣庆，除了参加道教界的一些活动，以及道士职业中常行的斋醮科仪之外，有了较多的时间在家，可以有更多的精力放在养育子嗣上面。所以陈莲笙从小从父亲那儿获得的呵护和教诲、指点是多方面的。这种教诲，当然除了一般的做人道理，还突出在道教信仰、文化的教养上。

倘若陈莲笙没有被过继来，他的人生道路是否会另外一条呢？历史是无法改变的。正是在进入陈家后在父亲陈荣庆的引导下，陈莲笙从此踏上了他不同凡响的人生之路，却是确实无疑的。

其父既作为道门世家子弟，又经刻苦努力成为修为甚高的一代名道，陈莲笙成长在一般人无法比拟的浓厚道教氛围内。和他的父亲一样，陈莲笙也自幼学道，7岁的时候，开始习经书，教他的老师是周耀庭。12岁的时候，他拜正一派本帮道士朱星垣为师，正式进入道门。

作为陈莲笙的师父，朱星垣受陈荣庆之请，亲自来到陈家教授小莲笙斋醮科仪方面的吹、打等功夫。这是作为道士的基本功，盖正一道的道士必须学会吹、打，具有相当程度的音乐技能才可以从容做道场，在坛场上按部就班地演奏仙乐、参与法事。除了师父的教导，小莲笙也从善于书画的父亲那里学习书法绘画，念经悟道。



三

小莲笙就这样在父亲和师父的悉心教导下茁壮成长着，像父亲一样，聪慧的小莲笙学习这些知识也是驾轻就熟，很快就掌握了学习科仪的基础知识。如前所述，1928年，当他12岁时，便正式拜当时著名道士朱星垣为师，深入学习与演练道门音乐和科仪。到了1933年，陈莲笙17岁的时候，又拜著名的正一法师张村甫为师，深入学习正一派的斋醮科仪。这一阶段的修习为陈莲笙精通道教的斋醮科仪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陈莲笙成为一代高道奠定了基石。正如陈莲笙后来在其《道风集》中写到的：

关于斋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做法场？……我们学道修道的人总是要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因此，就会有欲念滋生，言行错误。如果我们能虔诚地斋醮、礼拜、诵经和思神，就能达到“洗心净心，心行精至”。因此，我们做法场是为了自己的学道修道，也就是修道生活的一部分。陆修静还说过：“一切莫过乎斋转经者也。夫斋直是求道之本，莫不由斯成矣。”^①

在陈莲笙心目中，做法场精通道教科仪，始终是正一派道士的必修课。师从张村甫一年之后，陈莲笙就已经精通斋醮科仪的各项技能，名闻上海道教界。1935年，在陈荣庆等上辈高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5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道的举荐下，陈莲笙以19岁的年龄获得了江西龙虎山天师府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真人颁授的“万法宗坛”之“三五都功箓”。此是后话，下面还要谈到。

陈莲笙在当时的师承，既有家学渊源，同时也先后拜过几位在上海滩上有名的道士为师，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他非常好地继承了上海城帮道士的科仪特色。

1842年上海对外通商之前，上海正一道在历代天师的影响下已经成为上海地区的主流道派。而随着上海对外通商地位的发展，随着上海云集各地商贾，上海的经济日益繁荣起来，经济的繁荣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正一派第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的活动下，上海逐渐成为天师道的一个活动中心，外地的道士也纷纷进入上海传道布教，上海正一道越发壮大。然而在正一道内部，却逐渐按照道士的地域归属划分为“本帮”和“客帮”道士，每个帮派内部又分成更小的帮派，各个帮派师承和斋醮科仪各不相同，主要的帮派有本帮（上海本地道士）、苏帮（来自苏州的道士）、宁帮（来自宁波）、常熟帮（来自江苏常熟）、南通帮（来自江苏南通）、绍兴帮（来自浙江绍兴）、金锡帮（来自江苏金坛和无锡）等十几个帮派。除本帮外，其余各帮统称为客帮。

本帮是上海本地道士组成的道派。民国初年的本帮内部按地域又可以划分为三个小帮。浦东的本帮为东帮，中山西路以西为西帮，东西帮之间为城帮。据张化在《上海宗教通览》中记载：城帮与东帮在经忏仪式的形式上比较相近，两帮道士能合作做道场，有的城帮道士与东帮道士间还存在师承关系，城帮和东帮因此可以合成一个帮派。西帮道士在民国之前主要活跃于七宝（曾属上海县，今属闵行区）、南翔（今属嘉定区）以



及沪杭线以西的农村，民国后进入上海市区，在徐汇、长宁、普陀、江宁区（后并入静安区）建立道院，承接道场。本帮道士的道场排场盛大，以经忏为主，不过内部的各小帮还是有些区别，如西帮道场的音乐讲求欢快、明朗，听起来粗犷豪放，城帮道场的音乐则细腻、优雅，听起来庄严肃穆。

陈莲笙依所在地域而言，属于城帮道士。城帮的道场，坛场铺设讲究，有很强的艺术性，而对于唱念、器乐的配合也极其强调。他后来参与的斋醮科仪大多表现出这样的特点，而且他一生喜爱音乐，也不能不说在这段时间里埋下了根苗，而道教音乐的童子功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扎下的。





第二章 行道于社会各阶层

从7岁开始读道书，到12岁时正式拜朱星垣为师，陈莲笙成了一名正式道士。到了17岁时，他就熟悉道教科仪规范，能从事一般的斋醮科仪了。事实上，年轻的他已经是道教界颇有些名气的法师，经常自己出去做法场。他在道教界高功队伍中取得的地位，当然得益于父亲和师父的教导，也与他自己的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分不开。

做法场在正一道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自正一道诞生时起，就以重符箓、崇拜神仙为特色，强调斋醮科仪，修习的法术很多是画符念咒，祈禳斋醮，为人祈福禳灾。道教外的人们看道士的建道场，做法事，很是神秘，但却多不懂得，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道士，特别是法坛上的高功法师，要学习许多知识和操作技能，要迈过许多坎才能有所成就。陈莲笙就是经过了大量的努力学习和修持、练习才有所成就的。

首先，他从学道开始，就非常注意熟读科仪经书。原来凡是斋醮仪式，都有一定的本子，记述着该仪式的主要环节，这种本子，道门中称为“科”或“科范”，一般的道众，学习的科范主要是“班科”，上面主要记载着自己需要唱、念的辞句，也



简单地记述着需要配合高功法师做的一些动作。而高功法师是坛场上的主脑，他不仅要熟悉全部法事，而且还在坛场上负有指挥全体职事人员的职责。也就是说，他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陈莲笙对这一点十分清楚，所以从学道起，他就对于科仪本子反复熟读，凡是在仪式中对某一具体环节不甚明白的，就去查阅科书。这种学养是他较快成为一名有造诣的高功法师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成了他一生不变的习惯。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了晚年，20世纪80年代道教从十年浩劫中摆脱出来，仪式的失传十分严重，每当在科仪的举行和演练中遇到问题，他都会让年轻道士们去查一些科仪本子，尤其是像《灵宝玉鉴》、《灵宝济度大成金书》一类既记述仪式规范又有理义上的说明的书，他查阅更多。

作为一名高功，他还必须对于法事的流程、环节（道门中或称为节次）不断练习，直到能纯熟操演，而不是仅停留在书本知识上。其中一个重要的技能，是对于道门音乐的熟练。陈莲笙自从学道起，就十分重视音乐的训练。说到道教音乐，大家或许都知道它的价值。一曲《二泉映月》让世人都知道阿炳其人，而阿炳正是一个正一道士。他演奏《二泉映月》时，已出离道观多年，成了无锡城里的流浪艺人。但是，他的音乐成就，首先靠的是在道观里的艰苦训练，这首《二泉映月》，实乃道地的道教音乐。1973年美国的载人航天器上，放置了各种地球上的音乐录音，不断向外太空播放，希望外太空的文明生物能够听到并且理解地球上人们的心声，其中一首琴曲《流水》，就是青城山道士在19世纪末的作品。人们在各种场合欣赏到道教音乐的优美旋律时，不大会想到，这种音乐是怎么创作出来，又是怎么能达到那么美妙的效果的。从创作来说，话就长了，这





里不来多介绍，只是要指出一点，音乐是表现人的情感的，而这种情感又非常深地扎在人的内心之中，与人的信仰、生活态度以及对于人本身的理解有着密切的联系。道教音乐的创作，当然也是这样。它是道教徒信仰世界的表达，是他们宗教情感的抒发。现今的道教音乐是在近二千年的时间中，历代道士创作、继承、积累下来的，在时间流程中优胜劣汰，才沉淀出诸天隐韵的精华。而说到它的演奏，却也少不了演练者的艰辛。现今的人们，可能经常看到、听到各种音乐的演出，而演奏者多数是专业的乐团。然而在古代，或者说，近代艺术教育发展起来以前，道士们的音乐训练是在宫观里，通过师徒传授，获得基本的知识和技能，而想要成为一个有造诣的道乐演奏者，主要的还是靠他本人的刻苦训练，以及对音乐内涵的体悟。那些演奏水平高的道士，一般都是从小就经受了严格的训练，道门中称“扎童子功”，陈莲笙正是从小在“扎童子功”上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中年以后的陈莲笙曾经回忆起他练笛子时的情形。据他自己说，当年师父朱星垣对练习音乐非常严格，要求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大雪天时在廊檐下露天吹笛，手指冻僵了，还要照常练习。夏天在太阳底下，浑身是汗，仍然不准松懈。为了练习笛子和口嘴的位置不变动，有时还要在笛子上吊一个秤砣。这样严格训练后，才能保证道士在行进中吹笛始终不走样。

经过刻苦练习，他熟悉了各种坛场乐器，特别喜好吹笛，也吹得一手好笛。同时，因为他对科仪的内涵下过苦功，所以能体会到音乐在具体的仪式中每一环节要表达的情节和情感，所以在演奏中才能表达出极为丰富和细腻的变化。

除了科仪的演习和音乐的练习，年轻的陈莲笙也在内练中下了很大功夫。他从每天清晨开始，就要起来练功，每天都要



练上一个多小时，晚上临睡前，还有一套相应的功夫要做。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练习呢？这与道门中素来相承的“内道外法”的观念有关。原来，道教的高功法师，不仅要会演示科仪，而且还有许多内在的要求，或者说内秘的功夫。人们看到道士演法，只见他们依科演练，或唱或吟，或持剑，或持幡，有时画符念咒，有时步罡踏斗，好像在舞台上唱戏。毫无疑问，科仪的举行是有类似于戏剧表演的一面，但也与演戏有很大的，或者说根本的不同。演戏的演员知道自己在扮演一个确定的角色，所以他也会体验到角色的喜怒哀乐爱恶欲，随着戏情的发展演出悲欢离合，或高亢激越，或情意绵绵，好的演员尤其是这样。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在“演”，尽管说“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戏与真实的世界有相关的一面，但毕竟不是真实的世界。道士的演法却不是这样。他们在科仪中的表现，按照道门的理解，科仪举行，是沟通人神的一座桥梁，是一座“无量大法桥”。那么在法坛上演法，面对的是信仰的神仙和现实的人相互联系的世界。演法的目标是将人间的各种要求，呈报给神仙世界，又将各类困惑经由法事的进行予以一一解脱。在道士的内心，人与神，都是真实世界的组成要素。他们本人在坛场上是凡俗与仙境、人与神之间的沟通者。那么，他们凭什么做到这一点呢？除了符、剑及其他各种法器，根本的一点，是“有道行”，也就是自己必须修道有成。所以呢，成功的法师，都是修道有了根基，而且一直保持着进道不辍的态度。陈莲笙作为正一派的传人，坚持练习着各类道门必修的功课，清晨起来从叩齿集神开始，直到规定的经咒，存想思神，全部做完，正好天大亮，该用早餐了。用完早餐，则又开始了一天的事务。在住庙的日子里，还要参加早晚的焚修，照料香烛，接





待香客。

有了上面说的那些努力,陈莲笙对于科仪的理解日益深入,参加和主持仪式的水平也日渐提高,很快,在这一领域里便取得了同行的赞赏、斋主的信任。特别是斋主们,对这位年轻的法师,亲热地称为“小莲笙”。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赞赏他、喜欢请他做法事的相对固定的信众群体。小莲笙的名号,在上海滩上渐渐大了起来。

二

陈莲笙在上海滩的道教界崭露头角,并慢慢扩大影响的年代,也正是上海的道教慢慢获得发展的年代。

说也奇怪,上海本来没有名山大川,那些闻名天下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一个也与上海沾不上边,到了近代,上海的道教却渐渐壮大了起来,一些著名的道士也来上海活动,第六十二代天师、第六十三代天师都曾将上海作为活动的重要平台,第六十二代天师且羽化于上海,他的大出殡曾一时轰动上海滩。而在附近的道士也慢慢向上海集中。其实,说奇怪也不奇怪,古代的道教形成与发展,与地域关系密切,各派的宗坛常常选择在洞天福地,像江西的龙虎山、江苏的茅山、湖北的武当山等都是例子。那一时代,僻处海隅的上海,在道教界中当然数不上号,也不会引人注目。然而近代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社会转型期。城市化与现代经济的发展一起,迅速地但却有些畸型地开展起来。随着原有的地域经济、文化的格局被打破,整个道教活动的重心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向经



济文化上举足轻重的大都市谋求发展已成了明显的趋势。上海在当时成了沿海的大都市，经济、文化都形成了不可替代的地位。一些著名道教界人士来上海，主要是看中了它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希望在这里找到弘扬道教的舞台，而周围的浙江、江苏地区的道士来到上海，却主要是为了谋生。从陈莲笙出世之后，中国可以说正遭逢乱世。先是军阀混战，继而抗日战争爆发，异族入侵，内战升级，给江南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都是动乱不已。江浙一带，本来是东南富庶之区，但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农村的凋敝日益严重，破产的农民大量流入城市，成了不可遏止的趋势。而上海因为一度存在着列强的租界，所以在抗日战争中一度成为孤岛，为了躲避战祸，大量的难民涌入。同时，相对而言，上海毕竟是当时的经济中心，就业的门路远远比农村广阔，所以与上海人口大增同步，上海的道士数量也骤升。

陈莲笙出道之后，从虚龄17岁起^①，就开始为人举行斋醮科仪，时当1933年，正是大批客帮道士涌进上海的时候。所以在这一领域中也存在着同行业的竞争。这使得他非常小心，每临法事，都极为用心。这也使得他的科仪水平特别是音乐水平，不断获得进步。

当时上海的道士数量增加，除了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各种社会的经济的原因外，很重要的，也许是更加根本的，还是当时的上海人宗教需要的增长，特别是对道教信仰的增长。这种增长当然不是一时一刻的事情，而是长期的文化积淀中留下的刻痕。也许当时处于乱世，人们常常存在着惶恐不安的情绪，易

^① 依当时习俗，皆纪以虚年龄，依现在习惯计算则为16岁。



于产生向神灵寻求庇护的动力。从这一角度看，上海人宗教需要的增长，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原因还是统一的。不过，从更深的层面上说，传承近两千年的道教已经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里去，不少内容已成了民间风俗的一部分，是这种增长的内在根由。

旧时的中国民间，家里有了白喜事通常都要请道士和尚来做道场，超度亡灵。这样的习俗源头源远流长。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在下层民众中生活过，深知佛道两教对于中国民众生活习俗的影响。他做了皇帝后曾下令礼部编纂《大明立成玄教斋醮仪》，还亲自为之作序，称：“官民之家，若有丧事，非僧非道难以殡送。若不用此二家殡送，则父母为子孙者是为不慈，子为父母是为不孝，耻见邻里。”足见民间丧礼上道门法事的重要性了。民国时期的上海民俗，传统的请和尚道士做法事仍然是必备的，如上海崇明一带的风俗，人过世之后就要在门外为逝者烧纸钱、衣服等，同时请来和尚道士摇动铃钹诵经，称为“指灵开路”。因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这时期上海的丧礼还有很多不中不西的情况。小户人家请来和尚道士按传统风俗做道场，大户人家往往摆排场，弄得葬仪有很多繁文缛节。“上海的习俗，出殡的时候，和尚道士，走在一大排，中国音乐，外国音乐，笛子，喇叭，锣鼓，洋鼓，洋号，闹上几大队，叫上几十辆马车。女人走不动坐马车，男人走得动，也坐马车。亲朋送葬，也要多约些来送葬”。^①

除了葬礼以外，道教渗透在民间风俗中的还有各类祈祥纳福的法事，比如各类清醮，以及解星一类小法事。个人或家庭

^① 《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



有了灾祸，常要请道士做法事禳解，而地方上也常有定期或不定期的清醮举行，以使地方康宁，吉祥如意。

生老病死，谁都难免，丧亲之痛、无妄之灾、遭逢恶运，恐怕人的一生都或多或少要经历，禳灾去邪、祈祷吉祥，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当时的上海人，对于道教科仪的需要也是经常不断的。陈莲笙所处的时代既如此，他的活动当然也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民间风俗一致，适应着社情民心，以宗教仪式服务于信众，在民间风俗中寻求生存与发展之途。

自正一道诞生时起，长期分为住庙道士和居家道士两种。住庙道士在庙里修行，为信徒举行上香拜神、做法事等宗教活动，同时他们也接受信徒的邀请到信徒家里做法事，如祈福、延生、消灾、超度亡灵等斋醮科仪，收取一定的报酬。居家道士则是指在家里修行的道士，他们通常生活在自己的家族中，也接受道教信徒的邀请，到信徒家里做道场。在正一道绵长的历史中，很多散居道士以“道士”为职业，靠为斋主打醮做法会取得报酬来谋生。上海地区的道教自宋代之后就形成了居家道士在家修习正一派的教义与仪式，建立道院的传统，农忙务农，农闲修道，并且把建醮做功作为济世度人的主要手段，因此上海地区的道教和当地民众的生活、信仰、风俗联系十分紧密。

清末以降，随着上海逐渐崛起为经济、文化的大都市，城市人口增长，市民的宗教需要也随之增多。上海的道教一方面同社会政府保持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又同当时社会的生活商品化驱使相适应，信仰活动也呈现出一些商品化的成分。尽管当时上海地方政府只承认出家道士，并对正一道的迎神赛会、堪輿等宗教活动限制颇多，上海市区的道院仍然兴盛起来，承接





市民的做道场要求。当时做道场已经成为大多数道士最主要的谋生手段和频繁的宗教活动。

这一时期正一道的散居道士大多居住在租界和上海县城，自己开设道院或道房，招揽斋主行法事以谋生。有些上海本帮的出家道士也离开道观，在家开设道院。这些散居道士在住地门口挂着道院表牌或者道士名牌，客堂上供奉着元始天尊等道教神仙的画像，有的供奉着张天师的画像。这些画像仅仅是他们自己在家修行时礼神的对象，并不供香客烧香。有道院的道士被称为班首，无道院的则被称为赴应道士（指他们随时应承班首之请，搭伙做道场），也称为客师。班首又称为法师、高功，他们熟悉各种经忏仪式，和赴应道士一起举行法事。斋主上门找班首约道场，班首则带领赴应道士按约去斋主家中做道场，并收取报酬。随着上海的道士按照各自的地域来历划分为不同的帮派，其各自的斋主来源也各不相同。大多数客帮的道士承接的是与自己同乡的斋主之约，而像陈莲笙那样的本帮道士，活动的范围就要更广一些，在上海老城厢及周围地区都会留下他们的行迹。

清末以降，上海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习俗：每天清晨的时候，赴应道士云集某一固定的茶馆里，俗称茶会，等班首前来聘请。各个帮派的茶会地点也各不相同。班首聘请好赴应道士后，带着自己准备好的神像、法器、道袍、乐器等必需的“行头”，带领赴应道士去斋主家做道场。

陈莲笙也和其他正一道士一样，在熟练掌握了斋醮科仪之后，年仅17岁就经常出去做道场了。每当外出，都要像其他正一道士科仪班子一样，约上数量不等的同道，带上各类法器，以及用来布置坛场的用品。原来，他们去的，常常是寻常百姓的



家中，临时划出一片场地，或露天宅院，或家中客堂。而做法事的前提必须有一个坛场，称为法坛。要在那些人家布置一个法坛，少不了神像的悬挂，法器的陈列，在神像前，还要铺设罡单，作为上表时道士踏罡步斗之用。这些，当然无法在民众家中现成准备，而要由道士带去。所以，往东家那里做一场法事，其实是颇为辛苦的。

17到19岁间，他一直住在新闸路父亲开设的清虚道院。新闸路位于当时的租界中，来往的各色人等复杂而众多。小莲笙因此也就承接过多种类型的道场，斋主的家也分布广泛，有时候他甚至要跑到龙华、江湾等地方做道场。龙华位于现今上海徐汇区，江湾是现今杨浦区靠近宝山的地方，都是当年上海周边较远的地带。民国初年上海已经有了公共汽车，但是交通仍远未能谈上发达二字，行人出行，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多是黄包车之类的人力车。从租界到那么边远的地方来回一趟也颇要费些时间。到那么远的地方做道场，可想而知小莲笙的辛苦了。据陈莲笙的回忆，那时出去做道场经常一做就是个把星期，有时甚至半个多月。这当然要视科仪的内容以及东家的财力、家境而定。

当时陈莲笙所做的道场，一部分在清虚道院和其他宫观内，相当一部分则是要到东家家中举行。他所做的道场的种类很多，总的来看可以分成两个大的种类：清事和亡事。清事又称为阳事，亡事又称阴事。阳事是指为活着的人们举行的，诸如驱邪、祈祷消灾、求福、治病送瘟等，像发符、上表、各类朝仪，都是较为常行的。不知是因为此类法事以求清宁为主，还是因为行法的仪式多来自于清微法，上海地区习惯上称此类法事为清事。阳事中比较大的是各种清醮，它们是为了一个家族或一个





地方的安宁而举行的仪式活动，实际上是许多仪式都组织在一起的仪式群，大型的清醮举行起来要用七天、十天甚至更多的时间。陈莲笙去做的历时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的法事，就包括这类清醮。也有一些清事，实际上是些小法，如解星之类——民间信仰，人事都与天上星宿相联系，人要是倒楣，常认为是恶星照临，所以要请道士先生帮忙解一解，叫作“解星”。亡事是专为亡灵设置的仪式，即以超度亡灵为中心的活动。其超度的对象，是阴间的亡灵，召请的神灵，也常是阴间的主管，所以习惯上称为阴事。作为一种宗教，对人的终极关怀是其主要功能之一，道教度亡仪式，就是安慰亡灵，抚慰生者，送亡故亲人往生的仪式。这种道场也是在民间应用最广泛的仪式之一。上海地区做的阴事，种类很多，比如九幽灯仪，是以灯光照耀九幽地狱、救出亡灵的法事；炼度，是以法师法力直接将陷于地狱的孤魂饿鬼救拔出离幽冥的法事。当然，根据东家的家境，有时会请道士举行一些大型的超度仪式，一般小户人家，则基本上只做一天半天的小型法事。当时陈莲笙和其他道士所做的仪式究竟有多少，已难精确统计。不过依照某些回忆，1949年前上海的正一道士所做的仪式大小有一百数十种，现今民间的散居道士能做的还有七十多种，可见是种类繁多。要适应这种情形，做法师的就得不断学习，因为当时的道士做仪式完全是以满足东家的需要为中心，而对于自己来说，也是养家的手段，要你做而不会做，做起来做不像样，都无疑是砸自己的饭碗。况且，道门自有戒律，若是做法事不认真，会招致天谴，所以道士上了坛场一般都不敢马虎。而像陈莲笙这样修为较深的道士，则更是自觉地将做道场与做人、做法事与修道结合在一起，所以尽管辛苦，却从无怨言，在坛场上，再累，也要认



认真真，循规蹈矩。

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尽管已经是远东的大都市，同时也是一个两极分化严重，贫富两重天的世界。与洋楼里的欢笑、夜总会里的曼妙歌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处于上海的大量的棚户。所谓“棚户”，现今的年轻人恐怕已没有多少感性的印象。那是一种用些土坯、木板以及油毛毡等搭建的简陋的小棚。棚中空间狭窄不用说，其潮湿污浊也是当代人难以想象的。棚户中的居民，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贫民。棚户区，也就是上海的贫民窟。棚户与洋楼并存，是当年上海滩的一个让人视之难忘的畸型现象。特别是抗日战争发生后，1937年，日军在上海发动了“8·13”战争，大批民房被烧，闸北一带成了一片焦土。劫后余生的百姓纷纷逃进租界避难。待稍稍获得表面的稳定后，陆续逃进上海的外乡人又在焦土上搭起简易的棚户，于是闸北成了棚户最多的地块，是典型的贫民窟集中的地区。与闸北的棚户齐名甚至于可能形成时间还要早的著名的贫民区，在旧上海比比皆是，只不过不像闸北区那样成片罢了。普陀区小沙渡附近的药水弄、石灰窑，便是非常典型的两处。这里，也是陈莲笙做道场常到的区域。

它们地处现今的西康路和常德路之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大片密匝匝的棚户，胡乱搭建的小棚棚没有任何规则地分布着，进入里边，就像进入迷宫。它们的周围，正是工厂区，像当年恶名昭著的日本资本家开的“内外棉”，就在附近，



同时，也零散地分布着一些中国民族资本的企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曾在药水弄、石灰窑东北侧的小沙渡一带展开。可想而知，这是两处聚居着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工人群众的地区，同时也是无业贫民落脚之处。贫穷、没有文化、肮脏，是他们的主旋律。但同时，这里的民众也与其他中国民众一样，仍然保持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尽管也许这种向往本身是一种奢望；他们也保留了传统的信仰与风俗，凡是红喜事，也想办得热闹，而家中有丧葬，也尽可能请个把道士做一做。

道士在普通百姓眼里，会做法事，能通神事鬼，书画念唱无一不能，是“先生”，因此倘若有事请道士先生来，都是毕恭毕敬的。家里有白喜事，按照风俗必定要请来道士先生念经做忏超度亡灵。不识字的老百姓甚至把写灵牌的事务也委托道士先生帮忙。陈莲笙为人和气，到了那些贫苦百姓家，第一件事就是帮他们写好亡者的牌位，以及灵堂上的最起码的文字，如程式化的挽联之类。拿现今的眼光看，写几个字是最寻常不过的了。然而，在当时，中国人文盲本来就占了大多数，石灰窑、药水弄那一带的贫民，目不识丁的几乎是百分之一百。做惯了苦力活的人们，遇到了需要写字、识字的时候，可就只能干瞪眼了。年轻的陈莲笙写得一手清秀的好字，态度又好，东家的要求，都尽可能地满足，所以很快就得到那些地区的百姓的喜爱，他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小莲笙”。随着他到这一类贫民区做法事的次数越来越多，小莲笙的名号也传播开来。

除了经常被请到石灰窑去做法事，他经常去的还有闸北的苏北人聚集地。前面说过，8·13事变中，闸北是第一号重灾区。如果说，那里本来就是贫民聚居之区，那么经过8·13之后，更是赤贫户随处可见了。随着战乱的升级，大批从苏北农村逃难



到上海的人们，便同乡帮同乡，拉扯着在被日军烧毁的废墟上搭起聊以遮风避雨的棚棚。所以当时闸北的苏北人聚居区，便是典型的贫民窟。这些地方的百姓大多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生活都很贫困，也没有经济能力接受教育，自然他们能提供的法事报酬也就少之又少了。虽然明知如此，小莲笙仍然经常承接这里的法事，并帮助斋主打理丧礼，有时候道场做完也还无法抽身离去。

有一次，小莲笙去闸北为一户人家做超度亡灵的小道场。他到了斋主家一看，该户人家的孩子不幸夭折，父亲也早已过世，只剩下孩子的母亲帮人家做点活计艰难度日。爱子心切的母亲虽然按惯例请了道士先生来为孩子超度灵魂，却穷得连最便宜的薄皮棺材也买不起。做完了道场，小莲笙实在可怜这位寡母，不忍心收她应付的报酬，同时，还拿出些薄资帮她买了口棺材，安葬了孩子。这位寡母千恩万谢地送走了小莲笙。这件事，深深地埋在陈莲笙的记忆之中，几十年过去了，当他87岁，笔者去采访他时，听他谈到这件事，声调便慢慢地凝重起来，似乎回到了当年的悲痛与哀怜的氛围之中。好一会儿，看他的脸上，还是神色黯然。

其实这样倒贴一些钱的事情陈莲笙碰上的也不少。除了对普通百姓在旧社会生活困苦的同情之心，更多还是从他自己修道的体会出发，愿意竭尽所能来帮助别人。尽管小莲笙那时年纪轻轻，作为一位修养甚高的法师，他深刻明白修道不仅是个人成仙的途径，还是为人为众、心存慈爱的善功，即“修道为人”。几十年后，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我们学道为人，首先应该是为全社会的人……学



道为人就是要为人民群众……《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中有八个字，“齐同慈爱，异骨成亲”。这就是说，我们要对普天下的人都“慈爱”，都像亲人一样。要做到这一点，经文要我们“十恶不生”，就是“不杀、不害、不嫉、不妒、不淫、不盗、不贪、不欲、不憎、不妒”，行为要符合“真常”天道。^①

他认为做道场，是道士自己修道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修道也是兼利天下，心怀慈爱为众为社会的善功，是一个合格道士在日常行为里体道、合道的表现。这种思想，固然是道门无量度人的教义所提倡，同时也是他在年轻时候的宗教实践中获得的感悟。

四

旧时代的道士，走百家，穿万户，常常进入不同阶层的人家。除了和社会最底层的百姓打交道，陈莲笙也常常去大户人家做道场，有时也免不了与当权的人士，甚至于社会上的帮会头目打交道。这种交道，给了他种种了解社会的机会，也考验着他的生存智慧。

近代的上海，是中国的第一大都市，但也是一个畸型的城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本身已经够复杂的了，上海则是中国的缩影，集中表现了当时中国的复杂与混乱。大凡当年中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4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国一切光怪陆离的现象，在上海都能找到。在上海混出点名堂的外国人，称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各路工商业者来到这儿又将它当成是淘金的大码头；而代表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又将这里看成是革命的摇篮，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就诞生在这里。因为上海是当时中国资本主义最为发展的地区，综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汇聚了中国社会的各色人等，本土的政客与买办，外来的投资者与混混儿，中国原有的三教九流，外国教会的传教士，本国或外国的豪富，与社会最底层的赤贫民众，以传播文化为己任的各色文化人，与色情行业的从业者也就是社会反文化的代表者，混生在当时只有数十平方公里的小范围内，使得上海愈益显得复杂，甚至于有些诡异。道教作为宗教，本着无量度人的宗旨，以满足信众的需要为己任，而不管他们处在哪一阶层。前面说到陈莲笙在社会下层的平民中建立起了良好的声誉，但同时，他也不得不进入权贵之家，与上层社会的各色人等周旋。在这些人中，他在与之周旋时最小心翼翼的，要数上海滩上的大亨。

说到大亨，现今的人们千万不要以为专指那些发了大财的豪富。其实，在当时，一般的富人在上海还不能称大亨，只有那些能在上海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物，那些在社会上能够横行的人物，那些徒子徒孙布满各个社会角落的人物，才能称大亨。真正的大亨，是当时帮会的头子。民国时期，最著名的便是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陈莲笙直接间接与之打过交道的便有黄、杜两个。

黄金荣（1868—1953），字锦镛，小名“和尚”，绰号“麻皮金荣”。祖籍浙江余姚，生于江苏苏州，是旧上海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旧上海三大“流氓大亨”之首。杜月笙（1888—1951），





原名月生，发迹后改名镛，号月笙，1888年生于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南杜家宅，1911年后结识黄金荣，其后被黄一手提拔，遂成为青帮三大头子之一。

尽管黄金荣和杜月笙平时飞扬跋扈，但在信仰上却基本上与中国文化一脉相通，对道教佛教都表示尊重，并经常客客气气地请一些著名的法师去家里做法事，以禳灾祈福，求得健康长寿。那时的小莲笙虽然年纪很轻，但是其作为著名法师的名声远扬，自然也在受邀之列。著名的黄家花园（即今桂林公园），每年陈莲笙都要去做几次道场。每当这时，他都要格外小心。不过，虽然这些大亨常让平民百姓发抖，道士们初进他们家，总揣着一颗心，但据陈莲笙自己回忆说，大亨们对和尚、道士倒也客气，而且提供的报酬也格外优厚。这倒是耐人寻味的情形。陈莲笙与他们来往过几次之后，慢慢明白了其中的事理。

从信仰上说，大亨们不是什么虔诚的道教信徒。作为黑帮的头子，他们不得不经常面对勾心斗角的阴谋，稍不留心就会身处险境。事态不顺利的时候，请道士来做做法，驱驱邪，以保佑自己平安无事，转运转机。或者敬神事鬼，从斋醮仪式中得到安全感，希望得到神灵的护佑继续占据高位。同时，在当时，凡是某些节令，民间都有请道士打醮的习俗，大亨们依俗行事，既有本身的信仰的因素，也是表示风光的场合。尤其是遇到家逢不幸，有人过世，依俗都会请和尚或道士——有时甚至是两者兼请——做一做道场。因为这类人家交往复杂，来吊唁的各色人等都有，东家为了表示其地位非同一般，要做得特别风光。这时，是他们社会地位的一种炫耀。须知，这些人虽然是上海滩上的风云人物，如果查一下老底，却并不算光彩，从事的社会职业，常常与下九流割不断联系，拿今天的话说，便



是黑社会老大之类。当年杜月笙重修祠堂，请了章太炎做大序，太炎先生对于如何称呼其地位便甚费斟酌，最后用了“海上闻人”四个字，实在是用了国学大师的大智慧。所以在各类法事中，讲排场，给僧道们的报酬丰富于常人，正是显露其不同凡响的机会。比如，杜月笙的母亲出殡，便专门请了六十三代天师主持超度道场，在当时的上海滩曾引起轰动。

除了对道士沟通神人的“尊重”，大亨们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很清楚道士们平时做法事，经常东奔西跑，和各色人等打交道。去大亨家做法事的故事，必定是百姓们关心的焦点。那些平日高高在上的大亨如何敬天事鬼？他们对鬼神是否毕恭毕敬？这些琐碎的事情和尚道士们免不了要在民间谈论。因此大亨们经常嘱咐道：“和尚道士不要怠慢，因为他们跑千家，走百户，好啦坏啦，他们出去都要谈的，传出去不好。”为了防止和尚道士们在民间说他们的坏话，维护他们的威严而又带着神秘的形象，大亨们很聪明地选择了用和善的态度对待道士。

然而，帮会的头目们在有事请道士时，虽然和善，但从根本上说，他们并非道士的同路人。除了善待的一面，也有剥削、敲榨的一面。特别是他们手下的小混混，有时非常难缠。所以道士们平时对待那些大亨或者他们手下也都抱着破财消灾的心态，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道士们总要“孝敬”他们价值不菲的礼物。

旧社会的道士被称为三教九流之一，在社会上地位很低。最底层的老百姓尊重道士们能写会念，但是一般而言，在社会上，道士没多大地位。旧上海的道士同样处于这样的境地，一方面市民需要道士们为之做法事，满足除邪避灾和敬神事鬼的宗教需要，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登殿时的态度总是做出





最虔诚的姿态。另一方面又把道士看作神秘的“方外”之人，除了道场之外少与之接触。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后，随着西方科学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以科学救国的思想成为有教养人士中的普遍思潮，走西化道路的呼声不绝于耳，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运动此起彼伏。随着道教在民国期间的进一步衰落，反对道教敬神事鬼的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仍然会虔诚的拜庙烧香，宗教需要不减，但在有教养的社会阶层看来，普通道士只会专职做法事，文化修养不高，根本不会真正懂得“大道”的道理。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社会上稍有些地位的阶层如政府的公务员，各种机关的职员大多受过传统教育，也学习过现代西方科学的一些知识，他们一半秉承着传统文化，会按照习俗请道士做做法事，一半打心里并不大看得起道士。社会的上层人士，更不会对道士毕恭毕敬了，除了做做法事，也不会和道士有什么深交可谈。

相比之下，那些流氓大亨，管理地皮的黑帮，以及官府，和道士的交道却多一些。那时的上海远不是一个如表面繁荣昌盛的文明都市。军阀混战，国内时局动荡不安，各种各样的势利人物云集在上海明争暗斗。经济相对繁荣的上海及其周边的江南富庶地带在洋人和军阀眼里都是必争之地。地理位置的优越，文化上的先进，即使在那个动荡年代也使得上海在全国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上海满是各色人物的碰撞与交流，无论是本土人士，还是外来的移民都努力奋斗着，试图在乱世中的上海发迹。这样，上海的各个地带都处于黑帮和官府的监视之下，无法逃避开的黑帮和地痞流氓是当时上海滩的特色之一，著名的青帮三大首脑就是当时的时代产物。

即使是上海本帮的道士也要对这些大亨们毕恭毕敬，有事



情的时候好找他们帮忙。没有他们的帮忙，在上海是很难生存下去的。当时很多本帮道士手里有庙，有地产，就能收香火钱，有些地处繁华地带的庙香火旺盛，收入很高，加之做做道场，有的道士把手头的地产出租给政府机关、社会机构，收取租金。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地产非常昂贵，租金不菲。于是有些道士的生活还会比较富裕，这就吸引了地痞流氓和官府的关注。道士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低下，除了给这些地痞流氓和官府政客交保护费和各种苛捐杂税外，每到过年的时候，这些大地痞和政客还会跑到庙里来“看望”主持，也就是暗示道士们：“过年了，是不是应该送点上来？”这种官府吃道士的现象司空见惯，倘若“礼数”不周，道士们很有可能遭到流氓们的刁难，这时候就需要找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黑帮大亨帮忙了。

陈莲笙现在还记得，他的度师张成照所在的虹庙，曾经有一次被特务盯上了。因为虹庙地处英租界的中心地带，地势繁华，香火极盛，庙里的财产也比较丰富。特务认为虹庙的财产是一块肥肉，于是动起脑筋想占为己有。碰到这样的事，在那个昏暗的社会，靠官府伸张正义是不可能的，官僚们巴不得逮这个机会向道士们狠敲笔竹杠。虹庙的道士们平时和黄金荣有联系，也经常去黄家花园做做道场。无奈只好打出与黄金荣有交情的牌子，特务怕触怒黄金荣，只好放弃这个念头，悻悻而归。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不能依靠政府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却要依靠这些黑道大亨们，实在是只有在极度畸型社会里才会发生的怪事。陈莲笙现在回忆起那时的道观生存状况，常常会感叹旧社会里道士受到的压迫与剥削。有庙产，收入丰厚的道士日子还过得去，像火神庙这样香客比较少的庙，又没有什么地产，日子就颇有些艰难，要依靠给人打醮做道场的收入维持





生活。加上过年过节“孝敬”各路关系、人物，花费之余剩下的也就不多了。那时的小莲笙，生活是比较清贫的。

道士生涯看似平常，却又曲折。陈莲笙年轻时候的宗教实践和社会经历，使得他亲身体验了旧社会的世态炎凉，亲见旧上海的畸型社会，也亲身体会到一名道士，在旧上海受到的歧视，这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能迅速向新政权靠拢，打下了基础。





第三章 天师授箓，终身奉行

一

在陈莲笙的生活中，常常有许多机会，遇到一些对他一生有影响的人物。如果说，当年过继给陈家，是他一生最大的转折，那么，后来的一些际遇，则对他的某些侧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际遇张恩溥天师，便是对他的道学水平的提高，以及在道教界地位的奠定，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1935年，张恩溥来到上海，陈莲笙有幸见到正在上海活动的张恩溥。这是第一次见到天师，在一个正一派小道士的心里，当然是既激动，又感到幸运。须知，道教正一派的宗坛在龙虎山，张天师在道士的心目中，地位之高，声誉之隆，自然非同一般。历史上，见过龙虎山和天师的道士实际上非常之少，现在却在上海见到张天师，真的是很不寻常的际遇。而且，当时陈莲笙还只有18岁——按照当时的习惯，则纪虚龄，算19岁。

他为什么在这样年轻时便有这样的机缘见到张天师，除了个人的机遇，还得感谢时代提供的条件。

张天师，其实从明代以后，朝廷给予的正式称呼是“正一大真人”。天师的称号源自于东汉时张道陵创道鹤鸣山时定下的制度。当年他在四川活动，创立正一盟威之道，号称天师。以





后他的儿子张衡、孙子张鲁，也都称天师，不过，道门内部称张道陵为祖天师，即第一代天师，称张衡为嗣天师，张鲁为系天师。晋代，张道陵的三代孙张盛移居今江西省贵溪的龙虎山，此山便成为正一派的宗坛。龙虎山的掌教，都是张氏子弟中选择，代代相传，每传一代，依法统辈系，称为第几代天师，自张道陵算起，直到民国时期，传到第六十三代，名为张恩溥。龙虎山天师传到六十三代，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大家族了。盖中国人重血统，大家族都修有家谱，一代代不至于失传与紊乱。不过因为天灾人祸，朝代更迭等原因，各家族很难有数十代的记述明确的传承。像孔夫子的后代延绵七十余代，实在是前所未有的。而龙虎山竟能从东汉起一直沿袭了六十余代，恐怕也极少有另一个家族能与之相比了。不过，与山东曲阜孔府的传承严格依照血统意义上的辈份不同，天师的辈份虽是同宗相传因此也具有血统的意味，却主要是依照法统，继位的天师，可以是前一代天师的嫡嗣，也可能是弟承兄业，甚至也有叔承侄位的。所以严格来说，张天师的意义，在于在龙虎山的法统中，占据一个环节。因为明以后，原来历史上相继出现的各道派的符箓皆归入龙虎山，形成了综合各符箓派的正一派，张天师被朝廷封为正一大真人，隐隐为一代道门领袖，故其地位非同寻常。

但是，张天师的大本营一向在江西贵溪的龙虎山，在清代中期以前，张天师的足迹从来没有踏上过上海滩，为什么在民国时期他却跑来上海呢？

原来，这是由清末以来上海地位的提升所引发的。清末随着道教在上海的发展，正一道派逐渐把上海当成天师活动的重要舞台。第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1924)，字晓初，精道法，能文章，风仪峻整，于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嗣教。嗣教之后，张元



旭入京试图在当时的清廷谋升二品官阶。因为天师原来官列三品，自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后，则被降到从五品。张元旭的入京，就是想提升天师的官品，并请封其祖培源、父仁，为光禄大夫。入京之旅以失败告终。此后，他便云游淞沪，以符箓赐信徒，累奏奇验；又以职牒传道士，受度者众；并搜求谱牒，旁参碑铭，补述五十代至六十一代天师传，名为《补天师世家》流传于世。辛亥革命之后，江西的都督府以破除迷信为由，取消了张天师的封号，没收了其封地。袁世凯当政期间，在张勋的推荐下入京，于新华宫设三坛打醮，袁世凯恢复了其天师的称号还加封洪天应道真君，并归还其封地。张元旭的活动范围遍及京津沪等地。

随着上海在中国的经济、文化中的地位提升，不少商人与文化人都到上海活动，上海遂成为各种文化活动包括宗教传播的重要平台。同时，上海十里洋场，又是中国对外交流的大舞台，中国的宗教界人士，外国的传教士都曾在上海谋求发展。1912年，应天主教在华传教士李佳白等的邀请，张元旭来到上海参加中外教务联合会，作关于道教源流的报告。后来他又联合上海、江苏及浙江的部分道士筹划成立中华民国道教总会，设立中华民国道教会上海总机关部及上海道教公会，陈莲笙的父亲陈荣庆就在创办道会的过程中协助过张天师。自此之后，张元旭就把天师的活动基地主要定在了上海。

1924年张元旭在上海羽化后，灵柩护送回龙虎山，葬于上清通桥蒋村之山麓，面东南座西北，名曰洋塘观。他的长子张恩溥（1904—1969）嗣教成为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字鹤琴，号瑞龄，谱名道生，幼读诗书五经，诵习道教经典，并习道教之斋醮、符箓，于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继承父职成为正一道掌教。





30年代初，江西时局动乱，张离开江西到上海活动。直到抗日战争之前，他都停留在上海，主要是在上海、苏州一带展开教务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恩溥回到龙虎山隐居。抗战胜利之后，他又来到上海展开教务活动。

1946年冬，张建议上海道教界成立上海市道教会，标榜以“宗教为重，团结为重”，提出先产生地方性道教会，然后再组织全国性道教会的方案，意图改变加速道教衰微的分裂局面，并巩固“袭封嗣汉天师”的地位，扩大道教的社会影响。张恩溥依靠上海玉皇山福星观分院住持李理山道长的经济和人力支持，和当时上海民政局长张晓松在政治上的帮助，于1947年成立了以李理山为会长的上海市道教会，该会以“研究玄学，阐扬教义，刷新教务，联络道友感情，发展宗教事业”为宗旨。1947年4月间，该会在张恩溥授意下曾印发由陈撷宁居士起草的《复兴道教计划书》，提出开展“讲经、道学研究、报刊、图书、道书、救济、农林、科仪”等八个方面的复兴计划。可是当时内战已起，社会动荡，其复兴计划只是停在纸面上，最终也没有实行。1947年秋后，张恩溥又发起组织全国性的道教会，但在当时那样的时局下，当然不可能有结果。

虽然这样，原来远在龙虎山的张天师，却因此与出生于上海滩的陈莲笙有了接触的机会。而这一接触，便在陈莲笙的一生中打下了极深的烙印。

二

陈莲笙得见张天师，当然与他的家族有关。须知，陈荣庆



在上海道教界的声望非比寻常，陈莲笙能见到天师，显然与此是分不开的。

幸运的是，他不仅见到了天师，而且天师对这位小小年纪就熟悉斋醮科仪的道士非常喜欢。很快，陈莲笙便得天师垂青，给他授了“三五都功箓”。

三五都功箓，是正一法箓之一。可能从正一盟威道教创立不久，就形成了以授箓为入道标记和道职升迁资格证明的方式。以后，可能这种方式有明显的优越性，其他道派如上清派、灵宝派，都采用了正一盟威道的方法，各自制定了自己的法箓，以它们作为入道的凭证。到了元代，龙虎山天师受朝命总领三山符箓，明代以后，各种符箓道派的法箓统归于龙虎山，龙虎山原来的正一宗坛改名为万法宗坛。因此，上龙虎山受箓一向是道门的制度，得受者便在道教界内取得“正宗”的地位，被称为“三山滴血弟子”，端的不易。现在却由天师在上海亲授与陈莲笙，其幸又如何！陈莲笙当时年纪只有19岁，已得此殊遇，其幸又更如何！当时的他，其高兴，其感激如何，是不难想见的。同时，他也深感身上责任重大。

原来，陈莲笙明白，由张天师颁发的“三五都功箓”对道士而言，是一种极高的荣誉，也是赋予了他终生行道、弘道的重



■天师符





任。依正一道的规制，凡是主持醮仪的道士，必须先授法箓。据《三洞修道仪》说：受正一法箓，方可以为人章醮。因为只有得受法箓，才能名登天曹，才有道位神职。有了道位神职的道士其斋醮章词，才能奉达天庭，方可得到神灵护佑，反之斋醮章词则无效。所以，凡主持醮仪之道士，必先求授法箓以正道位。受箓之后，箓牒中拨付受箓者有护身及听凭调遣的神兵将帅，受箓者作法时，由他们协助斩妖除邪，拔度生灵，救济困厄。未受箓职者，就无权遣神役鬼，作法就不灵验。张天师作为正一道的领袖，他颁发的度牒都印有“万法宗坛”的标记，象征着道教内部权威对受箓道士法力的承认，得授之者便为道官，也就意味着他在教内有职衔，当然便领受了相应的职责和义务。在以后的日子里，陈莲笙经历了行道的顺畅，也经历了种种挫折和磨难，但是始终道心不改，一旦获得好的机遇，便全身心地投入弘道的事业，与他得到六十三代天师的眷顾与青睐，是密不可分的。

并非每一个熟悉斋醮的道士都能得到天师符箓。陈莲笙以19岁的年龄就获得了张天师颁发的符箓，这既是对他自身道术的肯定，也是获得天师肯定，成为一流高道的标志。这次受箓在陈莲笙的修道生涯里，是一件值得纪念的标志性大事。

三

在际遇张天师后，陈莲笙的学道生涯中又增添了另一份异彩，那就是参加了由张天师主持的罗天大醮，而且还在第二次罗天大醮中，担任了一个坛的高功。



罗天大醮是道教斋醮科仪中最隆重的活动之一。“罗天”，一说是指三界之上的大罗天，在道教里的意思是指天之三界以上的最高处。罗天设醮，意思是说请来的神灵数量众多，品位极高，设醮的时间长，规模庞大，设醮目的广泛，参与醮仪的道士和祭祀、奉献的道教徒人数众多。但此说颇有可商。原来，道门醮仪，以周天大醮、普天大醮和罗天大醮最为盛大，周天醮设神位三千六百份；普天二千四百份；罗天一千二百份。所以罗天大醮与其他二种醮仪一样，都是指罗列诸神仙真合而祭之。不管怎么解释，罗天大醮就是规模极其庞大的道教科仪。据明代《道藏》所收《罗天大醮设醮仪》的记载说，在罗天大醮中召请的有“三清至尊、十方上圣、玉京金阙、天帝天真、十方师尊圣众、三界官属、一切威灵”等天地间一切神灵。请来这么多神灵，行仪的目的也就非同一般了，一般是为祈求国泰民安、忏悔谢恩、祈寿延生、拔幽荐祖等比较重大的事情。罗天大醮的规模庞大，时间也长，一般要举行三天、五天、七天乃至四十九天不等，每天所行科仪也不相同，其内容十分丰富。

举办一次罗天大醮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最重要的需要修道很深的高道来作法，普通道士自然难以担任醮仪中的高功法师。另外，举办罗天大醮的费用也不菲，只有财力非常雄厚的人才能举办得起。历史上，罗天大醮常由朝廷或官府出面组织举行。在进入民国之后，朝廷不复存在，宗教与政治分离，也极少会有政府出面举行此仪。所以，这样的盛典人们只在一些小说中看到过，比如《水浒传》的头一回，就叙述到宋徽宗请龙虎山张天师进京举行罗天大醮驱除瘟疫，而实际的醮仪，则旷缺已久。1932年，由著名的青帮大亨黄金荣发起，邀请当时在上海





的第六十三代张天师张恩溥主办了一场罗天大醮，地点设在黄金荣的上海大世界。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要做罗天大醮，也就成了一件很隆重而且也很稀罕的事，一旦做起来，自然在全社会的震动、反响非同一般了。

黄金荣为什么要筹划这样一场大醮呢？

原来，在这一年，黄金荣收购了当时因竞争力不佳而面临破产的“大世界”，经过一番装修之后新的“大世界”轰轰烈烈地揭幕了。这重新装后的大世界，便称为“荣记大世界”。这是当时上海滩上最著名的综合性娱乐场所，里边杂技、唱大戏、滑稽说唱，样样俱全。这个以热闹为基调的大世界，开张伊始，自然也需要特别的闹腾一番，以扩大影响，就像以前在农村里做戏，先要来一套开台锣鼓，俗称闹台，以招徕听众。依照习俗，一座大的建筑场所落成，都要举行一场安龙仪式。黄金荣请来张天师到新落成的“大世界”做法事，安土镇宅，以求得生意兴隆。新开张的大世界，当然必须显一显黄金荣的实力，尽可能地大摆排场，于是他特地请张天师主持七天的罗天大醮，上海各大报纸都对这次打醮做了报道，人潮涌动，场面热闹得很。当然，当时道教界的人士，也乐于参与其事，因为不管黄金荣自己如何考虑，但从道教界来说，毕竟是一次展示道教文化、扩大社会影响的重要机会，而大醮中为国为民祈福消灾的宗旨也合乎多数人的愿望。

当时才年仅17岁的小莲笙，因得到张天师的喜爱，也被邀请来参加打醮活动。

尽管小莲笙只是参与了这次打醮科仪，并没有成为高功法师，但是这次参与却给了他学习的良机。能亲见张天师主持这样的大型科仪，为他提高自己的科仪水平，深刻体悟科仪的外



在形式与内在意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抗战胜利后，1947年，黄金荣又在大世界举办了第二次罗天大醮，仍然请张天师张恩溥主持。那时陈莲笙在上海道教界已经是修道甚高，颇有名气的法师了。他再次受到张天师的邀请参与这次科仪，并且是作为高功法师来参与打醮，不再是之前那个初出茅庐的小道士了。31岁的陈莲笙也成为那场法事中最年轻的高功，在那样盛大隆重的仪式中熟练地按照科仪的要求行法，年轻又充满活力的他格外引人注目。事隔多年后陈老回忆说，这次打醮依然设在黄金荣的大世界，七天的打醮张天师到了三天，大世界里来观看的信众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当时的大醮，共列十个坛，除了主坛由天师自领之外，其余都由各帮道士参加。因此，可以说，那次大醮是各帮道士斋醮风格的大展示，也是斋醮水平的大比拼。陈莲笙所主，当然是上海城帮的坛场。前面说过，陈莲笙擅长道教音乐，精熟科仪，演法水平甚高。在坛场上他唱念声音清亮，韵味十足，掐诀念咒，拿捏准确，踏罡步斗，飘逸潇洒，发符上表，进退有序。加上其他坛场职事的配合，乐队的节奏开合有致，使得这坛法事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须知，罗天大醮的举行，在道门是多年一遇的盛典，在最近一个多世纪中，也只举行过二三次而已，在此后的四十余年中，又一度成为旷典。陈莲笙参与其中并担任高功，不仅在当时，是他的荣幸，也是行道弘道生涯走上高峰的标志。而且在四十六年后，当1993年，在北京白云观重开罗天大醮盛典时，陈莲笙的这一经历，便成了十分宝贵的财富。正是他的这一经验，成了北京盛典的重要参考。只是，这些，1947年的陈莲笙是未曾预料到的。

可能是因为际遇六十三代天师的缘故，再加上陈莲笙在上



海滩的道教界比较活跃，人缘也好，所以在1947年道教界成立自己的组织——上海道教会时，刚满30岁的陈莲笙便参与了它的理鉴事会。



■ 1947年上海道教会第一届监事理事会就职合影，第三排左7为陈莲笙



第四章 在新时代的洪流中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次大转折。对于陈莲笙，也是人生的一大转折。

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永远彪炳史册的一年，一百多年来饱受奴役、战乱和压迫的中国人民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翻身成了国家的主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宣言，鼓舞着经历了一百多年奋斗的中国人民，古老的东方雄狮在企盼着重重新崛起，成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盛一员，渴望重振数千年来一直领跑东方的人文传统。

位于东海之滨的上海，与整个国家一样，迎来了新生。

当年有着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无疑是当时文化领域的重镇要地。经过近一个世纪东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上海早已成为国际著名的大城市。形形色色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物，各种来自西方和苏联的思想流派和诸多宗教都曾经在这里粉墨登场，在这座大都市里或轻或重地刻下自己的印记。解放前的上海既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中国历史的进程里扮演过革命先锋的角色，又满是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充满现代文明的堕落诱惑，足以令人醉生梦死。洋人们在这个被称为“冒险家的乐





园”之中其乐融融，街头的贫困小贩则担着货担艰难谋生，而下层的工人和城市贫民则用自己的劳动与贫穷支撑起富人的大厦。上海已经在当时的中国经济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豪华的各国银行大厦早已矗立在上海街头，肮脏矮小的贫民窟也挤满了前来谋生的工人。激愤与麻木，典雅与猥琐，激进与保守，现代与古典，在这座城市里颇具讽刺意味地融为一体。

1949年5月27日，经过解放军艰苦卓绝的奋战，上海终于从它近百年的半殖民地屈辱中摆脱出来，真正回归人民的怀抱。上海人民载歌载舞，把街道布置满鲜花和飞扬的彩旗，热烈欢迎解放军的正式进驻。5月28日上海人民政府成立。然而，胜利之下的上海却暗流涌动，社会也并没有立即安定下来。国民党撤退时留下大批反动特务，时不时暗地破坏着和平与人们对新政府的信心。刚刚解放的大多数上海市民一方面普遍对共产党怀着亲切之情，真心支持新政府，另一方面却为国民党对共产党长期的丑化和恶毒攻击所困扰。社会上到处流传着特务们故意散布的谣言：“国民党很快要反攻大陆”，“共产党在上海呆不久，解放军过了中秋节就走”，在宗教界，则普遍流传着“共产党不信教，要消灭宗教”的说法。上海的大资本家们拒不与新政府合作，一时间物价飞涨，人心惶惶。

1949年，陈莲笙虚龄33岁。

这样的特殊年代里，正当而立之年的陈莲笙是如何面对眼前错综复杂的局面呢？

他从自己在旧社会的亲身经历中，看到了当时社会的畸型，看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敏锐地观察到腐朽的旧势力早已丧失民心。旧社会道观受到层层盘剥，道士的社会地位低下，其实与劳苦大众只能过着悲惨贫穷的生活，有着一样的根源，就是



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道教的衰微只会延续下去。而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掌握了政权，掌握了自己命运，任谁也无法逆转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洪流。因此，他从内心里感到共产党的伟大，相信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从而很快就由一般上海市民都曾有过的犹豫、观望转变到拥护新政权的立场上来。

陈莲笙作为正一派的高道，自然深刻领会正一派积极参与世俗社会的建设的道理。在他看来，正一派道教不仅是清心寡欲的强调个人修成仙果的宗教，还是渗透在广大民众生活中，为民众谋福利，“修道为人”的宗教。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已经流传了近两千年，早已深深扎根在民间。道教追求的神仙境界，自由自在的生活，与广大民众的解放，是完全一致的。要振兴自清以降衰落的道教，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继续发展道教事业，就必须适应新社会的变化，积极和新政府合作，以热情的姿态投入新社会的建设。

当时国内宗教界的情况比较复杂，1949年9月在北平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宗教界人士代表共8人参加。新成立的中央政府于1950年5月召开全国政协宗教事务组第二次座谈会，讨论如何对待宗教的问题。周恩来总理亲自作出指示：“政府与宗教只求政治上一致，不求思想一致，各宗教应在教言教。”7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内设立了“宗教问题研究小组”。小组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宗教的情况和问题，并就有关方针、政策性问题提出意见，1951年1月9日和7月12日，政务院分别作出指示，在政务院和各大行政区文教委员会内设立宗教事务处，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部分省辖市和专署及县建立宗教工作机构，列为各级政府的直属机构





之一。由此开始，各级政府宗教工作机构逐步建立。宗教处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对各宗教的政策性问题，及各宗教团体的工作。

新政府终于明确地阐述了宗教政策！这个指示一经传达，陈莲笙立刻很欣慰地松了口气，那些关于“共产党要消灭宗教”的流言蜚语以及某些宗教界人士的担心全都不攻自破。陈莲笙在欣慰之余，也着手开始准备向新政府表明自己的态度。

机会很快就来了。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命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9月15日，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在朝鲜登陆，并且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着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为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和主权独立，中央政府于10月8日毅然下达了抗美援朝动员令。一场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群众运动在全国展开，上海人民也都磨拳擦掌投入到这场运动中。

就在上海各界积极地为抗美援朝贡献力量时，陈莲笙也在思考道教如何能为新中国出一份力量。当时上海宗教界各宗教机构大多响应政府的号召，组织信众捐款捐物。道教界当然不能落在后面。1951年，陈莲笙联合上海虹庙住持张源锬和上海关帝庙等道观的负责人，发起了上海道教界支持人民政府，为抗美援朝捐赠物资的活动。他很明白在这样的时刻，道教界的热烈响应政府的号召，是道教的优良传统，为国家作贡献是每一个道教徒应尽的义务，同时，这样做也是用实际行动支持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好时机。道教界在陈莲笙等人的带动下，各个宫观尽可能地行动起来，各宫观的道长、散居道士，在爱国主义情感的鼓舞下，本着“达则兼济天下”的态度，捐款捐物，积极配合政府的政策，为抗美援朝添加自己的一份心力。当时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旧社会里上海的道教备受摧残，



处于每况愈下的境地中，即使在解放后，道徒们获得了新生，但如何适应新的社会，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一部分宫观的自养也出现了问题，所以当时的道教处境比较困难。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动员起来，确实是克服了各种困难的结果。道教界的这次活动，一方面表现了道教徒们发扬了爱国主义的好传统，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陈莲笙等发起人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

陈莲笙干劲十足地奔走于道教界，凭借自己在正一道的声望为国家的事情操劳奔忙。他也希望通过响应政府号召的方式为道教界争取政府更多的关注。他在晚年回顾起这段历史，曾经自豪地说：“上海道教界主动出来为人民政府做工作，我也算是第一人了。”

二

不过，当他满腔热情地盼着表现自己的政治热情时，却遇到了一些复杂的当时不知怎么理解的事。这对他的政治态度，是一次考验。

第一件事，中国传统的其他宗教都陆续建立起自己的全国性的组织，并且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肯定，而道教组织的筹备迟迟没有开展，陈莲笙内心不由焦急起来。

1950年，政务院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基督教的代表，同年9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基督教界发表的《三自宣言》，基督教获得了新政府的公开承认。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基督教界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为志愿军捐款捐物。1954年7月，中





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获得了中央政府的支持。自此，基督教走出解放初期内部的复杂局面，取得了政府和全国人民的认同。差不多同时，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也在政府的支持下成立。

与道教共处了近两千年的佛教也有了新的起色。1952年11月4日至5日，全国佛教界二十多位著名人士在北京发起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书》，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筹备组，又经过半年的筹备，1953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和有关决议，从此中国佛教协会正式成立，佛教得到了新政府的正式承认。

1952年7月，由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中的穆斯林知名人士包尔汉、达浦生、马坚等在北京发起筹备，翌年5月11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中国伊斯兰教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正式成立。伊斯兰教也正式获得新政府的承认。

只剩同样位列五大宗教之一的道协组织工作还没有展开，这让道教界人士感到非常失落。陈莲笙也与大多数道教界人士一样，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焦急、惆怅同时又抱着希望。

对于道教的认定工作因为各种原因显得迟缓，也直接影响了上海道教界人士对某些社会活动的参与。最让陈莲笙感到难受的是：1953年上海宗教界举办各宗教界人士反美联合大游行，其他已经被国家正式承认的四大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当时在上海还有一定影响的犹太教和东正教，都收到了邀请，惟独道教没有获得邀请。前景不明，使得道教界的人士在这个时候，感到从未有过的失落。

怀着这种失落与委屈的心情，陈莲笙来到当时管理宗教事



务的民政局，试图向中国人民救济总署的领导反映情况，为道教界争取参加游行的权利。其实在陈莲笙的心里，参加游行的权利就是获得政府认可的标记呵！他又找到了当时佛教界领袖、著名的宗教爱国人士赵朴初先生反映问题。

陈莲笙作为一名虔诚的道教徒，在新形势下要坚持自己的信仰，为道教的发展作点贡献，路在何方呢？迷惘中陈莲笙徘徊犹豫了一段时间，决定索性离开道教界，到上海大世界去研究民乐。他希望暂时的离开能使自己冷静地观察形势变化，再为振兴道教寻找合适的时机。作为正一道的高士，他的音乐功底自然非同一般的扎实，吹、拉、弹、唱无一不精，在当时犹如娱乐总汇的大世界工作，如鱼得水。

然而陈莲笙仍然常常为着道教的前途而忧心忡忡，毕竟他已经投身道教二十多年，道教的信仰早已深深地植入骨髓！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密切关注着国家形势的变化。同时，他虽一度有些消沉，但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拥护始终未变，对贯彻共产党的宗教信仰政策的希望和信心也没有改变。

过了不久，他的希望终于获得了实现的机会。

三

其实，人民政府并没有忘记道教这个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只是由于在历史上道教比较松散，在认定其性质上，存在一时的困难。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束和国内局势的好转，使政府开始考虑把成立道教协会的问题提上日程。到了1955年时机成熟，上海市人民政府开始了主动和道教界人士的频繁接



触，商量成立上海道教协会的事宜。陈莲笙闻讯之后立即放下大世界的工作，返回道教界，与同道们一起着手策划成立道协的事情。两年的等待对于他来说已经太过漫长，他要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规划道教的发展前景。随后的日子阳光明媚，虽然筹备工作有大量前奏要做，他却觉得每天都精神抖擞，仿佛有使不完的劲激励他东奔西忙，和各方面协商道协的事情。

1956年，“上海市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在上海市人民政府



■ 1957年上海市道教界第一次代表会议全体代表合影，第五排左2为陈莲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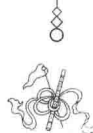


的支持下很快成立了。39岁的陈莲笙凭借其爱国热情和对道教事业的奉献精神，丰富的道教知识，多年累积的道教修养，娴熟的斋醮科仪，多年来在道教界广泛的影响力以及高尚的人品、旺盛的精力和工作热情，被道教界一致推举为筹委会秘书长。1957年，又召开了上海市道教界第一次代表会议，陈莲笙出席了会议。

同年全国道教协会的筹备工作也有序展开。1956年夏天，由沈阳太清宫方丈岳崇岱联络全国各地道教人士，在新政府的支持下，着手准备中国道协的组织工作。1956年11月26日，岳崇岱、易心莹、陈撄宁等著名的道教人士23人，齐聚在北京西苑饭店，成立了中国道协筹委会，商讨成立中国道协的事务。1957年3月，陈莲笙在上海主持了上海道协筹委会的第一次会议，之后他被选举为上海道教界的代表去参加北京中国道教协会的成立大会。

经过中国道协筹委会半年多的筹备工作，1957年4月8日筹委会在北京的前门饭店举行了道教界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2名代表，共同讨论了中国道教协会的章程、宗旨。在这次会议上，中国道教协会正式成立，会议选举了道协第一届理事会，岳崇岱被选为会长，汪月清、易心莹、陈撄宁等人被选为副会长，陈莲笙被选为理事会理事。1957年5月20日，新政府内务部部长谢觉哉正式批准中国道协成立登记，发给社宗002号社会团体登记证，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对道教的正式承认，道教正式成为合法的宗教团体。

中国道协的成立是中国道教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也是道教在中国发展历史中的里程碑。纵观道教的发展历史，从来就





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组织，道教诸派别各自为政，虽然江西龙虎山张天师统领三山符篆后使得道教形式上有了一定的统一，但是仍有正一、全真之分，缺乏组织上的统一机构。道教自明世宗时起就开始衰落，清代统治者对道教的贬抑更使道教不断走着下坡路。四分五裂的道教组织状况是导致道教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难以复兴的原因之一。现在中国道协在新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组织形式上的统一，政府的鼎力支持，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清清楚楚地写明“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道教似乎正面临一个百年难遇的自由发展良机。能遇到这样好的机会并亲自参与其中，陈莲笙此前的苦闷早已一扫而光，他对道教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为身处这样一个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而庆幸，同时也为自己能赶上这样的好时机而兴奋不已。

1956年，陈莲笙40岁，按实足算，只有39岁，在与会的代表中，是一位年轻人。所以当时像陈撷宁等老前辈，亲切地叫他“小陈”。他呢，对于老一辈的道长，则是非常恭敬，见了陈撷宁，都会按道门礼数致敬。当时正当英年，他又一向有爱好清洁的习惯，穿着素净而得体，说起话来，善言善语，让人容易接近。同时，人们听得出，他说话比较实在。在会议休息时，常常拿出一管竹笛，自娱自乐地吹奏起来。所以当时的他，给与会的代表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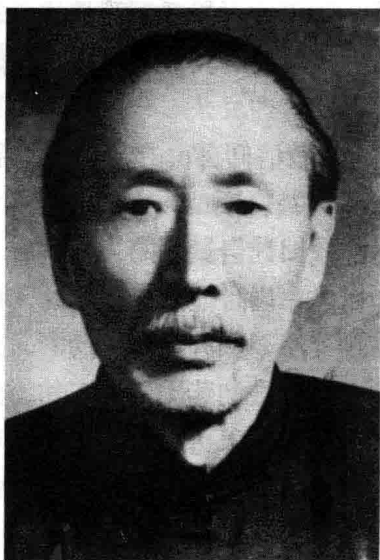
从北京回来以后，陈莲笙就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上海市道协的筹备工作中。作为市道协筹委会的秘书长，上有筹委会的



主任委员领头，下有好几位助手一起工作，担子不算最重，却也不轻。因为秘书长的工作，是各色各样的具体工作，不免繁琐，有时还让他觉得零零碎碎，不易打理。

当时，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同时，从50年代开始，中国正在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处于这样一个急剧变革的年代里，像陈莲笙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就有一个不断学习、跟上时代的任务。所以，当时他与筹委会的其他成员一样，积极地投入了对新的政策法令和有关精神的学习之中。作为秘书长，他也有责任为宣传和贯彻落实做好工作，因此那时他和助手们经常奔波于各个道观，传达党和政府的各项宗教政策和法令，配合政府完成道教界的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组织道教徒积极参与社会生产实践。同时，还要督促教徒们自觉提高自身的宗教素养，和道教界的知名人士讨论道教的进一步发展。那段时间陈莲笙起早贪黑地忙碌着，连家都顾不上回，吃、住基本就在道协筹委会所在地上海白云观，常常一出去就是一整天，再披星戴月地赶回白云观。谈到这段忙碌的时期，陈莲笙自己曾经感慨地说过：“那时，我将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上海白云观中了”。这段忙碌的时期不仅为道协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陈莲笙个人的修道生涯，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结识了一些以前未接触过的道教界知名人士，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中对他特别有影响的是著名的道教学者陈撷宁。

陈撷宁(1880—1967)，安徽怀宁人，原名元善，志祥，因喜读《庄子》，改名为撷宁，道号圆顿。他于清末考中秀才，却无意于仕途，后入安徽高等政法学堂学习，曾经师从严复。陈自幼身体孱弱，虽然多方求医，依然未见效果。陈在政法学堂



■陈撷宁

的学习也因身体原因而中途退学，后陈潜心学道，游历道教名山大川，拜访名师寻求仙道养生之术。他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确信仙道的养生之术确有效益，后来在上海白云观通读明代《道藏》，潜心研究道教仙学。陈撷宁一生出佛入道，又深谙儒家经典，终于创立独成一家的仙学，为现代道教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3年7月1日《扬善半月刊》在上海正式创刊。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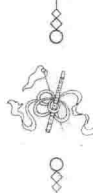
由当时的翼化堂善书局主办的刊物，本来是以一般意义上的“扬善”为宗旨的，陈撷宁担任主笔之一后，渐渐突出了研究仙学为主的倾向。1938年5月，陈撷宁担任上海仙学院的教授，主要讲授《灵源大道歌白话注解》、《黄庭经讲义》、《孙不二女丹诗注》、《悟真篇》等丹经道书。1939年1月《仙道月报》创刊，陈又担任其主笔。在这一时期的著述中，陈撷宁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仙学理论，他认为仙学即是古神仙家所事之养生学，是一种科学体系，仙学的主旨是打破生灭规律，追求长生久视。陈自己说他的仙学宗旨就是“惟生”，肯定人生的意义，“生”是唯一重要的。要追求长生，就务必重视丹道的炼养，在上海居住期间，他曾在自己家中按照道书的记载试验炼丹，证实道书记载的外丹炼制法确有依据。陈也注重内丹的



修习，并且对女丹功法做过深入的研究，除了《孙不二女丹诗注》外，陈还著有《答吕碧城女士三十六问》、《附录女丹十则中一段按语以补答杨君所问》，对近代女丹功法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除了实践道经记载的修养法，陈撷宁还在《中国道教源流概述》等文章中深入探讨“道”的意义，他认为“道”不限于“清静无为”的消极之面，也不限于“炼养、服食、符箓、经典、科教”等狭隘的范围，“道”贯穿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方方面面，大可治国齐家平天下，小可修身养性，飞身成仙。

1936年上海道教界发起组织中华道教会，陈撷宁为之撰写了发会辞。抗战胜利以后，陈游居于杭沪之间，专注于静功研究，他认为“静功完全是静，在气上只是顺其自然，并不用宗教的意思去支配气的动作”，无论男女老少，性别年龄，都可以修习静功。经过陈的研究和提倡，“静功”作为一种安全易行的健身功夫逐渐流传开来。在清末与民国的道教衰微时期，国家动荡，社会不安，生活艰难的条件下，陈撷宁依然学道不辍，不曾放弃道学研究和弘扬道学，堪称是现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道教学者、炼丹家和养生功法导师之一。陈撷宁曾参加第一届中国道教协会的筹备工作，中国道协成立后，曾担任过副会长兼秘书长；后来又担任了第二届会长。

尽管陈莲笙和陈撷宁同在上海很多年，由于二人的接触道学方式不同，却很少有机会认识交往，陈莲笙主要在正一道内活动而陈撷宁以仙学见长，接触正一道比较少，因此解放之前陈莲笙也只是对陈撷宁有所耳闻。直到1956年，陈莲笙为道协的事情忙碌不停，在上海市宗教处遇见陈撷宁，自此二人才相互认识。这次认识对陈莲笙以后研究道教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正一道素来重视斋醮科仪，对于道教文化的探讨和弘扬，重视得相对比较少，认识陈撷宁后，陈莲笙开始对道教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后来陈撷宁北上北京去中国道协任职，在走之前，他送给陈莲笙四个红木箱子，让其保管，里面装满了陈撷宁多年收藏的字帖、经书，还有珍贵的明代《九霄经》等典籍。陈撷宁还特别关照陈莲笙：“小陈啊，这几只箱子里的东西很珍贵，好好保管，一定要保管好啊！”聪颖好学的陈莲笙得到这些珍贵的资料如获至宝，研读这些书成了一段时期中他的习惯，也为他以后弘扬道教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与参考。

经过这段时期为道协的工作，陈莲笙自豪地感到，随着国家对道教地位的承认，道士的地位在新中国也有了质的飞越，道士们不再像旧社会一样被人瞧不起。而且，就陈莲笙个人来说，也感受到了新社会中生活的稳定和改善。他家里有六个孩子，陈莲笙对子女的要求都很严格，每个子女都要上学，学费昂贵，加上抚养四个老人，生活的重担是可以想见的。旧社会里，他每天东奔西跑地做道场，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养家糊口。解放以后，六个子女的学费全免，大大地减轻了陈莲笙的生活负担。陈的六个子女中，有四个在大学读书，不但学费全免，每个月还发给生活补贴，孩子的学业在新政府的支持下得以继续。每当陈莲笙谈到这件事，他总是对新政府充满感激之情，倘若在旧社会，道士地位低下，官府敲道士竹杠还来不及，哪里会提供什么补贴！四个子女读大学的学费恐怕也是陈莲笙依靠做道场无法提供的。这种安定的生活是共产党为他带来的，陈自己也有了时间和精力来研究道教文化，为道教在新时代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五

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使得成立不久的道协的正常活动没有延续太久。由于各种原因，国内的运动又此起彼伏地展开。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之后，道教界面临建国后第一次比较严峻的考验。社会上对道教的批判骤然增多，尤其反对道教的斋醮科仪，认为那是迷信，应该被禁止。当时情况最严重的时候，连老人过世葬礼上按风俗做做道场也一概遭到反对。陈莲笙本人也遭到了一些批判，他的情绪被这突如其来的反对打压下来，悲观消极的情绪无可抑止地抬头，工作热情也因此冷却下来。道协的领导看到陈莲笙如此消沉，就亲自来鼓励他，尽管处境艰难，道教的工作还是要继续下去，不能因此就中断这延续数千年的古老宗教啊！道教在这长长的数千年间，曾经经历过多少次磨难才延续至今，哪次不是靠道教徒的坚毅和顽强渡过难关？

然而反右倾运动刚结束，1962年“四清”运动又开始了。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45岁的陈莲笙正值盛年，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动荡的政治环境，他忍不住说了些针砭时弊的话。事后，有些人研究他的话，竟从中挑剔出一些被认为是“对现世不满”、“对领袖不敬”的意味。幸亏陈莲笙平时在道教界以爱国爱教，一贯拥护政府，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而闻名，特别是他待人待事方面有名的温良恭谦，不偏不倚。由于陈莲笙的好人缘，他在道教界内部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再加上他在教内特有的威望，总算帮助他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没有被扣上右倾分子的帽子，但处分是无法逃避的，陈莲笙受到的处分是：不点名批评。上海市道协筹委会秘书长的职位



自然被免去，每天早晨一早就去沐恩堂报到，晚上才能回去，最后还要写检查。

凑巧的是，上海佛教界的真禅大和尚，当时也被隔离在沐恩堂。这样，一僧一道，就这么偶然地聚合在一起。整整三个月时间，这两位佛、道界的高士聚在一起接受改造和交待思想。同时，他们在这期间有机会深入地探讨了佛、道义理和二教融合与分歧。这段特殊的友谊也在佛道交往的历史上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上海市道教协会筹委会恢复活动，真禅大和尚看到道门实在困难，便对陈莲笙说：需要什么，只要我这里有的，都可以先拿去！原来，真禅所在的玉佛寺，由于对外交流的需要，还在70年代初就恢复了开放，尽管在那个年头，宗教界都与富无缘，但比起道协所在的白云观来，



■陈莲笙与真禅法师（左）合影



条件要算好到天上了。共同的经历，使他们能在后来的岁月里相互支持。这是后话了。

三个月的教育完成之后，陈莲笙向领导提出离开道协，下到农村劳动改造去。然而内心里，陈莲笙如何舍得离开奋斗了多年的道教界呢？领导上知道陈莲笙的心思，道教的工作还是要继续下去，再没有比陈莲笙这样熟悉道教的人更适合在道协里工作了。一番劝说下，陈莲笙终于又留在道协内了。被免了筹委会的秘书长一职，陈莲笙想自己能做别的什么有意义的事呢？经过一番思考，他决定进行道教的文化研究，研究上海地区各个宫观的状况和历史。这个工作可不容易，需要到每个庙进行实地考察，于是陈莲笙开始到处跑。南汇的周浦，嘉定，还有川沙等边远的地方，都有陈莲笙考查的足迹，他要去考查这些庙的现状、历史，庙里供奉的神像和法器等等。

考查期间，陈莲笙发现这些基层道观里有很多珍贵的文物和经书，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珍贵的资料在基层道观里却不能得到妥善的保存。他把这个情况上报给了道协筹委会，经过政府部门的再三考虑，上面同意陈莲笙负责收集这些文物，统一存放到上海白云观保管。于是陈莲笙又带着人，到各个庙里逐一收集值得保护的道教文物，如三泾庙、大王庙、会真观等，都是他多次考查过的场所。在他努力下，一些小庙的文物也被陈莲笙收集到道协。至于一些大庙的东西，陈莲笙收集得比较顺利，大庙的住持大多正在接受批判和改造，在当时那个环境下，没人出面阻止陈搬这些法衣、经书、铜器、木雕、书画、象牙笏板等等。尽管这些东西非常珍贵，却几乎没有花费道协什么资金，很多东西直接运送来道协，有些象征性地付些钱，也就很顺利地收了来。包括陈撷宁送来的四大箱书，都被存放在





白云观的道协筹委会里。

尽管陈莲笙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保存这些珍贵的文物，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他费尽力气收集来的这些珍宝，在“文革”中却恰好因为集中而毁得更加彻底。为此陈莲笙受到过很多人的指责，大家都知道他收集了这么多好东西放在白云观。

1966年，“文革”爆发，一场空前的浩劫给了陈莲笙等道教徒们空前的打击。一夜之间，他们就由爱国的宗教人士变成了“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成了人们的活动目标。

1966年8月23日夜晩，这个不平凡的夜晚对于上海道教界来说是永远无法遗忘的，即使时隔多年人们不愿意再提起它，它仍然如一道不会褪却的伤痕，烙在道教的历史上，也烙在陈莲笙的记忆里。这一天，临晚上了，陈莲笙没有回家，正在白云观里忙碌着，做完了一些工作后，开始研读经书。

在这个平静的夜晚，远远地传来一阵阵喧闹声、口号声、脚步声，陈莲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这阵喧闹却离白云观越来越近，仿佛直冲白云观而来。陈莲笙有点坐不住了，将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外面喧闹的人群在白云观门口停下了，他们撞开门，呼啦一下涌了进来。原来是一群兴奋异常的红卫兵，领头人一声令下，他们立即开始在白云观里乱打乱砸，什么经典、文物、神像，通通被扔得散落满地。在这些小将们眼里，白云观里收藏的全是旧社会的遗物，都应该被捣烂砸碎。他们太年轻了，只知道凭着浑身的热血冲动行事，哪里明白什么是宗教文化、珍贵典籍，他们只想着拆庙，烧经典，砸神像，越是古老的东西越是应该打碎砸烂。

陈莲笙早已被轰出屋子，站在一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悉心收集来的宝贝被破坏。他们每砸一样文物在陈莲笙心里都



是一阵心痛。他惊异于眼前忽然发生的事情，不明白究竟是为了什么。曾经恭恭敬敬供奉的神像，满园散落的经卷和文物，他现在却无力保护它们免遭破坏。一个红卫兵翻出一套装帧精美的明版经典，恶狠狠地丢到院落中的泥地里。陈莲笙再也无法控制他的情绪了，他曾经多少次阅读这本经卷，诵读里面的经文啊！每次阅读的时候，他总要恭恭敬敬地请出经书，小心翼翼地翻阅，生怕把它弄脏弄坏。现在这部熟悉的经书竟被扔到泥地里了！陈莲笙跑了过去，蹲身收拾这部已经受损的折子本经籍，心痛得无以伦比。一个小将冲了过来，大声呵斥他：“赶紧放下，给我站回到原来的地方去！”

经过一个晚上的折腾，第二天早晨陈莲笙来到白云观一看，所有的东西都被扔到观里的天井了，包括陈撷宁送来的极其珍贵的明代《九霄经》。陈莲笙忍不住冲到井边想把这个珍本翻出来，在场的干部马上严厉地训斥他：“陈莲笙，你想干什么？你还想留下来复辟吗？”陈莲笙无奈，只好住手，眼看着珍本就这么毁掉了。经过这一番打砸烧毁，白云观里的文物除了八尊铜像其他都荡然无存了。不幸中万幸的是，上海白云观内原来有一部明《道藏》，还在50年代就捐给了市文管会保管，得以逃过此劫。待到改革开放以后，这部《道藏》才发挥了它特有的作用：被用作重印道藏的参考版本之一。不过这是后话了。

在当时混乱的局面下，任何人要想做一点正常的事，反而十分困难。比如上面提到的种种破坏，是在完全失控的情况下发生的，任何个人岂能阻挡。不过，在混乱中，却也偶尔会有一点儿缝隙。原来当时许多文物都被当“四旧”毁了，但是经过四清等运动，一般对于单位的账册，倒是注意保护起来，不予销毁。这给了陈莲笙一次小小的机会：他将当年挂在老君堂





的一幅老子画像拓片偷偷地藏到了一大摞账册一起，才使得它躲过了祝融之灾。说到这幅拓片，似乎没有多大价值。其实不然，这幅老子像，据说原系著名的画圣唐吴道子所画，在宋代刻石，藏于苏州玄妙观，拓片出于民国，当时刻石完整，系在石上的原拓。不像后来，原石牌因为久经动乱保护不良，已有风化损伤，已不及民国时完整；待改革开放之后，又因考虑到保护文物，原石不准再拓，只另外复制一石以备拓。所以，当年陈莲笙的略施小计，倒为白云观留下了一幅宝贝。“文革”结束后，白云观恢复，老子像重新悬挂于老君堂，陈莲笙看到之后，我们不知他心里作何感慨。只是这是后话，且放过一边。

经过这番闹腾，白云观里不仅文物被毁，同样被毁的还有道教的事业。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政府的支持下，道教地位得到确认，道士也获得了和别人平等的地位。陈莲笙带领着上海道教界的同仁，费心收集道教的文物古籍，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道教研究，惨淡经营道教事业。“文革”一开始这十多年的心血就毁于一旦，道士本人也成了“牛鬼蛇神”。这番打击把本就衰微的道教更弄得奄奄一息。但是，在那样艰难的情形下，各级党委还是尽其可能地保护了一批爱国爱教的宗教界人士，统战部的同志们在那个复杂的条件下，尽一切力量展开工作，努力保护陈莲笙这样的宗教人士免受更大的迫害，想方设法给他们安排新的岗位，以避开“文革”的旋涡。于是，陈莲笙在“文革”中转业了，他被安排在上海市南市区立新电气厂工作，从一位道门世家的继承者变成了一个普通工人。



第五章 走上道教界的领导岗位

1976年，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件，许多大到足以改变中国未来面貌的事件。毛泽东的逝世，“四人帮”的倒台，都是震惊中国乃至于世界的大事。与任何一个中国人一样，陈莲笙的后半生，注定要随着这种大变化而跟着巨变。

整整十年，陈莲笙离开了道教队伍，同道教乃至整个民族一样，他个人的命运也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历史浩劫中步入了困境，无法依照原来的宗教生活生存下去了。但他并没有消沉，而相信党和国家是一定会扭转这种局面的。物极必反，否极泰来。随着十年浩劫退出舞台，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开始恢复正常，尤其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陈莲笙看到了道教恢复的一线曙光。然而，在最初的欢欣之后，陈不得不再次默默地等待。直到三年之后，1979年，他参与筹备并担任过理事的中国道教协会开始恢复工作。1980年5月，他登上了北上的火车，赴北京参加中国道教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的陈莲笙，心中可谓是百感交集。百废待兴的国家，饱经苦难之后重现活力的人民群众，纷至沓来的回忆的思绪，交织纠结的心中的感慨，也如同快速前行的列车一样在他心中奔腾不已。





饱经沧桑的陈莲笙看得非常明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对于我们的国家，以及像自己一样的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来说，是一次新生。今天的安定局面真可谓来之不易，

不过，在赴京的火车上，陈莲笙还不能想清楚这些骤然出现的新鲜事物。他只是凭借自己的直觉与经验感到，从这以后，许多政策都会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在宗教问题上。他坚信，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不久就会回来的。他的直觉是正确的。1978年12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会议确定：认真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妥善安排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和活动场所，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于是在政府部门主导下，为宗教界落实政策，成了这时期宗教恢复生机的切入点，也成为所有宗教界人士奔走的中心议题。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1979年9月，中国道教协会重新恢复了活动，并定于1980年5月7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中国道教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经过十几个小时的火车，陈莲笙来到了北京，和全国各地、各道派的代表以及道教研究工作者共52人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当看到许多老朋友劫后余生，还能再在北京聚首，大家都不免心生感慨。只是，紧迫的会务使得他们没有时间多叙旧，而是投入了认真的讨论之中。

这次会议上，对原《中国道教协会章程》作了必要的修改，修改后的宗旨是：“团结全国道教徒，继承和发扬道教的优良传统；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推动和开展道教研究工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由39名理事组成的第三届理事会。陈莲笙被选为理事。第三届理事会进



而选举产生了常务理事会和正、副会长。常务理事13名。选举黎遇航为会长，王教化、陈理实为副会长，王伟业为秘书长。

这次会议是“文革”结束后，全国道教界人士的首度聚首，也是中国道教走向复兴的一个起点。代表们历经十数载的磨难，重又济济一堂，心中自然是感慨万千。

陈莲笙在1956年首次参加中国道教协会的筹备，后又参加了中国道协的成立大会，距离“文革”结束后的第三次全国大会，整整二十四年。二十四年中，发生了多少变化呀。当年他还是不到四十的中年人，在与会的代表中，相对还算年轻。而现在，却已是六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了，举目四望，与会的各地代表，多数也与自己差不多，有的则更加年长，早已白发苍苍。他一方面庆幸自己在六十多岁时还能迎来道教的春天，同时，也产生了空前未有的紧迫感：要趁着现在身体还好，要赶快多做工作，使中断了的道教事业尽快恢复和发展起来。

就在1980年的5月15日，中国道教协会第三届常务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根据第三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会议讨论了《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三年规划》、《白云观修缮工程规划》和《重新出版〈道协会刊〉的计划》。至此，作为全国道教领导机构的中国道教协会已完全投入正常运转，各项工作也全面展开。按新《章程》规定，每年召开一次常务理事会，商讨和决定年内的主要工作项目，每两年召开一次全体理事会议，总结工作和决定大事。

1982年10月21至27日，陈莲笙赴北京参加了中国道协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会址仍然选在中国道协所在地北京白云观。会上，理事们讨论了《拟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道教全国重点宫观名单》和道教知识专修班的教学工作；制订了《道





教界爱教公约》。这两个文件都让陈莲笙感慨不已。前一个文件，确定了最早一批拟作为宗教场所开放的宫观名录，这对于陈莲笙这样的道教界的老人，也是向往已久的事。原来，道教的宫观本来就是宗教场所，供信众、香客参拜神灵，为自己和民众举办各类斋醮仪式，以满足信众的宗教需要。然而，经过“文化大革命”，许多宫观被改作他用，虽然建筑还在，实际的功能却没有了。现在经过政府的批准，将要恢复为宗教场所，在道教界的老修行、老道长的心中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是不难想见的。后一个文件，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国道教界共同的行为规范，体现了爱国与爱教统一、保持道教的信仰与同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统一，所以他对此表示坚决拥护。此外，这两份文件，也给了陈莲笙极大的鼓舞。他明白，道教界真正的春天已经到来。

全国的形势大变，那么上海呢？他从北京开会回来，带着新的讯息，更带着一份紧迫的心情和朦胧的信心。

二

中国道教协会的工作是步入正轨了，但陈莲笙深深明白，更为繁琐更为艰苦的工作正等待着自己，特别是自己所在的城市——上海，原有的领导机构早已不复存在，各项工作还处于停止和空白状态。从北京回到上海后，陈莲笙道长就马上投入到了上海道教复兴的具体工作中。

198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切实贯彻党中央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批准上海市道教协会筹委会恢复活动。应各方面人



士的推荐，德高望重的陈莲笙道长欣然出任秘书长一职，担负起维护道教界合法权益、协助政府落实宗教政策的繁重而重要的工作。然而，从废墟中建起大厦毕竟不是一件易事。首先摆在陈莲笙道长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就是人员缺乏的问题。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十年动乱中，道教界人士或因冤假错案而遭不公正对待、蒙受不白之冤，或因当时的社会风潮而被迫还俗离开道教，以致于现在人脉衰落。为此，陈莲笙道长与沪上道友一起四处奔走，促使政府尽快纠正、平反道教界人士的冤假错案，使得大批道教界的人才得以出来工作。同时，积极开展宣传工作，使得被赶出宫观、还俗的道士在国家宗教政策和道家宗教精神的感召下重归道门。

与此同时，各处宫观的收回工作也被摆上了议事日程。为了尽快使上海的道教活动恢复往昔的生气，为了早日使上海的广大信徒拥有宗教活动的场所，在陈莲笙和上海道教界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努力下，经过积极与政府的宗教事务部门进行沟通，寻求社会各界的支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相继收回了包括上海白云观、浦东钦赐仰殿道观在内的八座道观，请回了道教神像，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在沉寂了十多年后，上海道教界终于开始呈现出了生机萌动的景象。

陈莲笙非常清楚地明白道教组织的重要性。从上海市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重新恢复活动，到上海市道协正式成立，在近四年的时间里，陈莲笙和其他同道一起，经历了非常艰苦的工作，但不管多么艰苦，在他看来，与“文革”时期相比，真是算不上什么，更何况眼下的一切都在变好，再多的困难，只要大家同心协力，就一定能克服。他知道，现在的道教事业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毅力与信念。渐渐的，他们觉得工作开始好做了，





社会各界对于道教的态度渐渐在变化，更加理解，更加友善，政府部门对于道教恢复支持的力度也在加强。这一切，陈莲笙心里很明白，这是党的宗教政策落实的结果。这时的他，不仅从政府部门和报纸上了解和学习中共中央有关宗教工作的有关精神，而且，还参与了当时还是新鲜事物的上海市宗教学会的活动。与学者们的交往，使得他能够突破原来局限于宫观活动的眼界。80年代初，学术界正在讨论宗教是不是鸦片的问题，实际上还扩大到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段时间，他听过传达和学习过的文件有很多，不过对于像他那样的宗教界人士来说，眼中最重要的，也是使他获得了巨大鼓舞的中共中央文件，莫过于19号文件。

1982年的19号文件，其名称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它发布于1982年的3月，是第一个全面系统地阐述在新时期党对于宗教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政策的文件。文件对“宗教信仰自由”给出了详尽的解释：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这个文件，认真总结和汲取了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在宗教工作中的历史经验，全面阐述了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成为新时期处理宗教问题的纲领性文件。

陈莲笙由于经常参加宗教学会的活动，听到的，思考的多了，对于文件的分量更加体会至深。这个文件是党的文件，是指导党的宗教工作的，但站在道教立场上看，无疑又是肯定自己存在的合法性的保证，是今后落实政策、为道教界争取合法权益的“尚方宝剑”。政治环境的好转与改善，宗教信仰自由政



策得到切实的贯彻落实，使得道教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春天。但十年浩劫中，道教的各级协会被迫停止活动，宫观被视为封建迷信场所，神像及道场设施遭到毁坏，道人也多被还俗遣散，道教活动基本停滞，可以说是大伤了元气。然而，对于陈莲笙道长这样饱经世事变迁早已大彻大悟的智者来说，“文革”的苦难不过只是一时的凄风苦雨，惟有心中纯粹圣洁的信仰才是永恒不变的，即便身处逆境，他也始终未曾放弃振兴道教事业的坚定信念。面对道教界百废待兴的局面，这时的陈莲笙道长，虽已年过花甲仍老骥伏枥，凭着一腔壮志，重又返回了道教界的领导岗位，一如既往地为一道教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985年4月22日，上海市道教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上白云观召开，出席代表105人。大会审议通过了《上海市道教协会筹委会工作报告》、《上海市道教协会章程》。选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42人，常务理事15人。陈莲笙道长当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协会宗旨为：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团结全市道教徒，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循道祖“道法自然”的教诲。爱国爱教，继承发扬道教优良传统，整理研究道教文化遗产，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全市道教徒的合法权益，积极参加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这次会议标志着上海道教团体在组织上和制度上的正式形成，为以后的上海道教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从上海市道教协会成立以来，陈莲笙一直担任着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职务，有一段时间，还代理过会长。1990年11月26日，上海市道教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海上白云观召开，出席代表136人。大会修改通过了《上海市道教协会章程》，选举产





生第二届理事会理事48人，常务理事19人。“文革”后为上海道教事业复兴作出贡献的陈莲笙道长众望所归地当选为会长兼秘书长，负责协会的全面工作。

与此同时，陈莲笙道长还兼任着中国道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一职，行政工作不可谓不繁重。但早已年过古稀的陈莲笙道长依然有着不输给年轻人的干劲。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事物深刻的洞察力，使得陈莲笙道长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独到的眼光，所以，能够针对上海道教的实际情况，提出许多富有远见而又切实可行的意见，比如，在上海市道协恢复活动不久，他就提出来要兴办道学院，用新的方式方法培养人才，同时又支持另一位学者、也是上海市道教协会的副会长潘雨廷先生的建议，筹备上海道教界自己的刊物。这些，后来都被证明是十分适时的举措，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在高效率地完成行政工作的同时，陈莲笙道长更积极探索道教如何适应社会、适应时代的新思路。陈莲笙道长认为，道教要生存、要发展，必须要积极主动地去适应社会、适应时代，新时期的道教徒要改变那些落后于时代、不适应时代的观念。要在教理教义上丰富和发展对“道”的认识，“道”是道教的基本信仰，信道崇道是不能变化的，但是“道”的内容是应该随着时代进步而向前发展的，前辈道长对于道的理解和认识，应该由当代教徒作出补充、修改和发展，以丰富道教的教理教义。在道法、道术和道教仪规方面，某些为当代社会生活需要的内容，应该加以发扬光大，对于道教的优良传统，应该加以弘扬，对于某些不适应社会的部分内容，应当加以适当的调整，使之更适应社会，造福人民。只有与时代保持紧密联系，道教才能始终保持蓬勃的生命力，才能始终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存在下去。



三

1992年3月2日至6日，中国道教协会第五届代表会议在北京京丰宾馆举行。来自全国23个省市地区的111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成为了陈莲笙道长事业的高峰，他不仅再次当选为中国道教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更被选举为中国道教协会的副会长。这不仅是对陈莲笙道长为振兴道教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的肯定，也体现了陈莲笙道长在中国道教界的



■祝贺陈莲笙荣任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前排左6为陈莲笙，左2为真禅



崇高威望。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包括：(一)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政府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二)听取和审议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三)选举第五届理事、常务理事、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四)修改《中国道教协会章程》和《宫观管理试行办法》，讨论通过《关于散居正一派道士管理试行办法》以及交流宫观管理和自养的经验等。3月7日，召开了第二次常务理事会议，归纳和研究了在代表会议中代表们所提出的问题；3月10日在白云观召开了第三次常务理事会议，研究中国道教学院的教学计划，决定开办短期“高功培训班”和“当家培训班”，准备一年后着手开办进修班，培养较高层次的道教人才。本次会议充分总结了中国道教协会近五年来的工作成绩，制定了今后工作的具体方针，是一次成果显著的盛会。会后，陈莲笙道长动情地说道：“五年来，第四届理事会在人员少，经费不多的条件下，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发展道教事业，可谓功德无量，可喜可贺，以后的工作也会更好地开展下去，相信我们道教界的前途会更加美好！”他担任中国道协副会长后，薪资比起以往稍有宽裕，而且年纪又大，应当好好休息，将养身体，但他却不改常态，欣然与观中道众同甘共苦，平日束身俭朴，坚持劳作，展现出非凡的风格与品质。

担任了全国道教协会的领导工作，陈莲笙深感身上的责任更加重大，他对于道教的整体关心更多，对于如何在新形势下弘扬道教优秀文化有了更加全局性的思考。



第六章 呕心沥血，振兴道教

一

时间不等人，陈莲笙重返道教界的领导岗位后，马上投入了繁忙的工作。他开始当秘书长的那几年，道教刚刚恢复活动，正是百废待兴，“文革”的疮痍还没有消除，道士中也还有许多人心有余悸。所以，那工作的压力，还有更大的精神上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但是陈莲笙保持着他长期以来形成的相信人民政府、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观念和行为习惯，使他对前途充满着信心和乐观向上的精神。他的这种精神也感染了很多同仁。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上海市道教协会筹备组，及以后正式成立的协会，碰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逐个地收回“文革”中被占的宫观。这本来也是人民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重要工作，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现实中牵涉到多方面的利益格局，真正做起来并不容易。

说来有些悲哀，中国在历史上遭受过太多的破坏。当破坏的高潮到来时，一把火就能将数百年的基业烧个精光。正像老子所说的那样“飘风不终朝，骤雨不过夕”，天下大乱毕竟于国于民都不利，所以不可能永远持续。但是乱定之后，由老百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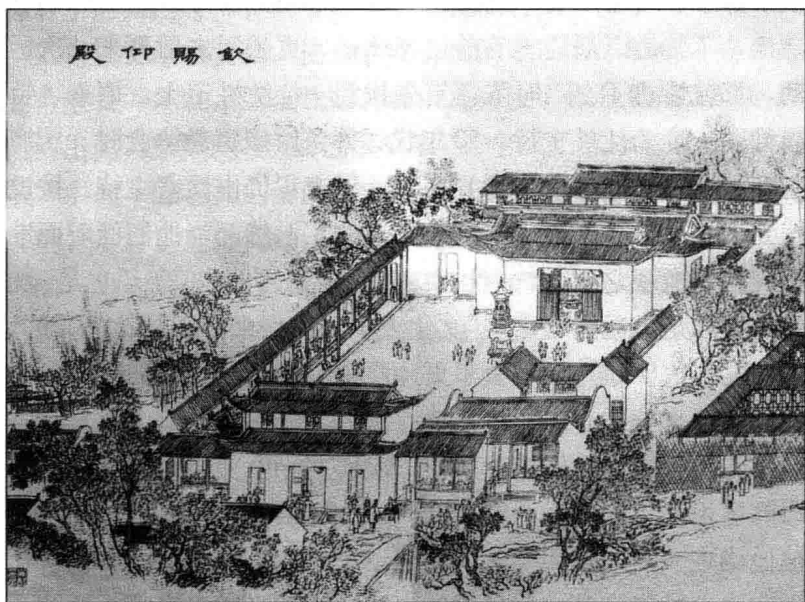
的休养生息，到百废俱兴，却不知要经历多少的艰辛。道教的命运，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一样，也经受了太多的折腾和磨难。待到乱后重建，却是步履维艰。上海道教界在收回自己的宫观时，便碰到了这样的情形。上海原有的宫、观、庙、堂，散布各处，“文革”当中全部停止了宗教活动，有的建筑破败不堪，有的虽然建筑尚完好，却早已改作他用，实际上是被其他单位所占用了。本来，道门清静，宫观以满足道人自己和信众的需要为旨归，与市井的利益格局关系不算太大。然而，上海是一个正在兴起的都市，原来处于偏僻地段的宫观，可能经历几年后便被围进了繁华之区，一旦被占用之后，占用方轻易不肯退出。当时的宫观，不少改成了工厂或者仓库，要想收回，工人的安置，货物的堆放地，一时都会成为问题，这些也都是非常实际的困难。

当时人们脑子里对于宗教还存在着各种僵化的观念，对于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重要性也还不是很认同。甚至于道士们本身，对于恢复宫观这件事，态度也不全一致。归还宫观，是许多老道长内心的愿望，他们从年轻时起，就在宫观里生活，这里有他们的信仰追求，精神寄托。当宫观被占，他们是怀着恐惧而又痛苦的心情离开的。如果哪一天能够回到正常的宗教生活中来，那是多么地令人欣慰呀！然而，被运动整怕了的他们，又常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观望着眼前发生的事。他们怕，怕再给人扣上“复辟”的帽子，怕提出一个全然合理、按说一点也不过分的要求却引来无妄之灾。这样的情形，加上利益格局的牵制，落政的工作就变得出乎意料的困难。当时整个上海道协处于第一位的工作，就是收回道观，作为秘书长，陈莲笙要做的具体工作当然更多一些。再难，他也必须迎着上。



归还宫观的工作，一开始的时候，还不得不半秘密地进行。浦东钦赐仰殿的恢复便十分典型。

钦赐仰殿，是浦东地区一座著名的宫观，主供东岳大帝，所以被称为东岳行祠。据传说，此观建于三国时代，系东吴孙权为母亲祈福所建，不过，没有文献依据。又一说，系建于唐代。清代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东岳行宫在浦东，相传唐敕建兴工。信官叔宝秦建造，钦赐还称仰殿雄。”秦荣光的根据是清



■清代海上名胜钦赐仰殿

代翻建时发现梁上有“信官秦叔宝建造”字样。不管怎么说，这座道观传说丰富，年代久远。本来，这座宫观在当地以及邻近地区的民众中享有很高威望，香火非常旺。然而，在十年浩劫中，这一道观也遭受了沉重的灾难。道士被赶出去，神像荡然





无存，整个道观被改成了麻袋厂。改革开放后，重新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市道协筹备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恢复这一著名道观，而具体的任务落到了陈莲笙身上。

想收回道观，先不说如何与当地的各个机构打交道，首先得有道士出面管事呀。原来庙里的道士，都已被赶回老家，有的种地当农民，有的被安置到社办工厂做工。幸好这些道士，都是本地人，被安置的地方倒是离道观不远。所以，要想找到他们不算难。问题在于，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许多人仍然心有余悸，不知道以后道教的前途怎么样，更怕回去后再来一次运动，那就惨透了。当时陈莲笙先找到一位沈姓道士。原来，钦赐仰殿一度为沈姓主持。50年代，筹备组织道教协会时，庙产归到了道协（筹备委员会）名下，但道观仍由沈家主持。按说找到他出面与各方打交道是最合适的了。然而当他们面对面地谈起恢复道观之事时，老沈却怎么也不愿再回去。想想也是，沈姓道士曾是道观的当家，“文化大革命”一来，正是首当其冲，遭受的迫害比起一般道士来更为严重。所以，在当时的情形下，不愿再回那一伤心地，也是情有可原。

陈莲笙做了沈姓道士工作，却无功而返，不由十分焦虑。一边翻尽记忆想找出合适的人选，一边向其他老道长打听。终于，被他确定一人，认为非此人莫属。

这人姓张，名文希。原是一座道观的当家，也是一位著名的高功法师，在浦东道教界有相当的威望。“文革”中，他与其他道士一样也被迫改行。由于他才干出众，当了当地一家阳伞厂的厂长。如果他能出山，那么对于浦东道观的恢复，一定会带来新的生机。不过，他已经担任厂长，工资比一般的工人高，而且生活稳定，让他放弃现有一切，回到空荡荡的道观，会愿



意吗？陈莲笙怀着疑虑，一时决断不下。想到最后，他还是抱着一丝希望，想先找到张文希再说。见到张文希，却让陈莲笙十分欣慰。原来，这位张道长，也是一位具有弘道志向的人士，只是经过那些可怕的变故，这时同样心有余悸，虽知道现在开始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自己也有些跃跃欲试，却又瞻前顾后，不知从哪里找到希望。陈莲笙的来访，一下子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与机会，两人越谈越投机。终于，他答应出山，尽管他对于前面还有多少坎要迈，心里也没有底。

与张文希的会面，使得钦赐仰殿的收回有了转机。接着张文希道长一一联系原来钦赐仰殿的老道友，做他们的工作，请他们出山。这项工作开始也很艰难。其中除了部分老道长在“文革”中埋下的心灵创伤尚未痊愈，也存在实际的生活问题：道长们好不容易逃出大劫，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特别是进了工厂的，虽然收入不高，但每月都有固定的工资，而当时的钦赐仰殿，却根本开不出工资，只能每月发放20元钱的生活费。试想，正一派道长们都有家室，突然放弃了稳定收入进入前途未卜的道观，实在有些强人所难。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张文希道长带头将自己原来所管理的庙宇作价出让，所得用于钦赐仰殿恢复，这样一种精神，再加上苦口婆心的劝说，终于有几位道长被他说动，愿意回到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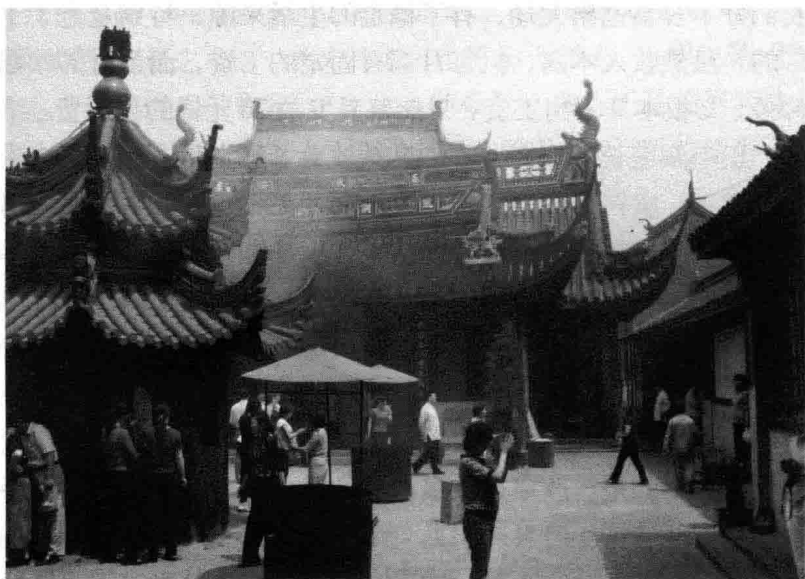
召回了部分道士，只是为宫观的收回创造了前提。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如何与各方去协商、谈判，还有许多事要做。尤其让人犯难的是，改革开放虽已有几年，人们思想上的存见要想破除却还有待于时日。所以，他们策划恢复钦赐仰殿的事，还不敢公开声张。几个人第一次凑在一起商谈办法时，还只能像做地下工作一样，秘密地进行。据几位参与此事的老道长回忆





说，第一次商谈是借一座工厂的仓库内进行的。当时有陈莲笙、张文希和其他几个人，同时请了当时的村子里的支部书记，一边商谈对策，一边还生怕别人知道。为了保密起见，陈莲笙特别找来长子陈耀庭帮忙记录，形成一份备忘录。正是这份备忘录，决定了与各方谈判的基本资料与策略。依照这份材料确定的办法，他们开始了正式收回道观的步骤。

1982年中共中央颁布了第19号文件，落实宗教政策的步伐开始加快，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辛努力，钦赐仰殿终于回到了道教手中。1983年8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批准，市道教协会终于收回钦赐仰殿。收回该殿后，市道协组织方方面面对其进行了充分的整理修复工作。先是清理现场，对占用单位及庙中



■恢复后的钦赐仰殿内景（2006年）



居民明令限期迁出。修复钦赐仰殿的一期工程就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虽然地方不大，但经过修整的钦赐仰殿比解放前要整齐庄严得多，为上海道界人士提供了一个举行宗教活动的好场所。1983年底以来，先后举行了东岳法会、老君圣诞、观音圣诞、三官会首、天师圣诞等宗教活动。每逢初一、月半来钦赐仰殿烧香的人数达到一千人左右，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东岳法会三天中，信众有六千余人，每年正月初一敬香的，常超过万人。他们大多数来自农村以及上海、南汇等郊县的农民。这足以说明，这件事是深得民心的好事。

钦赐仰殿的归还，只是一个例子，实际上，那一段时间，他最多的工作就放在宫观的归还上。他自己，有时还与相关的工作人员一起，查宫观的各种历史资料，包括当年的土地证、房产证，房子使用沿革的资料。因为，这是道教界能够证明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原始凭证。现在的人们，对于自己的产权证明看得牢牢的，有的证书还放进专门租来的银行保险箱中。但是历史上，道教界却没有那么强的维权意识，所以有关的资料，并不很全。原有的资料散失极为严重。因此，这件看来简单的事，在当时做起来却非常难。因此陈莲笙与同道们必须跟着已有的线索奔波于政府档案部门、房产部门，反复查找证据。

当然，更花费精力的是与各方的谈判。前面说过，由于历史的原因，也因为涉及各方的利益，当时恢复一个道观，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让已经占据了道观的单位退出去，往往十分困难，多跑几次腿只能算是小事，磨破了嘴皮子也是常情。当时陈莲笙与他的同道们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收回了一个又一个宫观。有的宫观，根据当时的环境，暂时难以恢复为宗教活动场所，也在产权上得到了落实，少数宫观，则依据有关





规定，得到了经济上的补偿。

他们这样做，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获得了成功，首先是凭着对道教的热爱。试想，当时收回宫观，对于个人来讲，谈不上有什么好处，如果不是出于对整个道教事业的责任心，会那么投入去做吗？同时，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实践道门传统伦理的结果。落实政策、收回宫观的工作，牵涉到各种矛盾，如何处理好，非常有讲究。80年代初中期，人们思想上对宗教政策认识还不太理解，有的当事人，会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接待道教界的代表，对这些，陈莲笙和他的同道们，却是本着慈同齐爱的精神，以和气、平等的态度对待之，不计较对方的态度，而是诚恳地据理力争。这样，便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矛盾。同时，在负责处理宫观的房产事宜时，还要有敢于负责、敢于承担风险的精神。因为这项工作政策性很强，同时又牵涉多方，既要据理力争，有时还得适当妥协。所以，遇事不敢拍板，也许就很难办成事。陈莲笙与当时参与此项工作的同道们，肩上担子实在不轻，除了工作的劳累，这种精神的压力更重。但他们都扛下来了，靠的就是不计个人得失、全部以道门整体利益为重的精神。

他们能做好工作，很重要的一点，是相信政府，依靠政府各部门特别是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支持，所以有事向政府反映，在政府指导下，依照合理合法的手段坚持做工作，是他们全部工作中贯彻始终的。陈莲笙在长期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合作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拥护党的领导，有事找政府的做法。由于他态度诚恳，从不采取激烈暴躁的做法，与各级政府部门容易沟通。有些宫观的落政，情况复杂，难以一下子给出结论，但只要政府部门讲清实情，他也总是表示理解，在行动上配合。所



以一些干部都这样评价他：他听党的话，能够与政府配合。即使这样，落实政策收回宫观的工作，仍然显得十分艰难，在90年代中期之前，更是这样。上海城隍庙的收回就是一个例子。

二

上海城隍庙，是上海道教的一个重要宫观。

“文化大革命”以前，上海城隍庙一直是开放的宗教场所。但是在那特殊的年代里，上海城隍庙也被迫关闭，它的大殿成了工艺品商场，称“豫园商场工艺品门市部”，后又改成“老城隍庙工艺品商店”。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里出售的黄金首饰生意不断升温，终于达到了空前红火的程度。当时一句广告语不知给商家带来多少财运。这句话是：“老庙黄金，给你带来好运气！”原来，民间风俗，对于首饰的佩带，既有审美的一面，又有祈求吉祥的一面。老庙，就是老城隍庙。上海一度在现在的黄陂路一带造过一个新城隍庙，但后来又自然退出历史舞台，上海人为区别起见，将原来的城隍庙称为老城隍庙。在传统的民间信仰



■被改成工艺品商店的城隍庙（20世纪80年代初）



中，城隍神是地方上的保护神，现在黄金首饰与老庙连在一起，那祈祥辟邪的功能便成倍地翻上去了，至少在民间有不少人是这样想的。所以那里的生意一年红过一年，是不难想见的。由此，要放弃一项利润丰厚的买卖，让出那样一块黄金宝地，确切点说，是一座黄金屋，搁在谁身上都难以割舍。

然而，城隍庙在信众的心目中有着崇高的也是不可替代的地位。开始时，是少数人偷着烧上几枝香，渐渐地，大殿前的香火多了起来。每当农历的朔、望（初一、十五），大殿前一片香烟缭绕，向着工艺品门市部大门朝拜的信众竟达三四百人之多。而每当除夕，来大门外烧头香变得更加公开。

正是基于此，陈莲笙道长便倡导开始恢复城隍庙的活动。只是，他，和他的同道们，可能都没有想到，这么看似简单的事，却变得旷日持久。

1986年，他和上海市道教协会第一次向有关部门正式提出收回上海城隍庙的要求。1987年6月虽然名义上收回了城隍庙产权，但是实际情况却是这样的：产权是收回了，然而其使用权仍在别人手上，大殿里仍旧是商场。

陈莲笙心系城隍庙的真正恢复。1988年4月4日，担任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陈莲笙起草了关于要求收回“文革”期间被占的上海城隍庙的产权和使用权的提案。

1988年6月4日，陈莲笙作为上海市政协委员，联合了其他委员，正式在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上提交了《要求收回“文革”期间被占的上海城隍庙的产权和使用权的提案》。对此提案市政协的负责人十分重视，立即开展了调查研究，之后，上海市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得出的结论是：根据中共中央中发（80）22号，国务院发188号，上海市委沪委批字149号文件，上海城隍



庙的产权属于上海市道教协会，使用单位向道教协会支付1966年8月占用至今的租金，属于列入的开放宫观范围，应当退还道教协会使用。

正在上海市道教协会为城隍庙的归还奔走时，中国道教协会在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的支持下，开始规划全国重点宫观。1990年3月9日，上海市道教协会向中国道教协会提出关于将上海城隍庙列为全国重点宫观的请示。请示很快得到了中国道协的确认。这对于上海城隍庙在道教内部地位的确立，起了很好的作用；对于上海市道教协会和陈莲笙会长的工作，无疑也是极大的鼓舞。

1992年2月24日，陈莲笙再次向有关方面提出要求恢复开放城隍庙的情况报告。

1992年5月20日，陈莲笙代表上海市道教协会向上海市人民政府送呈“关于上海城隍庙落实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到，恢复上海城隍庙为宗教场所本身就是维护宗教政策的严肃性，有利于社会稳定、繁荣和发展。希望1993年6月前收回全部使用权，以便接待国内外的友好人士参访，促进文化交流。

1994年11月28日，上海城隍庙使用权正式交还给上海道教协会。上海市道教协会终于成功收回了城隍庙的大殿、中殿和后殿。城隍庙在被迫关闭并改作他用28年后，重新归还了道教。这时，离陈莲笙等人提出恢复城隍庙，整整过了8年。

在这8年中，陈莲笙和其他同道为此付出的心血和精力真是一言难尽。然而，他们在多次努力不果的时候，始终没有放弃希望。因为他们相信道教的事业仍会得到发展，道教的权益理所当然地能得到保障。而这些，又是建立在相信党的政策的





前提下。在困难的时候，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想到向党、向政府、向政协反映，请求帮助。与牵涉到的相关部门、单位，则是既据理力争自己的权益，又和善相处，友好协商，从而得到了对方的同情与支持。事后，一位原来开设在这里的商场的负责人动情地说：我们在这里用城隍庙的场地，靠城隍老爷的威信，经商，发财，现在城隍庙要重新修复，我们也出一点力。于是捐出了二公斤金泊，作为神像装金之用。

上海城隍庙归还给道教，是上海道教界的一件大事，它的完成，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也是上海道教界特别是陈莲笙老会长不懈努力的结果。这一过程，得到信众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在某种意义上说，陈莲笙和他的同道们的努力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满足了信众的宗教需要。正如《联合时报》1994年7月4日的一篇《落实宗教政策有新进展——海城隍庙恢复为道教活动场所始末》里说道：“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市道协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于1987年6月收回了城隍庙产权。消息很快传扬开去，淳朴的信众以为收回了庙产就是恢复了庙。于是每逢初一、十五大清早，三五成群的香客面对着大殿的大门焚香纳拜，把礼谒城隍神看作是最大的心愿。1989年12月12日《新民晚报》作了《空庙招引烧香客》的专题报道，这篇报道客观上不知不觉地为城隍庙的早日修复开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空庙招来的香客越来越多。可是几年过去了，大殿仍然是商场。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在城隍庙看过、吃过，手里提着细软物品，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本想烧炷太平香，因为庙观尚未恢复，只能带着遗憾离去。旅居海外的老上海回乡省亲观光，希望到城隍庙进香了却心愿，祈求家乡亲人风调雨顺、平



安康宁，然而重温旧梦难上难。国际友人，如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一些著名学者专家乃至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在参观城隍庙时访求墙上石刻、殿前山门、戏台，想在那里留影纪念却未能如愿，只能在工艺品门市部的招牌下拍摄几张照片，以示到此一游。”由此可见，“要收回城隍庙的使用权，恢复开放城隍庙成为道教活动场所，使之成为上海特色之一，是上海道教界的呼声，也是全国道教信众的愿望。”

1994年7月7日下午，上海市道教协会在绿波廊饭店召开了成立上海市城隍庙修复委员会的新闻发布会。^①上海城隍庙修



■上海城隍庙修复委员会成立，陈莲笙（居中）在新闻发布会上。

① 张振国：《悠悠期盼 绵想成真——上海城隍庙修复委员会成立》，《上海道教》1994年第3期。



复委员会有23位委员,陈莲笙为主任,苏宗赋、张文希为副主任。新闻发布会后,到会的委员们一起在大殿前合影,记下了上海城隍庙重现生机的历史时刻。除了道教界人士外,还广泛邀请了相关领导部门、文物部门、文化工作者,以及部分社会知名人士。著名学者胡道静,古建筑专家陈从周,国画大师程十发,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陈耀庭,笑星王汝刚,书法



■ 1994年7月7日,上海城隍庙修复委员会成立时,陈莲笙道长(前左二)等在城隍庙大殿前合影。

家任政,豫园商城总经理程秉海等欣然担任了修复委员会委员。这其中还有一位特殊人士:上海城隍神秦裕伯的后裔,严格说是他兄弟的后裔——著名电影演员秦怡。此外还有宗教雕塑艺术家胡建宁任顾问。这样一个阵容,既满足了对修复领导工作的需要,也体现了社会和谐团结。

在陈莲笙会长的领导下,后来又成立了修复领导小组,负责具体的修复工作。



三

2000年11月14日，上海城隍庙内喜气洋洋，中轴线上红毯铺地，彩幅高悬。这一天，作为中国道教协会顾问的正一派大师陈莲笙道长荣升为城隍庙住持。来自海内外的嘉宾、道友信士300多人和上海道教界人士齐集城隍庙内共同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上海市道协和城隍庙为之举行了住持升座暨城隍庙开光庆典。



■修复一新的上海城隍庙



前面说过，城隍庙的归还，陈莲笙与他的同道们为之奔走八年之久，后又经数年的修复，方始克成。陈老道长荣升住持，既是他在道教界享有崇高威望的体现，

同时，也是他多年来为维护道教界权益、落实宗教政策努力的顺理成章的结晶。

升座典礼上，有关部门的代表、海内外道教界的同道，以及各界友好人士纷纷到场祝贺。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闵智亭、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孙金富、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梁玉书、上海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杨奇庆、香港道教联合会主席赵镇东、代理主席吴耀东、台湾中华道教会秘书长张桧、新加坡三清道教会主席陈国显，以及陈莲笙道长的爱徒马来西亚道教联合会署理主席陈文成等领导和嘉宾出席了升座典礼和庆典。

那天上午，嘉宾们很早就



■陈莲笙主持升座和城隍开光庆典宴会





■陈莲笙在年轻道长的簇拥下步入大门

来到上海城隍庙大殿前的广场上，准备迎候新任住持。在他们之中，有许多是久未会面的老朋友，也有是新加入到道教队伍中的，所以一见面，都相互问候，广场上一片友善的笑语声。上午约十时，广场上突然肃静下来。原来陈莲笙道长在几位年轻道长的簇拥下，正迈着方正的步伐，进入大门。人们立即分立两旁，让出大道，让陈道长走进大殿，直到主持法座前。人们看到的陈道长，人稍清瘦，法服加身，虽已83岁高龄，却仍是精神矍铄，道风严整，行步中规中式，举止仿佛在庄严的法事之中。时任中国道教协会顾问的黎遇航道长，扶陈道长升上法座。此时现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是大家对城隍庙庆典圆





满的衷心祝贺，也表达了对陈老敬仰之情。

在庆典活动中，有关领导，中国道教协会的代表，以及陈莲笙本人，都作了重要讲话。

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在庆典上致词说：道教界今年是好事连连，谨代表中国道教协会向陈莲笙道长和城隍庙表示热烈祝贺。他说：正一派宫观住持执事制度，是道教正一派的一种传统制度。此次上海城隍庙



■陈莲笙主持在大殿内升座

住持执事制度的恢复，是当代道教界的一件大事，是党的宗教政策贯彻落实的生动体现，也是道教在加强教制建设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道教的教制建设，是中国道教协会今年提出的重点工作之一，更是中国道教今后一个时期教务工作的主要内容。正一派宫观执事制度是教制建设的一部分。我们要通过恢复和健全宫观管理执事制度、教戒制度等，加强自我管理，振兴道风，传扬道教，利益社会。他还说：陈道长德高望重，一心为道，爱国爱教，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道教学识方面很有造诣，而且有良好的修养品行，在海内外道教界有崇高的名望。今天，陈老荣升为城隍庙住持，正所谓是名观



高道，相映成辉。道教界要高举“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旗帜，努力发扬道教优良的传统，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陈道长也在仪式上也做了精彩的发言，并依传统仪礼宣下誓词。他说：“太上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这是《道德真经》第二章，主要是做善事不为名利，好事成功不居功，正由于不为名利不居功，因而其善其功不去。用现在的话，“为人民做好事，人民不会忘记”。又说：“太上曰：初入道门，诣师奉受太上经戒、正一威仪、道门十规即正一规戒。学读三皈、五戒、十不、百三威仪、道门十规，有资道趋学之经，及随处阐教之化，益弘清静，大振道风。”上海城隍庙要承继传统。上海城隍庙建于明代永乐间，历由正一派（出家）道士主持的，它的传统为“师弟相承”的传统，即师父传徒弟的代代相承的传统。建国初原来的道士因其他原因而离庙，又无正式法徒，故五十年来住持之位一直空缺，庙务工作由庙务管委会负责进行。陈道长说：“贫道蒙人民政府的关心和本庙道众的推荐，在各山长老、道长和大德的支持下，委以上海城隍庙住持之职，非常荣幸，但也非常惭愧，非常担忧，因为年龄大，又不才，于是只能权充一下，望各位多多关心，多多协作。在下任职期间誓愿：服从领导、团结道众、爱国爱教、廉正服务；弘道扬善、济世利人、奉持规戒、与道长存。谨誓！”

陈莲笙道长还说道：“任何一种宗教，最能反映其精神实质，不仅仅是它的理论文献，还有它的教规。……读经书，索





根源，务正道，勿受邪说淫辞所乱，以道从出处，真一不乱，是立教之源，入道之本，此首务也。修持颂念、洗心涤虑，心无二念，若心口不诚，虽日颂千百，於己何益，更不能消灾散祸。积善行，绝所欲，不妄想，惟性命之修，正一虽惟曰科教，然非有性命之根基，曷得修己利人，济幽度显？故初入道，择明师，开发性，守十戒，遵壹规，收身心，皆自静定之功所能成就。宗派虽多，其源则一，凡行持必依道门定制，立成仪规，不可乱规。作为有师授的行持道士，须具有戒行和道学参究，次以弘法修善，济物利人，修持不殆。绝不名为利声色，夸名眩世，甚至不休香火，荒殆修持。道观住持，必须德高望重，廉明正直，言行端庄，学识采博，足以师表。并务以慈仁节俭，德量含弘，规矩公正，弘法扬善。凡行持道法以清静为本，不以名利富贵，即使艰难困苦，也不弃修持。所遇云朋霞友，亦须志同道合，先择后交尤为自戒。要立观度人，凡名山宫观，皆欲绵延香火，从而度人修持。然选择所度必以资性敦厚，可训器材，苟非，不予滥收，以免贻玷玄门，须宜自慎，一待得人，也先以听言观行，确审详实而登名。同时各道友执事，务守清规，各司其职，敬神明，熟神典，守斋戒，遵科训。管理经济田地，是前人留下祖产，即田地房产，以养道士生活来源，各寮院按定规掌管。凡属房产修葺起造，任何出纳明白登册，包括道众病老葬送都以有据入册，绝不允许互相容弊，以掩其私，各宜勉之。”

在升座辞中，他表达了对道教与国家民族关系的深刻理解“太上曰：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贫道陈莲笙今天叨居上海城隍庙住持之职务，当以太上之言立言，以祖师立教之本为本，以



道门规戒持戒，顺应历史潮流，适应社会变化，寻求道教生存繁衍之机遇，为国家之稳定发展，为民族之团结统一，为中华文化之繁荣昌盛，尽心尽力，鞠躬尽瘁。贫道愿在受命住持之时，信誓如下：爱国爱教，遵守规戒，团结道友，服务信众，弘道立德，惩恶扬善，精研道法，济世利人。愿天师护佑贫道与城隍庙全体道众，愿太上护佑道门为国为民多做贡献。”

老道长升座，在上海城隍庙的历史上，是恢复了中断数十年的旷典，所以十分引人注目。对于当时的城隍庙说，则是完善了传统的制度，使得宫观的管理更加有序。从此，城隍庙在老道长的领导下，日渐兴旺。

在以后的日子里，在他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城隍庙的年轻的负责人们，又接过陈老道长的对道教、对城隍庙热爱之心，坚持不懈地为之服务的精神，与有关方面协调，将大殿前侧两边的厢房和戏台收回。站在现今的城隍庙中，看到修缮一新的大殿，庄严的神像，一般人很难想象，当时陈道长等人所作出的巨大的努力。八年的争取，又经数年的修缮，所有这些事情中的故事，都隐藏到了背后。

四

陈莲笙在领导和直接参加收回宫观的工作中，从来都是平心静气，所以整个工作都是有序地开展。尽管有时碰到难处，也是积极创造条件，在时机成熟时水到渠成地加以解决。他有时内心很焦急，却极少表露出来。道士的涵养，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深厚而又自然。





但是，在这方面，他也有急眼的时候，忍不住迅速而又有点激烈地表达自己的情绪。那是当面对道教界的权益有可能遭受严重损害时。20世纪90年代中期，面临清虚观的安置，便是他极少一次急得跳脚的情形。

清虚观在上海市延安东路大世界对面。民国初年，全真道士姚瑞清、马福清、严洪清等人筹建，初称三官殿。后改名为清虚观，时以施药治病与经忏法务为主要宗教活动，并兼营素斋，由严洪清自任住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主改革的推进，以及上海市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的成立，这一道观的产权归到了筹委会名下，及道协正式成立，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上海市道协的产业。由于地处闹市，在当时条件下，无法恢复为宗教场所，经政府批准，清虚观的数间门面房出租给了某商业银行。这一举措，对于解决道教界的自养，起着重要的作用。

1996年，延安东路因为要修建高架桥需要把原来的清虚观动迁，而在动迁之际，开始时给予上海市道教协会的补偿却极不合理。

为此，陈道长于1996年9月11日分别给当时的徐匡迪市长、龚学平副市长、市委统战部的陶人观副部长写信，反映当时上海市道教协会面临的许多困难，本身在自养方面就困难重重，清虚观的拆建使得上海市道教协会面临更严重的问题。希望在延安东路高架路动迁过程中，对房产予以照顾，合理地加以解决。

1996年9月14日上午，市委统战部王生洪部长、陶人观副部长来到上海市道教协会所在地白云观，代表市委黄菊书记等看望陈莲笙会长。王部长说：“关于延安路高架东段需动迁道教的清虚观房产情况，黄菊同志非常关心，并且已经指示市建委、



统战部、宗教局做好协调工作，妥善处理此事。黄书记听说陈会长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就委托我来看望你，请你放心。”陈莲笙说：“我们道教的事情，市委领导这样关心，我内心非常感动，万分感谢。这下我觉也睡得着了，饭也吃得下了。我们道教对市政建设是非常支持的，相信有党和政府的关心，一定能够妥善处理好这件事。我们希望能就近补偿同等地段面积相当的房产，以确保市道教协会长期自养经费稳定的来源。我们一定做好广大道众的思想工作，确保稳定，为上海的经济建设贡献力量。”在陈道长的据理力争下，上海地方党政领导亲自顾问此事，使得清虚观房产的动迁方案作了重大的改动，预定将延安东路靠近江西路的一处房产补偿给道协。1996年9月27日市道协与有关方面达成合同，1999年11月25日将延安东路29号的产权交与了上海市道教协会。这样，清虚观的庙产置换有了一个结果，道教界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一场风波终于过去，陈莲笙会长与他的同事们，才松了一口气。

五

陈莲笙担任领导职务期间，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是为恢复和完善科仪而努力。

我们在前面说过，陈莲笙在年轻时即潜心于科仪，而且在上海滩上有一定的名望。在20世纪80年代，道教的仪式还刚恢复举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科仪缺失严重，一方面是老一辈的道长或已谢世或者已经改行做了别的，要想凑齐一坛执事都很难。另一方面，科仪的本子也有不少散失了。



根据陈莲笙的儿子陈大灿的回忆：“那个时候还没有收回白云观，我父亲就很担忧这些传统文化的失传，因为很多很著名的做宗教仪式的道长年纪都大了，有的已陆续地离开了。父亲就觉得非常紧迫，担心保不住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所以一到白云观恢复，就开始积极地做有关道教音乐的整理工作。那些重新回到庙里的老道士们也都很乐意来做整理的工作。他们常常坐在一起，一段一段地回忆，找人把唱的词、表、经文等记录下来，再整理，抄成正式文本。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任务。由于以前多是口授心传的，所以回忆起来就有难度。这也是很多地区都没有整理的原因，或是因为那些道士文化积淀缺乏，或是记忆力等的原因，有些纵然回忆起来，也由于不知道字怎么写，而功亏一篑。但是上海这边的道士文化水平普遍都高，多是从小习道，加上共同的努力，终于完成这个艰巨的使命。记忆最深的是对于唱赞的回忆上，他们的音乐节奏和唱词都记得很牢。这也是因为‘文革’期间，虽然不做道教仪式，但是还可以玩玩民间音乐，所以乐器都不生疏，恢复得很快，唱腔也都记得很牢。起先稍微生疏的，经过两次就熟悉起来。最为令人惊叹的是，凭他们记忆整理好的科仪文本，和‘文革’之后找到的原本对照，竟然基本不差。可以说是个奇迹。”^①

科仪本子的恢复，是一个难题，但首先是在经过了“文革”的破坏之后，人们的思想被搞乱，许多人弄不清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保护合法的宗教活动的重要意义，甚至于某些地方上的政府职能部门，还把举行道门法事当成“封建迷信”加以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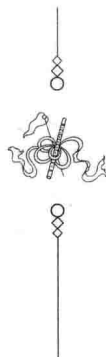
^① 《庆贺陈莲笙道长九十华诞》，第39页。



在上海道教界各位老道长的努力下，传统的科仪渐渐得到恢复，同时，他们也在陈莲笙秘书长的倡导下，欣然收下1986年开始入学的道学班的学员为徒，无私地将自己的行法经验传授给即将走上坛场的年轻人。经过严格的训练，一批年轻人开始接上老道长的班。当然在一开始时，他们主要还是在老道长的带领下，参加一些常行的法事。但是，上海道教新老道士结合的科仪队伍却非常引人注目。他们一站上坛场，便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须知，从50年代起，到改革开放，当中有近三十年，道教界基本上没有正常收徒，因此，科仪的传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80年代初期，上海音乐学院曾经列道教音乐研究课题，并到上海、茅山等地的宫观中录音录像。据参加此项工作的朋友们说，他们去茅山录像时，面对的常是七八十岁的老道长，其中有些年老体弱，每录十几分钟，就要躺下休息十来分钟。科仪后继无人，情况非常严重。这当然不仅是茅山一地的情况，也是全国性的问题。陈莲笙看到这一点，从招收道学班开始，就考虑到了科仪的传承。所以当他们入学后不久，就让他们按传统方式拜师学法，陈莲笙且亲为保举师，让学员们一一拜在老道长门下。而且根据他们不同的条件，有意地从中物色和培养高功法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年轻的学员终于可以与老法师一起在坛场上依科演法了。在80年代后期，新老法师一起上场，是上海道教科仪突出的场景。

而且，在走出上海的法务交流中，这种新老混合的科仪队伍经受了考验。第一次考验，在1988年的年底。

那一年，福建南平市成立道教协会，上海市道教协会应中国道教协会的邀请和委托，在中国道协副秘书长张继禹和上海道协副会长陈莲笙的率领下，于1988年12月15日组成法务团





前往福建祝贺，受到了热烈欢迎和接待。^①法务团由上海市道教所属道观（钦赐仰殿、白云观）道长及道学班学员18人组成。在南平期间，由上海的法务团主坛，就溪源庵德云观启建祈福保安大醮三天，参加醮事的居士、信士四百多人。此外，附近的尤溪县、柘荣县等信众居士和道长也专程前来参加醮事，拈香礼拜、香烟缭绕、灯火辉煌，极一时之盛。法务团的这次活动，不仅体现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而且还促进了沪、闽两地道教文化的交流，加强联系，增进道谊。在法事中，上海的老道长带领着年轻的学员们认真演法，配合十分默契。

这次法务交流，获得了当地道教界一致的好评。它证明了上海科仪后继无人的局面已经出现了扭转的曙光，同时也证明了陈莲笙倡导的新式办学与传统的拜师学法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是切实可行的。这一模式，在第一届道学班学员的毕业典礼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检验。

1989年的7月10日，上海市道教协会主办的道学班首届毕业典礼在上海白云观举行。中国道教协会秘书长李文成及副秘书长兼北京白云观监院黄信阳，上海各大宗教的负责人，以及江西龙虎山、江苏茅山、苏州、浙江等地道长，上海电视一台、二台和上海各大报纸的记者共200余人，一同见证了第一届道学班全体学员举行的“进表”科仪。白云观凌霄宝殿上灯烛辉煌，全体毕业生参加了大型的法务，从“开表”、“分灯”、“金玉”、“赦水”、“请圣”到“上表”，其中法师、班首、乐队及值殿等都是由学生担任工作，处处都显示了老道长们为培育道教新人所付出的心血。这是对三年学习成果的一个汇报表演。经

① 《上海道教》1989年第1—2期合刊，第63页。



过陈莲笙道长三年含辛茹苦的培养，学员们的宗教知识、文化知识、斋醮仪范及宗教政策等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为上海道教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后续力量。^①

陈莲笙在年轻时参加了由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主持的罗天大醮。以后四十余年，再没有过这样的盛典。不想，在他年近古稀时，却再次率团参加了一次罗天大醮，而且其规模和影响，都大大地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那两次大醮。

1993年，在北京白云观举行了该观中断了三百余年的罗天大醮。陈莲笙作为上两次大醮的亲历者，心中自然会有特别的感慨。同时，像他那样实际参加过罗天大醮且担任过高功的老道，在当时的道教界，已经可以说是硕果仅存了。因此，他的经验，也引起主办者的重视。

本次大醮是为祈祷世界和平、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而举行的，其规模之大堪称史无前例。除白云观外，西安八仙宫、上海白云观、苏州玄妙观、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杭州抱朴道院、广州三元宫、香港青松观、台北指南宫，以及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澳洲悉尼青松观等都分别设坛演醮。整个罗天大醮就是个系统，运转起来有很多环节。9月17日上午，首先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然后按照传统程序分别进行本坛开坛、玄门功课，然后诵雷经并安坛，下午则进行雷忏，并建坛朝。18日上午，先后开早课，进行早朝，并诵玉皇经，下午则进行玉皇忏、发递文书等仪式。19日上午，例行早课、诵玉皇经，并观摩青松观上表仪式。下午则进行玉皇忏、开表、敕水和请圣等仪式。晚上则进行本坛小施舍仪式。20日上午早课后，进行

^① 龚贞观：《首届道学班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上海道教》1989年第3—4期合刊。





了诵雷经、度人经和午朝等活动。下午则是雷忏、拜表、通真仪式。晚上还有玄妙观炼度。21日早课后是三官经，下午是三元忏和晚朝，当晚观摩指南宫仪式并行施食。22日早课后，诵真武经，观摩指南宫上表。下午进行星真忏和大顺星活动。23日早课后诵五品经，下午进行水忏和晚课活动。晚上则进行了本坛斗姆炼度。25日早课后诵北斗经。下午诵南斗经，进行百拜朝天忏和供天十献仪式。26日早课后进行孔雀经卷上观摩及白云观上表活动。下午则举行了最后的散坛谢神送圣圆满仪式。

“罗天大醮”是道教中最隆重的大型宗教活动之一，是祭祀上天诸仙的一种仪典。大醮期间，将由大德尊师主持名坛仪式，诵经拜读，日夜供奉香灯，祝圣朝真，此次专为信士设延生坛和度亡坛。延生坛是为祈福延生、消灾解厄、祈求事业成功、健康长寿、吉祥平安及许愿还愿而设。度亡坛是对已故先人进行追悼超度而设。超度寄托着孝男孝女、同事朋友对已亡人的思情与友谊。当白云观仙音绕梁、香烟缭绕之际，善男信女参玄朝拜，拈香献花，亦可想见当年之盛。新加坡的《新民日报》援引台湾地区道教总会副秘书长张桢的谈话介绍了这次复杂的仪式：“会场将搭起11座七层高坛，每坛各有职司，来完成复杂的仪式，所以叫‘通力演教’，白云观负责主坛，指南宫则负责度亡坛。道教有最复杂的仪式，光是解释，道藏就有5485卷，这次所举行的‘罗天大醮’和‘周天大醮’、‘普天大醮’都属于天子之醮，只是天数与所请的神明星君数目不同，‘罗天大醮’该行法12个昼夜，设下1200个星君圣位，普天则须行七七四十九天，周天则要30天。白云观曾是古代天子行普天、周天大醮之处。”《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中称此次“罗天大醮”仪式为“道教历史上最为盛大的活动”。“自明朝第三



十八代天师主持罗天大醮以来，已有 500 多年没进行过如此盛大的道教仪式活动了”。是汇聚了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韩国名山宫观等海内外道教界同仁的活动，《人民政协报》在此次罗天大醮结束后报道中称之为“我国宗教史上极为罕见的盛事”。还对“罗天大醮”委员会将功德收入的 100 万元人民币全部捐赠给“希望工程”这一善举给予了高度评价。



■陈莲笙在九幽灯仪中上香

整个大醮期间，白云观内彩旗飘扬，香烟缭绕。信众如潮，钟鼓声声，道乐飘飘。陈莲笙道长认为这些都是弘扬道法的好机会。各个国家的道教团体齐聚一堂，是非常好的交流机会。参加此次“祈祷世界和平护国佑民罗天大醮”的上海白云观名单如下：团长陈莲笙、副团长金鸣皋，团员有凌晋明、吴关德、吉宏忠、史孝进、史孝君、沈荣泉、秦方





育、朱浩祥、成笃生、王进、夏连全、徐进福、葛乃君、吴幸初、叶有贵、沈桂林、丁常云、张淑华等。



■陈莲笙（图左）在司鼓

陈莲笙一直关心着科仪的恢复、完善与传承，直到年过古稀，也仍常参与科仪，有时则在乐队中司鼓，指挥着音乐的节奏。

六

陈莲笙道长自幼生于正一世家，从小耳濡目染，对于授箬仪式非常虔敬。正一授箬传度历史悠久，其仪式也非常复杂。一般说来，道教正一派的授箬传度开始于汉末晋初第四代天师张



盛。实际上，道书中有记载可以追溯到祖天师张道陵以及张鲁。最初之时，作为一个拥有很多信众的组织他们设立了职务等级的制度，这也就同时产生一套科仪章法。随后到南北朝，形成灵宝、上清等法箓，各自开坛传箓，称“三山符箓”，道教的仪式制度方面也相应更加完善和系统化，而且发展得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崇敬。道士受箓，根据不同的修持，发给相应的职牒。作为正一派道士必须受箓，不受就无法遣使箓中的兵将听命法坛。授箓由传度大师、监度大师、保举大师来主持，传度大师是专门负责传授正一法箓的大师，监度大师是监督传度大师在授箓法箓过程中秉公授度的大师，保举大师是专门负责保箓、保戒、保香的大师，此三师在隋唐以前一般由受过法箓、德高望重的老道长担任。宋元以后，特别是宋真宗时，王钦若为天师在京都奏立授箓院，自此三山符箓悉皆归之于龙虎山后，三师必由龙虎山天师来担任，此法一直沿袭至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道士受箓后，颁发给职券牒文，以证其所任之法职，名号录之神界，以通达神灵，今简称为“职牒”。后五代孙夷中对法箓进一步整理，其所著《三洞修道仪》称：“箓有一百二十阶。”然正一法箓流衍人间者实为二十四阶，或二十四品。一百二十阶箓，是综合了正一、灵宝、上清等派的法箓。二十四品箓，是因张天师立二十四治，以应二十四气而出的。宋元以后，三山符箓统归正一大真人掌管，授箓成了龙虎山天师的重要职权。但是到了清朝末期，农民起义，列强侵略，国内动荡等导致了经箓散失，规范仪制失传，正一授箓传度中断了将近百年。在当代社会中，人类的文明意识已经和古代的完全不同了，那么在新的时期如何恢复呢？全国各地的正一派道士也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同心协力，于是促成了第一次正一派会议的成功召开。





1990年杭州会议是第一次的道教正一派会议，会议后一年，也就是1991年首次恢复了在天师府的授箓传度。当然恢复的过程是复杂艰辛、充满挑战的。并且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1991年，应江西龙虎山嗣汉天师府邀请，上海道教法务团一行16人，在以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陈莲笙为顾问、副会长张文希为团长的率领下，于9月30日赴江西龙虎山^①，参加天师府10月3日至9日为新加坡和台湾道教徒启建授箓传度的传统大醮，受到鹰潭市、贵溪县有关领导以及天师府全体道众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法务团由上海道教协会与白云观、钦赐仰殿两道观道友组成。根据中国道教协会指示，由江西、北京、上海、江苏联合组成“授箓传度指导小组”，以继承和弘扬祖国道教文化，保持天师正一道传统为宗旨。在指导小组的安排下，授箓传度得以顺利进行，整个醮仪严肃而隆重，既保持了道教正一派的传统，又体现了“济物利人”的道教思想。活动期间，法务团受到鹰潭市政府领导的亲切接见和宴请，市统战部和市宗教局领导也前来参加祝贺。为了对上海法务团的大力支持使这次授箓传度醮仪圆满成功表示感谢，天师府还专门赠送“鼎力相助，情谊情深”的锦旗和礼品。

1994年4月26日—18日在上海龙华宾馆召开第二次道教正一派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八省一市的道教协会负责人和道教宫观的道长，也有来自各省市宗教局的干部，共35人。26日上午的会议，由中国道教协会秘书长李文成主持，简要介绍了这次会议的目的和内容，他说：这次座谈会是继1990年杭州会议之后的第二次道教正一派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

① 《上海道教》1991年第4期，第28页，第49页。



学习、交流、讨论，学习国务院总理李鹏签发的两个宗教法规，并结合各地散居正一道士情况来讨论授箬规定（草稿）。

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时为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的陈莲笙道长作了题为《关于正一派道士授箬目的和意义》的讲话。他从道教正一派的历史和现状谈到正一派授箬的意义和目的。他说“正一派的授箬制度，是正一派传统制度，其意义首先在于恢复和健全道教正一派的教戒和规范制度；其次是修建由凡入圣的阶梯，同时也是勉励和规范自己的行为准则。”他还说：“我们恢复正一派授箬之事宜，旨在通过恢复正一派授箬传度之仪式，使真正的修道之士明正道位神职，广宣真道之教化，度己度人，使之道德素质和宗教素质得到不断提高；通过对这一仪典的恢复，可以积极引导广大散居正一道士逐步走向正常化的。”这不仅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道教徒的责任，而且也是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最后，他还提出了开展授箬工作应的几个问题：1. 正一派授箬工作，应统一由道教协会组织，由中国道教协会指定符合条件的宫观承办；2. 授箬宗坛要。教事业的健康发展这个大局来考虑，不能简单从事，更不能相的随便设坛授箬和买卖授箬职牒。3. 开展授箬工作要有利，促进和加强对散居正一派道士的管理。4. 对散居正一派道士授箬，应在积极作好散居发证工作的基础上进行；5. 要进一步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加强对正一派散居道士的管理。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制订出台了《道教正一派道士授箬规定》，并由各位代表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意见和建议，进行必要的修改。同时也讨论了陈莲笙道长的《关于正一派道士授箬目的和意义》的讲话，大家一致认为讲话内容实事求是地针对正一派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举行授箬的意义和目



的，这是完全符合当今社会和当前道教发展需要的。基于陈道长的讲话，大家提出了很多有益建议，如授箓工作可先试点，总结经验再完善；要对授箓道士进行考核，严格审批；要严格按照正一派的传统进行，制定一套授箓道士的考核办法；要积极宣传散居的正一道士，增进各界对散居正一道士的认识。

1995年12月5日至7日，在江西龙虎山举行了首次国内授箓大典。当时虽然已经进入了寒冷冬季，但是龙虎山的天师府内，到处彩旗飘扬，人流如潮，热闹非凡。道教祖庭迎来喜庆的节日，天师府内充满了一片生机。“热烈庆祝全国道教正一派首次国内授箓活动隆重举行”的横幅高悬于头门，前有太极杏叶，后有混圆八卦图，甬道两边二十八宿旗迎风招展，玉皇殿内更是彩灯高挂，烛光通明。整个天师府内充满了浓厚的道教气氛，披上节日的盛装，全国道教界盼望已久的正一派授箓传度法会在这一天拉开序幕。

来自江苏、上海、湖南、湖北、安徽、甘肃、浙江、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吉林、河南等十二省一市200余名箓生参加了本次授箓传度大典。这里，既有年仅20多岁的青年道长，又有年近八旬的老道长。青年道长多为道教后起之秀，皆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道教理论知识，年老道长大多是几十年来一直从事于道教工作者，具有较多的实践经验和较高的科仪水平。他们都是怀着一颗对道教虔诚的信仰之心和对祖庭天师府的敬仰之情，不远千里而来的，为了一个共同目标，抱着一个共同的希望。虔诚的道教信仰，赤诚的爱教之心，使大家走到一起，从全国各地喜气洋洋地来到天师府朝拜祖庭暨参加授箓大典，诸多箓生都非常激动，特别是一些初到天师府的箓生更是激动



不已，十分珍惜这次授箓的机会。

1995年12月5日上午，授箓传度法会正式开坛。根据道教传统仪规，法会礼请江西龙虎山道教协会副会长何灿然为传度大师、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陈莲笙为监度大师，江苏茅山周念孝为保举大师，同时又礼请中国道教协会副秘书长张继禹为护箓大师，江西龙虎山天师府住持张金涛为护法大师，江苏苏州市道教协会薛桂元为护经大师，上海浦东钦赐仰殿凌晋明为护坛大师，浙江洞头县道教协会会长施书宝为护戒大师，湖南湘潭市道教协会董淑和为护道大师。全体箓生在掌仪及诸大师的带领下，分别参拜了玉皇、三清和祖天师后，接着进行“开启”法事。下午，全体箓生参拜诵经后，监度大师陈莲笙道长作《道教度人与度己的教义思想》的讲话，他希望全体箓生要发扬《度人经》中“仙道贵生、无量度人”的精神，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修持和自身修养，处处以“道”来规范行为，要以自己的修养、道德行为来感化众生，普度众生。法会期间，护箓大师张继禹道长为全体箓生讲了“道教正一派授箓规定和制度”，传度大师何灿然道长为箓生“说戒”。在大师和全体箓生的座谈会上，陈莲笙大师对箓生们提出了受箓后的要求，希望他们要坚定信仰，重振道风，崇奉善功德行，提高道教素质，利人利物，护国护教，要继承和发扬道教优良传统，为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与精神文明相适应作贡献。他还希望各箓生回到各自名山宫观后，要促进地方道教工作的正常开展，促进道教发展。为体现这次授箓传度仪典的威严，法会于6日中午举行了传统的“打斋”活动，传度大师行“用斋”礼后，全体箓生用斋，使全体箓生了解和体验到传统斋供仪礼。三天的盛大法会，经过了启师、拜斗、传度、斋供、上表、送圣，于7日下午功德圆满。



经过陈道长的四处调查和奔波，2001年8月19日至21日，中国道教协会在上海中亚饭店召开了正一派道士授箓工作座谈会。来自上海、江苏、江西、浙江、湖南、湖北、安徽、福建、甘肃等省市的道教协会负责人和熟悉正一派授箓活动的老道长及以上各省市宗教事务部门有关负责人，中国道教协会闵智亭会长，张继禹、丁常云副会长，袁炳栋秘书长，袁志鸿副秘书长，以及时为道教协会顾问的陈莲笙道长等33人出席了会



■陈莲笙（左3）在正一派道士授箓座谈会上

议。国家宗教事务局一司王哲一处长莅会指导。本次会议的议题是：1. 交流近年来散居正一派道士管理情况；2. 讨论研究正一派道士授箓工作；3. 征求对中国道教协会草拟的两个关于



正一派道士授箓规定的文件的意见。中国道教协会袁炳栋秘书长主持了开幕式。中国道教协会闵智亭会长作了重要讲话，上海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吴孟庆代表上海市民宗委致词，对会议在上海召开表示欢迎并祝会议成功。

闵智亭会长在讲话中回顾了中国道教协会自1989年在杭州召开关于正一派散居道士管理工作座谈会以来，对散居正一派道士管理及正一派授箓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后指出：道教正一派授箓是一项重要的教务活动，也是加强道教教制建设的重要内容。1991年和1995年分别对海外和内地道教正一派道士恢复举办授箓传度法会以来，已授箓传度弟子千余人，通过授箓传度，对逐步恢复和健全道教正一派的规戒制度，促进道教教制建设和正一派道士的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看到正一派授箓方面还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道教正一派需要薪火相传，大批中青年正一派道士亟待锻炼提高，道教界一再要求再开坛。为此，中国道教协会将两个关于正一派授箓工作的“规定”提交会议，供大家讨论并征求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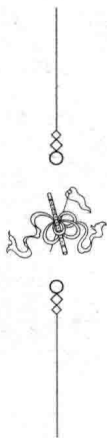
会议期间，代表们围绕闵会长的讲话和两个“规定”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这个会开得很有必要也很及时。会上各地道协负责人分别介绍了近年来在散居正一派道士管理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加强对散居正一派道士学习的领导，加强正一派道士自身素质的提高，建立正一派散居道士的民主管理组织或联系网络。正一派的授箓传度，不仅是道教教制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对散居正一派道士提高素质，强化管理的一个重要途径。会议期间，大家对中国道教协会提交的两个“规定”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和意见。

8月21日，会议圆满结束，张继禹副会长在闭幕总结讲话





中指出：这次会议使大家对正一派授箓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达成了共识，认识到授箓工作是一项关系到道风建设和道教健康发展的大事，而不能仅仅把它看成是单纯的传统传承。做好这项工作，一定要同正一派道士的规范管理，道风建设以及整体素质提高相联系来考虑。最后，张副会长代表中国道教协会对为会议召开给予大力协助的上海市民宗委、上海市道教协会和上海市各个宫观表示衷心感谢。





第七章 育新人弘文化

谈起陈莲笙会长，道教界内部的许多人都会赞不绝口地说：他最大的功劳，一是培养了优秀的接班人，二是发展了道教文化。而有时谈到上海道教界几位崭露头角的年轻人，他们又总会说：你们上海条件好，有高人指点。他们说的有高人指点，主要就是说能得到陈莲笙的教诲，也能得到陈老请来帮助道教的开展文化研究的学者的指导。确实，从陈莲笙担任上海市道教协会的主要领导开始，就十分重视道教文化事业的发展，无论是办教育，办刊物，还是探讨道教音乐，他都是积极倡导者，也是直接的参与者和领导者。

今天看来，重视文化事业似乎是天经地义。试想，宗教归根到底，乃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形态。一种宗教，而且是当代宗教，不发展自己的文化，行吗？然而，在20世纪的80年代，人们却不一定都有那样的共识。特别是80年代初，对于文化重视的人，还是凤毛麟角，将宗教看成一种文化现象，是大约到了80年代中期之后才慢慢地受一部分人的肯定和重视。当时的道教界还处于复苏的过程中，边缘化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心有余悸的道长们，能够看到自己的文化资源和价值的，





更少了。

然而，陈莲笙却似乎有点例外。他很早就重视道教文化的探讨，也很注意对于道教文化的弘扬。这一点，或许与上海道教界有过的传统有关，或许与他于50年代结识陈撄宁有关，更或许与他的几个儿子都被培养成大学毕业生有关。他从上海市道教协会筹备活动恢复之初，就开始了与学术界的交流与对话，还在筹备过程中，就倡议并具体指导了对道教文化的一个侧面——道教音乐的研讨。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成立了上海市宗教学会。宗教学会成立时就邀请年轻人一起参加，有好的文章，就会拿到《宗教》杂志转载，然后又收入当年的《宗教问题探索》。当时年轻学者中有一位就是陈莲笙先生的大儿子陈耀庭，他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时为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的研究员。笔者当时也算是一个年轻人，说实在的，三十五六的人，在学术界的正常情况下，要进入中年的行列了，但是因为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耽搁，学界一样发生了断层，所以也便可以充一充最年轻的一群了。陈耀庭对于宗教有些兴趣，喜欢读朱熹的书，发现朱老夫子对道教情有独钟，尤其对内丹学兴趣极浓，所以也便以《道教影响下的朱熹》一文为砖，敲进了宗教学会的大门。

陈莲笙先生有时候也会参与学会的研讨活动，那场景至今很多人还记得：他穿着一件蓝色府绸衬衫，清清爽爽，头发梳得非常整齐，个子高高的，却很清瘦。天热时，穿着府绸的中式服装，手上拿着把纸折扇。听他说话，声音不高，很和气，一个十足的老先生形象。旧时过来的文人，就应当是这样的打扮，这样打扮的，一定是文化人。当人们知道这位陈老先生是一位道士时，不由有些吃惊，道士也有文化修养的吗？因为那个时

期，人们对道士都未免有些偏见，总觉得道士只会吹吹打打，并不了解道教也需要有学问。后来接触多了，他们觉得这一位道士，确实是与众不同的得道之人，言谈举止中不仅带着几分书卷气，还有很多内敛的智慧。笔者还记得，在陈先生身旁，经常还有几位同行，经介绍，才知道他们都是道教协会筹备组的成员，有一位是张源荣先生，道协成立后担任过办公室主任，后来又被选为副会长；还有一位是张先生的哥哥张源勋，当时还在大学里任职。另外还有几位，名字记不太清了，但知道他们都是道教界的前辈。所以，陈莲笙先生的好学，得到了同道们的支持，也许，他们之间是相互感染罢。陈莲笙先生始终在提倡并且身体力行地研究道教文化。时间长了，人们，包括学术界和道教界，慢慢认识到陈莲笙先生就是一位道教界的学者，他的学养与他的道行，是紧紧地结合着的。

二

陈莲笙在改革开放之后，最早倡导对于道教音乐的研究。这也是他从事道教文化的探讨与弘扬的第一件值得记下的大事。

道教音乐的渊源是原始巫教中的降神歌舞。“巫”这个字，最早就是以舞降神的人物形象的象征。根据《周礼·春官宗伯》和《尚书·伊训》等文献的记载，早在周代以前，“师巫而舞雩”、“恒舞于室”、“酣歌于宫”，已是社会的普遍风尚。一直到道教成立之初，音乐歌舞也主要被用来祈祷神灵。从东汉时代开始，音乐逐渐同斋醮仪式相结合，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道教



音乐不再仅仅是悦神降神的手段，而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性，成为维系道教礼仪制度的重要形式。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道教建立起了自己的音诵仪范。东晋南北朝是道教成熟的时期。道教的经典、斋仪在这时形成了较完备的系统，道教音乐也在这一时期初具规模。东晋问世的《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大量引用诸天隐韵，认为仙音是由天上大道之气自然发出的，给了道教音乐的来历一个形上学的解释，而灵宝派的步虚声，也给道乐提供了一个典范；北魏时的寇谦之改革天师道，提倡音诵，也给道教音乐的发展以重大影响。至唐代，道教音乐达到了极盛：在政府干预下的道教音乐科仪更为规范；道教的庙堂祭祀乐制创立；道教音乐被纳入宫廷的燕乐系统，称为“道曲”。而宋、元、明、清的道教音乐发展，更是为今天的道教音乐奠定了基础。这些音乐用于道教课诵，用于道教斋醮，用于



■ 1982年陈莲笙（前排右2）在青年宫（大世界）参加演出获奖合影



道教节庆，功能非常完整。可以说，道教音乐是道教文化中一块历史悠久且丰富多彩的宝贵遗产。它的许多曲目，实际上已经走进人们的生活，只是人们日用而不知罢了。比如著名的《二泉映月》，便是出自道士阿炳（华彦钧）之手。

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似乎开始酝酿快餐文化时代的到来。表现在审美层面上，催生了一种极具世俗化色彩的价值追求。通俗流行音乐火爆神州，而像歌剧、传统戏剧这样的高雅艺术则少人问津，更不用提一直倍受冷落的宗教音乐。有着悠久历史的道教音乐更是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

前面说过，陈莲笙自小受过严格的音乐训练，有很高的造诣。他也长期参与上海地方江南丝竹的演出。道友联谊，他也会拿出竹笛，吹一曲仙音。可以说，他对道教音乐是情有独钟。对于道乐的长期无



■陈莲笙在吹笛子

人整理，他内心的焦急是常人难以感知的。

作为一个将道教信仰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教徒，作为中国道教界的领导者，陈道长是决不能眼看着先辈的心血和结晶就此流失的。陈道长时常提醒自己，要把老祖宗的瑰宝好好地保留继承下来，如果这些东西在自己这一代人的手里丢失，那是无论如何不能向后人交代的。一个偶然的机会，陈道长听闻上





海音乐学会成立了“民族音乐遗产抢救小组”，旨在为濒临失传的中国各地、各民族的民歌、说唱音乐、宗教音乐等进行录音、录像和整理研究。陈道长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抢救和保护道教仪范音乐的契机。如果有上海音乐学院这样专门的音乐院校支持，对于道教音乐的发展将是莫大的帮助。

在与道协的其他领导商议后，陈道长决定亲自去上海音乐学院商谈有关事宜。时任中国音协副主席和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贺绿汀老先生是一位对本民族音乐富有深厚感情的老艺术家，正是他在全中国音乐理论工作会议上，倡议成立上海音乐学院“民间音乐遗产抢救小组”，对宝贵的民族音乐遗产进行抢救和保护。因而，上海市道教协会和上海音乐学院关于抢救保护道教科仪音乐的合作事项进行得十分顺利。当然，这里也必须提一句：陈道长的次子陈大灿，当时正在音乐学院工作。家学渊源，加上他自己在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的严格训练，使他如鱼得水，很快成了学术界最早开展道教音乐研究的专才之一。所以，上海市道协与上海音乐学院的合作，一开始就进行得十分融洽。

不久，两家单位联合录制了《中国道教斋醮·上海卷》录像片和录音磁带，记录了上海地区道士举行“净坛科仪”、“进表科仪”的过程和音乐演奏，其演奏和录音、录像制作均具有较高的水平。该录像片所记录的宗教仪式，既是中国古代宗教哲学思想的体现，又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仪仗古朴，服饰绚丽，经文典雅，仪礼有序，音乐更是丰富多彩，既是中国古代音乐的继承，又同民间音乐保持着血肉联系，具有中国宗教音乐的特点。《中国道教斋醮·上海卷》的摄制，开创了《中国道教斋醮》录像的先河。此后，上海市道协和上海音乐学院又摄制完成了第5集全真坤道“关灯散花科仪”，第7

集茅山卷“进表”(三茅表)科仪,第8集常熟卷“早朝行道科仪”等,对我国的音乐、宗教、历史、民族、民俗以及文化等各学科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陈莲笙都担负着指导和释疑的重任。这时,他数十年钻研道乐的经验 and 素养,派上了大用场。笔者还记得,在一次鉴定会上,他对科仪音乐录像中许多具体环节都作了中肯的分析,甚至于包括在科仪中跪拜姿势的雅观与否,都有具体的指示。同时,他又是一位好学之士,与上海音乐学院的合作,也使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多地从学术层开展对道教音乐的探讨。

趁着与上海音乐学院合作的东风,陈道长又不失时机从上海道学院的学生中挑选一批懂音乐、素质高的学员,组建成立了上海市道教协会自己的道教音乐队,整理演奏道教音乐,并亲自出任乐队总顾问一职。乐队成立以来,多次出外省市和国外演出,受到了良好的反响。1998年,上海道教音乐队一行10人赴欧洲参加在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举办的宗教音乐节,上海道教音乐队应法国地塔泥演出公司邀请在上述四国的六个城市即巴黎、格勒诺布尔、日内瓦、佛罗伦萨、都灵、法兰克福进行了宗教文化交流。各地对上海道教音乐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许多报界新闻媒体如:《欧洲时报》、法国《解放日报》、瑞士广播电台、意大利多家新闻机构、德国之声广播电台等纷纷派记者对乐队主要负责人进行了采访和报道。通过这次宗教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扩大了上海道教在海外的影响,从而为中国道教争得了荣誉,赢得了欧洲各阶层人士的赞誉。这一成功,也是陈道长多年努力培养人才、致力于提高上海道教音乐的水准的成功范例。



三

1983年，上海市道教协会正式成立。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道友们都在为场所的收回、自养的落实而辛劳。然而这时，道教界后继乏人的现象也日益显现。每次召开相关会议时，目光所及多为银髯皓首垂垂老者之形象，这不禁使陈莲笙道长暗自忧虑：老龄化同样威胁着道教，青黄不接啊！具体来说，宫观的管理、宗教活动的开展，都需要道士，但目前的资深道士大都年事已高，诸多工作都显得力不从心，就是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也有一定的困难。道教界近三十年没有收徒，人才断层是不争的事实。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该怎么办？陈莲笙道长经过认真的考虑后，觉得有必要开办一所培养道教专门人才的学校。这座学校，不仅要用较快的集体培养的方式培训出能适应道教界各项工作的年轻道士，而且要让受培养者有较高的宗教素养和健康的人格。由于这是一项新的尝试，与传统的师徒授受的方式有所不同，人们当然不可能完全都能理解其重要性，但是陈莲笙道长坚信办学非常必要，也充分地陈述了其间的理由，所以他的设想，很快就得到上海市道教协会其他领导成员的赞同。在陈莲笙道长的积极倡导下，在上海市宗教局的领导和支持下，经过市教育部门的批准，决定成立上海道学班。由陈莲笙主持学校的筹备工作。上海道教第一所培养道教专门人才学校开始筹办。

但是，举办道教学校，在上海道教史上属首创，没有前人的办学经验可以借鉴。于是，在办学过程中只能不断摸索，在教学中不断修正。虽然当时的办学条件比较艰苦，困难重重，但



是陈莲笙道长始终把“培养道教接班人”作为办学的宗旨。当时，道教界内部，对于办学的必要性、紧迫性看法不尽一致，同时办学必定要涉及场所，没有校区，谈何办学？而依当时道协的条件，新建一座学校肯定不可能，只有挤用哪一座宫观的房屋才能勉强让学校安顿下来。陈莲笙与同道们多次商谈，对宫观的当家耐心地说服，终于取得了理解和支持。上海道学班落户于上海市道教协会所在的海上白云观。说是学校，讲起来实在有些寒酸，也就是一间教室、一间办公室和一个兼做图书馆的学生活动室，准备给学员住的，就是白云观楼上的若干临时隔出的房间或者是阁楼。

1986年，在人力、物力和财力都相当困难的情形下，上海道学班开始招生，先后从江苏海安、句容、如皋等县，以及上海市郊县招来了31名学生。3月，他们正式入学，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中去。道学班的教学计划除设语文、历史、书法、英语及时政课外，就是学习道教知识，如教义、仪范、唱赞、经忏、道乐等基础课程。在三年学习期间，头两年侧重于课堂教学，每周六把学生分成两组，轮流在两所道观实习。第三年，教学重点转到殿堂上来，在道观里进行斋醮及管理等活动，培养学生独立进行宗教活动和管理的的能力。同时，上海市道协还经常组织学生外出参观、访问，以扩大学生眼界。为培养学生的综合修养，道学班还举办了一个“丝竹”小乐队，每周一、四晚上是音乐专业课，它以道教音乐为主，“丝竹”音乐为辅，硬是把一群不懂音乐的人组织培养成了一个具有道教特色的小乐队，并且经常外出观看音乐演奏会，还参加了嘉定长征乡举办的民族音乐演出等。学员经过三年的学习，懂得了道教基本知识，提高了文化素养，并能在实践中初步运用所学的知识。有





的学员刚入学时经常写错别字，现在已经能写短文，在《中国道教》杂志上发表。过去他们中间大部分人不通书画，经过学习，有些人能绘画，有的已经能写一手好字。

当时，道教界才恢复活动不久，不仅物力有限，而更严重的是，师资极端缺乏。大量的文化课，道教史、道教与中国文化一类的专业课，教内都找不出一个人能够承担的。当时不知谁向陈莲笙先生建议，借用上海高校、社科院的力量，聘那些单位的学人来上课。陈莲笙素来与学术界有着良好的关系，他采纳这一意见后，开始或自己出面，或委托助手出面，谦辞联系了一部分教师，其中包括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的陈耀庭，上海教育学院的刘仲宇，以及社会上对音乐主要是江南丝竹有造诣的老师等。有了师资，便有了办学的基本前提。此外，为使面临失传的道教科仪得以续传，陈莲笙道长还邀请了一批科仪水平较好的老道长为学生开班授课。

他不仅组织有关人员编写讲义，而且还亲自授课，将他多年来从事道教工作的宝贵经验，科仪理论，道教知识以及对教理教义的独特见解，都毫无保留地传授出来。因为他深深地感到，几千年来的道教历史说明，道教的发展同道教人才的涌现、道教徒素质的提高有密切的关系。道教自魏晋南北朝至唐宋金元时期，道教兴盛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时期的道教人才辈出，连绵不断。可是，清代以来，道教出现了衰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道教缺乏人才，道教徒的素质低。他还常说，道由人显，道教的存在归根结底是依靠道教徒的存在，道教的发展也取决于道教徒素质的提高和道教人才的多寡。

在教学上，陈道长秉承了以往“心传口授，口口相传”的传统做法，采用集体授课和学用结合的方法，在教学实践中收



到了良好的效果。此外，还在实践中总结出了好的教学经验：一是课堂授课比传统的师徒个别授受更有利于普及提高和尽快发现人才。二是招收学员要慎重考查，要把对道教虔诚的信仰和品德优良放在首位，要有初中以上的文化基础，不能滥竽充数。三是课程设置必须以宗教课为主，文化课为辅，坚持在教言教，按道教科仪和传统习惯从严要求。四是坚持学用结合，学习期间必须坚持参加宗教活动，做到“道像道”。这些经验的取得，为今后的教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道学班于1989年毕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由新式教育与传统授徒相结合培养出的道教徒。



■ 1989年7月上海市道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莲笙道长（右4）等在上海道学班首届学员毕业典礼上与学员合影

1994年9月，上海道学班正式更名为上海道学院，陈莲笙道长出任院长，为上海道教进一步培养高层次人才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以后，又招收了两届学员。从第一届（当时名道学班）至第三届，总共培养了七十余名毕业生。从上海道学院走出来的学生，都相继走上了工作岗位，充实到上海市道教协会及市内各个宫观，成为职业道士，为上海道教的振兴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事实证明，陈莲笙道长重视培养道教人才的思想是很有远见的，是符合上海道教事业发展需要的。

陈莲笙当时已是70岁的老人，为了办学，付出的心血之多，很难计量。除了上面提到的，更多的精力和心血，还是对学员的教育和管理上。他在学员面前，既是一位严师，更是一位慈祥的老长辈。因为，他从心底里喜欢这批十五六岁到二十几岁不等的小孩子。陈道长和道学班学生之间是一种亲如父子的感情。现在已经走上上海道教各个领导和工作岗位的道学院的毕业生们，谈及陈道长当年在道学班投入的热情以及对他们的关照都激动不已，却又带着一丝丝的羞涩，就仿佛是儿子回忆父亲对自己儿时的关爱一般，有点陶醉，又有点为自己当年的顽皮无知而略显不好意思。有位周道长，是第一届的学生，1986年入学，后来也一直追随陈道长做事。他讲起当年的学习和生活，总是很兴奋，说到激动处或者劲头上就普通话和上海话夹杂着，其中透露出来的他对于陈道长的亲近和爱戴是显而易见的。他很坦率地说：“其实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因为在我们学习的三年中，陈道长和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所以太熟悉了，以至于对于当时他对我们的关怀都忽略了。觉得很稀松平常了。但是现在想起来，他对我们真是如同父亲对待儿子一样啊。”其实很多时候子女都很少觉察到父母的爱和关怀，似乎认为父母爱子女、关怀子女是天经地义的，自自然然的。但是那些关怀总是会在以后的生命长河之中，慢慢堆积，并且融为一股暖流，



温暖着我们的心田。

对于第一届道学班的学员，陈道长投入了极多的感情，他的希望和他的宏愿都寄托在这些生机勃勃的学员身上，这也就决定了他对于他们的严厉。“那个时候，”周道长笑着说道：“我们还年轻啊，所以我们会贪玩，有的时候出去时间超过假条时间都会被陈道长叫到办公室去批评。”“而且陈道长特别强调做道士就要有个道士的样子。因此道袍、道帽，以及平时的坐立行走都做了很严格的规定。当时我们还不服气，现在想来也多亏他对于我们的严格啊，如果没有那个时候的严格管理，我们在道教知识的掌握和道教修为上绝对是徒有虚名的。”陈道长有没有对他们发过火呢？周道长说，作为一个修道之人，陈道长本来就心性平淡，性情上不会有太大波动，陈道长遇事都是淡然处之，绝对不会大喜大悲，更不会愤怒了。也就是有时候见我们不学习了，或者做错事了才会严厉地批评我们，但那也不是发怒啊。

陈道长当时有行政职务在身，他先后作为道协副会长兼秘书长、会长，琐碎之事颇多，很多事情都要他操心，不可能经常参与教学，但是只要有空，他就去各个宿舍溜达，去询问学员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最主要的就是指导他们的乐器演奏，以及科仪。陈道长对于二胡笛子等乐器都演奏得非常娴熟，而且他在长期的学习和练习之中还摸索了一些技巧，找到了一些乐器的演奏窍门。因此在平时，学员练习演奏道教音乐的时候，他就会在学员的身旁悉心地指导，告诉他们该怎么演奏。那个时候上海道教界非常缺乏年轻的后备力量，因此，陈道长就很有紧迫感，总是督促学员们学习。几乎每晚吃过晚饭，他都会把学员们聚集起来，让他们进行科仪的训练。那种望子成龙的急





切心情真是只有身在其中才能切实地感受到。这些督促和训练对于课堂是十分有益的补充，学员们在其中经常学到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李纪道长是第三届道学院的学生。他说起当初在道学班的生活和学习情况的时候，很兴奋：“啊，那个时候的生活啊，虽然过去了好多年，但仍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情呢。当时我的宿舍就在陈道长的隔壁，所以平时有空陈道长就会去我宿舍看看我们在干什么。如果我们在练习乐器，就会指导我们。如果看见我们没有学习而是在玩的话，就会把我们宿舍的人都叫去练习科仪。那时候夏天天热，陈道长的房间里有空调，他看见我们学员们满头大汗，就心疼地叫我们去他房间里凉快凉快。冬天天冷的时候，因为当时学院的洗澡还不很方便，陈道长房间可以洗澡，他就让我们学员去他房间里面洗澡。这些点点滴滴的事情，都让学员们记忆犹新。”李纪道长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他三年级毕业刚分配的那一年9月份，年轻人总是稍微有点管不住自己，很多人都偷懒不练习科仪，陈道长见此状况，就把学员们都召集到大殿进行科仪的演练，由于天热，很多年轻的学员都觉得身体承受不了，而当时陈道长八十多岁高龄还站在那里陪着他们一起演练。现在回忆起来，李道长都连连感叹说：“一个八十多岁的人啊，就在那么热的天里站着。让人心里真不是滋味啊。”从那以后，学生们也都体悟到陈道长的良苦用心。他是多么希望这些道学院的学生快快成长为栋梁，为道教的建设和发展去冲锋陷阵啊！

在陈道长和全体师生的努力下，上海道学院一直办得井井有条，学生都能尊师守纪，平时还非常注重对国家宗教法规的学习，不定期地邀请专家来进行相关法规知识的辅导，并适时



组织学生对《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进行研讨，不断提高学员的政治觉悟和法规的意识，并深刻认识到宗教事务与国家、社会的重要关系。道学院还非常重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不但在日常教学中增加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还经常邀请相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到学院来做爱国主义方面的报告，使学员们深切地认识到，爱国主义是在长期的历史中积累起来的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热爱祖国、忠于祖国是当代青年的神圣职责，作为一名道学院的学员，应该继承和发扬道教传统文化，将爱国与爱教结合起来，为祖国的道教事业奋斗终生。这些，也得到道教界内外和有关领导部门的赞许。在第一届学员的毕业典礼上，时任中国道教协会副秘书长黄信阳道长曾发表讲话，充分肯定了上海办学的成果。他说：“三年来，上海市道协办学宗旨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为我们和道教组织因地制宜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道教人才，作出了榜样。也为我们中国道教协会创办道教学院提供了可作借鉴的经验。”

在三届学生毕业并分别走上工作岗位后，不久，人们开始发现，目前道教界的文化和专业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一批道学院的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为上海道教界输送了新鲜血液，他们中的很多人，经过几年锻炼陆续走上了上海道教的各级领导岗位。但是，比起时代的需要，社会的发展，大家的文化水平和学修，都还差得很远，因此有必要让已经毕业的学员们回炉进修。为此，有人建议，开办一个进修班，让部分有条件的学员在学历层次和实际学养上登上一个新台阶。当时担任上海市道协会长的陈莲笙道长，积极地支持这项工作，而且亲自指导了这项工作。经过当时担任道协秘书长的史孝进等人的具体操作，这个班挂靠在中国道教学院，称中国道教学院上海进修班。





中国道教学院上海进修班是经过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批准，中国道教学院授权，在上海市民宗委的关心支持下，由上海市道协举办的培养上海道教高级人才的专科学校。全班学员来自原上海道学院毕业的一、二、三届毕业生，经考试合格后择优录取。1998年，他们正式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中国道协张继禹副会



■中国道教学院上海进修班学员毕业留影，前排右4为陈莲笙

长对上海市道协在培养道教人才方面的创新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要求全体学员一定要继承老一辈道长们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不断学习，要把今天的毕业看作是又一个更高层次学习的新起点。用自己的知识正确理解学道、修道、悟道之间的关系，培



■陈莲笙会长（右1）出席毕业典礼。

养自己的悟道水平，弘扬道教的优良文化，发挥道教的积极作用，为社会进步作贡献。陈莲笙会长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作为有几千年历史的道教，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数次的兴衰，依然能够存在，就必然有其存在的价值。这就需要我们去挖掘和研究，要完成这项历史任务，就必须要提高我们的思想素质、理论水平和综合能力，因此，我们要有紧迫感、历史使命感，不要满足于取得的成绩，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解决好道教如何与社会相适应的这一历史问题。”^①

^① 《上海道教》1998年第3期，第4页。



四

上海道教在历史上没有非常出名的道士或者道教思想家，也没有如茅山或者龙虎山那样的名山宫观，要怎么样办出上海道教的特色，让上海道教有自己的优势呢？这些都是陈道长一直认真思考的。他于是着手重点抓两方面，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文化。教育就是创办道学班，当时的上海道学班已经改名为道教学院，又扩大招生范围，可以说在全国道教教育上是尤为突出的一个。作为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智者，陈道长清楚地明白，文化是一切事业的基础和先导，无论是团体还是个人，文化都是其素质与潜力的具体体现。更何况当今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外来文化占据主导，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盛极一时，道教和儒学、佛教等传统宗教和文化一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文革”后重返道教界领导岗位，陈莲笙道长就开始苦苦思索该如何振兴道教文化，使之在新的时期发扬光大。但道教文化的建设毕竟是一个庞杂的系统性工作，究竟从哪里开始入手呢？

一个人的智慧毕竟有限，更何况自己还肩负着中国道教协会和上海市道教协会的日常工作，以及上海道教学院的日常工作，事务不可谓不繁忙。而道教文化建设这样的大事仅靠一人之力是万万不行的，为此古道热肠的陈道长找到了时任上海市道教协会副会长的潘雨廷先生，一起共商大计。

潘雨廷先生是著名的道教学者，易学专家，别号观玩客。1949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教育系。后师从周孝怀、熊十力等，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70年代初，开始从事道教文化研究。他研究的重点是宇宙和古今事物的变化，并有志于贯通东西方文



化之间的联系，对中华学术中的《周易》和道教，有极深入的体验和心得，撰写了大量道教史和道教文化等方面的论著。

当天，陈道长将自己的想法向潘雨廷先生和盘托出，想不到的是潘雨廷先生也早已为此事思索良久，正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潘雨廷先生认为，道教文化的振兴和发展，首先要做的是对传统的发掘和研究，只有从传统中寻找精髓和要义，并以为核心与骨干，才能使新时期的道教文化具备生机和潜力。听完潘雨廷先生的一番分析，陈莲笙道长不禁为有潘先生这样



■陈莲笙（中）与潘雨廷（右）

的同事和知己而感到欣喜，同时困扰多时的心结就此解开，心中道教文化建设的道路豁然开朗。两位智者促膝长谈，各抒己见，上海市道教协会关于道教文化建设的大计也就此酝酿开来。

1987年，在陈莲笙道长和潘雨廷先生的共同努力下，上海





市道教协会文化研究室正式成立，由潘雨廷先生出任研究室主任一职。同时聘请了教内外的著名学者和道长担任日常的研究工作，充实研究室的学术力量。陈莲笙道长明白，这个研究室不仅是一个挖掘、研究道教传统精髓的文化机构，更应当成为宣传、弘扬道教文化的窗口。只有认清了这一点，才能把研究室真正地办好。

研究室运转伊始，陈道长就将开办“道教知识讲座”提上了议事日程。其实，关于道教知识的讲座在“文革”之前就曾经举办过一阵，只是由于十年动乱而被迫中断，但这种讲座宣传道教文化的形式毕竟是推广道教文化的一个良策，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善和道教事业的复兴，陈道长觉得有必要重新恢复这种讲座，而由研究所出面举办这类讲座更是合适。为此，陈道长亲自出面邀请了一批对道教文化有博识的学者、居士、道长举办讲座，为信众讲学，此举受到了良好的效果，研究室举办的几次讲座不仅提高了信众的道教知识水平，更宣传了一度被大众所冷落的道教文化，同时也在无形之中为文化研究室打响了牌子，可谓是一石三鸟，研究室的工作取得了一个开门红。

作为一个研究室，必须要有一个刊物，而且作为上海道教领导机构的上海市道教协会也没有自己的刊物。此外，纵观上海道教历史，还没有出现过自己的刊物，虽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起，上海翼化堂创办过《扬善半月刊》和《仙道月报》，道教学者陈撷宁先生参与其中，大大提高了这两份刊物的质量。但它们皆不是纯粹研究道教的刊物，并且维持的时间也很短暂。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陈道长和潘先生决定尽快将研究室所属的专刊搞出来。但这个刊物究竟该如何定位，究竟是搞成一本理论性的学术刊物还是普通的介绍道教文化的读物，这是一个难



题。

潘先生直言不讳地指出,对于道教思想文化的研究、阐释、弘扬,全社会做得很不够,尤其是道教界自身做得不够。道教在新中国成立时已经搞得相当芜杂,解放后又因为“左”的政策的影响,宗教活动受到限制,道教研究几乎处于停顿状态或仅仅局限在少数专家学者的范围内,同广大道教信众也有些脱节。因此,整个道教工作包括道教研究,还处在比较低的水平。所以这本刊物当开风气之先,成为一本理论水平较高的研究型刊物,为上海乃至全国的道教文化研究树立一个榜样。

陈道长觉得潘先生的意见很切入要害,但同时也担心太过理论化的倾向会使这本刊物成为只有少数专家学者问津的读物。陈道长以为,这本刊物的宗旨应当是反映当代上海道教活动情况和道教研究水平,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团结广大道教信众走爱国爱教的道路,同时增强道教徒的知识修养,提高道教学术研究水平,促进道教界友好交往。而且,办刊物,能培养一批有一定文化知识和宗教造诣的人,团结一批专家学者,特别是可以培养一批年轻的道士、道教徒,使他们有一个学习、练笔的园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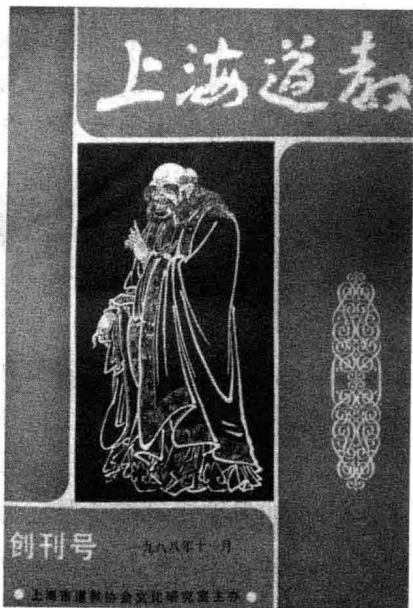
事实上,潘先生和陈道长在对本刊物的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只是潘先生是从学者的角度出发,而陈道长则是站在道教界领袖的位置上看待这个问题。经过充分的交流和沟通,两人很快就办刊的问题达成了一致。

为了加强编辑部的力量,陈道长还亲自出面物色和聘请编辑人才。当时他请来了老编审杨友仁先生,又定下了林其铨、刘仲宇等人。同时,道教协会又定下常务理事张源勋,加上潘雨廷先生,及另外一位,总共是6个人,开始了刊物的筹备。





1988年，由上海市道教协会主办，由道教文化研究室组成编委会，负责编辑和出版工作的《上海道教》正式创刊，它以弘扬爱国主义思想、研究中国道教文化，继承道教优良传统、沟通道教信众之间以及道教界与学术界的联系为宗旨，设立了“道教论坛”、“道教史研究”、“道教人物”、“名山宫观”、“道教知识”、“道教徒修养”、“道教文化”、“信息交流”、“气功丹法”、“养生保健”、“港台和海外道教介绍”等栏目，融学术性、知识性、艺术性、趣味性、健身性为一体，成为了一本具有学术性、文献性、艺术性、健身性和导游性的综合性刊物。创刊后的《上海道教》紧紧围绕其办刊宗旨，在积极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弘扬道教文化，指导道教工作，交流经验，提供信息等诸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得到上海市宗教局领导和市道教协会领导的好评，也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和兄弟省市道教界的好评。这一系列成果的取得，无不倾注了陈道长和潘先生的心血。在创刊14周年时候，有人专门写了调查报告《道教自办媒体的成功范例——十四年来的〈上海道教〉》，称赞说：“《上海道教》创刊于1988年，至今已有十四年了。《上海道教》伴随着上海道教界前进的步伐，



■《上海道教》创刊号书影



紧紧围绕办刊宗旨，积极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弘扬道教文化。十四年来，《上海道教》在全国同类刊物中赢得了声誉，可谓道教界自办媒体的成功范例。”《上海道教》的成功，既倾注了陈老的心血，也宽慰了他对于弘扬道教文化的紧迫之情。

陈道长把《上海道教》看成自己的孩子，他说：无论多么困难，绝对要坚持办下去。在1989年和1990年这两年上海道教最困难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当时的市道协难以开展正常运转，根本无法支付刊物的日常经费，差一点都办不下去。当时陈莲笙找另一位副会长张文希商量对策，张副会长十分爽朗，从他所主持的钦赐仰殿并不富裕的资金中，先垫付了二万元人民币，才使得《上海道教》勉强维持。同时，编辑部也采取措施，把季刊暂时改成半年刊，也就是一年出两期，硬是给坚持下来了。当时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工作很辛苦，津贴却很少，陈道长一直心里过意不去，到后来经济稍有好转，他就提出要提高编辑部人员的津贴。而且陈道长从《上海道教》创刊，就亲自把关，看稿子，非常认真，这个良好的风气一直影响着其他的工作人员。当我们为写陈老的事迹采访现任主编丁常云道长时，他不无高兴地对我讲：“从创刊到现在，《上海道教》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问题。”这倾注了陈道长多少心血啊！

五

陈莲笙不仅大力提倡和支持道教办刊、办学，弘扬道教文化，而且自己身体力行，笔耕不辍，不断撰写弘道文章。他从小就从父学习，加之聪颖好学，领悟力极强，这为他后来在撰





文述道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他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参与筹备上海市道教协会开始，就十分注意对道教文化的研讨，对本市道教界各类文献、资料的搜集。非常可惜的是，他当年的心血，在“文化大革命”中绝大多数皆已被付之一炬。现在只有极希罕的几件保存下来，算是当年的漏网之鱼。比如他曾搜集到民国时期的若干道教活动的照片，并且细加访问，一一标出当时照片上的人物。这对于研究上海道教史是异常珍贵的资料，也是不可再生的资料。“文革”结束后，国家开始重视宗教文化建设，陈莲笙积极配合和帮助党落实宗教政策，重新恢复了对道教文化的研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道教事业中，其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他丰富的文字作品。

从中国道教协会恢复活动以后，陈莲笙就在《道协会刊》上发表论文及回忆文章。及上海市道教协会创办了自己的刊物，他更是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从1989年开始，他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专讲道教徒的修养。仅这组文章，便连载了两年之久，其中包括：

第一讲 奉道行事；

第二讲 爱国爱教；

第三讲 学道为人；

第四讲 多行善功；

第五讲 我命在我；

第六讲 斋醮度人；

第七讲 众术合修；

第八讲 适应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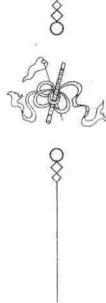
这些文章，都紧密结合道教面临的问题，调动道教传统资源，加



以阐释；同时也在阐释中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时代的新鲜血液。所以实际上，是在新时期中对道教教义的重新诠释和发展。发表之后，引起了道教内部的广泛反响。有的道观还组织同道专门加以学习讨论。以后，他又发表了《道教宫观管理讲座》、《道教与当代社会生活》等系列文章，同样引起了道内的关注。

这些文章，以及其他一些讲话、提交给学术会议의论文等，后来结集成了《道风集》一书。

《道风集》是一部关于当代道教徒修养以及道教与当代社会生活的专著，对当代道教徒提出了新的要求，对道教如何适应社会进行了探索，对当前道教的振兴和发展作出了精辟的论述。这本集子是1996年陈道长八十华诞之际，为了尊重他一贯的节俭作风，其众桃李门生、各界人士共同提议，由上海市道教协会组织人员将他这些年来日常以及会议上的文稿整理结集，作为祝寿之礼。可以说，这本《道风集》是陈道长的撰述精华，里面展示了他多年来对于道教文化的研究和体悟。十年之后，2006年，当他九十大寿时，又出了增订本。增订后的《道风集》共分为总论、道教徒修养讲座、道教宫观管理讲座、道教与当代社会生活、讲话以及其他等六大部分60余篇论文和发言稿。从道徒修养到道观管理、从道教内部建设到道教与社会的联系等各个方面阐释了诸多具有建设性的理论和见地。陈莲笙在增订本自序中如是说：“余弱冠入道，深知道教义理之深邃，道术变化之奥妙，斋醮仪范之恢宏。做一个道士，唱念做之技艺件件要驾轻，琴棋书画之功夫桩桩要就熟。因此，做道士很难。”由己推人，陈道长从道徒的自我修炼开始说起，又衍生及道教关乎社会、关乎国家的宏大命题，这正是应了他自己所说的：“学成之后，余厕迹于海上道门，出入于社会各阶层。在旧社会





熟睹十里洋场，风雨飘摇，深知社会变化之迅速，生存之维艰。因此，道教之生存也很难。”

上海市宗教局副局长吴孟庆在陈莲笙《道风集》出版座谈会上说：“这本《道风集》是他平时所演讲，所写文章的汇集，主要是讲道教的发展和道士的修养，字里行间展示了陈道长培养‘有道之士’的拳拳之心，体现着作者振兴道教的执着之意。这种拳拳之心和执着之意，反映了陈道长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道风集》的出版对端正道风，提高道教的文化层次，规范道士的行为准则，培养新一代道教接班人，都有重要的意义。”

张继禹在《引导道教振兴和发展的佳作——祝贺〈道风集〉出版》这篇文章中总结道：全书对当代道教的发展，道教徒的修养，道教和当代社会生活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诸多问题进行较系统的论述，凝聚了陈会长的卓识和心血，体现了一位老道长的爱国爱教，弘扬道教的志心弘愿，给人以教益和鼓舞。”

这些对于《道风集》的评价都很高，也充分体现了陈道长确实在道教修为、弘扬道教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深得道教界人士的尊崇。陈莲笙老而弥坚，紧随时代步伐，笔耕不辍，在这些文章中努力地阐述道教思想，从奉道行事、爱国爱教、学道为人、适应时代等八个方面论述了作为一个道士要如何进行真正的修养。他积极提倡搞好团结，加强联合，要关心民众，关心社会，要提高道教的文化研究水平，发扬优良传统，继承历史遗产。在经济大潮冲击的时代对道教的发展起到了灯塔的作用，指引了海上船只的航行。

《道风集》内容正如其副题所展示的有两个部分：道教的发展和道士的修养，前者是道教发展的理论、纲要；后者是道教



徒修持规范，二者相辅相成，浑然一体。《道风集》既然揭示出道教发展历史的一条重要规律——“道由人显”，把培养道教人才放在振兴和发展当代道教的首要地位上，并且提出“道教徒修养”的八个方面要求，普及和提高道教徒的整体素质水平。这就要既具有理论、方向的指示性，又有修持实践的可操作性，因而具有实际意义。“结伴行道”则提出了道门内外的团结问题。“团结就是力量”，不团结，“窝里斗”，人力、物力不用于创造、奉献和发展，而是浪费于“内耗”，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道风集》提出要实现两个团结，即要实现道门内各个教派的团结，而且还要实现与社会各界的团结：“联合各方面和各个层次力量来推动道教文化的发展”。可以说：这不仅是道教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新时期道教发展的必须。“道法自然”实质是提出“通变”问题。“通”就是会通，就是对道教传统的继承；“变”就是变化、创新。古人说：“变则可久，通则不走。”道教要发展，就必须解决好通与变亦即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道风集》指出：“有些根本的东西，例如对‘道’的信仰是不能变的，变了就不成其为道教了。但是有些东西又是变化的。”

陈莲笙的这些关注和思考，一直也是关心道教事业的教内外人士对于道教的振兴发展和未来前景所关注和努力实践的，而《道风集》正好启发了对于关键问题的思考，在各个方面都起到了带头的作用。

他的著作有如下这些特点：

1. 充满辩证，富含弘道智慧

道门是中国辩证法发展特大渊薮，各派共奉的祖师老子，就是一位辩证思维的大家。陈莲笙继承了老子的传统，在他的文章中，从题目就能看到其辩证的思维活动，比如：《无为治道，





有为治人》、《不满和知足》、《炫耀和养晦》、《生活日趋富裕和精神保持清虚》、《无为和管理》等，充满了辩证思维，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2. 覆盖面广

正所谓有容乃大。《道风集》涉及道教徒修养，道教思想，道教教义，斋醮度人，道教和当代社会生活，适应时代，培养人才等各个方面。他在《血脉贯通，百事兴旺》一文中写道：“社会要发展，社会的血脉就要贯通，道教要发展，道教的血脉也要贯通。道教的血脉贯通有二层意思：一层是道教内部的自身血脉要贯通，另一层意思是道教和国家、社会之间的血脉要贯通。”并提出要改变观念，加强道教人才的培养。在教义思想、宗教生活、教徒规戒、服务社会、庙观管理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设想，作出了积极的探索。

3. 风格朴实

陈道长的文笔轻盈，语言平实，朴素而具有深度。每一篇都不空洞，都踏实而严谨，每一篇都可独立成文，连接起来又能浑然一体，成为一个系统。能够由浅入深，在潜移默化之中，让读者吸收到营养，让读者觉得舒服而有兴趣。在陈莲笙道长《道风集》出版座谈会上，上海市宗教局副局长吴孟庆就指出《道风集》的其中一个特点是“语言平实，文风朴实，充满了辩证法。书中所载的各篇，虽称不上鸿篇巨制，但各篇联系起来看又自成一体。读这本书，如同听一位长者娓娓而谈，没有空洞的说教，不是板着面孔训人，从历史讲到现实，从道教知识讲到做人的道理，从度人度己，讲到适应时代，深入浅出，言简意明。道教学说本身是充满哲理的，它可以讲得深奥艰涩，也可以讲得通俗易懂，而后者尤其难能可贵，但《道风集》基本



上做到了”。

《道风集》不仅仅为上海的道教大众所喜好阅读，全国的道教徒也奉为学习的经典，其论述和见解深深吸引了广大道教界内外的人士。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上海道教何去何从，陈莲笙和有志于重整道教的道教界人士一起，爱国守法，划清与封建迷信的界限，组织爱国爱教的活动，终于在新社会中争取到了道教的合法地位。陈道长在《机在天地，亦在人心》一文中讲得很透彻，不论是国家的命运和道教的命运都要凭着自己的努力去抓住机遇。因此1956年和1979年，都是道教界人士的良机。尤其是1979年党的宗教政策落实，他开始大力地开展道教活动，为道教在民众中的声誉做足了准备，到1985年上海道教在文化和学术界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影响。随后，他还录制音乐创办杂志，同海内外广泛交流，使得上海道教的影响遍及全国，走向世界。

毫不夸张地说，《道风集》可以作为当代道教爱国爱教的最好教材之一，是继承和发扬道教优良传统的最好体现，它表明，陈莲笙也是引导道教适应时代的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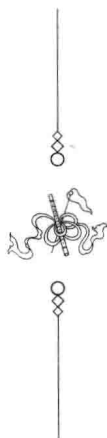
1990年，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拟组织撰写一本全方位反映上海宗教界历史以及现状的《上海宗教志》，道教文化研究室随即投入了这项巨大的工程，撰写其中的《上海道教志》。最终经过全市五大宗教团体的专家学者十年的努力，于2001年2月正式出版。该书以极具上海特色的详实资料、丰富内容，分总述、大事记，以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其他宗教、宗教事务和人物等8篇共十大部分，738页文字(计110万字)和32页彩色照片。相当大部分的史实和资料都是第一次对外披露和公布。其中的《上海道教志》可以说这





是陈道长和潘先生领头的道教文化研究室的一大理论成果，更是为道教的文化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另外，研究室还多次派人参加国际道教学术研讨会，并拿出具有一定质量的论文。所有这些工作都为宣传上海道教、弘扬道教文化打下了基础，也为让全国乃至世界了解上海道教作出了贡献。

二十几年来，上海道教界在弘扬、宣传道教文化上的成果有目共睹。陈道长作为带头人功不可没，正是得益于他的远见卓识和不懈努力，上海道教界的文化建设才有了今天这样繁荣的局面。





第八章 弘道四海

一

陈莲笙重返领导岗位后，一项重要的工作，是与各地同行的交往。这种交往，开始时主要还是在大陆各地的宫观和道友之间进行。特别是邻近的江苏苏州、茅山，以及江西龙虎山天师府等地。但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开展了与我国的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道教界之间的交流。同时，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改革开放的发展，渐渐地开始了与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邻近国家的道友的相互往来；再以后，西方国家的某些道教界人士或者道教研究的学者也陆续地来上海拜访有关的宫观和道教组织。在这些活动中，陈莲笙都十分重视，将它们看作是与海内外道友相互学习、相互切磋的机会，也看作是向道友昭示中国当代改革开放中道教新面貌的机会。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其地理位置优越，并且全面推进对外开放，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多领域、多形式地对内对外开放格局。经济迅速发展，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际交流频繁，逐渐上升为国际大都市，成为中国经济文化交流传播的中





心。整个上海与国际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及借鉴的速度也大大加快，力度亦大大增强。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发掘各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使之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道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已经被愈来愈多的人们所认识，道教文化中的许多思想精华，如崇尚自然、重视环保、注重和谐等，对现代社会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期望长寿和更为丰富的精神生活很自然地成为大多数人的共同追求。因此，道教医学、道教养生、道教音乐都是值得大力发掘的文化宝藏。所以，来往于上海的国际与中国台港澳地区的道教界人士和其他友好人士日益增多。他们希望与上海道教界、学术界交流弘法经验，探讨道教文化的真谛。因此陈莲笙与整个上海道教界对外接待的任务愈益繁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旅游业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地位日益重要。道教宫观大多在风景幽雅的山川名胜之地；或历史悠久，故事传说甚多，令人神往；或两者兼备，使旅游者惊叹不已，常常成为旅游者参访的首选之地。许多道教名山和宫观成为旅游热点，对香港、台湾地区和国外道教信徒及其他旅游者极具吸引力。这也在无形之中为弘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天时地利人和，陈莲笙道长敏锐地觉察到这恰好是弘扬道教的大好时机。作为一名道教徒，仅仅个人学道、修道是不够的，还必须承担起研讨道教优秀文化、增进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特别是要利用上海独特的地理与文化优势，面向世界，做好弘道的工作。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上海道教的各项活动又开始走上了正轨。上海市道教协会相继收回了白云观、钦赐仰殿、圣堂、东岳观、龙王庙、三元宫等道教宫观，并且恢复了



这些宫观的正常宗教活动。同时，为了保存道教文化遗产，上海市道教协会还专门邀请了上海博物馆的专家对白云观的明代铜像作了修复。为了丰富道教人士的知识，还专门邀请知识渊博的学者、居士和道长们，举办了一系列的道教知识讲座。此外，还整理录制了丰富多彩的道教斋醮仪式和宗教音乐，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经过多年筹备，还于1988年12月成立了道协文化研究室，出版《上海道教》刊物。这些，都为接待海内外的同道及友好人士打下了基础。

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人，因为常常读到、回忆到的是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所造成的恶果，所以很难设想，我们的文化在古代曾经有过非常开放的时期，道教面向世界，既吸收域外优秀文化，也尽可能地抓住机遇对外传播。所以，当代道教界的对外交流，实际上是恢复了当年全盛期的优良传统。从道教形成不久之后，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就十分注意吸收异域文化的优秀成分，到了唐代，其影响更远播海外。高祖李渊曾派使臣到高丽送天尊像，又派道士到高丽宣讲《老子》。道教还传入真腊，当地人“尤信道士”。日本也传入道教经书，故王维在《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中有“金简玉字，传道经于绝域之人”。唐太宗令道士成玄英等与玄奘合作将《道德经》译为梵文，王玄策在印度建碑文宣传道教自然无为思想。这些都表现出盛唐时代道教传播的兴盛景象。自明清，道教衰落，道士骤减，弘道之事似乎也成为少有人及之事。“文革”后，道教在新时代的沐浴下，正茁壮成长，合法的地位得以恢复，使得陈道长对于道教海外交流萌发了信心。并且开始积极与海内外道教团体或者爱道人士互访交流与学习。

当然，一开始，上海道教界还是主要地与全国各地的道教





界开展联系。1991年1月5日以龙虎山道协理事、嗣汉天师府知客张贵华为团长的天师府参学团一行7人，参访上海白云观。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陈莲笙对参学团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陈莲笙道长说：“龙虎山乃道教祖庭，自汉天师正式创教以来，一直为道教中心。最近，龙虎山举行天师圣像开光大典，这不仅是我们道教界的一件大喜事，而且也是重振道风、弘扬道教的一个新起点。希望今后我们之间多多交往，增进道谊，共同把祖天师创立的道教发扬光大。”张贵华道长介绍祖天师开光的盛况之后说：“这次龙虎山的修复乃至开光，各级政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因此，我们应当感谢党和人民政府，感谢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参访期间，参学团还参观了浦东钦赐仰殿，就两地的宗教活动和宫观管理制度等进行交流。不久，即应江西龙虎山嗣汉天师府邀请，上海道教法务团一行16人，在以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陈莲笙为顾问、副会长张文希为团长的率领下，于1991年9月30日赴江西龙虎山，参加天师府10月3日至9日为新加坡和台湾地区道教徒启建授箓传度的传统大醮，受到鹰潭市、贵溪县有关领导以及天师府全体道众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法务团由上海市道教协会与白云观、钦赐仰殿两道观道友组成。根据中国道教协会指示，由江西、北京、上海、江苏联合组成“授箓传度指导小组”，以继承和弘扬祖国道教文化，保持天师正一道传统为宗旨。在指导小组的安排下，授箓传度得以顺利进行，整个醮仪严肃而隆重，既保持了道教正一派的传统，又体现了“济物利人”的道教思想。活动期间，法务团受到鹰潭市政府领导的亲切接见和宴请，市统战部和市宗教局领导也前来参加祝贺。对上海法务团的大力支持使这次授箓传度醮仪圆满成功表示感谢，天师府还专门赠送“鼎力相助，



道谊情深”的锦旗和礼品。

从道协成立后，陈莲笙频繁地与各地道友交流，先后到鹤鸣山、青城山、龙虎山、崂山、茅山等名山宫观参访。



■陈莲笙（中）在道教发源地四川鹤鸣山

二

陈莲笙道长和上海市道教协会还和我国台湾、香港及澳门道教界频繁往来，与那些地区的道教团体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陈莲笙道长与台港澳的友好往来就开始了。这时离上海市道教协会正式成立还不久。1986年，上海市道教协会接待了香港圆玄学院副主席赵镇东一行；1987年4月，应上海市道教协会的邀请，香港圆玄学院副主席邓国材以



及邱显华、梅明达组成的香港圆玄学院代表团访问上海，参观了海上白云观、钦赐仰殿、上海道学班，以及尚未开放的著名道观上海和嘉定城隍庙。陈莲笙在这些活动中都代表市道协主持了欢迎座谈和宴请等活动。同时，在陈莲笙的安排下，上海道学班的学员还为香港的客人举行了祝愿仪。

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友好往来就更加频繁了。

1995年8月15日，受中国道教协会邀请，香港省善真堂代表团一行11人，在香港道教联合会副主席周铭先生的率领下，在中国道教协会联络处孙同昌主任的陪同下抵达上海。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陈莲笙等到机场迎接。在沪期间，代表团一行受到了上海市宗教事务局何全刚局长的接见和宴请。代表团参观了上海城隍庙、白云观、浦东钦赐仰殿和佛教玉佛寺、龙华寺等，受到了热情接待。该堂总理周铭先生表示，今后要多加加强友好往来，促进沪、港两地道教界的文化交流，代表团还参观了南浦大桥、东方明珠电视塔等，对上海的城市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

1999年香港青松观的侯宝垣一行6人来上海参访，陈道长给予热情的接待。

2001年10月14日至15日香港啬色园徐守沪主席，蔡亮、李跃辉副主席等一行25人来沪参观。代表团成员在市民宗委、市道协有关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上海白云观，以及上海第四聋哑学校等福利事业单位，并在上海城隍庙拜会了市道协领导、陈莲笙名誉会长、史孝进会长、吉宏忠副会长等，进行了亲切交谈。

2003年3月22日至24日，以香港道教联合会主席汤伟奇为团长，副主席吴耀东、张锦鸿、曾忠南为副团长的访沪团一



行23人到上海参观访问。他们受到了上海道教界朋友的热烈欢迎，陈莲笙名誉会长，史孝进会长，丁常云、吉宏忠、戴敦邦副会长等市道协领导与客人们亲切会见。因客人们的要求，安排他们参观了上海城隍庙、白云观、钦赐仰殿以及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南京路步行街等风景区。期间两地道教界同仁举行了座谈、交流和互赠纪念品等活动，共同探讨中国道教的发展和道观管理。通过交流，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香港客人也对上海道教近几年的发展变化表示赞赏。

以上只是香港道友来上海活动、陈莲笙道长主持接待的部分情况。事实上，与香港客人来访的同时，陈莲笙道长也曾数次率团访问香港。

1986年12月，应香港圆玄学院的邀请，由上海道协陈莲笙为团长，潘雨廷为副团长，



■上海代表团陈莲笙（左3）、张文希（左1）、苏宗斌（左5）、潘雨廷（左6）拜会香港道教联合会负责人汤国华（左4）、赵镇东（左2）

苏宗斌、张文希等4人组成的访问香港代表团，去香港访问，这是上海道教界首次访香港，受到了香港道教联合会主席、圆玄



学院名誉主席汤国华，圆玄学院主席吕重德，副主席赵镇东等热烈欢迎。汤国华还主领香港儒、道、佛三教60余人，举行传统的宗教仪式，接受上海市道协赠送的《道藏辑要》。上海代表团访港期间，还同香港道教界进行了学术交流，潘雨廷副团长主讲了《道教八卦图的渊源及流变》，获得香港道教同仁的普遍好评。陈莲笙团长和圆玄学院副主席赵镇东交流道观管理理念；上海代表还参观了圆玄学院创办的圆玄第一中学、圆玄小学、圆玄幼儿园和安老院、施诊所等社会福利事业；参观访问了黄大仙观、青松观等著名道观。

1993年2月，应香港圆玄学院邀请，上海市道教协会再次组团访问香港，参访了圆玄学院、蓬瀛仙观、黄大仙观、青松观、云泉仙馆和香港道教联合会等道教场所。香港也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和上海有某种相似，这次陈道长就非常耐心地考察了一番香港道教的状况，香港是如何培养道教人才，如何推动道教传播，如何管理宫观……这些都给了他很多借鉴之处。因此在回上海后，他开始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对于上海道教发展的未来有了更大的信心。

因为与香港道教界有着长期的友好往来，陈莲笙道长与香港道教界的领袖均保持着深厚的友谊。这一点，笔者也深有感触。每当笔者到香港，遇到汤国华、侯宝垣、李显华这些香港道教联合会或著名宫观的领导人，他们都会问起上海的老会长身体怎么样。至于其长子陈耀庭赴港，他们更是经常围绕陈老会长问长问短。陈会长对他们这批老朋友，也是经常挂念在心。对于已经仙逝的老人，他也怀着深切的感情加以悼念。比如侯宝垣、赵镇东、汤国华等老朋友走时，他都表达了悼念之情。而且在他们身后，也还经常回忆和怀念。当侯宝垣道长仙逝三周



年际，陈道长就曾写下《怀念侯宝垣同道》一文：

道经上说：“道无形相，要藉人弘。”

侯宝垣道长的一生全心全意贡献给了弘道事业。

他是一位上对得起祖师，下对得起后辈的高道。

侯宝垣道长生前的近二十年中，为了促进大陆道教
教的恢复和振兴鞠躬尽瘁地做了大量工作，为了推动
海内外社会各界对道教的关心和研究卓有成效地做了
大量工作。受惠于侯宝垣道长的宫观和道士们永远不
会忘记他。中国道教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中国文化史
永远不会忘记他。中国华侨史也永远不会忘记他。

我为当代道教界拥有侯宝垣道长这样的高道感到
欣慰，感到骄傲，感到荣耀。

我深深地怀念我的同道侯宝垣道长。^①

对侯道长的深深怀念，典型地表达了陈莲笙道长与香港道
教界的同道们建立起的同道之谊，同胞之谊。

在陈莲笙道长的弘道活动中，与台湾道友的交往占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上海地处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前沿，
作为一个走向国际的大都市，地理位置优越，台湾道友常常将
这里作为进入祖国大陆的第一站，更重要的是，这二十余年来，
上海道教界的面貌在不断更新。与台湾同道的交往，当然不是
陈莲笙及其他道长个人的行为，而是整个道教界都极为看重
的大事。

^① 香港青松观印行《弘道阐教——侯宝垣道长纪念集》，壬午年，2002。





而与台湾道教界恢复与发展联系，是整个道教界长期的愿望。只是限于历史和现实的条件，海峡两岸一度隔绝，道教界的来往当然也无路可通。但是改革开放的春风，不仅吹拂着神州大地，也消融着两岸隔绝的坚冰。

早在1980年5月，中国道教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经过认真的准备和深入的讨论，通过了《致台湾省道教界书》：“台湾省道教界诸道长道鉴：中国道教协会第三次代表会议于五月七日在首都北京召开。各道派、名山宫观及道教学者之代表欢聚一堂，同研玄门之奥义，交谈修持之所得。畅叙之余，怀念在台道友，特为保留理事名额二名，俟台湾回归祖国之日，予以增补。回顾本会于一九五七年成立，迄今已二十三秋，惜云海阻隔，以致历届会议均空台湾代表之席次，同道之情谊难以互罄，悟真之秘旨无从共习，云天伫望，仰慕殊深。唯我道教，源远流长。太上老君所传清虚之大道，大汉天师所授正一之法篆，绵绵相传，灿然犹存。凡我道友，弘道显教，责无旁贷，愿与台湾诸道长共推爱国爱教之热忱，促祖国统一之大业，于国于教，皆幸甚焉！道教之丛林宫观，遍布全国，名山福地，胜迹依然。台湾省诸道长及道教学者，倘能作大陆之游，朝拜祖庭，寻访仙迹，切磋教义，交流心传，彼此定能获益慰怀，同增道谊。东望台澎，书不尽意。中国道教协会第三次代表会议，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三日于北京。”

《致台湾省道教界书》表达了祖国大陆道教界同行对于台湾同道的关注，也表达了他们与全国人民一样希望看到祖国统一的真诚愿望，对祖国河山和民族团结的深切关怀。

1989年，陈道长出任上海市道教协会的会长。由于道教是传入台湾最早的宗教，而且其中以正一道为多，上海也是正一



道居多，所以台湾的“中华道教总会”特意参访上海市道教协会。当时台湾“中华道教总会”正拟创建“中华道教学院”，恰好趁此次机会向上海市道教协会取办学之经。因为在1986年上海市道教协会创办了第一届“上海道学班”，陈道长兼任教务主任并亲自组织教学，将上海道学班办得有声有色。在欢迎接待中，陈莲笙道长热情诚恳的态度和渊博的道教文化知识，给对方非常深刻的印象。宾主都极尽其欢。他们谈道谊，谈道学，更常将话题转到对两岸和平统一的憧憬。自此之后，台湾道教界的来访变得经常。除了“中华道教会”的历任负责人，各宫观与上海道教界的来往也开始发展起来。

1989年4月9日，以台湾道教会理事蔡明贤为团长、许持明道长为副团长的台湾高雄道教参访旅游团一行18人，到江西贵溪上清嗣汉天师府参访，受到天师府全体道众的热烈欢迎。蔡明贤团长说：“参访祖庭，是我们很久的愿望，现在终于实现了，我回去一定要把祖庭的巨大变化，介绍给台湾道教同仁，还希望更多道友回大陆参拜祖庭。同时希望祖庭诸位道友去台湾参访。让我们一道为道教的发扬光大作贡献。”当时，陈莲笙道长也在江西，听这一席话，不由感慨万分。台湾同胞和大陆人民之间的根的情谊在各个方面都有体现，尤其是道教。台湾的道教人士更是把回大陆看作是回娘家一样亲切。随后他们一行来到上海参访上海市道教协会。陈莲笙道长给予了热情的接待。

1991年10月台湾道教参访团参访上海市道协。

1996年8月台湾高雄道德院组团来访。

同时，陈莲笙道长也开始带着上海道士出访台湾。1994年11月，应台湾高雄文化三清宫邀请，中国道教协会组织道教文





化交流团访问台湾，并参加了由台湾高雄文化院举办的“纪世升平法会”活动。交流团由九省两市12个名山宫观41名道士组成。上海市道教协会和北京白云观各自组织了道教正一、全真两派的法务组随团赴台交流。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陈莲笙担任团长，中国道教协会副秘书长黄信阳和常务理事张常明担任副团长。教务处主任袁志鸿任秘书长，常务理事王光德、杨世华任副秘书长，交流团在台湾开展了法会、文化交流和参访活动。在那里受到了台湾道教界的热烈欢迎。11月19日，15天的参访、交流活动圆满成功，台湾的道友们到机场依依送别。此次活动引来台湾很多媒体的争相跟踪报道，如《台湾新闻报》、《民生报》等，所以非常具有时代意义。在他们的报道中，常常关注陈莲笙道长的情况。

三

上海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每年来访的国际朋友不知凡几，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对道教抱着浓厚兴趣的友好人士，也有若干海外的道友。

还在上海市道教协会正式成立不久，陈莲笙就参与了对外国友人的接待。1986年，美国驻沪领事金大友，法国著名作家肖胧，美国夏威夷大学柯文华教授，法国远东研究所劳格及博士来访问，陈莲笙等人向友人介绍了情况，赢得了他们的赞赏。1987年11月，美国中孚道观院长凯蒂博士，公关主任台维·菲尔德教授，研究室主任冀朝礼教授来上海访问，并与海上白云观结成友好兄弟道观。当时任上海市道协副会长兼秘书长的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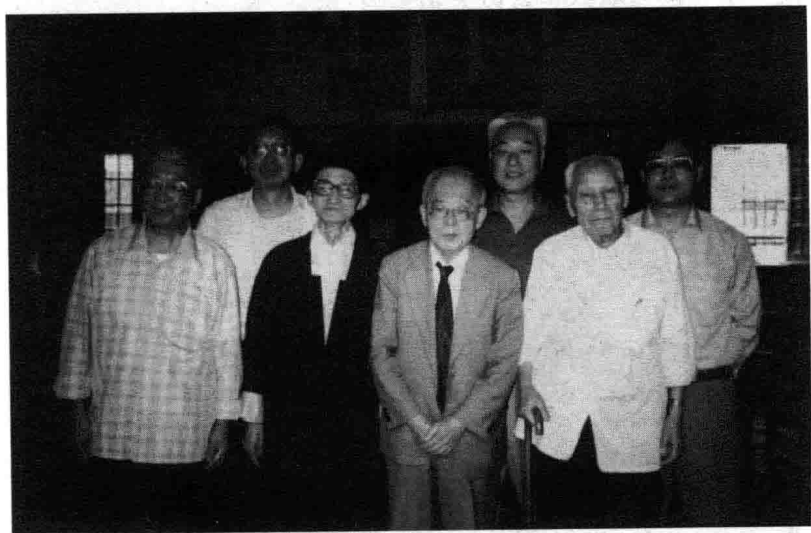


莲笙不仅参加了接待，而且对于许多具体事宜作出了安排。

从此之后，海外来宾越来越多，他们中有著名的作家学者，有道友，也有政界人士。

——1987年，分别接待了澳大利亚道家柳存仁教授和英国著名作家韩素音女士。

——1988年，接待了日本道教学者丰屋邦夫副教授。



■陈莲笙（前左2）与再次来访的柳存仁教授（前右2）等合影于上海白云观老君堂（1998年5月）

——1989年，接待了法国上海联谊会副会长沈根栋；美国悟真学院院长、紫根阁阁长、美洲佛教协会主席谢满根。

——1990年，接待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四国驻沪总领事及夫人，以及法国上海联合会一行36人的访问。

——1991年9月26日至10月6日期间，新加坡道教总会





(该会成立于1990年3月，由近30座道观和道教团体组成)参访团一行13人，由主席陈国显率领对北京、上海、浙江、江西等地道观进行参访。并且由中国道协李文成陪同，赴上海白云观、上海钦赐仰殿等参访。新加坡道教徒此次组团来访，增进中、新两国道教界之间的联系，加深道谊。

——1992年，接待了法国著名道教学者施博尔。同年，还接待了菲律宾道教总会访华朝圣团。

——1997年2月，美国宗教团来访。



■陈莲笙（右）和张文希（左）会见施博尔博士

——1998年，日本著名道教人士卫三宏来访。新加坡道教协会再次来访。

以上只是几个例子。在这些来访接待中，陈莲笙道长总是不忘向客人介绍我国宗教政策，介绍上海道教界欣欣向荣的景



■ 1997年，陈莲笙会长（中）等与来访的美国宗教界代表团成员在上海城隍庙合影

象。同时，也虚心听取客人的意见、建议。他的言谈举止彬彬有礼，道风整洁洒脱，给来访的客人留下极深的印象，也建立起深深的友谊。所以每当陈会长所在的宫观举行重大活动，都会有我国台港澳和各国的道友来贺。

陈道长也强调了要主动“走出去，多交流”。

新加坡道教总会于1994年举办了道教文化月活动，邀请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的道教代表团共同举行斋醮仪式。陈莲笙率领上海的多位道士，前往参加其法务活动，颇得当地道友们的的好评。1997年7月陈莲笙道长再次赴新加坡参加新加坡道教成立七周年纪念活动。1997年11月他又应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庙之邀赴新加坡参加八天法务活动。





四

在陈莲笙的弘道活动中，广收门徒，也是重要的方面。人们常说，一个教派，一个组织，能否长期生存与发展，除了它的思想、制度要不断地适应社会，符合信众的需求，符合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极其重要的一点，是要后继有人。师传徒，徒成师再授徒，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道教自创立之初，就是采用师徒制度来传道的。师父收徒弟，徒弟再收徒弟，徒弟的徒弟再收徒弟，这样传承下去，将道弘遍天下。陈道长很小的时候，就跟随学道，学艺精湛，早就名气在外，因此很早开始就有很多人慕名来拜师学道，他也本着弘道的愿望，择善而传，收授了不少徒弟和学生。这一点，与他一向提倡的创办新型的道教学院，依现代教育理念培养接班人，相辅而相成。

陈道长的徒弟很多，可谓桃李满天下。在北京、重庆、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等地，都有正一道士或居士慕名前来要求拜在陈老道长门下。这也难怪那么多人投师心切，像陈老这样的德高望重的正一大师在全国几乎已是硕果仅存，能拜在他的门下，实在算得上三生有幸。

陈莲笙道长还收了一些海外徒弟，如马来西亚道教人士陈文成（1998年正式成立“马来西亚道教联合会”〔Dersekutuam Gabungan Taoist Malaysia〕，陈文成〔B.S.Tan〕为副会长，后又历任署理会长、会长）。陈文成与陈道长的师缘开始于多年前。说起来，还得稍扯远一点。1997年，应马来西亚华人政党马华公会的邀请，上海有两位教授赴大马演讲道教文化。到了那里，才知道大马是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度，马来人、华人和印



度人是主要的民族。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包括语言、文字与宗教。华人中绝大多数信仰道教和汉传佛教。但是华人宗教的组织化程度很低。当地的道教信徒有意成立一个道教联合总会的组织。邀请两位中国学者前往演说，实为广造声势计。那两人中，一人就是陈莲笙道长的长子陈耀庭，另一个则是作者本人；而参与接待的，主要人物就是陈文成，以及另一位道教信徒何远平。这样，陈、何以及其他大马道教界人士就与上海有了不解之缘。不久，马来西亚道教联合总会组团来上海和中国大陆其他地方访问，率团的正是时任副会长的陈文成。而陈文成率团参访上海市道教协会，与陈道长便有了这一面之缘。正是这一次相见，让陈文成这个道教徒，第一次感悟到了真正的道教宗师风范，他那一次与陈道长告别之后，就萌发了要拜陈道长为师的心愿。过了几年，陈文成和当时任大马道教联合总会秘书长的何远平专程来上海，请求陈道长收他们为徒。陈道长眼见马来西亚道教人士如此虚心好学，也不由感动，欣然收下了这两个徒弟。由于陈文成在马来西亚道教界的重要影响，陈老弘道心愿在异国他乡获得了回响。

除了个别收徒之外，还应广大道众的要求，举办了几次集体拜师收徒仪式。

2004年11月27日（农历十月十六日），身为中国道教协会顾问、上海市道教协会名誉会长、上海城隍庙住持的陈莲笙大师在上海城隍庙举行道教正一派弘法传度活动，投拜弟子共56人，来自上海各所道观。此次活动聘请高功法师薛明德道长为监度师、吴关德道长为保举师、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史孝进道长为掌仪师、浦东新区道协副会长王贵荣道长为助理，徐松兰、秦方育、顾桂馥、奚金元道长协助参与科仪的护法。传度仪式分





五个程序：请师、启师、行礼、开示和发证。经过此番传度仪式，上海大多数中青年道士得以拜在陈老门下。

陈莲笙道长真正的起到了一个“光”的作用，一点点光就可以驱逐黑暗，就可以照亮周围的很多人，又点亮了其他的光源，使得光越来越强，照耀更多的人。现今，陈道长的徒弟、学生们都活跃在行道、弘道的队伍之中，其中不少担任了道教界的重要职务。如前面提到的陈文成，现在仍在马来西亚道教联合总会会长的任上。至于在中国大陆，他的学生中担任道教界领导职务的就更多了。上海市道教协会的主要领导，可以说都是他的弟子。另外有一些门生，经常以老师的教诲砥砺自己，走出国门，弘道不息。如重庆绍龙观的主持李一，弘道的足迹到过马来西亚，近年更到达欧洲，在朋友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于德国北莱茵地区创办道观和养生中心，向德国民众展示了道教文化的魅力。所以，陈会长广收门徒的效果，这一做法对于弘道的意义，还会持续地呈现出来，并像滚雪球那样，越来越大。





第九章 高风亮节，提携后贤

陈莲笙先生从12岁正式拜师学道，弘道的志向久而弥坚。但是，只有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才遇上了道教发展的黄金时期。1979年，重上北京参加中国道协的成立大会，虚年龄已经63岁；1985年上海市道教协会正式成立，他担任副会长、秘书长时，虚年龄69岁；1990年起任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74岁；1992年担任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时，已76岁。老杜诗云：人生七十古来稀。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年过七旬，应当抓紧工作，尽可能地贡献力量，同时，从整个道教界的情况考虑，如何让年轻的一代快速成长，无疑显得越来越急迫。由于历史原因，中国道教界有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没有正常收徒，从改革开放、道协恢复活动到兴办道学班、道学院，也就是近二十来年的事。年轻的一代，在宗教修为、社会声望来说，都还与老一辈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如何帮助他们尽快成长，接上班，接好班，已经迫在眉睫。

对道教界接班人问题，陈老道长从道协成立的第一天，就已开始加以考虑，他力主兴办新型的道教院校，就是出于此目的。这一点，如前面说过的那样，取得了成功，也获得了教内外的一致好评。然而，当这些年轻人毕业之后，如何使他们赶快成熟，还有待于在组织制度上加以保证，让年轻人尽快地走





上各级领导岗位，特别是要选择其中优秀的有造就前途的人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各地方的道教组织主要的领导职务，还是由老人担任着，中国道教协会的会长、副会长，除个别人外，都超过了70岁。让年轻人上，教内的有识之士几乎达成了共识。然而，年轻人上来了，老的怎么办？老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自己退居二线，让合适的年轻人上，另一种是恋栈，舍不得退，对年轻人上来不放心。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牵涉到利益格局，并不是都能想通的。

陈莲笙道长采取的是坚决、彻底地退下来，腾出位置给年轻人。

—

1998年8月中国道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前门饭店隆重召开。这次大会，是在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也是在中国道教事业蓬勃发展和中国道协工作取得可喜成绩的基础上召开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道教界代表188人出席，是历年来道教界规模最大、代表性最广的一次代表会议。作为中国道教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副会长的陈莲笙老道长，此时已经八十有二，但是依旧精神矍铄，他身穿一件整洁朴素的道袍，尽显儒雅风范。

在会议上，道教界人士纷纷就培养人才、宫观管理、深入开展道教文化研究以及对外交往等踊跃发言，热烈讨论，为道教的发展和传播献计献策。道教事业蒸蒸日上，这些，陈道长看在眼里，心中甚为喜悦，但是放眼望去，举目皆为银髯浩首



的老道长，心中不免也为道教人才的后继感慨。同时，他也深知近年来中国道教协会，及各个地方道教协会也早就认识到了这个严峻的问题。时代改革，道教也在改革，道教培育人才的方式也在改革，这些都有利地促进了各地对于中青年道士的培养。但是仅仅只是让那些年轻人在台下看着是不行的。当务之急，自然是推介新秀，培养青年领导才俊，因为道教的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

把自己的位置让出来，给年轻人一个锻炼的机会，这个想法早就在陈道长的脑子里面酝酿了，借着新世纪到来之前的这次道教界承前启后的会议，陈道长主动提出了不再担任中国道教协会常务理事，并且提出了候选名单，常务理事3个，史孝进，丁常云，吉宏忠；理事4个，史孝进，丁常云，吉宏忠，姚树良。这个举动震惊了中国道教界，也使得其他宗教人士看到了陈道长作为一名优秀道士的高瞻远瞩，大家都为他离开领导岗位而惋惜的同时，也看到了中国道教的希望和未来。中国道教协会鉴于陈道长对于道教事业呕心沥血，不求回报的大义之举，仍然希望陈道长这样才德兼备的楷模能够做道教协会的顾问。陈道长欣然同意。

更让陈道长喜悦的是在这次道教界的盛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亲切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代表。李主席在接见中，对中国道协成立四十多年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道教界在当年抗洪救灾中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希望道协新一届领导集体继续发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挖掘、整理道教文化中与现阶段精神文明建设相一致的内容，团结联系广大信教群众，和各族人民一道齐心协力、扎实工作，为完成新的任务作出更大的贡献。李





主席还和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合影留念。这些都坚定了陈道长为祖国、为道教事业献身的决心。

最后经过大会的选举，道教协会的领导岗位上出现了一些年轻人。陈道长看着那些生机勃勃的面孔，露出了慈祥的笑容。提携新秀，在他看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二

1999年10月13日，上海市道教协会第四次代表会议在上海城隍庙胜利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有130余人，代表着全市各区、县的道士和居士。出席会议的领导有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宗教局局长孙金富同志，市宗教局副局长马定华同志，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道长以及区县宗教部门的干部、各有关部门和兄弟宗教的负责人、特邀嘉宾等共50余人。这次会议在全国各族人民庆祝建国五十周年和迎接澳门回归的大好形势下召开，对于上海道教界来说，也是世纪之交的一次盛会，有着特殊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道长意识到上海市道教协会也面临着相同的领导班子老龄化，缺乏新鲜血液的问题，于是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会长，将机会留给培养年轻人。他在这个时候提出让出位子，当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已经计划了很久，并且已经一步步地铺垫好了。

自1990年11月26日，上海市道教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陈莲笙当选为会长兼秘书长，到1999年，他已经在上海市道教协会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了近10个年头。现在社会稳定，人们安居



乐业，国家的宗教政策又非常有利于道教的发展，看着上海道教在各个方面都渐入佳境，日趋成熟，在稳步发展，他也放心让年轻人大展身手了。陈道长始终急道之所急，乐道之所乐，忧道之所忧，与道同呼吸、共命运。如何做一个好的道教领导人？照搬其他宗教的管理、简单移植国外的和我国古代的现成概念显然是不成的。只有在继承一切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加以推陈出新才能为时代所接受。他明白作为道教领导人要具备以下的素质：

1. 高瞻远瞩

领导人要登高望远，且有领而导之的才能。但蔽于私利，一叶障目，只看脚下者常有。道教本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要顾大局、思长远，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然后才能顺势利导、纵横捭阖，成功有望。高瞻远瞩的本领来源于知识储备、理论修养与战略思维，也与人的高尚情怀相通。智商与情商高度结合，然后才能很好地审时度势，深谋远虑，正确决策，敢于决策，站在潮流的顶尖领导潮流，也才能敢于率先垂范，组织群众，言传身教，宣传群众，发挥团队精神，调动所有力量，势如破竹，去争取胜利。

2. 德才兼备

道教人才不仅仅是通才，而且应是英才和贤才。通才是知识型人才，学富五车。但他不一定就是英才，英才则是能力型人才。二者相通，也互有区别。英才是各种办事能力和才干的最佳综合。他能洞察秋毫，善于应变，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他具有判断力强、概括力强、思维敏捷的特点；他机智灵活，勇于负责，指挥若定，能驾驭千军万马。通才可以为师，英才可以为帅、为将。道教领导者应该是帅才与将才的结合。但是通





才与英才不一定是贤才。忠诚敬业，洁身自好，关爱下属，推己及人，嫉恶如仇，见义勇为，身先士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贤才之要，亦是受人爱戴的个人魅力之所在。崇尚虚华，艳羨富贵，迷恋酒色财器，此衰败之兆。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双重人格，此小人之尤。得人易，得才难；得才易，得通才难；得通才易，得英才难；得英才易，得贤才难。

3. 思贤若渴

这是领导者事业成功的重要秘诀。毛泽东曾经指出过，领导者主要是做两件事：出主意和用人。一人主意不如多人主意，常人主意不如三顾茅庐，请贤才出山。忌贤妒能，孤家寡人，失败之道；选贤与能，唯才是举，成功之兆。鲍叔牙让贤管仲而为齐桓所用，魏征之歿而为李世民所悲，皆用人惜才之典范，故



■陈莲笙老会长（左）与丁常云副会长合影



传为美谈。关键要有慧眼识真珠。用人不问文凭不行，只问文凭也不行。有巧舌如簧者，有大智若愚者，有忤逆怠慢于我者，有百依百顺于我者，如何识别和对待他们？全凭一颗公心和几分英明。陈道长在细微之处，敏锐观察着那些将来要为上海道教事业，以及全国道教事业，甚至整个世界的道教事业添砖加瓦的道学院的学员们。通过他们的学习成绩和日常表现，陈道长寻找着将来的栋梁之才。

经由陈莲笙道长亲手创办的道教学院培养出来的人才，也到了在真正的岗位上试炼试炼，拿起真刀真枪，做点实际工作的时候了。在1995年上海市道教协会第三次代表会议上，陈莲笙再次当选为会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提拔新秀了，那个时



■陈莲笙老会长（中）与吉宏忠副会长（左）、史孝进会长（右）合影





候年轻一代的道教学院第一届学员史孝进做了上海市道教协会的秘书长。这本身就为之后的换届选举，提拔新人做好了准备。而1999年的第四次代表会议上，选举产生的新一届理事会和领导班子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新培养出的中青年道士。史孝进道长为会长，丁常云道长、吉宏忠道长、戴敦邦居士为副会长，吉宏忠道长兼秘书长。他们青春勃发，满腔热情，正是为道教事业奋力拼搏的大好年纪。

三

当然，上海道教是离不开陈道长的，他被理事会推选为名誉会长，继续为上海道教作贡献。即使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陈莲笙道长对于道教事业以及众生的关心仍没有丝毫减少。他经常出席道教界的各种重大活动，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鼓励道教界年轻新秀，倡导弘扬道教文化。2000年9月，在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召开的市委领导与上海宗教界人士“庆中秋、迎国庆、盼统一、促发展”的谈心会上，陈莲笙积极参加并发言。2001年5月，陈莲笙参加了市委统战部举行的市委领导与市宗教界人士的座谈会。2002年4月“宗教学研究生课程旁听生班”在上海社科院会议室举行开学典礼，陈道长出席并庆贺。2003年3月，陈道长与上海市道教协会一起迎接以香港道教联合会主席汤伟奇为团长、副主席吴耀东、张锦鸿、曾忠南为副团长的访沪团。2003年11月在《上海道教》杂志“庆祝创刊十五周年座谈会”上发表了感人演说。2005年伊始，全国各地千余所道教宫观应中国道协倡议，于1月3日正午12时共同举行“消



灾解厄祈福大法会”，祝愿海啸灾厄消解，亡者早日超度，生者健康安宁。上海市道协在上海城隍庙举行了有上海市道协、各区县道协以及各宫观负责人参加的法会，超度在印度洋海啸灾难中罹难的各国民众。年近九旬的陈莲笙道长不畏严寒，亲自参加法会。他说：“作为道士，我们绝对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作为具有优良传统的中国道教，更不能游离于世界之外。以‘济世度人’为宗旨的中国道教，就是要积极参与到社会中去，关心身边的世界，帮助民众摆脱生活疾苦。”追忆起1991年入夏，苏、浙、皖部分地区洪涝，7月中旬，上海各道观在市道协的倡导下捐款5000元，7月25日，专门召开支援灾区大会，响应道协号召，陈莲笙道长做动员报告，并且当场捐款1400余元，发扬爱国爱教爱人民的美德，为支援灾区“出一份力，尽一份心”。对于陈道长的慈善心怀，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

这位老人高风亮节，但丝毫也没有忘记自己身负的重任，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仍然用自己的智慧和社会影响，做着弘道的工作。





第十章 寿高德更高

生于1917年的陈莲笙，在2006年迎来了九十华诞。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做生日按虚年龄计，到了2006年10月25日，正是九十大庆的日子。

这些日子，他心里总是幸福满满的，回顾那看似漫长的、却也似弹指一挥间的九十年的人生之路，一幕一幕如同电影在脑海中播放，多少酸甜苦辣，多少欢笑泪水，却只能让他感叹一句：岁月真美好，要珍惜啊。

陈莲笙道长觉得幸福还因为很多的好友、道友、晚辈们纷纷来看望他。每当他看着那些以前调皮捣蛋的道学班小道士，如今成了各地道教界的栋梁；每当他看到当年意气风发的老朋友，如今白发苍苍，却精神矍铄；每当他看到那些虔诚的道教信徒为他祈祷祝福，他内心里就有止不住的喜悦在欢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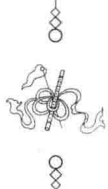
早在陈莲笙道长九十大寿前夕，中国道协、上海市道协以及其他地方的道教团体都开始积极地筹划、调配、组织陈莲笙道长的九十寿辰庆典。陈莲笙道长是中国当前道教界最德高望重的领袖之一，也是当代道教界卓有成就的代表，他的九十大寿到底要怎样过，成为众多虔敬者多次讨论的话题。陈莲笙道



长虽然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由于他在道教界崇高的威望,实际上还是退而不休,因为经常有道教界的人士来向他请教,或者商谈一些教内的事务。同时,有关的领导同志也时而会来看望他。所以陈老虽已年届九十有余,仍然不寂寞,也没有真正闲着。这几年,他的生活可以说是安静却又充实。而他自己呢,也是对于弘道事业仍然志之于怀。他的贡献,他退下领导岗位后的一以贯之的爱国爱教的情怀,都感动着大家,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所以,在他九十华诞时,海内外道友和其他老朋友,都用各种形式表达了对这位老人的尊敬,海内外许多道友都发来了书画、贺词、文章。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道长的寿联为:“法高寿自高,心长事更长。”并称赞陈莲笙道长为:道教界卓有成就的一代宗师。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书:“虚竹幽兰生静气,和风畅日契天怀。”著名道教研究专家,也是陈莲笙先生的老朋友卿希泰先生的祝词这样写道:“献身弘道,勋业辉煌;吉人天相,福寿而康;有子耀庭,邦家之光;永怀风义,地久天长。”黄信阳道长题:“莲座高耸扬正道,笙歌蔓延播德芳。”这只是大家送来的祝寿贺辞的一部分。大家敬重这位弘道不息的老道长,当然不仅因为他的寿高,更因为他的道风让人钦佩,德行足以服众。

但是,大家知道,陈道长素来不愿意为了自己的生日张扬,除了家人之外,也不同意别人为他专门庆寿,当年他八十大寿时,就曾坚决谢绝了道友们为他庆寿的好意。所以大家虽有为他祝寿的心愿,却无法直接表达。想了半天,最好的办法,是秉承陈莲笙道长素来提倡的帮困济贫,希望为社会的慈善事业多做贡献的精神,设立一个基金会。同时,正值他的代表作《道





风集》修订版印成，那末，趁此机会举行一个首发式，也很有意义。于是在10月金秋的日子里，上海城隍庙专门设立了“陈莲笙慈善基金”，并在城隍庙二期修复工程完工之际，一并举行“城隍庙二期工程竣工暨陈莲笙慈善基金成立大会”。

大会于2006年10月25日，陈莲笙道长90岁诞辰当天举行。这一天，在那座倾注了陈莲笙道长多年心血的上海城隍庙内，洋溢着派欢腾喜庆。清晨时候城隍庙已经彩旗飘扬，香客云集，热闹非凡。长长的红地毯迎来了远道而来参加庆典的各方嘉宾，他们有政府部门的领导，有来自海内外的道教界友人，还有学术界的专家学者。此次参加庆典的海内外来宾人数超过了600人，在城隍庙的历史上可谓空前。如前面说过的，上海城隍庙是海上著名宫观，始建于明代，迄今有近600年的历史。“文革”结束之后，经过多年的努力，于1994年重新修复开放。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大殿前的厢房及与大殿遥遥相对的戏台，却仍未收回。这次，经过多方努力，其厢房及戏台皆回到道教界自己手中，装修一新，塑上神像，等待开光后向信众开放。

上午10时，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道教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丁常云道长宣布庆典开始，场内外的嘉宾和香客都十分激动，热烈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随后，丁常云道长逐一介绍了与会嘉宾。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史孝进会长致欢迎辞，对于前来参加庆典的各方嘉宾表示了衷心的感谢。此次活动，得到了上海市党政部门的高度重视，也获得了国家宗教局、中国道教协会，以及各地道教界领导等的大力支持，上海市原人大常委会主任、现任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主席陈铁迪、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俞云波、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副会长张继禹，国



家宗教局的有关领导、上海市民族与宗教委员会的有关领导、各省市自治区道教协会的领导，莅临了大会。大会还得到香港道教联合会及香港圆玄学院、蓬瀛仙馆、青松观和黄大仙祠的大力支持，蓬瀛仙馆还专门派香港道乐团专程来上海参加庆典演出；澳门道教协会的代表也出席了大会。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美国等国家和地区道教界朋友也派来了代表。

上海市道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城隍庙庙管会主任吉宏忠道长汇报了二期工程修建和陈莲笙慈善基金会筹建的情况。他在发言中说道：“城隍庙有近六百年历史，历经风雨兴衰，见证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的宗教政策进一步落实，在豫园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收回了大殿前厢房和戏台使用权，从去年5月起，开始了二期工程修建。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二期工程目前已经全部竣工，老庙换新姿。展现在公众眼前的上海城隍庙是一座具有明代江南园林风格的道观，体现了道教宫观的传统面貌。上海城隍庙能有今天的气象，归功于党和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政通人和的大好形势。”

陈莲笙慈善基金会，是为了实践老会长的心愿，倡导效力国家，回报社会，广行仁爱，护国利民而创立的。其宗旨是“齐同慈爱，济世度人”的道教教义思想，推崇和谐社会，利益各方众生，宣传道教行善积德的主张。在陈莲笙慈善基金会成立庆典上，上海城隍庙陈莲笙慈善基金会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黄浦区分会捐赠200万元。上海城隍庙住持、前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现中国道教协会顾问陈莲笙道长素来关心社会慈善事业，根据城隍庙本身的弘道旨趣和经济实力，决定设立陈莲笙慈善基金。两项庆典，放在一起举行，格外增添喜庆气氛，也更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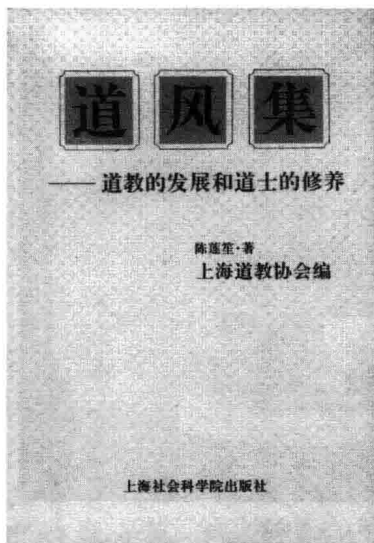
有社会意义。

随后，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湖南省道教协会会长、全国人大代表黄至安道长代表国内外诸山长老致辞。香港道教联合会主席、圆玄学院主席汤伟奇道长代表港澳台和海外道教界致辞。中国道教协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任法融道长也做了饱含激情的讲话。上海市民族宗教委员会的领导、城隍庙所在的黄浦区的领导也分别讲了话，最后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俞云波讲了话。在祝福声和掌声中庆典圆满结束，神像开光法会开始，来宾们开始参观。当看到二期工程的巧妙建筑格局的时候，很多海内外的来宾都纷纷感叹上海城隍庙建筑在传统和现代结合中达到了完美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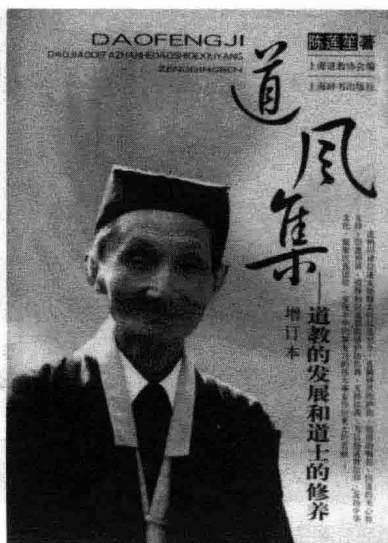
二

同样在陈莲笙道长九十寿辰之日下午2时半，在上海中福大酒店的会议厅里，陈莲笙道长《道风集》（增订本）首发式暨座谈会也揭开了帷幕。

十年前，也就是1996年，陈莲笙道长八十寿辰，上海市道教协会将老道长历次讲话、讲座的文稿编订成册，命名为《道风集》出版发行，作为献给老道长的八十寿辰的贺礼。之后，陈莲笙道长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此次，上海市道教协会再次加以收集整理，续订为《道风集》（增订本），作为献给陈莲笙道长九十华诞的贺礼。陈莲笙道长是当代道教界德高望重的领袖人物之一，也是道教内部少数有自己独特见解的学者之一。当年他的《道风集》出版，在道教界与学术界都曾引起重视。这



■ 1996年《道风集》书影



■ 2006年《道风集》(增订本)书影

次增订再版，更加引人注目。

首发式上，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史孝进介绍了《道风集》(增订本)的修订过程和出版宗旨。他说：“总观《道风集》(增订本)，可见字里行间无不展示着陈道长培养有道之士的拳拳之心，体现着老道长振兴道教的执着之意。这种拳拳之心和执着之意，反映了陈道长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毫不夸张地说，《道风集》可以作为当代道教徒的最好教材，它的出版对端正道风，规范道士的行为准则，培养新一代道教接班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上海辞书出版社陆海龙先生代表出版社发言时说：“借用佛教的说法，陈老的文集也是一种布施，是一种最好的道法布施，它度人的功德无量，对建构和谐社会的功德无量，对道教健康发展的功德无量。”

随后，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道长与学





■任法融会长和刘仲宇教授为《道风集》（增订本）出版揭幕

术界代表刘仲宇教授一起为《道风集》首发揭幕，当带绣球的红色布幔被缓缓揭开之时，装订精美的90本《道风集》呈现在与会嘉宾的眼前，会场内霎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在《道风集》（增订本）的出版座谈会上，来自道教界和学术界的代表们分别作了精彩而感人的发言。

道教研究专家卿希泰先生在来函中回顾了和陈道长的交往，对陈道长的九十华诞以及《道风集》增订本的发行表示了衷心的祝贺，他说：“尊敬的莲笙道长，在您老人家九十大庆之际，我谨以充满无限喜悦和景仰之情，向您老人家表示诚挚的祝贺，衷心祝愿您长生不老，永远福寿康宁。您的健康长寿，既是道教界的希望，也是祖国人民的希望。您是我最为崇敬的德高望重的道教界领袖之一，在我们多年的交往中，您不仅以仙风道骨和敦厚朴实、平易近人的长者风范感染着我，而且还使我深



深深地感受到您的的确确是一位始终保持以‘道’为信仰、结合爱国与爱教为一体的活生生的典型，您始终以充满火热的豪情、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大主流之一的道教文化而献身。”在卿教授这一番情谊绵长的言语中表达了对陈道长的无限崇敬之情。

道教界的学者代表有张继禹、袁志鸿、范恩君发了言。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叙述了自己对老会长深厚的道德涵养和广博的道教知识的感受，畅谈了《道风集》（增订本）对于当代道教的重要意义，特别是以切身体会阐述了此书出版对于自己的指导意义。

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道长在发言中说：“我认为，《道风集》的出版是当代道教发展的一件大事，是引导道教发展振兴的佳篇，是第一部道教界自己分析论述当代道教及振兴道风的力作，是当代道教爱国爱教的最好教材。今天看来，《道风集》已普遍受到当代道教人士的欢迎，并在道教界产生了积极的反响，这说明《道风集》所论述的“道教的发展和道士的修养”已得到道教人士的普遍认同和关注，陈老的爱国爱教精神和卓越见识也正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人。《道风集》在十年后增订再版，必将对道教的发展和道士的修养进一步产生引领作用和积极影响，亦将更好地引导道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此，谨对《道风集》的增订再版表示热烈的祝贺，对陈老表示崇高的敬意！同时，也想结合《道风集》所关注和论述的“学道为人”这一方面发表自己的一些想法，从而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道教服务社会、利益社会，服务人群、利益人群的优良传统，切实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他的发言也代表了广大道教信徒的感受。

朱越利教授作《真正的高道》一文庆祝陈莲笙道长九十华





诞。他在文中回忆同陈莲笙道长的几次交往：“从1986年5月4日下午那个座谈会到现在，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交往了不知多少次。在我眼里，陈莲笙道长对人始终是笑容可掬，慈眉善目的。对我是这样，对别人也是这样。我不负责道教工作以后去看他，他对我还是那样。他对人既不摆长者架子，也不摆官架子，也不摆宗教领袖架子。他真诚地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道士，一个普通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长期的观察和多次谈话中我真切地感觉到，陈莲笙道长心中对国家，对信众，对帮助过他的人，始终不渝地充满着感激之情。”最后他还献了一首五律恭贺陈莲笙道长九十华诞。“白云飘海上，海上有仙山。护教经风雨，终生守篆坛。衣传玄脉旺，书写道风严。常向东南望，真人性自然。”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研究所所长李刚教授在发言中说：“十年前，当陈莲笙道长年届八秩时，我读到他的《道风集》，感受良多，启发不少。今天，当他老人家年届九秩之时，我又拜读了他的《道风集》（增订本），对他老人家的高风亮节和深刻的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有了更多的体悟。”与会学者一致认为《道风集》（增订本）出版在道教界思想和道风建设中有重要意义，从中透出了道教界学者对于自身文化和教义建设的深入思考；道教界的代表则畅谈了阅读和学习《道风集》的体会。

厦门大学宗教哲学系主任、宗教研究所所长詹石窗教授，山东省道教协会副会长、泰山碧霞元君祠范恩君，上海道教编辑、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其燊研究员，中国道教协会副秘书长袁志鸿分别作了发言。

当时笔者有幸做了总结发言，记得当时感慨万千地说过：“陈老的《道风集》（增订本）是我们道教界和学术界的共同财



富，大家都非常重视。学术界和道教界的紧密结合是陈老一直努力倡导的。我和林教授在创刊《上海道教》时都是陈老叫来的，能够共同探讨道教文化，我感到非常荣幸。”

《道风集》的修订重版，是这位老人80年学道、弘道实践与思想的总结。它使我们看到，这一位年届90的老道长，不仅道心坚定，而且是一位智慧的道门学者。

三

在迈进90岁时，陈莲笙道长还有一件事感到十分欣慰与自豪，那就是他的后辈们都十分争气，不仅个个学有所成，而且其中几位还正在为道教文化的发展贡献着力量。他们虽然没有正式皈依道门，却为了道教的事业而不懈努力。

每当提到自己的子女，陈莲笙道长都会由衷地自豪起来，哪一位父亲不会因子女的出色而骄傲呢？陈老育有三子三女，六个人中除了一个因为“文革”上山下乡耽误了学业之外，有五个大学毕业，特别是三个儿子，现在都在为弘扬道教优秀文化而积极工作。长子陈耀庭，生于1939年，主攻道教研究，是著名的道教学者。和父亲一样，他从小在道门世家的熏陶下，和道教结下不解之缘。少年的陈耀庭就经常跟随祖父和父亲去做道场，近距离的观看斋醮科仪活动，实在可算玄门中人。50年代，陈耀庭遵照父嘱，发愤读书，以高分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文史哲的修养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毕业后，陈耀庭返回上海工作，“文革”期间，他没有随波逐流的去当“闯将”，而是潜心随父研究中国文化，尤其深入研究宗教学。后入上海社会





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专门从事道教研究，尤长于道教仪式的研究与阐发，这当然与其家学渊源分不开。他曾多次赴国外讲学或参与研究，系海内外知名的学者。次子陈大灿，生于1944年，是当代著名的道教音乐学者，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倡导研究道教音乐，现任英国伦敦的中国国乐团团长。大灿从小就酷爱音乐。有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的父亲指导，陈大灿的音乐才能在很小的时候就崭露出来，上小学的时候就在上海少年宫的艺术团里演



■陈莲笙与长子耀庭（左）次子大灿（右）

奏二胡。小学毕业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时候，他从报考的20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唯一一位被录取者，当时的监考老师是音乐界的著名人物：王乙和陈雨教授。他对道教音乐乐理

和演奏技巧的掌握，得自于父亲从小的培养、严格的要求和悉心的指导，所以他能获得监考老师的青睐，绝非偶然。后来他在音乐学院里师从陆炳荣先生，名师指点，又加上自己的刻苦练习，终于成长为音乐界的一位著名人物。在道门世家长大的陈大灿，对道教也比别的艺术家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对



道教音乐也有着独特的深厚情感。他后来专门从事道教音乐的研究，为中国传统宗教音乐作出自己的贡献。1984年前后，陈大灿陆续主持录制拍摄了上海道教音乐、江苏茅山道教音乐、苏州道教音乐，在海内外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20世纪80年代，赴法国留学，专攻道教研究。学成后，机缘凑巧，到了英国，发起组织中国国乐团，并任团长。同时也没有中断道教音乐的研究与弘扬，现在仍担任上海城隍庙道乐团的顾问。三子大霖，“文革”中曾到江西工作，凭着突出的音乐才能，很快进入当地的文化馆。20世纪90年代，他回到上海，在宝山区某文化馆工作。同时，他积极参与上海道教音乐的研究与实践，帮助上海城隍庙建立道乐团，并应聘为团长。他曾带领道乐团参加过多次道教音乐的会演。

陈莲笙道长谈到子女的成就时总是夸奖他们自身的努力，他说：“他们的成才，主要是他们自己勤奋和努力。”谈到自己的影响却总是很谦虚：“如果说我对他们有什么贡献，那只是一些基础上的培养，仅此而已。”然而在陈家子女的成长道路上，我们可以发现陈老起了多么大的作用！要培养这些基础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潜移默化中陈莲笙带给他们多么深刻的道教素养熏陶。陈老本人作为正一派的高道，不仅斋醮科仪的技能娴熟，还有深厚的道学修养，他指导子女们在道教里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经过“文革”的动荡，陈老还能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后代，也是他为道教界作的又一个贡献吧。对此，不仅他本人觉得自豪，作为了解的人，我们也因之增加了对他的尊敬。须知，当代的道教界人士中，一家出五位大学生的已属屈指可数，其中还有三位仍为道教事业作着贡献的，依笔者所知，实在是没有第二家。现今，他膝下三子三女都各有了儿孙。全





家人一起，四世同堂，着实让人羡慕。



■陈莲笙 90 大寿合家欢

四

光阴似箭。转瞬间人们告别了2006年，进入2007年。按农历，为丁亥年。

这一年，陈莲笙道长过得同样充实而富有内涵。因为在这一年，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件，足以让他永志难忘。

第一件大事是骄阳胜似火的8月，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冒着高温酷暑视察上海城隍庙道观并亲切看望陈莲笙老会长。

8月16日上午市委书记习近平来到上海城隍庙，与迎候在



山门口的市道教协会会长史孝进,市道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城隍庙管委会主任吉宏忠亲切握手致意。习近平总书记是第一次来到城隍庙,看到这座处在市中心老城厢的既古色古香又焕然一新的道观,兴意盎然地询问道观的历史情况和现状,吉宏忠道长一一向习书记作了介绍。

随后,习书记亲切地看望了中国道教协会顾问、上海市道教协会名誉会长、上海城隍庙住持陈莲笙老道长,习书记握住91岁高龄的陈老道长的手高兴地说:“我代表市委、市府来看望您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陈老道长表示感谢党和政府对道教界的关心支持。

座谈中习书记说:“到上海工作后,我是第一次到宗教界作调研,在市九次党代会后,在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之际,来看望宗教界的朋友。”他说:“道教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道教界人士爱国爱教,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看到史孝进、吉宏忠等年轻道士已经挑梁担纲,习书记说:“看到道教年轻人的成长很高兴,希望道教事业健康发展,为建设和谐社会,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为促进上海经济和社会发展多作贡献。”^①

习近平一声“德高望重”的赞誉,使得老人激动不已,而更让他感到高兴和欣慰的是,习书记对道教文化所作的肯定,以及对年轻一代道长成长的期待。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前,他有心弘道,而限于条件,举步维艰,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才迎来了道教发展的黄金时期,那么此时的他回顾往事,心中实在



① 杜庆余:《市委书记习近平视察上海城隍庙》,《上海道教》2007年第4期,第2页。



是感慨有加。近三十年来，他重返道教界的领导岗位后，心血花得最多的，一是弘扬道教文化，二是努力培养接班人，扶着年轻的一代成长，而现在这两者都得到了领导的肯定，不由心中充满了自豪，同时也更觉得身上责任重大。

第二件大事，是他迎来了中国道教协会五十周年的大庆。

五十一年前，1956年，陈老参加了中国道教协会的筹备，次年，即1957年，他作为上海的代表参加了中国道教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亲眼见证了道教历史上第一次成立自己的全国性组织——中国道教协会。改革开放以后，他又多次担任了这一组织的领导职务。不知不觉中，过去了半个世纪。五十年后的中国道教协会已成长为在海内外有广大影响的道教的社会团体。在庆祝她五十周年的日子里，老人心中会泛起多少回忆，有多少感慨，恐怕不是过来人，很难想象。他非常想飞往北京参加庆祝盛典。但是，由于年事已高，未能如愿。于是，他几经思考，拟了一份祝词，提交给了大会。他在祝词中热情洋溢地说：

各位同道：

值此中国道教协会成立五十周年之际，道衲作为曾经参加中国道教协会筹备和第一次代表会议的代表，谨向庆祝大会致以衷心的祝贺。

道衲由于健康的原因，不能前来参加这次庆祝大会，心中十分遗憾。

五十年前，中国道教协会的成立开创了中国道教历史上新的一页。五十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感召下，得到社



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也由于全体道教信徒的努力，中国道教已经出现恢复和振兴的大好局面。道衲每思于此，总是无比激动。

道衲希望同道们一定要发扬道教的优良传统，坚持爱国爱教，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积极投身伟大祖国各项建设事业，为国家、为人民多做实事。

道衲希望同道们一定要坚定道教信仰，学习《道德经》的思想，保持清静无为，大公无私，淡泊名利，克勤克俭的道风。

道衲希望同道们一定要抓住培养道教人才的关键，道教适应社会必须有一批道心坚定、道艺精湛、道风清正的人才。有了一批这样的人才，道教才会对社会作出贡献。

道衲希望同道们一定要加强团结，不同宗派、不同地区、不同道观之间要消除成见，同心合力，出于公心，弘道立德。

年轻的同道们，任重道远。道衲希望五十年以后，祖国更加强大，人民更加幸福，世界太平，没有战争。五洲人民，没有苦难。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传遍五湖四海，让人们都能感受太上的光辉。

陈老的这番话，是对中国道教协会五十年庆典的祝贺，也是对道友们的期望，尤其是对年轻一代道友的期望，也是对自己的勉励。八十年的学道、行道与弘道，他一向精进不已，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保存着一份道心。这份道心，将鼓励他继续精进不





退，爱国爱教的拳拳之心，将在他生命中延续、放光。

进入90岁之后，陈道长难免会有疾病缠身。但是他一次次都坦然面对。而上海的各级领导和道教界的同仁们，也无微不至地关心着他的健康。有几次，人们已经对他十分担忧，但是这位



■病中的陈老仍关心道教的发展

老人却都化险为夷，奇迹般地挺了过来。大家额手加庆，为他顽强的生命力啧啧称奇。他自己，除了感谢领导的关怀和同道的照顾，也一直励志不息，志在生命尚存，就要弘道不已。

人们祝福这位年过90的老人健康长寿，希望他能为道教事业再贡献出积聚了数十年的经验和智慧。



附录一

陈莲笙弘道法语

赵丽娜 朱晓怡 摘编

一、适应时代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全面贯彻落实，道教官观修复，青年道徒培养，道协活动恢复，道教文化得到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和同情。所有这些，也是天地给予我们道教的机遇。在道教的历史上，特别是近百年来，这样的时机可以说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们要珍惜它，抓住它，利用它，恢复道教，壮大自己。

——《机在天地，亦在人心——从“机遇”说起》，《道风集》（增订本）第123页

历史告诉我们，在道教和时代关系上，只能是我们道教主动去适应时代，而决不是相反。在当代中国社会，我们道教在政治上要坚持爱国主义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拥护改革开放的政策。在经济上也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社会，有益民众。这些都是我们道教适应时代的内容。

——《迈向新世纪——关于新世纪道教弘扬与发展的思考》，《上海道教》1999年

第4期第30页





如果我们在思想上固步自封，自我封闭，两耳只闻钟鼓声，“以不变应万变”，那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不可能做到的，其结果也必然是自误误人，最终使道教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丧失立足之地。

——《道教徒修养讲座·第八讲 适应时代》，《道风集》（增订本）第70页

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国家。历史积淀下来的儒、释、道传统浸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这个思想传统不会终止，也不可能终止。

——《坚持信仰，适应时代》，《上海道教》2001年第1期第4页

道法自然。这是太上的至言。自然这个词包含着自然界和社会的丰富含义在内。道应该是变化的而不是凝固的，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支持变化的而不是抱残守缺的。

——《培养人才，加强联合，适应时代——关于中国道教文化的当代发展的三个问题》，《道风集》（增订本）第9页

道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道教的生命力也就包含在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之中。

——《坚持信仰，适应时代》，《上海道教》2001年第1期第4页

千百年来，道教文化一直丰富和影响着我们炎黄子孙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道教作为一种中华民族文化，已经深深扎根在民间，不少内容已和习俗融化在一起。

——《不断进取的十年——庆祝市道协成立十周年》，《道风集》（增订本）第199页



进入21世纪，中华传统文化也面临挑战，终将发生某些变化。但是，人类的文明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会轻易丢失。离开传统的革新是不会持久的，离开创新的复古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坚持信仰，适应时代》，《上海道教》2001年第1期第4页

大道之行，自有必然。当人们根据历史经验教训，社会终于顺道而行的时候，中国出现了奇迹。百业兴旺，人民幸福，社会安定，前途灿烂，举世瞩目。二十年来中国道教的发展正是中国奇迹的一部分。

——《增订本序》，《道风集》（增订本）第1—2页

新世纪中，道教文化也将在改革和复古的不断矛盾变化中前进。道教应该充分利用自己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善于在革新和复古的矛盾中寻找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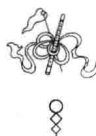
——《坚持信仰，适应时代》，《上海道教》2001年第1期第4页

我们道教有着优良的传统，道教文化渊源流长，博大精深，需要消化吸收，古为今用。

——《不断进取的十年——庆祝市道协成立十周年》，《道风集》（增订本）第197页

道教还有广泛的群众性，宗教活动还需要具有一定信仰素质、政治觉悟和科仪能力的道士去引导，不断剔除糟粕，积极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做一个真正的爱国爱教的教徒。

——《不断进取的十年——庆祝市道协成立十周年》，《道风集》（增订本）第197页





道教应该积极地面对社会，关心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给人以精神、信仰和伦理的帮助。

——《坚持信仰，适应时代》，《上海道教》2001年第1期第4页

我们生活在经济和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里，我们没有理由拒绝新的合理的有用的东西进入我们的宗教生活、丰富道教。

——《适应时代》，《道风集》（增订本）第71页

新世纪的道教，在自身方面，必须进一步加强道风建设、组织建设、经济自养和人才建设，在政治方面，必须进一步强调爱国爱教、适应社会。这些都是道教弘扬与发展的重要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迈向新世纪——关于新世纪道教弘扬与发展的思考》，《上海道教》1999年第4期第30页

宣传道教，就是要使道教逐步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性宗教；弘扬文化，就是要使道教的优秀文化服务社会，使道教的养生理论造福人类；要把道教经典译成外文，向世界各国传播。同时，还要组建道教历史博物馆，向世人展示道教历史；还应建立道教信息资料库，以更好地适应信息时代的社会，更好地宣传道教、弘扬道教文化。

——《迈向新世纪——关于新世纪道教弘扬与发展的思考》，《上海道教》1999年第4期第30页

当今的社会是个有组织的社会，道教要适应社会生活，必须改变一盘散沙的状况而要组织起来。



——《以道德之力振兴道教》，《道风集》（增订本）第13页

道教适应时代的问题，首要的不是去改变细枝末节，而是去改变观念以适应时代。

——《适应时代》，《道风集》（增订本）第71页

“道”是我们道教的基本信仰，信道、崇道那是不能变化的，但是“道”的内容是应该随着时代而丰富发展的。

——《适应时代》，《道风集》（增订本）第71页

在道法、道术和道教仪规方面，某些为当代社会生活需要的部分，应该发扬光大；某些不适应的部分，应该适当调整。

——《适应时代》，《道风集》（增订本）第72页

有派别，并非注定是坏事，中国有句古话叫“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合之变也是事物发展的体现。

——《培养人才，加强联合，适应时代——关于中国道教文化的当代发展的三个问题》，《道风集》（增订本）第6页

道教有没有活力就看它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如果道教徒只知道关在庙门里面，只顾自己修炼成仙，不关心民众，又有什么理由去要求民众支持你的修性和关心道教的未来呢？

——《以道德之力振兴道教》，《道风集》（增订本）第13页

新世纪中人的精神世界又是多元的，对于信仰的选择也更加自由。处在这样的时代，道教如果不发展，不变化，就会无





法适应，无法满足民众的信仰要求，就会失去发挥自己功能的机会。

——《坚持信仰，适应时代》，《上海道教》2001年第1期第4页

中国道教应该发展自己的教义思想和规戒伦理，革新自己的科仪和法术，发扬传统的养生修炼方法，提高道教信仰的层次，为一切需要关怀和帮助的民众服务。在新世纪中，道教如果既不能为信徒的“生”的需要服务，又不能满足信徒对“死”后世界的愿望，就会失去信徒和丧失未来。

——《坚持信仰，适应时代》，《上海道教》2001年第1期第4页

道教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必须加强内部的团结，不论是什么宗派，是怎样的法脉，在社会上应该以一个声音说话，应该捏成一个拳头。

——《坚持信仰，适应时代》，《上海道教》2001年第1期第4页

在信仰市场里，将信徒看作是自己的“上帝”，使民众感到道教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有了社会承认的存在价值，道教自然就可以在21世纪里立于不败之地。

——《坚持信仰，适应时代》，《上海道教》2001年第1期第4页

香港道教联合会主席汤国华先生有句名言：全真派和正一派，是一个老太爷的二个儿子。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既是兄弟手足，那就要休戚与共。家和百事兴，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宗教也是如此。

——《培养人才，加强联合，适应时代——关于中国道教文化的当代发展的三个



问题》，《道风集》（增订本）第7页

它（道教协会）改变了（道教）历史上的按宗派、按官观、按师承关系建立的各自为政的一盘散沙的组织面貌。联合的观念应该贯穿在道教各派之间、道教官观之间、道教徒之间以及道士同信徒之间。

——《适应时代》，《道风集》（增订本）第72页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就是需要我们几代道长的持久而共同的努力。我们切不可因为培养的青年道士已有一定数量而有任何放松。老一代道教徒也要抱着“活到老，学到老”的态度，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学修养，去弘扬道法和教育后辈。

——《适应时代》，《道风集》（增订本）第73—74页

我们要珍惜道教今天在政治上社会上获得的地位，在信仰上获得的尊重，在文化上获得的弘扬。我们这些老道士都明白，从清代中叶至今的几百年中，道教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得到社会的重视，其作用得到像今日这样的发挥。正因为如此，我们道教徒要不分地域宗派，不论年龄性别，紧密联合，从自身做起，努力提高自己的信仰和修养水平，弘扬道教，服务社会，善导众生，造福人类。

——《适应时代》，《道风集》（增订本）第74页

现代道教要积极参与市场经济，只有参与才能适应。道教旅游、道教文学、道教文化用品、食品、药品、饮料开发、道





教医学、养生学都可以作为开发对象，让它们走进市场，走出国门，上海是具备这方面条件的。因此，我们要积极开拓，勇于进取。

——《上海道教正在努力适应当今社会》，《上海道教》1997年第1期第4页

“天道无亲”，最为公平，你是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你也别想带走这个世界上的一草一木。

——《生活日趋富裕，精神保持清虚》，《道风集》（增订本）第134页

社会上有些人说，想发财就要冒险，就要搏，他们认为最快的致富方法就是摇奖中彩，赛马中彩以及赌博。有的人还到道观里来求神灵保佑他冒险成功。我想，因为他们追求致富的方式和态度是不符合“天道”的，所以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

——《生活日趋富裕，精神保持清虚》，《道风集》（增订本）第132页

“天道无亲，唯善是与”（《太平经》），神灵不会保佑一个人发财致富，而让无数人破产贫穷。

——《生活日趋富裕，精神保持清虚》，《道风集》（增订本）第132—133页

有权的人多想着为国为民使用权力，有势的人不利用手中之势为自己家庭谋取私利，有才学的人一心为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做出贡献，有钱的人在个人致富的同时，多为还处于贫穷阶段的地区和人民谋利益，多为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增加基金，多为鳏寡孤独、残疾人谋取福利，多在庙里烧香祈愿做些功德，这些都能使自己更加充实。“光而不耀”有助于自己事业的成功、品格的高尚、家庭的平安、子女的成长和晚年的



充实幸福。

——《炫耀和养晦》，《道风集》（增订本）第141页

在新世纪里，中华民族将要实现复兴，中华文化也将放射出无比的光辉。道教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将复苏和振兴。

在新世纪里，上海将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上海这个东方明珠将放射出耀眼的光辉，上海的道教也应该对于中国道教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道教学院上海专修班毕业论文集〉代序》，《道风集》（增订本）第289页

二、道由人弘

道是道教的根本，道是无所不在的。以道立教，以教弘道，但是，道由人弘，教由人传，法由人显。

——《在上海城隍庙住持升座典礼上的开示词》，《道风集》（增订本）第244页

道由人显，道教的存在归根结底依靠道教徒的存在。道教的发展也取决于道教徒素质的提高，道教人才的多寡。

——《培养人才，加强联合，适应时代——关于中国道教文化的当代发展的三个问题》，《道风集》（增订本）第5页

国家需要人才，道教需要高道，只有自身努力，准备足够的条件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和道教的需要。这个条件就是要能够认识天道地道，日月有数，就是要学会善盗天机，善知杀机。

——《机在天地，亦在人心——从“机遇”说起》，《道风集》（增订本）第124页





道教传统的继承和适应社会，关键是要培养出一批既有深厚的道教传统修养，又能主动去适应社会需要的“道士”。

——《继承传统和适应社会》，《上海道教》1996年第2期第10页

近代上海道教应该对于中国道教的发展作出贡献而未能，其根源只能归于上海道教的人才缺乏和素质不高，它从另一个侧面又说明，盛况却无力扭转衰势。

——《培养人才，加强联合，适应时代——关于中国道教文化的当代发展的三个问题》，《道风集》（增订本）第5页

不同时代的高道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他们身上既继承了道教的一些不可变更的内容和形式，又对道教如何同身处的时代相适应作出贡献。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都是继承和革新、原则和灵活、承袭和创新的结合。而要培养出这样的“高道”来，培养他们的人也要有这种“结合”的观念。

——《继承传统和适应社会》，《上海道教》1996年第2期第10页

道教为了要体现自身的价值，理应关心各种层次信徒的要求，满足他们的信仰需要和宗教感情需要，只有在回报社会对道教的需要之中，道教才能证明存在的自身价值。

——《社会需要和自身价值》，《上海道教》1996年第3期第3页

道衲积几十年学道生活的经验，体会到“贫道”的“贫”的本义并非是“贫穷”的意思，而“道”的本身就是包含天地万物，是涵盖天下的，因此学道、修道和弘道的本身就是普天下最富足的事情。但是“道”又是“俭”的、“啬”的。《道德经》



说“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治人事天莫若啬”。俭是节俭，啬是爱惜。以这样的教导来要求我们，我们是富足的，但是我们要节俭；我们是涵盖天下的，却要谦卑地不为天下先。因此，道门的修道生活在社会的总体生活水平中应该总是处于低水平，应该永远是低调的。

——《增订本序》，《道风集》（增订本）第3页

“贫道”只是一种谦虚地表示自己是个不敢为天下先的修道学道人而已。

——《增订本序》，《道风集》（增订本）第4页

人生就像一条大河：一边是善，一边是恶；一边光明，一边黑暗；光明的一边光辉灿烂，黑暗的一边泥潭火坑。我们说的度人，就是要帮助不学道的人学道，帮助学道的人成道，使人从恶变成善，从差变好，从假变真，从丑变美。

——《度人先度己》，《道风集》（增订本）第206页

度人就好像坐船，船在水中行，需要动力。被度的人要划浆，我们度人的也要划浆。不用力，河是度不过去的。这就是说，度人有一个过程。一个人要从恶变成善，就要艰苦的脱胎换骨。

——《度人先度己》，《道风集》（增订本）第206—207页

度人的人和被度的人是平等的。他们的不同只是知有先后，觉有深浅。

——《度人先度己》，《道风集》（增订本）第207页





“齐同慈爱，异骨成亲。国安民丰，欣乐太平”，这是我们道教的理想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与人之间是亲兄弟、亲姐妹，彼此之间没有压迫、没有欺骗、没有妒嫉、没有仇恨、没有偷盗、没有邪淫、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国家平安、人民富裕，生活幸福。这样的世界就是“大同”世界，不过我们道教称它为“太平”世界。

——《度人先度己》，《道风集》（增订本）第209—210页

我们的修道学道不能只是为自己，我们的目光要看着众生，要看着社会上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的人。自己处处以道来规范行为，并且以自己的修养、道德行为来感化众生，普度众生。只有这样一种不仅为自己而且为别人为社会的修道，才是真正的仙道。真正的仙道修持，其善功是不可限量的。

——《度人先度己》，《道风集》（增订本）第210页

道教的信徒一旦失去了“道”的本性，那么“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在社会上就失去了教化的功能和存在的依据，其结果就是逐趋衰落。

——《以道德之力振兴道教》，《道风集》（增订本）第12—13页

如果我们的道教徒能够按照太上的“善”字去规范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们道教和道教徒在民众中的形象就真正发挥了道教这个宗教的功能，起到了作用。

——《以道德之力振兴道教》，《道风集》（增订本）第15页

对于我们来说，“修身”是头等的事，只有身修，才可能谈



得上治家、治乡、治国、安天下。

——《以道德之力振兴道教》，《道风集》（增订本）第18页

守道不失的关键是一个“守”字。之所以要“守”，是因为有外道之物在“攻”，因此，我们学道的要守得住，就要能够“自拒”。

——《以道德之力振兴道教》，《道风集》（增订本）第18—19页

概而言之，“自拒”的关键是“无欲”。欲望和一切非分之想，可以说是当今社会所有个人灾祸的根源。

——《以道德之力振兴道教》，《道风集》（增订本）第20页

要知道“道”并不难，难就难在按“道”办事、行“道”。如果能够自始至终坚持行道，那么“道”就在修道人的心中和身上了，换言之，那个修道人应该说就是“得道”了，即使那个修道之人处身于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和人际关系的蛛网之中。

——《以道德之力振兴道教》，《道风集》（增订本）第21页

一旦我们得到了教徒们的支持，我们就不愁有事没人做，有难没人帮，有庙没道士，有道士没烧香，有烧香没信仰，有信仰没人关心，也只有出现这样的局面，我们的道教才会振兴起来。

——《以道德之力振兴道教》，《道风集》（增订本）第15—16页

近二十年来，中国道教全面复兴，通过道教自身努力弘扬以及中国和世界各国学术界的研究和介绍，正逐渐为中国大多数民





众和世界各国各民族所认识，得到世界各宗教的承认和尊重。

——《中国道教也会走向世界——从意大利客人来上海做道场想到的》，《道风集》（增订本）第252页

道教作为一种中国宗教也平等地跻身于世界各宗教之林。中国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受到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尊重和敬佩。

——《中国道教也会走向世界——从意大利客人来上海做道场想到的》，《道风集》（增订本）第252页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的道教，也会像中国传统文化其他内容一样，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中国道教也会走向世界——从意大利客人来上海做道场想到的》，《道风集》（增订本）第253页

道教的信众中间逐渐出现外国人，这也不是令人奇怪的事情。

——《中国道教也会走向世界——从意大利客人来上海做道场想到的》，《道风集》（增订本）第253页

道教要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局面，也确实要做好经典文献的外国语翻译工作、弘道材料的外国语翻译和发行等工作。

——《中国道教也会走向世界——从意大利客人来上海做道场想到的》，《道风集》（增订本）第254页

道衲希望，道门后继之人能看到历史赋予的机遇和挑战，



未雨绸缪，及早准备，将邱处机祖师和张宇初天师所言的“立观度人”的宗旨推向世界，发挥道教对于人类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道教也会走向世界——从意大利客人来上海做道场想到的》，《道风集》（增订本）第254页

“天道”是永恒的、不息的，而个人是暂时的、短促的。天道是创造的、无私的，而人享受着、占有着天道的恩惠。我们学道的人，就是要学习天道的创造和无私，把自己暂时而短促的生命融化到永恒和不息之中，使自己的胸怀宽广得如同山谷，如同大海一样。

——《生活日趋富裕，精神保持清虚》，《道风集》（增订本）第134页

我们的道教是在祖国这片土地上创立起来的宗教，有着中华民族自己的特色，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祖国，也就不会有我们这样的道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光辉的五十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上海道教》1999年第3期第4页

抗战胜利，说明中国人民不可侮，不管敌人怎样疯狂，不管遭受多大的困难和挫折，只要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后胜利永远属于人民，玩火者必自焚。我们上海道教界一如既往与党和人民风雨同舟，肝胆相照。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道风集》（增订本）第195页

要全面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哲学思想、科学文化思想的发展及其演变规律，全面总结、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对





中国道教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是一个不可少的重要方面。

——《珍惜大好形势，弘扬道教文化——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上海道教》1999年第1期第1页

人们对于生活有如此不同之态度，生活也会相应给予人们以不同之回报。这就是天道之至公，人生之因果。

——《〈人生赠言〉序》，《道风集》（增订本）第290页

天道至公，人道无私。至公者昌，自古以来，尽然。

——《〈人生赠言〉序》，《道风集》（增订本）第291页

现实的道教总是要依靠道门中人自己去努力弘道才会有生存的机会和发展的可能。努力就需要辛勤的劳作。努力就需要自身的智慧。努力就需要明确的方向。努力就需要远大的理想目标。努力是体力的活，更是脑力的活。努力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足够的人才，多种多样的人才。

——《〈中国道教学院上海专修班毕业论文集〉代序》，《道风集》（增订本）第289页

三、修养为本

近两千年中，社会发展，时代变迁，历史上有多少风风火火的东西都消失了，湮没了，但是道教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道观仍然存在，神像仍然存在，经书仍然存在，而最重要的是，我们道士一代一代传到了今天。今天，



我们还要培养青年道士，使道教继续传下去，直到将来。

——《道教徒修养讲座·第一讲 奉道行事》，《道风集》（增订本）第33页

保持“道”的信仰特点，体现道士的精神风貌，是在当代社会中振兴道教的关键所在。

——《以道德之力振兴道教》，《道风集》（增订本）第13页

作为道士，他有一些根本的东西是不能变的，变了就不是道士了。这就是一个道士对道教的信仰不能变。一个道士如果连信仰都没有了，那他就不是道士了。即使他还留在道观里，穿着道装，他的心也不是道士了。

——《道教徒修养讲座·第一讲 奉道行事》，《道风集》（增订本）第33页

按道行事，就是“得道”，不按道行事，就是“失道”。其实世界上人的所有事情，以及由此给人带来的高兴和悲伤，喜悦和忧愁，都是由“得”和“失”两个字引起的。

——《道教徒修养讲座·第一讲 奉道行事》，《道风集》（增订本）第36页

我们道教徒认为“道”是太上在冥冥之中创造的、规定的。因此，太上就是“道”的化身。我们“奉道”，就是要信仰太上，信仰先天地生的各位尊神，相信是他们创造了“道”，由道再衍出天地万物，并且再让道体现在天地万物之中。各位尊神在注视着我们，我们丝毫不能轻慢。

——《道教徒修养讲座·第一讲 奉道行事》，《道风集》（增订本）第36页

道教在建立组织和参与社会中，重要的是以“道教”的宗





教功能和“有道之士”的身份。离开了“道”，道教和道士就混同于一般社会组织和一般民众，不论为道教和社会做多少好事，都体现不出道教的特点和功能。

——《以道德之力振兴道教》，《道风集》（增订本）第13页

在经济社会大发展的时代，我们广大道教徒，在弘道兴教、服务社会的同时，精神上要保持“清虚”，要遵循教祖“道法自然”的教诲，做到清心寡欲。我们学道之人，充分享受着“天道”的恩惠，那就让我们敞开胸襟，像山谷和大海一样对待这个高速发展的物质世界，要多行善功，广结道缘。

——《迈向新世纪——关于新世纪道教弘扬与发展的思考》，《上海道教》1999年第4期第30页

不能把世俗利益作为道教徒的行为准则或目标……真正按大道行事的人，对于世俗利益的一套东西是绝不追求，也不放在首位的。

——《道教徒修养讲座·第一讲 奉道行事》，《道风集》（增订本）第37页

做生意是为赚大钱，要赚大钱千万不要进道观做道士，因为第一不允许，第二不可能。不允许，因为解放后的道教是纯洁的道教，要奉道行事。不可能，因为道教已经恢复了本来面目，规戒严肃，制度齐全，不可能在道教内部搞不合法的手段。

——《道教徒修养讲座·第一讲 奉道行事》，《道风集》（增订本）第35页

要在教理教义上丰富和发展对于“道”的认识。“道”是我们道教的基本信仰，信道崇道那是不能变化的，但是，“道”的内容是应该随着时代进步而向前发展的。现代社会飞速发展，



它同五十年前的世界已有很大差别，前辈道长对于道的理解和认识，也应该由我们当代道教徒作出补充、修改和发展，以丰富道教的教理教义。

——《上海道教正在努力适应当今社会》，《上海道教》1997年第1期第4页

得未必是福，失未必是祸。奉行大道的人，就要有这样的气度、胸襟和目光。

——《道教徒修养讲座·第一讲 奉道行事》，《道风集》（增订本）第37页

要培养有爱国爱教、具有开拓精神的新一代道教徒。在政治上要坚持爱国爱教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拥护改革开放政策。在经济上也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社会，有益民众。

——《上海道教正在努力适应当今社会》，《上海道教》1997年第1期第4页

我们道教徒应该自觉地“爱国爱教”，把“爱国爱教”作为自己行为的一个准则，作为道教徒修养的一项重要内容，把政府要我们“爱国爱教”变成我们道教徒的自觉行动。

——《道教徒修养讲座·第二讲 爱国爱教》，《道风集》（增订本）第39页

我们爱国不仅爱历史上的祖国，还必须爱现实的祖国，爱社会主义祖国，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讲到“爱教”，大家也都知道热爱自己道教的道理。我们的道教是值得我们做道士的热爱的，值得道门外的人尊重的。中国的一部《二十五史》里到处有道教留下的痕迹。

——《道教徒修养讲座·第二讲 爱国爱教》，《道风集》（增订本）第39—40页





怎样才称得上“爱教”呢？第一，道心要坚，就是要有坚定的道教信仰……第二，道术要精，就是要刻苦学习道教学问……第三，道戒要严，就是要严格遵守戒规纪律……

怎样才称得上“爱国”呢？第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第二，遵守国家的法律规定……第三，积极投入祖国四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爱国和爱教是相互联系的。统一起来，就是我们当代道教徒修养的一项方向性的内容。

——《道教徒修养讲座·第二讲 爱国爱教》，《道风集》（增订本）第41—42页

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各人”，修道和学道只能依靠各人自己的努力……我们修道和学道不光是为了自己，而且应该处理好和同道之间的关系，离不开信众的帮助。

——《道教徒修养讲座·第三讲 学道为人》，《道风集》（增订本）第44页

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学道为人就是要为人民大众，为社会主义……“为人”不是空话，而应该身体力行……我们也要妥善处理同其他道门中人的关系。

——《道教徒修养讲座·第三讲 学道为人》，《道风集》（增订本）第46—47页

世界是复杂的，人也有善恶。我们的“学道为人”当然是为最大多数善人的，而不是为了恶人。帮助善人，自己是行善功；帮了恶人，自己也是行恶。因此，我们必须睁开双眼，提高识别能力。

——《道教徒修养讲座·第三讲 学道为人》，《道风集》（增订本）第48页



道教的“善”就是一切行为要符合天地万物的自然，不要做违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事。反过来说，所谓“恶”，也就是逆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各种行为。具体地说：爱护自然环境。

——《道教徒修养讲座·第四讲 多行善功》，《道风集》（增订本）第49页

整个自然界是一个相生相克的循环，行善的人是不会去人为破坏这个循环的。山居的道士要爱护林木花草，不要在春夏季节渔猎，弹射飞鸟，挖胎破卵，残害生灵。

——《道教徒修养讲座·第四讲 多行善功》，《道风集》（增订本）第49—50页

动物也是天道循环中的一环，我们要少吃或不吃动物，春夏季更要少吃，特别是决不能伤害珍稀动物，让自然界能自然无为地生息不止。

——《道教徒修养讲座·第四讲 多行善功》，《道风集》（增订本）第50页

天地自然和人是相互依赖的，浑然一体的。用现代科学的话来说，自然界和人组成为一种生命的“链”，天下万物相关相联，环环紧扣。在这个链中，物种都有它自己的位置，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索取和奉献》，《上海道教》1996年第4期第25页

一是“忠”……二是“恕”……三是“俭”……四是“诚”……五是“朴”……六是“孝”……七是“信”……八是“慈”……九是“礼”……十是“义”……这十个方面是我们道教徒处理社会关系的“善行”的道德要求。它是维持社会正常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道教徒修道、得道必须做到的积善立功。

——《道教徒修养讲座·第四讲 多行善功》，《道风集》（增订本）第51—52页





“我命在我”，是我们道教教义中一句警句，一句名言，现在已经受到社会上普遍注意和引用……道教的“命”只讲生死寿夭，没有富贵贫贱的意思在内。这是因为道教要求信徒清静无为，自放草泽，不要把人生的富贵贫贱看得很重，重要的是学道、得道，长生升仙。

——《道教徒修养讲座·第五讲 我命在我》，《道风集》（增订本）第53—54页

我们道教对于顺逆、吉凶，既然认为是道的体现、命的主宰，就不畏天命，而是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安天命而知足。

——《道教徒修养讲座·第五讲 我命在我》，《道风集》（增订本）第54页

我们道教徒既信天命，又要努力……在世界各种宗教的命运观念中，我们道教的“我命在我”思想，应该说是比较能动，颇具特色的。

——《道教徒修养讲座·第五讲 我命在我》，《道风集》（增订本）第55页

发扬优良传统，继承历史遗产，这是今天我们道教徒的历史责任。国运昌盛，社会稳定，道教的“命”自有天机。

——《道教徒修养讲座·第五讲 我命在我》，《道风集》（增订本）第57页

“做道场”是道教主要的仪式活动，如同佛教有佛事、开水陆法会，天主教有弥撒，基督教有礼拜，伊斯兰教有五功一样……道教徒在道场里祈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超度祖先亡灵、早登仙界的愿望，无疑是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的。

——《道教徒修养讲座·第六讲 斋醮度人》，《道风集》（增订本）第58页



我们道门中的人有二点是应该明确的，第一，道教是追求修身养性，长生成仙的；第二，修身是为了实践道，而不是为了欲或者为了钱。

——《道教徒修养讲座·第七讲 众术合修》，《道风集》（增订本）第63页

为什么人的生命有长有短呢？这是因为人的精神和肉体上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挫折和伤害，使人不能终其天年。所以历代道教徒在强调戒欲慎行，保持健康的同时，还探索种种修身养性的方法，以求长生。

——《道教徒修养讲座·第七讲 众术合修》，《道风集》（增订本）第64页

众术合修的养生原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道”是无限的，而“术”是有限的。人在后天受到的干扰和损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人的养生必须在精神上、内脏功能上以及躯体保健上给予全面的照顾。

——《道教徒修养讲座·第七讲 众术合修》，《道风集》（增订本）第66页

新世纪的道教，必须把适应社会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因为适应社会才是道教发展的前提。

——《迈向新世纪——关于新世纪道教弘扬与发展的思考》，《上海道教》1999年第4期第30页

新世纪的道教，首先要树立正确和纯洁的信仰，道教徒要通过自己的修行，淡泊名利，纯洁心灵，与人为善，坚持正信，树立良好的信仰风范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迈向新世纪——关于新世纪道教弘扬与发展的思考》，《上海道教》1999年第4期第30页





做一个道士，唱念做之技艺件件要驾轻，琴棋书画之功夫桩桩要就熟。因此，做道士很难。

——《原序》，《道风集》（增订本）第5页

历史上无数事实以及人们的无数经历都说明，跳跃式的发展，必然带来的是跳一级，退二级的结果，而只有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往上攀登，才可能达到发展的顶峰。

——《生活日趋富裕，精神保持清虚》，《道风集》（增订本）第132页

修道就是修一个“自觉”，得道就是得一个“自觉”。一旦万事“自觉”，一言一行都符合天道、地道和人道了，那不就是“得道”了吗？一举一动都按太上《道德经》的话去做，那不就是“道”的体现了吗？

——《以道德之力振兴道教》，《道风集》（增订本）第16页

你站在山上极目远望，那山峦起伏、层林密布、云雾飘渺，你会感到天“道”的伟大而个人之渺小；你环顾海上，不论船体多大，随浪摇晃，任风摆布，你也感到沧“海”之伟大而个人之渺小；你看到山石上雕刻的前贤名句和手迹，你都会感到天地之悠悠而个人生命之短暂。

——《生活日趋富裕，精神保持清虚》，《道风集》（增订本）第134页

在当代中国，我们道教在政治上要坚持爱国主义的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拥护改革开放的政策。在经济上也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服务社会，有益民众。这些都是我们道教适应时代的重要内容。

——《适应时代》，《道风集》（增订本）第70页



这些新发现大大扩展了我们对“道”的认识，我们当代道教徒应该对“道”作出解释，以丰富或修正前辈道长们的阐述……因此，丰富和发展道教的教义教理，特别是对于“道”的认识是道教适应时代的首要内容。

——《适应时代》，《道风集》（增订本）第71—72页

改变我们道教徒的某些不适应时代的观念，这是道教适应时代的最重要的一步。任何急于求成或者自我封闭的思想都不会有好结果。

——《适应时代》，《道风集》（增订本）第74页

新世纪的道教不仅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而且更多的是要适应社会、适应新的时代。要在继承和发扬道教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积极开拓，勇于进取。

——《迈向新世纪——关于新世纪道教弘扬与发展的思考》，《上海道教》1999年第4期第30页

四、庄严宫观

一座座道观正在修建、恢复和开放，一批批年青的道士正在走上神职、执掌大权。现在，正是我们要重视管理的时候了。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重视管理》，《上海道教》1997年第1期第20页

我们道教中的人，应该树立起“管理”这个观念。这是因为道教是一个由共同信仰的人组成的社会团体。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重视管理》，《上海道教》1997年第1期第20页





道教信徒给予宫观的奉献都是为了支持我们传道、弘道，同时为他们的道教信仰服务。“瞻众为先，悠久为志”是我们每一个管理道观的住持们时时要考虑的事。让每一件财和物都为弘道服务，从长远打算，就要求我们以“道法自然”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件宫观里的财和物。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道法自然》，《上海道教》1998年第4期第13页

道教的宫观内部要加强管理。我们做道士的，特别是各庙观的新上任的青年主持，不会管理的要学会管理，会管理的要管好。管理工作就是要管好，要理顺。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道法自然》，《上海道教》1998年第4期第13页

道法自然，应该是教徒处理天地间一切事务的基本原则。因此，道教宫观的管理也应该以道法自然来处理一切。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道法自然》，《上海道教》1998年第4期第13页

财物两清，是“道法自然”原则在管理工作的最起码的要求。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道法自然》，《上海道教》1998年第4期第13页

管理工作中的“道法自然”是要使我们宫观的管理事务，明白公正，不偏不倚，任何事情都能放得上台面，任何决定都有利于宫观的生存和发展。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道法自然》，《上海道教》1998年第4期第13页

道教的宫观管理，也必须有个“规矩”。道教的规矩就是



“道”。我们的一切都讲“奉道行事”，官观管理概莫能外。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健全制度》，《上海道教》1998年第4期第10页

“道”显现在世间一切事物之中，无论贵贱，无论贫富，无论慧拙。因此，学道的人也应该是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没有瞒天下人耳目的事。明明白白、不偏不倚地处理管理工作的一切事务，就可以做到公正。“公乃大”，只有凡事公正了，才能真正做好官观管理工作。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道法自然》，《上海道教》1998年第4期第13页

道教的管理是主张“无为而无不为”的。道教中的人只有做到顺乎天道，顺应自然和社会，才能真正的“无为而无不为”；而顺乎天道，顺应自然和社会的管理，“无为而无不为”的管理，才是真正的管理。

——《无为和管理》，《道风集》（增订本）第149页

太上说到“无为”总是与“有为”、“无不为”联系在一起的。我以为，“无为”可以理解为一种高度自觉的管理境界，而“无不为”则可以理解为管理措施的严格执行。如果我们官观里的执事们人人各司其职，各尽其职，整个官观的“人财物”的管理自然就有条不紊，自“无不为”而到“无为”。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重视管理》，《上海道教》1997年第1期第20页

“无为”同“干预”并不是反义词。“干预”并不等于不“无为”，不“干预”也不等于“无为”。

——《无为治道、有为治人——从“干预”说起》，《道风集》（增订本）第125页





无为是指处理万物和治理天下都要顺乎万物和天下的“道”，用现在的话说，做事要合符规律，顺其道而行之。“无为”强调的是对于万物之道的态度。但是做事还是要做的，治理还是要治的，不能认为“无为”就什么也不干。

——《无为治道，有为治人——从“干预”说起》，《道风集》（增订本）第125页

道教的千百年历史说明，在道教的内部，保持通畅的人才选拔之路、生财自给之路、民主管理之路和规戒监督之路，是我们道教能保持长盛不衰的重要经验。

——《血脉贯通，百事兴旺》，《道风集》（增订本）第152页

道教徒的管理也应该坚持“奉道行事”的原则，也就是要以“道”的思想来管理，而在方法上则应畅开胸怀，吸收各种有用的现代管理的科学方法。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重视管理》，《上海道教》1997年第1期第20页

要管理就要有规章制度，规章制度建立在规律上，规律就是道。道要守，守的就是规律。掌握了规律，就能管理好人财物。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重视管理》，《上海道教》1997年第1期第20页

过去，我们总是把眼光看着教外，同教外人争合法权益。现在，我们还要看到身后有没有榔头，防止墙内的人利用管理不善窃取私利。加强道观管理，说到底，也是为了堵塞漏洞，防止我们道教的合法权益的流失。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重视管理》，《上海道教》1997年第1期第20页



从生活中的例子就可以明白，一个车轮要有几十根车条来支撑，车条崩断，轮子就会变形。车轮变了形，那车子就动弹不得。我们道教的事业也一样，加强管理就像维护车轮一样，使每根车条都发挥作用，使官观和协会的各个部门都能发挥作用。

——《无为和管理》，《道风集》（增订本）第148页

一些管理得好的道观就让人感到井井有条。了解一下他们的做法和经验后，采用社会上的说法来总结，实际就是大权集中，小权分散；集体研究，个人负责；分清脉络，各司其责等等。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第二讲 分清脉络》，《道风集》（增订本）第83页

港台道观里的一些大事大多由理事会、董事会等集体研究决定，由当家等负责执行。这就是说，道观的大权掌在集体手里，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另外，当家等有职有权，那职权是集体授予的……综合港、台地区一些道观的经验，当代道观的活动大致有三条脉络。第一条是庙务活动的管理……第二条是社会活动的管理……第三条是附属事业的管理……三条脉络分清以后，各种事务都有人负责处理，并且向当家的和董事会负责。这样一来，自然整个道观的活动井井有条，自然不会出现有事没人做、有人没事做的局面。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第二讲 分清脉络》，《道风集》（增订本）第83—84页

我们今天乃至明天的道观管理同过去比较起来，内容增加了，任务繁重了，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如果我们继续一切由一个当家说了算，恐怕是不能完满胜任的。看来只有把管理工作理清脉络后，交给众道长以及信徒一起来承担……我以为一个道观管





理得好不好，首先就是我们梳理头发的工夫到不到家，我们对于当今道观活动的内容是不是吃透，认识是不是符合实际。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第二讲 分清脉络》，《道风集》（增订本）第85页

宫观管理是件大事，做这个大事就要把大事分析成一件件细小的事情，然后把一件件小事交给一个个部门负责。各部门职责分明，可以检查，可以比较。我想，这样就可以分清脉络了。套用一句社会上的话，那就是定岗位，明职责，岗位责任制。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第二讲 分清脉络》，《道风集》（增订本）第85页

道教传统的继承和适应社会，关键是要培养出一批既有深厚的道教传统修养，又能主动去适应社会需要的“道士”。

——《继承传统和适应社会》，《上海道教》1996年第2期第10页

当代中国道教在复苏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道教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道衲认为，归结起来，就是人们在议论的“世俗化”和宗教要求的神圣化的矛盾问题……道衲忧虑的是，道士的神圣性一旦被丢弃，那么其后道观、神殿、神像和科仪的神圣性就堪忧了。

——《增订本序》，《道风集》（增订本）第2页

当代社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因此，我们要大力注意吸收人才、培养人才、启用人才和留住人才。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第三讲 选拔人才》，《道风集》（增订本）第87页

人才的上下流动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种是为了更好地培



养人才，使人才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熟悉各种管理工作，进一步提高“住持领袖”的道学水平和业务能力。一种是为了保护人才，不使人才在某个岗位做久了，陷进复杂的人事和社会关系中去。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第三讲 选拔人才》，《道风集》（增订本）第90页

在选拔人才方面，我们要有个培养的过程，循序渐进，不能揠苗助长；在淘汰某些不称职的人员时，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要用人所长，避人所短。另外，在选拔人才时，要提倡公平竞争，走群众路线；在淘汰某些不称职的人员时，也要公正透明，听取道众的意见。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第三讲 选拔人才》，《道风集》（增订本）第91页

每一个待选拔的道教人才，则应该自始至终摆正自己的位置，有了成绩不骄傲，遭到挫折不气馁。得到选拔不沾沾自喜，得意忘形；调动工作不垂头丧气，继续努力，终身为道教事业服务。要做到这一点，就是不要把选拔看成是获得个人名利的进身阶梯。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第三讲 选拔人才》，《道风集》（增订本）第91页

有一句老话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句话告诉我们，人生在世要做一番事业，要做得好而标准，要做得令人满意，就必须有个原则，有个标准，有个制度。不然，什么事情也做不好。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健全制度》，《上海道教》1997年第4期第10页

在管理工作中，社会上习惯地将“规矩”说成是制度。道



友们在官观里学道、行道等要奉道行事，按制度执行，这样才能使官观活动有序地进行，发挥官观的弘道立德，教化信众的作用。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健全制度》，《上海道教》1997年第4期第10页

当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道教出现了振兴的局面，香火旺盛，信徒云集，捐资供养，重修庙堂，新的住持和执事等一批批提上岗位，客观上把加强道教宫观管理的要求又提了出来，有的地方还提得十分迫切。道教宫观管理的繁重事务要求我们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仓库管理制度，殿堂管理制度，法务管理制度，人员选拔、宾客接待和安全保护等制度。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健全制度》，《上海道教》1997年第4期第10页

关键是，我们年轻的住持们要懂得根据制度来治庙，而不是凭个人感情或者想当然来治庙；我们年轻的道友们要懂得根据制度来为人处世，安身立命。因为，制度是我们学道、修道、行道和弘道的行为规范，是当今时代“道”的内容的一个方面。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健全制度》，《上海道教》1997年第4期第10页

健全制度还应该包含这样的意思，那就是要不断去完善制度，不断去修改制度，使制度在实行中发挥更加切实的效用。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们对道的认识要不断充实、丰富和提高。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健全制度》，《上海道教》1997年第4期第10页

在今天的道教宫观管理中，在执行清规戒律时，仍然要采用赏罚、奖惩的办法。评比，这种办法是有用的，因为通过评



比，奖励先进，批评落后，启发和调动宫观内的道士自觉管理宫观事务的积极性，对今后进一步提高道教宫观管理水平当然会有所推动。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第七讲 奖惩监督》，《道风集》（增订本）第109页

“民主”这个词，按我的理解就是以民为主的意思，用社会上常说的话，那就是要让老百姓当家作主。以民为主和民为邦本的思想，在中国本是早已有之的。孔家店中有，道家思想中也有。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第五讲 发扬民主》，《道风集》（增订本）第97—98页

我们道教在历史上一开始就曾为“民主”的理想去追求过和付出过。当然，我们的先贤追求的民主和我们今天在创造的民主生活都有着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它和西方文化为背景的“德先生”式的民主不同，也和无政府主义的“民主”的含义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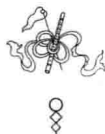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第五讲 发扬民主》，《道风集》（增订本）第98—99页

从道教宫观管理的角度来认识“民主”，当然是推进道教宫观正常管理下的民主，也就是在严格的管理制度下的“民主”。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第五讲 发扬民主》，《道风集》（增订本）第99页

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民主又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管理和民主只有相互依存，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使道教宫观管理有序地进行。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第五讲 发扬民主》，《道风集》（增订本）第99页





选拔人才，就是要让每个在道观中的道士感到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发扬民主，就是要让每个道士对官观里的事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有畅所欲言的地方；分清脉络和健全制度，就是要让每个在官观里的道士和职工知道自己每天应该做些什么和怎样做；奖励和惩罚就是对每个道士和职工在自己岗位上做得好的要给予表扬和奖励，对做得不好的要给予批评和惩罚。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把被管理的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道法自然》，《上海道教》1998年第4期第13页





附录二

陈莲笙弘道思想研究

刘仲宇 安莉霞 李 兰

陈莲笙大师不仅在行道弘道的实践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在如何弘道方面作了一系列思考，并将之总结成文，从而形成了有关在新时期如何弘扬道教的丰富思想。他的理论阐释，是当代道教教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实践一样，也是他对于当代道教的重大贡献。

道教是一个古老的宗教，如果依照道教界的说法，道教起于黄帝的时代，已经有了5000年的历史，而按照目前中国学术界大多数人的意见，道教教团形成于东汉，则也有了近2000年的历史。那么悠久的历史中，改朝换代不知凡几，经历的社会形态也不在少数——从形成时的封建社会，到清代中期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再经过短时间的过渡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是什么支撑着道教走过如此巨大的社会变迁呢？原因当然不能简单地加以判定，但是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道教界能够应时顺变，不断地调整自己，使之与面临的新的历史条件相协调。这种应时顺变，涉及到广泛的方面，有制度上的，有行为模式主要是科仪上的，有炼养方法上的，但是其中处于中心的内容，则是理论上的阐释，即按照新的条件，形成新的教义思想。教义思想的演变，常常带动其他方面的进步，从而使古老的宗教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获得





宽广的发展空间。当年张道陵天师创立正一盟威道，就是通过
对《老子》五千文的独特阐释，奠定了教义的根本思想，使整个正一盟威道有了统一的观念基础。明清时期，全真道在王常月的带领下，有过一段中兴的历史，而其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有了新的教义思想，形成《龙门心法》，并用之“振拔”处于萎靡不振的全真教。这只是两个例子，事实上，道教的每一次发展，都包含着教义思想的创新和阐释。当它处于近代以来的重大社会变革之中时，道教界的有识之士也注意到了重新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所需应对的环境，寻求弘扬道教的法门。然而，由于时代的条件和道教界自身的原因，在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后，就没有能取得大的进展。虽然有陈撄宁、易心莹等人的努力，提出了一些企求适应时代的真知灼见，奈何和之者寡，没有能形成大的气候。陈莲笙比起其先辈来，既有对历代道教思想家特别是近现代的陈撄宁等人的传统继承的一面，同时又有自己的创造。为什么能做到有所创造呢？除了他自己的学识之外，极为重要的一点，是陈莲笙比起近代的前辈来，遇到了更好的时代。拿他自己经常说的话，道教在改革开放之后，遇到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只有改革开放之后，道教才有了稳定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以来经常处于震荡不安之中的状况。重返道教界领导岗位的陈莲笙开始有了用武之地，同时也更加切身地感受到了道教面临的问题，迫使他对这些问题加以思考和阐释。说是“迫”，因为道教进入新时期之后，百废待举，实际问题每时每刻都会冒出来，让处于领导岗位的人们绕不过去。而要回答或解决问题，首先必须弄明白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根据道教的教理教义制定出应对之策。然而，面临这种“迫”，并非每一位道长都有深刻的思考。这里涉及每个



人的文化自觉不同，也涉及弘道的紧迫感、责任感的深浅不同，当然也与每个人的学养紧密相联。陈莲笙在同道中，是一位道心坚定、对弘扬道教具有深切的责任感的人，他对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对新时期中如何弘道的问题，较早思考，较早形成自己的思想观点。人们称他是道教界的学者，因为他在八十年中，学习不止，思考不止，进入新时期后，又笔耕不辍，为当代道教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一、 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弘道契机

(一)

陈莲笙道长生长于一个道教世家，但是，他担任道教界的领导工作时，面临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已经与他的前辈有极大的差别。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似乎是紧缩式的。从清代的封建社会末期，入民国，进入所谓共和时代，实际上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又很快进入社会主义，差不多一百来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几种社会形态。生活于其中的一个人，前后要经历几种社会的大变化。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会有一些观念上的积淀，当新的历史时期到来时，又需要对原有的观念进行反思，去除其不适应的部分，增添新的认识。在近代历史上，常会有人因为跟不上时代变化的急速步伐而落伍，甚至由进步变为阻碍进步。陈莲笙出生于1917年，一生经历了从民国到新中国的巨大变革；进入新中国之后，又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可以说一生在思想上不断





地经受着激荡。作为一个道士，当然不会处于社会漩涡的中心，但是，陈莲笙个人，却一直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尤其是进入新中国之后，他积极地学习，力求快些适应新时代。所以虽然到了改革开放恢复道教活动时，已过花甲之年，但一直保持着一种努力理解新环境使自己的思想与活动与新的时代特点相协调的态度。所以，他对于如何弘道，是从积极地理解时代特点开始的。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适应时代”。

这种要求适应时代的呼唤，是陈老面对新的社会环境时切身感受的表述，同时也是道教传统教义思想在新时代的回响。道教从道家哲学中吸取了虚心待物、随顺自然的思想，为自己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提供了哲理上的依据。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观点，认为：“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道家处事，心中没有一个先设的成见，只是根据事物的本然情形，因循其变，说是有确定的方法来处理问题，却又无固定的方法，只是根据时势而行动。圣人之所以不朽，乃是因为他们只是守住那变化的时机。这类思想在道家、道教中是经常提起的老话题。正是它，使得道教能在近2000年中不断适应时势变化，寻到新的生存与发展资源。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2年中央19号文件关于宗教政策发表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贯彻和落实，道教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道教进入了它发展史上的新时期。这和解放前的社会现状完全不同了。也就是说道教的发展不能再



采用旧的模式了。智者都知道审时度势，知道顺应时代的发展。

正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对于陈莲笙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都提高了很多，他压抑多年的对宗教事业的热情也终于可以再次燃烧起来，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但却正好也是蓄势待发的时刻，在经历多年艰辛磨难和道教修为的长期积累之后，他又重新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了道教的发展事业中去。陈莲笙道长也看到了道教要发展就必须适应时代、适应社会。将道教的深厚底蕴和现代相互调和起来，适应时代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陈莲笙道长认为要正确地对待道教适应时代，首先要明白，道教本是人的信仰，而人都生活在变化中的社会和时代之中。他不但强调要继承道教传统，同时也多次在国家会议、道教会议以及研讨会上提到道教要适应时代。陈莲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道长，他将道教的道法自然，应用于生活、学习、修行的各个方面，提出了道教要适应时代发展，并且也一贯坚持这个主张。他的这个思想在多篇文章中都有体现。比如《培养人才、加强联合、适应时代》、《适应时代》、《正在顺应时代发展的道教》等等。在宗教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研讨会上，陈莲笙道长专门作了题为《上海道教正在努力适应当今社会》的发言。

在这些文字中，都贯穿着陈莲笙道长关于道教发展要适应时代的思想。其基础就是道教的一大核心观念“道法自然”。他说：“道法自然。这是太上的至言。自然这个词包含着自然界和社会的丰富含义在内。道应该是变化的而不是凝固的，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支持变化的而不是抱残守缺的。”^①从上海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和江南地区道教的实际情况出发，道教面临的改变课题是广泛而复杂的。用“道”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决不能固步自封。道教有近2000年的历史，其经典道籍中的思想哲理、道画、道乐，以及养生之道无不渗透在了中华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的衣食起居。老子的《道德经》为很多学校家长等采纳作为教育之用，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道教中提出的道法自然和环境保护紧密联系。此外道教中所体现的和谐思想更是有助于现在我党所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方针政策。另外养生之道，也是为人们日常所关心和参考的。可以说道教要想长期发展必然是要与时俱进的。经典的传统要继承，与时代相适应的发展变革也是非常必要的。

他一再强调，适应时代，是历史的要求：“历史告诉我们，在道教和时代关系上，只能是我们道教主动去适应时代，而决不是相反。在当代中国社会，我们道教在政治上要坚持爱国主义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拥护改革开放的政策。在经济上也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社会，有益民众。这些都是我们道教适应时代的内容。”^①面临着时代内容的变化，最要命的是固步自封：“如果我们在思想上固步自封，自我封闭，两耳只闻钟鼓声，‘以不变应万变’，那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不可能做到的，其结果也必然是自误误人，最终使道教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丧失立足之地。”^②

① 陈莲笙：《迈向新世纪——关于新世纪道教弘扬与发展的思考》，《上海道教》1999年第4期第30页。

②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7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二)

陈莲笙道长所说的“适应时代”，决不意味着消极地应付，而是要求根据时代的新内容新特点，发展自己，弘扬道教中的优秀成分。因此，适应时代也意味着要抓住道教发展的契机，积极地壮大自己。他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全面贯彻落实，道教宫观修复，青年道徒培养，道协活动恢复，道教文化得到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和认同。所有这些，也是天地给予我们道教的机遇。在道教的历史上，特别是近百年来，这样的时机可以说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们要珍惜它，抓住它，利用它，恢复道教，壮大自己。”^①他对当前的机遇充满了信心，因为他看到，道教是整个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与整个中华文化一样，都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道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道教的生命力也就包含在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之中。”^②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光辉灿烂文明历史的国家，其历史积淀下来的儒、释、道的传统浸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这个思想传统不会终止，也不可能终止。进入21世纪，中华文化传统也面临挑战，终将发生某些变化。但是，人类的文明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会轻易丢失。离开传统的革新是不会持久的，离开创新的复古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很显然，他对于新时代弘道的信心，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的信心上的。这种信心，既是一种高瞻远瞩的眼光的表现，也基于他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12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坚持信仰，适应时代》，《上海道教》2001年第1期第4页。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这位长期坚持爱国爱教的老人，相信大道之行，自有必然。当人们根据历史经验教训，社会终于顺道而行的时候，中国出现了奇迹。百业兴旺，人民幸福，社会安定，前途灿烂，举世瞩目。二十年来中国道教的发展正是中国奇迹的一部分。所以在他看来，只有适应了时代，道教才能焕发出生命力。适应时代，正是道教大有作为之时，每一位道教徒都有不可推卸的贵职。

(三)

那么，如何适应时代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谁都无法给出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因为当前的时代是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对这一时代的特征，即使是最有智慧的人，也只能在实践中，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步去了解，逐步去领会。所以在改革开放中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所以，只能根据面临的问题，提出一些应对之策。陈莲笙道长对这一问题，作了多次阐述，在《培养人才、加强联合、适应时代》一文中他提出了五方面的适应时代的总框架：

“从上海和江南地区道教的实际情况出发，道教面临的改变课题是广泛而复杂的，至少有下列五项：

一是教义思想必须增加新内容。将道教信仰和当代社会生活相结合，在宇宙观、社会观、善恶观和神仙观等方面回答当代道教徒关心的问题，对道教如何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作出教义的解释。

二是宗教生活必须作出新调整。根据当代道教徒的要求，对科仪和道法的内容作出取舍，淘汰不合时代的，新增教徒需



要的。

三是教徒规戒必须符合时代的要求。根据社会要求和教义思想,制订符合当代生活实际的规戒,既把持教徒队伍的纯洁,又能吸引朋友和留住教徒。

四是积极进行各种服务社会、壮大自己的道教事业活动,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为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服务,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出版道教经典和书刊,建立和扩大同教徒信众的联系,为教徒排忧解难。

五是在团体和庙观管理中,借鉴社会成功的经验。培养人才,鼓励竞争,提倡民主,奖勤罚懒,不断增强道教发展的活力。所有这些道教如何适应当代社会生活的课题,都不是书斋的空谈,而需要我们不断实践,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我们道教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①

在《适应时代》一文中,他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些思想。他说:“十年来,给我启发最大的是什么?就是观念要改变。如果我们观念不改变,就不可能使道教适应时代。因此,道教适应时代的问题,首要的不是去改变细枝末节,而是去改变观念以适应时代。”^②

他又说:“改变我们的观念,首先是在教理教义上丰富和发展对于‘道’的认识。‘道’是我们道教的基本信仰,信道、崇道那是不能变化的,但是‘道’的内容是应该随着时代而丰富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物质本原、宇宙起源以及生命奥秘等等都有一些新的发现。这些新发现大大扩展了我们对‘道’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9—1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7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的认识，我们当代道教徒应该对‘道’作出解释，以丰富或修正前辈道长们的阐述。现代社会飞速发展，它同五十年前、一百年前的世界已有很大差别，前辈道长们对于社会之道和人生之道的论述，也应该由我们当代道教徒作出补充、修正和发展，因此，丰富和发展道教的教义教理，特别是对于‘道’的认识是道教适应时代的首要内容。”^①“为了适应现代社会高度组织化的生活，我们还要改变道教组织的观念。1957年，我们道教成立了跨宗派、跨地区的联合的道教协会，各省市先后也都成立了跨宗派的协会。这是道教组织适应现代社会的重要步骤，因为它改变了历史上的按宗派、按宫观、按师承关系建立的各自为政的一盘散沙的组织面貌。联合的观念应该贯穿在道教各派之间、道教宫观之间、道教徒之间以及道士同信徒之间。根据上海、茅山和苏州等地的做法，适当吸收道教信徒参加道教协会的工作，密切道观同有影响、有号召力的信徒代表的关系，道协和道观主动为道教徒解忧扶困，参与社会生活，使道教作为一个实体出现在当代社会生活之中，其作用发挥得越来越好。”^②

在《继承传统和适应时代》一文中，他就提到了对于传统和现代之间如何调和，道教的发展如何从中找到契合点，也提到了不能固步自封。

他说：“人大概有种惯性，习惯于用固定的眼光看待事物。所以，太上在《道德经》的二十二章里就告诫我们：‘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这就是，我们要用‘道’的眼光来看待事物，而不要固步自封，自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71—7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7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以为是，更不要自高自大。”^①

“就拿道士的培养来说，现在有一种说法，‘道学院的教师应该都是道士，课应该由道士自己来上。’但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因为，就上海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老道士中实在无力胜任这些文化和专业的课程。这是客观条件，不是我们想如何就可以如何的。何况，教徒弟是个苦差使，站在课堂上讲二个小时，如果没有内容，没有足够的体力，那是上不下来的。再说，当今的社会是个信息社会。课堂上有来自各方面的老师讲课，可以让小道士开阔视野，消息灵通，成长得更快。让我们的小道士放在‘近亲’抚养的成长环境中，我看，这也是不利于教学的。”^②

再拿刊印道教书籍，出版道教刊物来说，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花那么多钱搞这些东西，看又看不懂，白糟蹋钱。”这种说法是固步自封的。陈莲笙感叹道：“我们道教包含的内容太丰富，历史又如此悠久，我们自己能说已经懂得多少呢。最近出版的一本《中华道教大词典》，分门别类的参加执笔的道门中人和国内外专家学者达到112人之多。由此可见，道教学问之深，研究之难。因此，有些经籍和文章，我们做道士也不懂。这里，还牵涉到我们自身的文化底子。更何况，道教文化是个积淀，我们的祖师和前辈，传给我们那么多经籍，我们就应该去弘扬、研究和继承。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对于后代来说，也是一种积淀。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钱是不会糟蹋的，不过，如果我们花了钱，印了书刊，因为看不懂就不看，或者束之高阁，那才是真正的糟蹋钱，而且更是有负于2000年的道教传承，数典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15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157—15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忘宗了。”^①

再拿培养青年道士让他们承担一些工作职务来说，现在有人对这些青年道士也有议论，说他们“嘴上无毛，做事不牢”，“看他们能干上几年”等等。这种说法是看不起小道士的，自高自大的。这些小道士的选拔不是凭空乱点的，而是经过几年的宗教教务、宫观管理等工作的实践基础上考察的。这些小道士的工作能力在工作实践中获得了一定的提高。对于他们的优点和成绩，我们应该给以肯定和表扬。对于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可以也应该给以批评和帮助。如果有了错误而不愿改正的，我们也可以给予处分，有严重的错误，也可以撤职乃至开除出道门。这里需要的是老一辈人对道教事业的责任心，而不应牵涉任何私人感情。长江后浪推前浪。道教事业的继承和发扬靠谁呢？只能靠这些既有坚定的道心又有处世能力的小道士。^②

这些问题，虽然三言两语却不容易解决，属于观念的范畴，而改变观念要经过很长的时间。陈道长就通过说理举例子，用事实说话，以理论为辅助，来化解对于旧的观念的固执，首先使得道士们自己先转变观念，对道教的认识理解不再止步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观念。

解决了观念的问题，陈道长就开始具体地从各个方面来调整 and 进行道教的管理建设，在道教的传播和与社会相融合方面都有显著的计划：

1. 教义思想和科仪要与时代相适应

首先是在教理教义上丰富和发展对于“道”的认识。“道”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15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158—15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是我们道教的基本信仰，信道、崇道那是不能变化的，但是“道”的内容是应该随着时代而丰富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物质本原、宇宙起源以及生命奥秘等等都有一些新的发现。这些新发现大大扩展了我们对“道”的认识，我们当代道教徒应该对“道”作出解释，以丰富或修正前辈道长们的阐述。现代社会飞速发展，它同五十年前、一百年前的世界已有很大差别，前辈道长们对于社会之道和人生之道的论述，也应该由我们当代道教徒作出补充、修正和发展；因此，丰富和发展道教的教义教理，特别是对于“道”的认识是道教适应时代的首要内容。将道教信仰和当代社会生活相结合，在宇宙观、社会观、善恶观和神仙观等方面回答当代道教徒关心的问题，对道教如何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作出教义的解释。在道教科仪方面，某些为当代社会生活需要的内容，应该加以发扬光大，对于道教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加以弘扬；对于某些不适应社会的部分内容，我们应加以适当的调整。著名的道教学者陈撄宁先生早在50年代时曾说过，一是道教的形式，二是道教的精神，道教的形式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而道教的精神，应该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继续得到流传的，其中一些有利于社会的内容，应该加以弘扬，使之更加适应社会，造福人民。

2. 宗教生活必须作出新调整

根据当代道教徒的要求，对科仪和道法的内容作出取舍，淘汰不合时代的，新增教徒需要的。教徒规戒必须符合时代的要求。根据社会要求和教义思想，制订符合当代生活实际的规戒，既保持教徒队伍的纯洁，又能吸引朋友和留住教徒。在团体和道观管理中，借鉴社会成功的经验。培养人才，鼓励竞争，提倡民主，奖勤罚懒，不断增强道教发展的活力。所有这些道教如何适





应当当代社会生活的课题，都不是书斋的空谈，而需要我们不断实践，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我们道教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

3. 组织管理制度等的改革

为了适应现代社会高度组织化的生活，还要改变道教组织的观念。1957年，我们道教成立了跨宗派、跨地区的联合的道教协会，各省市先后也都成立了跨宗派的协会。这是道教组织适应现代社会的重要步骤，因为它改变了历史上的按宗派、按官观、按师承关系建立的各自为政的一盘散沙的组织面貌。联合的观念应该贯穿在道教各派之间、道教官观之间、道教徒之间以及道士同信徒之间。根据上海、茅山和苏州等地的做法，适当吸收道教信徒参加道教协会的工作，密切道观同有影响、有号召力的信徒代表的关系，道协和道观主动为道教徒解忧扶困，参与社会生活，使道教作为一个实体出现在当代社会生活之中，其作用发挥得越来越好。

4. 提高道士自身的素质修养以适应新时代要求

陈道长认为要适应时代发展，就要加强自身的修为，那么培养人才就是重中之重。纵观古今，我们不难发现，在道教人才辈出的朝代和时期，道教总是发展得非常迅速。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有葛洪、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等一大批道教活动家和理论家，他们能够根据时代的变化，逐步改革道教组织结构 and 理论，剔除贫民性和地区性，突出贵族特征和正统性，以维护纲常名教的鲜明姿态，取得了统治阶级的支持和信任，使得道教有了发展的重要动力，道教教义才系统精密起来，其仪式才得以恢宏大观。唐宋金元明等朝代，道教中人才辈出，连绵不断，成玄英、李荣的重玄学，司马承祯和李筌的哲学精论，孙思邈的医道大著，王重阳和全真七子的宏论集粹，林灵真、王



契真和金允中的仪规大成，雷思齐的引易入道，张宇初的博学精深，正统万历的《道藏》编纂等等，这些都使得道教发展达到了鼎盛之势。因此陈莲笙道长意识到培育人才迫在眉睫。

5. 新形势下努力弘扬道教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形势一片大好，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经济发展迅速，文化水平持续发展，这些都为道教的恢复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内环境。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地为道教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做好了充足的物质和精神准备：更好地发展道教事业的经济条件和科技手段，以及更为宽松和自由的文化环境，从两方面同时促进了道教的再次发展。尤其是上海发展非常快，上海道教在如此好的环境下恢复发展着。陈道长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认为适应时代，就要大力地弘扬道教文化。于是在各个方面都展开了弘扬道教文化的工作。

首先成立了专门的道教文化研究机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道教对外关系的日益扩大，以及与世界宗教界的来往也日益频繁。我们上海道教界的思想水平，也必须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上海市道协领导经过认真考虑后认为，上海道教要有自己的研究机构，这样才能适应社会，适应时代，适应上海道教事业发展的需要。于是，上海市道教协会文化研究室于1987年正式成立。聘请了教内外一些著名的学者和道长担任研究工作，研究室还举办“道教知识讲座”，配合《上海宗教志》的编写工作，撰写《上海道教志》。同时研究室还多次派人出去参加国际道教学术研讨会，并拿出具有一定质量的论文。所有这些工作都为宣传上海道教、弘扬道教文化打下了基础，也让全国乃至世界了解上海道教做了一定工作。

其次创办了《上海道教》杂志，开创了上海道教文化研究





工作的新局面。道教中历来讲“道不言道，道不外传”，这是传统。可是当今的北京、四川、上海以及台湾和港澳地区刊印道教书籍，出版道教刊物，在教内外弘扬道教文化，陈道长称之为创新式的弘道。《上海道教》杂志的创刊，在上海道教史上是一个创举。纵观上海道教历史，还没有出现过自己的刊物，虽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道教学者陈撄宁在上海创办过《扬善半月刊》和《仙道月报》，但皆不是纯粹研究道教的刊物，更不是我们道教自己创办的。虽然如此，维持的时间也很短暂，而《上海道教》杂志则系上海市道教协会的会刊，它由上海市道教协会主办，由道教文化研究室组成编委会，负责编辑和出版工作。其宗旨是在爱国爱教的基础上，以研究和探索中国道教文化、继承和发扬道教优良传统为中心，致力于沟通道教界和学术界的联系，增进道谊，交流教务，办成具有学术性、文献性、艺术性、健身性和导游性的综合性刊物。《上海道教》自1988年正式创刊以来，至今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来，紧紧围绕其办刊宗旨，在积极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弘扬道教文化，指导道教工作，交流经验，提供信息等诸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得到上海市宗教局领导和市道教协会领导的好评，也得到海外专家学者和兄弟省市道教界的好评。十年之中《上海道教》发表的文字，已经有300万字之多，这个数目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十年的《上海道教》既记录了上海道教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足迹，也反映了上海道教界总体水平的提高。正如有的学者在《上海道教》创刊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所说的：《上海道教》杂志是上海道教的一面旗帜，更是上海道教的历史丰碑。

后又录制了《中国道教斋醮·上海卷》录像片和录音磁带。



为了抢救和保护道教仪范和道教音乐，由上海市道教协会和上海音乐学院联合录制了《中国道教斋醮·上海卷》录像片和录音磁带，记录了上海地区道士举行“净坛科仪”、“进表科仪”的过程和音乐演奏，其演奏和录音、录像制作均具有较高的水平。该录像片所记录的宗教仪式，既是中国古代宗教哲学思想的体现，又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仪仗古朴，服饰绚丽，经文典雅，仪礼有序，音乐更是丰富多彩，既是中国古代音乐的继承，又同民间音乐保持着血肉联系，具有中国宗教音乐的特点。《中国道教斋醮·上海卷》的摄制，开创了《中国道教斋醮》录像的先河。此后，上海市道协和上海音乐学院又摄制完成了第五集全真坤道“关灯散花科仪”、第七集茅山卷“进表”(三茅表)科仪、第八集常熟卷“早朝行道科仪”等，各集都真实、客观、系统、完整而高质量地抢救和记录了各地各宗派道士的道教仪式的全过程，对我国的音乐、宗教、历史、民族、民俗以及文化等各学科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6. 适应时代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人类的文明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传统美德不会轻易丢失。离开了传统的发展是不会持久的，新世纪中，道教文化也将在改革和传承中继续大力弘扬传统美德。道教在立教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规范，包括在戒律条文中，对道教徒有相当强烈的约束力，成为道教徒必须遵守的规则。道教的这种道德规戒，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我们当代道教徒要以此为目标，发扬道教优秀的道德规戒。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过无数代人的阐释和实践，经过一





代又一代人的身体力行，传承发扬，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传统美德中的热爱祖国、崇尚气节、勤劳节俭、尊老爱幼、惩恶扬善、诚实守信、孝亲尊师、廉洁奉公、团结友爱、谦虚礼貌、乐善好施等具体品质，仍然包含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道德的内容之中。这些传统美德在我们道教界也得到充分体现。“道由人显”，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有那么多品德高尚的人作为榜样，有许多优秀的道长，兢兢业业，前仆后继，鞠躬尽瘁，才使得道教对于传扬中华民族美德的作用尤为显著。《道德经》正是一部传播美德的教科书。

陈莲笙道长曾惊喜地感叹今天的道教，处在历史最好的时期。我们更应该继续发扬道教优良传统，积极适应当今社会。

7. 关心民众精神生活，构建和谐社会

新世纪的物质文明发展迅速，而人的精神世界变化明显滞后，加上社会矛盾，生活困扰和天灾人祸交织一起，人就需要在精神上得到抚慰、帮助和解脱。陈道长认为道教应该积极地面对社会，关心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给人以精神、信仰和伦理的帮助。新世纪又是崇尚个性、自由的时代，因此，新世纪中人的精神世界又是多元的，对于信仰的选择也更加自由。处在这样的时代，道教如果不发展，不变化，就会无法适应，无法满足民众的信仰要求，就会失去发挥自己功能的机会。正因为如此，中国道教应该发展自己的教义思想和规戒伦理，革新自己的科仪和法术，发扬传统的养生修炼方法，提高道教信仰的层次，为一切需要关怀和帮助的民众服务。在新世纪中，道教如果既不能为信徒的“生”的需要服务，又不能满足信徒对“死”后世界的愿望，就会失去信徒和丧失未来。陈莲笙认为：“道教为了要体现自身的价值，理应关心各种层次信徒的要求，



满足他们的信仰需要和宗教感情需要，也只有回报社会对道教的需要之中，道教才能证明存在的自身价值。”^①

陈莲笙道长深刻地领会了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充分理解当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他懂得了只要充分发挥道教的积极因素，就可以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社会秩序，改善社会风尚起到积极的作用。要积极进行各种服务社会、壮大道教事业活动，建立和扩大同教徒信众的联系，为教徒排忧解难。为贫困孤苦之人提供救济，为灾区人民捐款和祈福，努力为社会的稳定作出贡献。

8. 积极参与市场经济，以适应时代发展

我党提出搞好经济建设，因为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家富强了，我们才有稳定的社会，才能安居乐业，道教也才能长足稳定的发展。因此陈道长还提出：“现代道教要积极参与市场经济，只有参与才能适应。道教旅游、道教文学、道教文化用品、食品、药品、饮料开发、道教医学、养生学都可以作为开发对象，让它们走进市场，走出国门，上海是具备这方面条件的。因此，我们要‘积极开拓，勇于进取’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为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服务，增强自身经济实力。通过参与市场经济，既可以帮助发展国民经济，又可以使得道法弘扬。”

道教在充满竞争的新世纪要勇敢地面对挑战。这些挑战，有来自传统文化中的其他成分，也有来自新的文化成分，当然，也有来自社会的经济和生活各个方面的。道教应该充分利用自己在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历史地位，善于在革新和复古的矛盾中寻找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陈莲笙道长对于道教界后辈们

^① 陈莲笙：《社会需要和自身价值》，《上海道教》1996年第3期第3页。



的期望就是：“我们的道教要主动去适应社会、适应时代的发展。我们更要珍惜道教今天在政治上、社会上获得的地位，在信仰上获得的尊重，在文化上获得的弘扬。因此，我们道教要紧密联合，加强团结，从自身做起，努力提高自己的信仰和修养水平，做到弘扬道教，服务社会，善导众生，造福人类。”

陈莲笙道长对于要适应时代的肯定判断，对于如何适应时代的思考，是随着新的问题和新的情况出现，而反复地思考着的，这大约就是司马迁的父亲说的“无成势，无常形”罢。

二、明悟教由人传，培养弘道人才

(一)

如前面所说，在陈莲笙道长看来，改革开放给道教带来了新的生机，道教正处于近百年来最好的发展时期。那么，要弘扬道教，要普度众生靠谁呢？拿一个较有学术意味的话来说，弘道的主体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是道士。

道是由人来显现，也是由人来弘扬的。道教的博大精深，丰富的哲理都是需要人来学习，来揭示，来阐述，来传播，来体现。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要“有人”。但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弘道的。“人”是关键。“道是道教的根本，道是无所不在的。以道立教，以教弘道，但是，道由人弘，教由人传，法由人显。”^①陈莲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24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笙说：“道由人显，道教的存在归根结底依靠道教徒的存在。道教的发展也取决于道教徒素质的提高，道教人才的多寡。”^①因此同时，陈莲笙指出：“道教传统的继承和适应社会，关键是要培养出一批既有深厚的道教传统修养，又能主动去适应社会需要的‘道士’。”^②

在他看来，道教历经2000年而仍具有不歇之生机，就在于道教的硬件官观与组织等还存在，更在于传承道教的主体道士仍存在。“近两千年中，社会发展，时代变迁，历史上有多少风风火火的东西都消失了，湮没了，但是道教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道观仍然存在，神像仍然存在，经书仍然存在，而最重要的是，我们道士一代一代传到了今天。今天，我们还要培养青年道士，使道教继续传下去，直到将来。”^③

陈莲笙很明白：“不同时代的高道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他们身上既继承了道教的一些不可变更的内容和形式，又对道教如何同身处的时代相适应作出贡献。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都是继承和革新、原则和灵活、承袭和创新的结合。而要培养出这样的‘高道’来，培养他们的人也要有这种‘结合’的观念。”^④正因为此，他大声地呼唤道教人才的出现，“国家需要人才，道教需要高道，只有自身努力，准备足够的条件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和道教的需要。这个条件就是要能够认识天道地道，日月有数，就是要学会善盗天机，善知杀机。”^⑤他呼唤人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继承传统和适应社会》，《上海道教》1996年第2期第10页。

③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3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④ 陈莲笙：《继承传统和适应社会》，《上海道教》1996年第2期第10页。

⑤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12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才，也积极地培育人才。

他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竞争的时代，道教也处在竞争之中。太上要我们‘不争’，‘不争’只有经过‘竞争’才能达到，如同只有‘有为’才能‘无为’一样。当代社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因此，我们要大力注意吸收人才、培养人才、启用人才和留住人才。我们不能要求当今培养的青年道士个个成才，但是，我们如果能自觉去提高道教徒的总体素质，使他们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赤子之心，有坚定的道教信仰，有遵纪守法的道德水准，有精通宗教生活的道学修养，有中等以上的文化水平，有参加社会生活的活动能力，有适应当代社会生活的创造能力。如果我们有一批这样的青年教徒，选择其中的先进者，将其推上教职，那么，我们道教就会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②他的一番话清晰地表达了对于道教人才培养的迫切和必要。

在1992年10月西安召开的“中国道教文化研讨会”上，陈莲笙道长曾经就道教文化的当代发展谈过三点意见，其中第一点就是培养人才的问题。在会议上，他说当代社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因此，我们要大力注意吸收人才、培养人才、启用人才和留住人才。

陈莲笙道长对于迫切培养人才的呼唤，当然不仅仅是出于他个人的内心感受，事实上，人才的短缺已经严重制约着道教的发展，所以当代道教界的许多领导人都看到了加速培育各种人才的紧迫性。已故的闵智亭会长生前就十分重视道教人才的培养，并且为当前道教界教育事业的滞后而焦急。他在中国道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5—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协六届二次常务理事会道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抓住机遇，育才弘道》中说：“道教界对道教教育工作的认识还不一致，重视不够；各类院校（培训班）都缺乏师资，缺乏统一教材，生源严重不足，经费没有保证；培养的人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远不能适应道教事业发展的需要。从现实看，挖掘整理、发扬道教教义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管理好宫观庙宇，办好教务，加强同海外道教界友好交流等，都需要大批的高素质的道教人才。从长远看，道教未来的面貌，兴衰存亡，关键看今天我们培养的人才数量和质量；我们今天的道教教育事业将决定明天道教的命运，今天培养的合格道教人才，下个世纪将成为道教事业的栋梁。对此，我们应该有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闵会长的话，表达了道教界有识之士的共同眼光和共同心愿。从这一角度看，陈老对于道由人弘、加快培养道教人才的思想，代表了中国道教界在面临新时代新情况时高瞻远瞩的眼光。这种眼光，既是他们面临新情况下的切身感受，也是道教长期发展经验的总结。

纵观古今，我们不难发现，在道教人才辈出的朝代和时期，道教总是发展得非常迅速。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有葛洪、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等一大批道教活动家和理论家，他们能够根据时代的变化，逐步改革道教组织结构和理论，剔除贫民性和地区性，突出贵族特征和正统性，以维护纲常名教的鲜明姿态，取得了统治阶级的支持和信任，使得道教有了发展的重要动力，道教教义才系统精密起来，其仪式才得以恢宏大观。唐宋金元明等朝代，道教中人才辈出，连绵不断。唐代道教处于全盛，除了朝廷的支持，很重要的也是因为这一时期道教人才达一时之盛。成玄英、李荣的重玄学，司马承祯、李筌和谭峭





的哲学精论，孙思邈的医道大著，叶法善等人的法术声望，张万福、杜光庭对科仪的整理完善，钟离权、吕洞宾等人对于内丹学的传授与阐扬，都使得道教的发展全方位地空前地丰富。及于宋代，陈抟所传的《易》学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张伯端和其他南宗传人的活动，将内丹学推到了高峰，王文卿、张继先等人对于五雷正法的提倡则使道教法术达到了新的不同以往的境界，金元时代王重阳和全真七子的宏论集粹，林灵真、王契真和金允中的仪规大成，雷思齐的引易入道，元末明初张三丰对于内丹和内家拳的创造性成果，明代张宇初的博学精深，众多道士参与正统万历的《道藏》编纂等等，清初王常月公开放戒，如此等等，这些都说明，道由人显，有了人才，可以使得道教发展达到鼎盛之势，有了人才，可以使得道教从沉闷中焕发生机，有了人才，可以让道教的文化资源汇入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海洋，为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

陈莲笙道长认为要培育道教人才就要勇于挑战传统规矩当中不适应时代的方面。因此，他不拘旧制，支持新的课堂教育方式。道教历来培育人才的方式都是拜师、密传。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如果还一味坚持原有的传统，对于道教本身的发展是不利的。因此，除了道教中一些符咒、丹诀采用拜师传授的方法承袭传统以外，很多地方创办了道学院，以课堂的方式培育道教人才。陈道长非常提倡这种做法，认为这些是适应时代的。有些人提出说：“道学院的老师必须要是道士才行。”陈道长却并不这么认同，他想得深，看得远。正因为他看到了当今



社会是个充满竞争力的社会，要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就要全面地培养道士各方面的学识，提高道士的文化层次，使得他们不会被快速发展的时代所抛弃。邀请来自于学校或者研究所的学者和研究人员来上课，可以开阔道士们的眼界，获得更加丰富的知识。他在对中国道教学院上海专修班的毕业论文集上写道：“现实的道教总是要依靠道门中人自己去努力弘道才会有生存的机会和发展的可能。努力就需要辛勤的劳作。努力就需要自身的智慧。努力就需要明确的方向。努力就需要远大的理想目标。努力是体力的活，更是脑力的活。努力的先决的条件就是要有足够的人才，多种多样的人才。”^①

目前，上海道教学院的道士仍然每周有在华东师大进修文化课程。陈莲笙道长认为这些都要灵活掌握，当前人才缺乏严重，如果等三年完成学业才用，会出现青黄不接的景象，因此可以不足三年就把一些表现较好的小道士重用为协会和官观的骨干。陈道长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豪情，也激励了许多年轻的道士更加热情地投入到道教建设之中。

此外，陈莲笙道长认为道教徒必须具备的素质有三方面：

(1) 政治素质。在政治上，要求广大道教徒，要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陈莲笙说：“我们的道教是在祖国这片土地上创立起来的宗教，有着中华民族自己的特色，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祖国，也就不会有我们这样的道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②爱国还要爱党，陈莲笙常说：“抗战胜利，说明中国人民不可侮，不管敌人怎样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28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光辉的五十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上海道教》1999年第3期第4页。





疯狂，不管遭受多大的困难和挫折，只要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后胜利永远属于人民，玩火者必自焚。我们上海道教界一如既往与党和人民风雨同舟，肝胆相照。”^①因此，上海市道协坚持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学习，使大家了解到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激发了我们广大教徒的爱国热情。通过学习，也使我们认识到，道教的命运与国家盛衰有着亲缘联系。历史告诉我们，每当国运昌盛时期，道教也随之昌盛。每当国运衰弱时期，道教也随之而衰弱。道教徒深知，道教的坚强靠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祖国民族亲情。国家不强盛，人民不富裕，道教就不能振兴。其次，上海道学院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一项长期工作，从学生阶段，就开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全市各道观也坚持组织学习时事政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学习和教育激励广大道教徒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2)文化素养和道德教育。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更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道教文化是祖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陈莲笙很明白“要全面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哲学思想、科学文化思想的发展及其演变规律，全面总结、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道教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是一个不可少的重要方面。”^②

中国道协在有关会议报告中曾多次提出，要把提高广大道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19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珍惜大好形势，弘扬道教文化——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上海道教》1999年第1期第1页。



教徒的文化素养和道德素养，作为各级道教组织的重要工作来抓，要有紧迫感，要把它放到整个道教事业健康发展的高度。上海道学院更应在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方面做好基础工作。在招收学员时，就严格把关，通过文化考试和道德审核，择优录取。入学后，要加强文化课的教学，使他们广泛认识到学好文化课的重要性。因此，文化课的学习和道德素养的提高，也成了道学院培养青年道教徒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关系到今后上海道教队伍的面貌。同时上海道协还定期举办道教知识讲座和各类学习班，以弘扬中华文化，激励广大道教徒重视学习文化知识。道协负责人，不但自己努力提高文化素养，而且还有甘当阶梯的精神，扶植和造就可学之才。通过几年的努力，上海道教徒的素质总体上得到了提高。做一个合格的道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吃得了苦，要受得了艰辛。这就要求道士们在精神上有很高的境界，而不能注重肉体上的享受。陈莲笙由自己谈起，他说“道衲积几十年学道生活的经验，体会到‘贫道’的‘贫’的本义并非是‘贫穷’的意思，而‘道’的本身就是包含天地万物，是涵盖天下的，因此学道、修道和弘道的本身就是普天下最富足的事情。但是‘道’又是‘俭’的、‘啬’的。《道德经》说‘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治人事天莫若啬’。俭是节俭，啬是爱惜。以这样的教导来要求我们，我们是富足的，但是我们要节俭；我们是涵盖天下的，却要谦卑地不为天下先。因此，道门的修道生活在社会的总体生活水平中应该总是处于低水平，应该永远是低调的。”^①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道士们具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备更高的道德情操，潜心修道，终能成为高道。

(3)道教学识方面的提高。陈莲笙认为：“道教的信徒一旦失去了‘道’的本性，那么‘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在社会上就失去了教化的功能和存在的依据，其结果就是逐趋衰落。”^①因此道士对于道教知识的学习非常关键，因为对于道教教义、教理的学习，是培养其认识“道”的基石。只有在这个基石上，道士才能真正的了解道，体悟道，从而修道，弘道，充满道性。道教的普通信众对于道的了解大部分是通过与道士接触而来的，所以掌握道教知识，是非常必要的。

道教知识的学习主要来源于道学院的教学和道教徒们的自学，以及师带徒的学习方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道教知识和传统的仪规又重新得到传承，上海市道协还采用现代化手段，对传统的科仪进行录音、录像，对一些不适应时代的内容，进行了调整和删除，弘扬那些符合时代精神的内容。目前，上海各官观的青年道教徒，都毕业于道学院，经过三年的学习和实践。因此，都具有一定的道教知识和科仪水平，在各官观中，担负起弘扬道教的历史重任。在对外交往和团结广大信徒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有了“人”，接下来就是“弘”了。“弘”是弘的“道”，因此就要奉“道”行事。陈莲笙道长在《奉道行事》一文中这样写道：《道德经》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这就是说，可以解说的“道”，就不是永远不变的“道”，不是真正的“道”。俗话说，可以意会，不可言传，“道”就是这样的。太上在《道德经》说到的“道”，是无所不包、无所不为、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12—1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无所不能的。它“先天地生”，产生在天地之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就是天地人都要按“道”办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就是宇宙天地、人和万物，没有一样不是由“道”产生的。“道”又体现在宇宙天地、人和万物之中，因此，“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万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也就是说，天地万物之中，只要有形象的、有生命的、有精质的里面都包含着“道”。^①历史在发展，人类在进步，在当前的宇宙进程中，“道”同样蕴藏在万事万物之中，正如他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无数个发明创造，可以说所有的发明创造都是‘道’产生的，都是‘道’的体现。人类社会还有许多没有发明的东西，没有认识的东西，它们也都是‘道’产生的，也都是‘道’的体现，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认识和理解那些‘道’的水平，也就是我们还没有‘得道’。人们要问，万能的‘道’，体现万物的‘道’是哪里来的？我们道教徒认为‘道’是太上在冥冥之中创造的、规定的。因此，太上就是‘道’的化身。我们‘奉道’，就是要信仰太上，信仰先天地生的各位尊神，相信是他们创造了‘道’，由‘道’再衍出天地万物，并且再让‘道’体现在天地万物之中。各位尊神在注视着我们，我们丝毫不能轻慢。”^②

因此，道教徒就需要知“道”，修“道”，悟“道”，行“道”，只有这样最后才能真正地做到弘“道”。陈道长认为“奉道行事”，是道教徒的第一位的修养。道教徒不可以把世俗利益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35—3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3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作为道教徒的行为准则或目标。也不可以把“得”和“失”对立起来绝对化。同时也要有为道教事业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准备。陈莲笙说：“道教为了要体现自身的价值，理应关心各种层次信徒的要求，满足他们的信仰需要和宗教感情需要，也只有有在回报社会对道教的需要之中，道教也才能证明存在的自身价值。”^①

知“道”就是要先知道，先了解，先学习。修“道”就是要从自己修养修为方面修炼“道”；悟“道”则是通过修来更深的感悟“道”；感悟“道”的目的就是要将“道”行出来，也就是行“道”；仅仅行出来还不够，还要传播出去真道，也就是弘“道”。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跳过任何一个环节，俗话说：“绳锯材断，水滴石穿”，学道者须要力索，待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得道者一任天机。但是，陈莲笙提醒到：“要知道‘道’并不难，难就难在按‘道’办事、行‘道’。如果能够自始至终坚持行道，那么‘道’就在修道人的心中和身上了，换言之，那个修道人应该说就是‘得道’了，即使那个修道之人处身于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和人际关系的蛛网之中。”^②

陈莲笙认为：“对于我们来说，‘修身’是头等的事，只有身修，才可能谈得上治家、治乡、治国、安天下。”^③

在《多行善功》一文中，陈道长更是提到了道教徒修道的重要一点就是如葛洪所说要“积善立功”、“恕己及人”。陈道长还将这些归结起来：

① 陈莲笙：《社会需要和自身价值》，《上海道教》1996年第3期第3页。

②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2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③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1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一是“忠”，忠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忠于自己的道教信仰。决不做有伤国格、人格和道教形象的事。

二是“恕”，为别人的高兴而高兴，同情别人的疾苦，周济别人的急难，救济别人的穷困，谅解别人的过失。

三是“俭”，不贪污受贿，不奢侈浪费。一草一木，一茶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以节约为美德。

四是“诚”，见人之得如同自己所得，见人之失如同自己所失。诚恳待人，不嫉妒，不中伤，不欺骗，不背后议论人之长短，不口是心非，不作伪证。

五是“朴”，谦虚朴实，不自以为是，不骄傲自大，不骄横拔扈、盛气凌人，不奉承拍马。

六是“孝”，孝顺父母，尊敬师长。不论他们贫富，都能始终如一的问寒问暖。父母和师长年迈体弱，应该关怀备至，服侍照料。

七是“信”，说话办事讲信用，承诺的必定做到，借人的必定偿还，损坏他人的必定赔偿，不贪小便宜。

八是“慈”，无论是对于亲人或者陌生人，都要怀有一片慈爱之心。特别是像婆媳关系、师友关系等处理，更要彼此间多一点相互体谅的慈心。

九是“礼”，待人接物，万事要讲礼貌。俗话说，礼多人不怪。讲礼貌，体现在一举一动之中，不能将礼庸俗化为送礼。老话说，礼轻情义重，不能计较礼物价值。

十是“义”，兄弟姊妹或者同师的弟兄姊妹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相互帮助，友爱关心。一人有难，众人相助。^①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51—5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陈莲笙认为“这十个方面是我们道教徒处理社会关系的‘善行’的道德要求。它是维持社会正常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道教徒修道、得道必须做到的积善立功。对于‘善’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会不断增加新的内容，但是‘天道’是‘自然’的这一条基本内容，却是不会变化的。”^①有了这些准备之后，弘道就水到渠成了。他说：“如果我们的道教徒能够按照太上的‘善’字去规范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们道教和道教徒在民众中的形象就真正发挥了道教这个宗教的功能，起到了作用。”^②

在弘道的过程中，人还是一个关键。首先，在弘道的时候道教徒要守住“道”，而不能把“道”给“弘”出去了，自己的“道”给弄丢了。处于花花世界的道教徒要知道如何拒绝物质利益的诱惑。陈莲笙提到：“‘守道不失’的关键是一个‘守’字。之所以要‘守’，是因为有外道之物在‘攻’，因此，我们学道的要守得住，就要能够‘自拒’。”^③他进一步说：“概而言之，‘自拒’的关键是‘无欲’。欲望和一切非分之想，可以说是当今社会所有个人灾祸的根源。”^④这方面做好了，下一步就要思考“弘”道的方式与方法了。

如何“弘”？采取什么方式？此外，弘道的对象不同也要区别对待，只有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才能达到真正的“弘”道。例如同国内同胞传道，与向海外友人传道所需要采取的方式就有不同。以集体的身份还是个人的身份传道；采取普遍性还是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5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1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③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18—1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④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2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单个性传道，亦或者将所有的方式方法相结合起来传道？总之，这些都成为了陈道长思考的内容。而他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也呈现在他自身的弘道过程之中。

在他的弘道过程中，主要是立足上海道教，以上海的各个道观为根据地，又加上创办的道学院和《上海道教》来逐渐扩大道教的影响。此外，还通过做慈善事业来弘道，也就是之前他文章《多行善事》那里面提到的，在国内发生大的灾情的时候，陈道长总是挺身而出，虽然他一直以来都很勤俭，却总是在这个时候第一个慷慨解囊，伸出援助之手。1991年入夏，江浙皖部分地区洪涝，7月中旬上海各道观在市道协的倡导下捐款5000元，7月25日专门召开支援灾区大会，响应道协号召，陈莲笙道长做动员报告，并且当场捐款1400余元，发扬爱国爱教爱人民的美德，为支援灾区“出一份力，尽一份心”。2005年伊始，上海市道协在上海城隍庙举行了由上海市道协、各区县道协以及各宫观负责人参加的法会，超度在印度洋海啸灾难中罹难的各国民众，祈愿海啸灾厄消解，亡者早日超度，生者健康安宁。年近九旬的陈莲笙道长不畏严寒，亲自参加法会。他说：“作为道士，我们绝对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作为具有优良传统的中国道教，更不能游离于世界之外。以‘济世度人’为宗旨的中国道教，就是要积极参与到社会中去，关心身边的世界，帮助民众摆脱生活疾苦。”在陈道长的以身作则之下，上海市道教协会代表上海道教，为大众做了许多善事，在做这些善事的过程中，恰恰更好地弘扬了道教。





三、凭藉道德之力，筑固弘道根基

“人行大道，号曰道士。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顺理，唯道是从，从道为士，故称道士”。这是《太霄琅书经》里的一段话，也是陈莲笙背得滚瓜烂熟的一段话，意思是说做一个道士，必须要有一定的修养，按大道行事，信仰道，追随道，按道的内容身体力行，奉道行事，不然就不能称为道士。持有一定的修养，是一个道士应该放在第一位的事，因此，陈莲笙在弘扬道风之时，把道士的修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从八个方面记述了修养体会，让我们仔细地归结如下：

（一）奉道行事

作为一个道教徒，首先是信仰“道”，然后才是奉“道”。陈莲笙认为：“作为道士，他有一些根本的东西是不能变的，变了就不是道士了。这就是一个道士对道教的信仰不能变。一个道士如果连信仰都没有了，那他就不是道士了。即使他还留在道观里，穿着道装，他的心也不是道士了。”^①在《道德经》开篇里写着：“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说真正的“道”是无法用语言准确说明的。它是无所不包，无所不为的。道“先天地生”，由“道”产生出宇宙、天地、万物以及人类。同时，天地万物又处处体现着“道”，包含着“道”。“我们道教徒认为‘道’是太上在冥冥之中创造的、规定的。因此，太上就是‘道’的化身。我们‘奉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3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道’，就是要信仰太上，信仰先天地生的各位尊神，相信是他们创造了‘道’，由‘道’再衍出天地万物，并且再让‘道’体现在天地万物之中。各位尊神在注视着我们，我们丝毫不能轻慢。”^①陈莲笙深信自己每时每刻的行为都受到各位尊神的关注与查点，因此他一丝一刻也不敢轻慢自己的行为，按照一定的原则来行事。《太霄琅书经》说“人行大道，号曰道士”。这个原则就是“道”，陈莲笙说：“按道行事，就是‘得道’，不按道行事，就是‘失道’。”^②

在当今各类社会问题纷纷畸形凸现的时代，宗教应当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宗教的正常发展，对于形成一个正常的社会文化秩序或精神规范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宗教提倡与人为善，有助于精神文明的建设，是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重要支持。宗教团体或宗教组织内部能够约束全体信徒的行为，并能通过一系列礼仪制度，安抚信徒的不安定的社会恐惧心，由此产生稳定社会的价值。道教作为中国主要宗教的构成之一，是中国的传统宗教，经历上千年的积淀，已经深入人心。道士作为道教的主体更加应该担负其对本宗教、对社会的责任。而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道士在修道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和世俗利益发生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坚持按道而行才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才是一个真正道士的体现。陈莲笙认为，“保持‘道’的信仰特点，体现道士的精神风貌，是在当代社会中振兴道教的关键所在。”^③这个关键就决定了“道教在建立组织和参与社会中，重要的是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3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3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③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3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以‘道教’的宗教功能和‘有道之士’的身份。离开了‘道’，道教和道士就混同于一般社会组织和一般民众，不论为道教和社会做多少好事，都体现不出道教的特点和功能。”^①陈莲笙语重心长地教导各位道教徒：“不能把世俗利益作为道教徒的行为准则或目标……真正按大道行事的人，对于世俗利益的一套东西是绝不追求，也不放在首位的。”^②对于那些满脑子都是钱的人，陈道长语重心长：“做生意是为赚大钱，要赚大钱千万不要进道观做道士，因为第一不允许，第二不可能。不允许，因为建国后的道教是纯洁的道教，要奉道行事。不可能，因为道教已经恢复了本来面目，规戒严肃，制度齐全，不可能在道教内部搞不合法的手段。”^③

但是陈莲笙是辩证看问题的。他认为把世俗利益当作道士行为的目标当然是不符合道的，但也不必把这二者绝对的对立起来。《道德经》里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意思是说，“有”和“无”，“得”和“失”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修道之人要能够认清清楚“得”与“失”，道与世俗利益的关系。得未必是福，失未必是祸。奉行大道的人，就要有这样的气度、胸襟和目光。“其实世界上人的所有事情，以及由此给人带来的高兴和悲伤，喜悦和忧愁，都是由‘得’和‘失’两个字引起的。”^④陈莲笙道长提倡：“在经济社会大发展的时代，我们广大道教徒，在弘道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1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3—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③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3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④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3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兴教、服务社会的同时,精神上要保持‘清虚’,要遵循教祖‘道法自然’的教诲,做到清心寡欲。我们学道之人,充分享受着‘天道’的恩惠,那就让我们敞开胸襟,像山谷和大海一样对待这个高速发展的物质世界,要多行善功,广结道缘。”^①要做一个真正的道教徒,就必须坦然地面对俗世的利益,不可“过分”,以无为而无所不为。

修道人要有为道教事业奉献自己的精神,向历史上的道教先驱学习,为道教的发展做力所能及的事。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修道之人。综上所述,道教徒最根本的指导原则即“奉道行事”。

(二) 爱国爱教

常言道:“没有国,何来家?”道教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纵观道教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道教历千年之变迁,由萌芽发展到辉煌,期间起落无不与当时的国家昌盛、衰微相关。尤其是至清之后道教衰微,道教在清末动荡社会中呈现支离破碎状,当时的道士社会地位低下,过着贫苦生活。苦尽甘来,自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领导下,道教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信仰自由的宽松氛围得以形成,在这种环境下,道教开始逐渐恢复生机,道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提高道学修养的机会。在如此幸福的环境中“修道”,令陈莲笙不由地感叹,作为本土宗教的道教以及广大的道士们有什么理由不支

^① 陈莲笙:《迈向新世纪——关于新世纪道教弘扬与发展的思考》,《上海道教》1999年第4期第30页。



持我们的政府,不热爱我们的国家呢?他认为:主动热爱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道教徒的基本行为准则。他还说“我们道教徒应该自觉地‘爱国爱教’,把‘爱国爱教’作为自己行为的一个准则,作为道教徒修养的一项重要内容,把政府要我们‘爱国爱教’变成我们道教徒的自觉行动。”^①

中国历史悠久,道教文化源远流长,中国传统中几乎随处可见道教刻下的痕迹。一个道门中人,是作为道家思想和道教文化继承者,既承担着发展道教文化的重任,也是承担着在新时期建设中国文化的重任。作为道士,陈莲笙说道“我们爱国不仅爱历史上的祖国,还必须爱现实的祖国,爱社会主义祖国,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讲到‘爱教’,大家也都知道热爱自己道教的道理。我们的道教是值得我们做道士的热爱的,值得道门外的人尊重的。中国的一部《二十五史》里到处有道教留下的痕迹。”^②爱道教,发展道教,是每一个道教徒不言而喻的信条。热爱道教不是空喊口号,它体现在修道的过程中,道教徒要怀着对“道”的坚定信仰来修道,不但修斋醮科仪,还有道教知识,行为上严守戒律,决不辱没道士的称号。

陈莲笙认为:“要培养有爱国爱教、具有开拓精神的新一代道教徒。在政治上要坚持爱国爱教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拥护改革开放政策。在经济上也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社会,有益民众。”^③

爱国与爱教的关系上,道教徒要明白它们尽管内容上有所不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3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39—4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③ 陈莲笙:《上海道教正在努力适应当今社会》,《上海道教》1997年第1期第4页。



同,却又是相互联系的,共产党为道教的发展创造了和平安定的局面,把追求共产主义当作社会发展的目标。道教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太平”社会,两者殊途同归,目的一致,道教徒的当务之急既要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又要坚持不懈地追求道士的信仰。最后陈莲笙总结道:“怎样才称得上‘爱教’呢?第一,道心要坚,就是要有坚定的道教信仰……第二,道术要精,就是要刻苦学习道教学问……第三,道戒要严,就是要严格遵守戒规纪律……怎样才称得上‘爱国’呢?第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第二,遵守国家的法律规定……第三,积极投入祖国四化建设的伟大事业……爱国和爱教是相互联系的。统一起来,就是我们当代道教徒修养的一项方向性的内容。”^①只有这样,中国道教才能复兴和发展。在党和政府的积极扶持之下,道教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和丰硕的成果,这些都是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的,陈莲笙高兴地说:“近二十年来,中国道教全面复兴,通过道教自身努力弘扬以及中国和世界各国学术界的研究和介绍,正逐渐为中国大多数民众和世界各国各民族所认识,得到世界各宗教的承认和尊重。”^②



(三) 学道为人

在古代,修道的目的和现在修道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宋朝编修的《云笈七签》里有一句话,叫“古之学道为己,今之学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41—4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25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道为人”。古人认为“修道”是为了个人成仙,结茅为庐,饮清泉,食松果,离尘出世。而我们今人却无法像古人那样离尘出世,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我们必须同社会打交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网络使得全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人们可以不用考虑时间和地点自由地沟通与交流。人作为社会的构成因子很难脱离社会而生存。宗教组织、文化传统和道德规范,在国家治理乃至社会整合的过程之中,常常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为社会成员、社会沟通、社会稳定,提供了共同的立场、标准。社会成员的行为、互动,可以处于它们的指导之下,遵循其价值系统之中的规范,以此来控制、消解、规定、协调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冲突。道教徒作为道教的主体同样也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同样也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生活,道教徒也有权利享受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切成果,但是在享受社会进步带来的好处同时,也有义务为社会作出贡献。宗教的社会功能就是维护社会发展,造福百姓,道教就是提倡“度人”,学道的目的也是“为人”。陈莲笙说:“我们的修道学道不能只是为自己,我们的目光要看着众生,要看着社会上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的人。自己处处以道来规范行为,并且以自己的修养、道德行为来感化众生,普度众生。只有这样一种不仅为自己而且为别人为社会的修道,才是真正的仙道。真正的仙道修持,其善功是不可限量的。”^①正如《道德经》上所说的:“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道教就正如那“水”,滋润宇宙万物,道教徒业应该如“水”一样,滋润大地众生,而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得道成仙。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21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学道为人”？

陈莲笙常说：“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各人’，修道和学道只能依靠各人自己的努力……我们修道和学道不光是为了自己，而且应该处理好和同道之间的关系，离不开信众的帮助。”^①“学道为人”中的“人”包括了道教界内人士，同时也包括全社会的人，《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说：“齐同慈爱，异骨成亲”。意思是说道教徒要用一颗慈爱之心关怀天下所有的人，做个“有情”之人。所谓“为人”，就是说在宗教活动中为信众做好工作，帮助他们度过困难。不仅仅为信众服务，还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陈莲笙说：“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学道为人就是要为人民大众，为社会主义……‘为人’不是空话，而应该身体力行。……我们也要妥善处理同其他道门中人的关系。”^②归根结底，学道为人就是为了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整个国家的繁荣昌盛。

但是度人的过程自然不会万事顺利，陈莲笙说：“度人就好像坐船，船在水中行，需要动力。被度的人要划桨，我们度人的也要划桨。不用力，河是度不过去的。这就是说，度人有一个过程。一个人要从恶变成善，就要艰苦的脱胎换骨。”^③当然，与人为善也并非盲目、不辨是非的。陈莲笙道长提到：“世界是复杂的，人也有善恶。我们的‘学道为人’当然是为大多数善人的，而不是为了恶人。帮助善人，自己是行善功；帮了恶人，自己也是行恶。因此，我们必须睁开双眼，提高识别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4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4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③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206—20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能力。”^①不帮恶人，是不帮他们继续行恶，而不是彻底放弃他们，陈莲笙道长说：“人生就像一条大河：一边是善，一边是恶；一边光明，一边黑暗；光明的一边光辉灿烂，黑暗的一边泥潭火坑。我们说的度人，就是要帮助不学道的人学道，帮助学道的人成道，使人从恶变成善，从差变好，从假变真，从丑变美。”^②总之，为了将世界上的人都成为良善之人而修道，这样才是真正得道之人。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学道为人，也是为道，因为只有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了道教的积极作用，才会支持道教的发展、道教才会得到长足的发展、振兴。陈莲笙说：“一旦我们得到了教徒们的支持，我们就不愁有事没人做，有难没人帮，有庙没道士，有道士没烧香，有烧香没信仰，有信仰没人关心，也只有出现这样的局面，我们的道教才会振兴起来。”^③而道教的振兴，也会促进国家的繁荣，社会的稳定，形成和谐共进的局面，真乃锦上添花之妙象。

（四）多行善功

《太平经》中说：“天道无亲，唯善是与”，意思是说天道不分血缘和亲疏关系，只根据“善”的原则判断人的行为，并给予回报或惩罚。修道的人要想得到天道，与天同寿，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行善。而“善”与“恶”到底是怎样界定的呢？陈莲笙说：“道教的‘善’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4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20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③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15—1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就是一切行为要符合天地万物的自然,不要做违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事。反过来说,所谓‘恶’,也就是逆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各种行为。”^①陈莲笙认为:“整个自然界是一个相生相克的循环,行善的人是不会去人为破坏这个循环的。山居的道士要爱护林木花草,不要在春夏季节渔猎,弹射飞鸟,挖胎破卵,残害生灵。”^②

天地自然和人是相互依赖的,浑然一体的。“用现代科学的话来说,自然界和人组成为一种生命的‘链’,天下万物相关相联,环环紧扣。在这个链中,物种都有它自己的位置,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③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言:“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追溯到比对这个相互作用的认识更远的地方,因为正是在它背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了。”“只有从这个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了解现实的因果关系。”^④万事万物都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的,“动物也是天道循环中的一环,我们要少吃或不吃动物,春夏季更要少吃,特别是决不能伤害珍稀动物,让自然界能自然无为地生息不止。”^⑤因此,正确处理道士与自然、社会的关系,是行善的关键。

东晋时候的著名道士葛洪曾经说过“积善立功”和“恕己及人”,陈莲笙认为这是处理各种关系的总纲,详细来说,可以用十个字概括:一是“忠”,二是“恕”,三是“俭”,四是“诚”,五是“朴”,六是“孝”,七是“信”,八是“慈”,九是“礼”,十是“义”,“这十个方面是我们道教徒处理社会关系的‘善行’的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4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49—5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③ 陈莲笙:《索取和奉献》,《上海道教》1996年第4期第2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⑤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5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道德要求。它是维持社会正常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道教徒修道、得道必须做到的积善立功。”^①这在《太上感应篇》中也有体现。正所谓“行善事，福虽未至，祸已远离；行恶事，祸虽未至，福已远离。”尽管得道成仙，名利仙班是一件难之又难的事，道士以及道教徒仍然应该依照这“十字”所概括的行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走在得道成仙的正确道路上。

（五）我命在我

“我命在我”是道教教义里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警句，如何来理解这句话呢？“我命在我”有两个重要的词即“命”和“我”，首先要弄清楚这两个词的内涵。

陈莲笙认为，道教的“命”不同于儒家的“命”，“道教的‘命’只讲生死寿夭，没有富贵贫贱的意思在内。这是因为道教要求信徒清静无为，自放草泽，不要把人生的富贵贫贱看得很重，重要的是学道、得道，长生升仙。”^②“命”是天地之上的自然之理，也就是“道”。道教认为“三清”作为人的“命”的主宰，但同时道教徒不能消极待命。陈莲笙说：“我们道教对于顺逆、吉凶，既然认为是道的体现、命的主宰，就不畏天命，而是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安天命而知足。”^③

唐代卢重玄曾经解释“力命”说：“命者，必定之分，非力不成。力者，进取之力，非命不就。有其命者，必资其力。有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51—5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53—5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③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5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其力者，或副其命。亦有力之不能致者，无命也。持命而不力求者，候时也。信命而不信力者，失之远矣。信力不信命者，亦非当也”。意思是说，命是神灵主宰赐予的名分，但是人如果不努力也是实现不了的。陈莲笙说：“我们道教徒既信天命，又要努力……在世界各种宗教的命运观念中，我们道教的‘我命在我’思想，应该说是比较能动，颇具特色的。”^①

人的努力可以取得成功，但是如果神灵主宰没有这个名分，也是枉费。有命的人，一定要依靠努力实现他的命。有的人努力了却不能成功，那是命中没有名分。如果有命而不去努力，那就只能等待时机了。光信仰命而不去努力的，就不会成功。光依靠努力而不信仰命的，也是不恰当的。陈莲笙说：“发扬优良传统，继承历史遗产，这是今天我们道教徒的历史责任。国运昌盛，社会稳定，道教的‘命’自有天机。”^②

“我”这个词的意思要理解为大“我”和小“我”。大“我”可以指国家，也可以指道教，国家的昌盛和道教的复苏都体现着大“道”，道教的努力在复兴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小“我”指道士个人，道门的兴盛与否既有命的主宰，也依赖道士个人的努力，每个道教徒必须付出努力，即保养自己，又要为道教和国家的昌盛作出贡献，才能顺应道教的“命”。

（六）斋醮度人

斋醮科仪是道教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斋醮通常也称为“道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5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5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场”，陈莲笙说：“做道场是道教主要的仪式活动，如同佛教有佛事、开水陆法会，天主教有弥撒，基督教有礼拜，伊斯兰教有五功一样……道教徒在道场里祈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超度祖先亡灵、早登仙界的愿望，无疑是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的。”^①因此，道教徒必须弄清楚做道场的意义和为信徒做道场时应持的态度。

陈莲笙首先谈到了做道场的意义。陆修静曾经说：“以人三关躁扰，不能闲停，身为杀盗淫动，故役之以礼拜；口有恶言，绮妄两舌，故课之以诵经；心有贪欲嗔恚之念，故使之以思神，用此三法，洗心净行，心行精至，斋之义也”（《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也就是说，做道场是为了道教徒学道修道，是修道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②做道士必须举行斋醮科仪，无论正一道还是全真道。其次做道场是为了社会伦理、孝子慈亲，是有功于社会的。^③杜光庭说过：“醮者，祭之别名也。香花灯烛，果酒茶汤，降天地，致万神，禳灾祈福，兼利天下”。道士做道场祝愿天地求告万神，为别人消灾降福，本身就是做善功，为社会做贡献。总之做道场既是为了道教徒自己的修行也是为了信徒谋福的善功。

做道场的神圣意义必然要求道教徒在其过程中严肃认真地对待。首先，道场的做法必须符合既定的规范，不能随意而行。另外，做道场收取一定的费用，是为了维持道教徒的生活，无可厚非，但是道士不能把道场看成做生意，在钱财上斤斤计较，而忘记了道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5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5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③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6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场的神圣含义,破坏坛场和神灵的尊严。

(七) 众术合修

众所周知,道教是追求修身养性,长生成仙的宗教。追求长生成仙的并不是追求人的躯体“天长地久”。道是无始无终的,而人的躯体却是形而下的,按照天道来说人的躯体是会衰老终了的,只有人的精神对“道”的追求是无始无终,“天长地久”的。人的肉体则由于受到来自精神和肉体方面的各种伤害,不能终其天年。历代道教徒都探索过不同的修身养性的方法,以求长生。在葛洪时代,他强调:“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则其小者不可不广知也。盖籍众术之共成长生也。《微旨》概括起来也就是“众术合修”,气功修行只是道教修行的一部分内容。因此,道教追求修身养性,并非是享乐主义作祟。陈莲笙特别指出:“我们道门中的人有二点是应该明确的:第一,道教是追求修身养性、长生成仙的;第二,修身是为了实践道,而不是为了欲或者为了钱。”^①

“为什么人的生命有长有短呢?这是因为人的精神和肉体上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挫折和伤害,使人不能终其天年。所以历代道教徒在强调戒欲慎行,保持健康的同时,还探索种种修身养性的方法,以求长生。”^②

“众术合修的养生原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道’是无限的,而‘术’是有限的。人在后天受到的干扰和盈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人的养生必须在精神上、内脏功能上以及躯体保健上给予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6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6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全面的照顾。”^①因此,只修气则只能得到片面的结果。正一道历史上修身养性的方法如陶弘景和司马承祯,他们的《养性延命录》和《坐忘论》都是中国医学史和道教史上的名篇。而在正一道的斋醮仪式上,法师需要先炼自身再度众身。通常,正一道的道士并不是不讲修身养性,而是不专注于内丹,更倾向于“众术合修”。在当代国内,很多人到道教内寻求养生长寿之法,道教中人更要自觉地加强养生研究,使道教发扬光大,弘扬道教文化,抵制那些假借道教名义的人兴风作浪,偷鸡摸狗。陈莲笙感叹:“你站在山上极目远望,那山峦起伏,层林密布,云雾飘渺,你会感到天‘道’的伟大而个人之渺小;你环顾海上,不论船体多大,随浪摇晃,任风摆布,你也感到沧‘海’之伟大而个人之渺小;你看到山石上雕刻的前贤名句和手迹,你都会感到天地之悠悠而个人生命之短暂。”^②

(八) 适应时代

道教内对于适应时代有两种看法,年长的道友怀着“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认为道教是流传了两千多年的传统,不能改变道教来适应时代。年轻的道友则希望道教能适应社会的变化,使道教在当代社会发扬光大。陈莲笙认为这两种看法都具有片面性。

历史上看,道教在开始阶段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和社会生活始终有紧密的联系。例如金元时期出现的全真道派是道教顺应时代生活的典型。历史告诉我们,在道教和时代的关系上,只能是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6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13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道教主动去适应时代。在当代中国，道教在政治上坚持爱国主义的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拥护改革开放的政策，是道教适应时代的重要内容。“以不变应万变”是行不通的，最终只能使道教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丧失立足之地。

那么如何来适应时代呢？陈莲笙认为，道教适应时代的问题，首要的不是去改变细枝末节，而是去改变观念以适应时代。他曾经说过：“在当代中国，我们道教在政治上要坚持爱国主义的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拥护改革开放的政策。在经济上也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服务社会，有益民众。这些都是我们道教适应时代的重要内容。”^①

道教要适应社会，首先是在教义教理上对“道”的丰富和发展，“道”的内容是应该随着时代而丰富发展的。宗教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处于互动关系之中，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必然要求宗教在其神学观念，行为方式，组织结构等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陈莲笙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道教的道的认识也应随之丰富发展。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新发现大大扩展了我们对道的认识，我们当代道教徒应该对道作出解释，以丰富或修正前辈道长们的阐述……因此，丰富和发展道教的教义教理，特别是对于‘道’的认识是道教适应时代的首要内容。”^②他还说：要在教理教义上丰富和发展对于“道”的认识。“道”是我们道教的基本信仰，信道崇道那是不能变化的，但是，“道”的内容是应该随着时代进步而向前发展的。现代社会飞速发展，它同五十年前的世界已有很大差别，前辈道长对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7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71—7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于道的理解和认识，也应该由我们当代道教徒作出补充、修改和发展，以丰富道教的教理教义。^①因此，他认为“新世纪的道教，首先要树立正确和纯洁的信仰，道教徒要通过自己的修行，淡泊名利，纯洁心灵，与人为善，坚持正信，树立良好的信仰风范和高尚的道德情操。”^②在观念丰富的同时，陈莲笙还提及：“改变我们道教徒的某些不适应时代的观念，这是道教适应时代的最重要的一步。任何急于求成或者自我封闭的思想都不会有好结果。”^③

其次，在道法、道术和道教仪轨方面，某些为当代社会生活需要的部分，应该发扬光大；某些不适应的部分，应该适当调整。为了适应现代社会高度组织化的生活，我们还要改变道教组织的观念。道教成立跨宗派、跨地区联合的道教协会，就是道教组织适应现代社会的重要步骤，它改变了历史上道教各自为政的一盘散沙的组织面貌。同时，培养新一代道教徒和提高老道士的修养方面也是改变观念的重要内容。随着道教宫观的不断开放增多，需要的青年道教徒也在增多。要培养出有高度学识水准的，有精明管理能力的和协会工作能力的，有高超的法术和仪范水平的高道，需要青年道士和老道士自身的不懈努力去弘扬道风。而这一切都有相当的难度，陈莲笙非常明白，他说：“做一个道士，唱念做之技艺件件要驾轻，琴棋书画之功夫桩桩要就熟。因此，做道士很难。”^④

① 陈莲笙：《上海道教正在努力适应当今社会》，《上海道教》1997年第1期第4页。

② 陈莲笙：《迈向新世纪——关于新世纪道教弘扬与发展的思考》，《上海道教》1999年第4期第30页。

③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7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④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与世界的接轨，中国传统宗教……道教也为整个世界所熟悉，《道德经》被翻译为多种外文。“道教作为一种中国宗教也平等地跻身于世界各宗教之林。中国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受到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尊重和敬佩。”^①这些是令陈莲笙激动不已的。他相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的道教，也会像中国传统文化其他内容一样，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②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对《道德经》发生兴趣，而且还有一些外国人已经信仰了道教，甚至修炼“内丹”，国外学术界对于中国道教的研究水平也不亚于国内学者，甚至于，在西方的科学界、哲学界、神学界，在面临诸多无法解答的难题、处于瓶颈的时候，有时也会转而投向道教，试图在道教中挖掘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陈莲笙看到了这一点：“道教的信众中间逐渐出现外国人，这也不是令人奇怪的事情。”^③因此，他说：“道教要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局面，也确实要做好经典文献的外国语翻译工作、弘道材料的外国语翻译和发行等工作。”^④全球化的今天，道教不可能只在中国闭门造车，而是要积极地与世界接轨。

总结陈莲笙道长的八个方面的修养体会，我们看到，他从宇宙论和认识论上非常注重从教义教理上探索修道的奥秘。首先，深入探究什么是道教徒追求的“道”，对太上在《道德经》中所讲的“道”有深刻的理解，告诉道教徒们要切记以“道”为行事的第一准则。他还解释了道教的“命”的观念，澄清道教与我们日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25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25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③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25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④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25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常受儒家观念影响而持有的“天命观”的不同。道教的“命”的观念，既包含着道教信仰的神灵，即三清对人的命运的主宰，这是作为一个道教徒应该持有的信仰；同时，道教徒又不应该安于天命、消极待命，通过自己的努力即“我”的主观行为去实现名分才是对“命”的正确认识。

他又从方法论上谈到修道的方法。作为正一派的高道，陈莲笙一贯非常注重斋醮科仪的修习，认为斋醮是道士自我修习的重要之法，“洗心净行”必得在斋醮中完成。同时做道场的目的也是为信众谋福利的善举，陈莲笙强调修道在当代社会，这些事情都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且是为了社会作贡献，“学道为人”不止为己，按照《度人经》的说法，就是“齐同慈爱，异骨成亲”，道士要怀着慈善之心待人，多做善事，因为道教徒信仰做善事能得到好的回报。所谓的“善”也就是行事符合大道的规律，“天道无亲，惟善是与”，行善是修道的重要法则之一。总的来说“众术合修”是正一道的修行方法，既注重养生又强调斋醮科仪，涵盖了道教内的各种修行方法，道教徒大可从延年益寿的方法上弘扬道风。

在实践方面，陈莲笙道长以开放的眼光强调道教与现世的结合，他从道教的发展历史中总结出道教与时代的关系，并告诉我们为了适应当今的时代道教需要改变的方面，不仅是道教徒自身的观念，还包括道教徒的发展，培养青年道士和提高老道士的修养。正确处理道教与外界的关系始终是陈莲笙关注的焦点，他认为道士不仅要爱国爱教，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政治地位，还必须在日常生活中本着行善的原则积善立功、恕己及人。从道士个人做起，为国家、社会、道教以及个人的修道作出应有的贡献。最后，更为重要的，陈莲笙道长教导道士们不得急功近利，他说：“历史



上无数事实以及人们的无数经历都说明，跳跃式的发展，必然带来的是跳一级，退二级的结果，而只有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往上攀登，才可能达到发展的顶峰。”^① 他还说：“修道就是修一个‘自觉’，得道就是得一个‘自觉’。一旦万事‘自觉’，一言一行都符合天道、地道和人道了，那不就是‘得道’了吗？一举一动都按太上《道德经》的话去做，那不就是‘道’的体现了吗？”^②

陈莲笙道长无私地把自己长长的修道生涯中宝贵的修道经验作出总结，从各个方面阐释他的修道历程，为道友们提供了值得参考的修习之法，实在不愧是正一道的高士。

四、加强宫观管理，庄严弘道场所

众所周知，宫观是道友们参透道理，举行法事等众多道教活动的场所。本人在《宫观和道教文化的发展》中对此就已经作过详细的论述，宫观作为道教宗教场所的总称，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它本身是道教文化的产物，或者说是道教文化的物化。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宫观是一个很庄严的地方。确然如此，身处宫观之中，人们总能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一种肃穆的情绪。在当代道教的发展之中，宫观起到了一个无可比拟的巨大的载体的作用，它不仅对道教在历史发展中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也使道教在未来的岁月中可以发展得越来越好。对于宫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13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1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观的管理等诸多方面，陈莲笙道长也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仅仅是道教官观管理的专门讲座，他就做了8次，而在其他报告、论文等中，也还有大量的论述涉及如何使得官观更加庄严的具体方法。

（一）重视管理

陈莲笙道长首先提出了一个态度的问题，就是应该要重视管理。改革开放以来，陈莲笙道长参观过各地的许多官观。看到有的官观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有的官观修复工程井然有序，一个殿一个殿，一条路一个园逐年修复。年年有进步，年年有变化；听到有的道观汇报帐目清楚，收支公开，量入为出，既有远期目标，又有近期打算。然而，他也看到有些道观殿宇不洁，垃圾狼籍，有的道观人员混杂、道风不整；有的道观汇报帐册不全、管理松弛；有些道观既无远大目标，更无近期打算。对于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他认为问题就是出在官观的管理上，有的官观管理得好，而有的则管理得不好。他明确提出道教中的人，应该树立起“管理”这个观念。他说：“一座座道观正在修建、恢复和开放，一批批年青的道士正在走上神职、执掌大权。现在，正是我们要重视管理的时候了。”^①这是因为道教是一个由共同信仰的人组成的社会团体。上海市道教协会就是一个社会团体。

对于道教的管理，陈道长有着独特的见解。他说到，“道教的管理是主张‘无为而无不为’的。道教中的人只有做到顺乎

^① 《道教官观管理讲座·重视管理》，《上海道教》1997年第1期第20页。



天道，顺应自然和社会，才能真正的‘无为而无不为’；而顺乎天道，顺应自然和社会的管理，‘无为而无不为’的管理，才是真正的管理。”^①对此，他也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无为’可以理解为一种高度自觉的管理境界，而‘无不为’则可以理解为管理措施的严格执行。如果我们官观里的执事们人人各司其职，各尽其职，整个官观的‘人财物’的管理自然就有条不紊，自‘无不为’而到‘无为’。”^②值得一提的是，陈道长明确指出“无为”同“干预”并不是反义词。“干预”并不等于不“无为”，不“干预”也不等于“无为”^③。有的人可能会问，无为是不是就什么也不要干了呢？对此，陈道长明白地说：“无为是指处理万物和治理天下都要顺乎万物和天下的‘道’，用现在的话说，做事要合符规律，顺其道而行之。‘无为’强调的是对于万物之道的态度。但是事情还是要做的，治理还是要治的，不能认为‘无为’就什么也不干。”^④

陈道长也进一步指出了道教管理的一个准则，即道法自然。他说到：“道法自然，应该是教徒处理天地间一切事务的基本原则。因此，道教官观的管理也应该以道法自然来处理一切。”^⑤继而，道教徒的管理也应该坚持“奉道行事”的原则，也就是要以“道”的思想来管理，而在方法上则应敞开胸怀，吸收各种有用的现代管理的科学方法。对此他提出了几种方法。

第一，要管理就要有权威，权威建立在公心上，公心就是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14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道教官观管理讲座·重视管理》，《上海道教》1997年第1期第20页。

③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12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④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12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⑤ 陈莲笙：《道教官观管理讲座·道法自然》，《上海道教》1998年第4期第13页。





道。《道德经》中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①这就是说，以道的思想管理官观，要宽容和大公无私。道教中人，无论是谁，都不能把道教的“人财物”看作是个人的私产或者用之“以权谋私”。有人当上了住持，却把修庙的材料往家里拉，把庙产当成了私产。有人经营某些事务，却从中捞利，中饱私囊。有人把同乡同好拉在身边，结成“小团体”，在用人上不能出于公心。这些不公而失道的举止，是会有报应的，那就是失去权威，失去人助，最后被逐出道门。

第二，要管理就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处理关系建立在适应上，适应就是道。《道德经》中有云：“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②古今之“有”区别很大，因此执道之法也应该有所不同。一些管理不善的道观，大多与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关系有关。一些住持沿用旧子孙庙的家长制的管理办法，不能发挥和健全官观民主管理委员会的作用，用人、化钱和理物等都是一个人说了算。财务管理也没有健全制度，也不和社会上的财务、审计等制度接轨，搞成一笔糊涂账。

第三，要管理就要有规章制度，规章制度建立在规律上，规律就是道。《道德经》中说到：“道常无为而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③道要守，守的就是规律。掌握了规律，就能管理好人财物。我们常常说“依法管理”，法也就是一条条的条文。依法管理的目的是什么？其中之一是保护道教自身合法权

① 《道德经》16章。

② 《道德经》14章。

③ 《道德经》37章。



益。过去，我们总是把眼光看着教外，同教外人争合法权益。现在，我们还要看到身后有没有榔头，防止墙内的人利用管理不善窃取私利。加强道观管理，说到底，也是为了堵塞漏洞，防止我们道教的合法权益的流失。

可以看出来，陈道长对于官观管理的诸多思想，有其独到之处，更很好地与现实结合了起来。除此之外，还将规章制度等很好地运用了起来，引人深思，可以很好地借鉴。另外，于1985年，上海市道教协会正式成立之际，陈道长当选为副会长兼秘书。几年来，经他努力呼吁、奔走，上海市道教界相继收回并开放了6座官观，使信徒有了宗教活动场所。他对此的贡献实在是可见一斑。

（二）健全制度

俗话说得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依据一定的规矩。陈莲笙道长认为道教的官观里面，规章制度是很必要的，故他提出了要健全制度。他认为，道教的规矩就是“道”。我们的一切都讲“奉道行事”，官观管理概莫能外。不过，在管理工作中，社会上习惯地将“规矩”说成是制度。道友们在官观里学道、行道等要奉道行事，按制度执行，这样才能使官观活动有序地进行，发挥官观的弘道立德、教化信众的作用。陈道长将社会生活中的制度运用到官观生活中，这点是较创新的。1986年，上海市道协创办了“上海道学班”，陈道长兼任教务主任并亲自组织教学。首届学员三年结业，已充实到市道协及本市官观为职业道士，陈道长还十分重视对道教文化的研究与弘扬。他定期举办道教知识讲座，邀请对道教





文化有博识的学者、居士、道长讲学，通知信众前来听讲，提高信众的道教知识水平。他创办了“道教文化研究室”，组织研究工作。除此之外，他还主编了许多道教杂志，他为道教制度的健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健全制度的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它包含许多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应该分清脉络。这是个主导原则。陈道长说：“采用社会上的说法来总结，实际就是大权集中，小权分散；集体研究，个人负责；分清脉络，各司其职等等。”^①陈道长看到了港台一些宫观采取了很好的措施：“港台道观里的一些大事大多由理事会、董事会等集体研究决定，由当家等负责执行。这就是说，道观的大权掌在集体手里，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另外，当家等有职有权，那职权是集体授予的……综合港台地区一些道观的经验，当代道观的活动大致有三条脉络。第一条是庙务活动的管理……第二条是社会活动的管理……第三条是附属事业的管理……三条脉络分清以后，各种事务都有人负责处理，并且向当家的和董事会负责。这样一来，自然整个道观的活动井井有条，自然不会出现有事没人做、有人没事做的局面。”^②陈莲笙道士将社会上的诸多好的操作方法应用到道教事务之中，其实是很有创见的。《道德经》说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③意思是说，一个车轮子有三十根辐条，辐条集中到中间的车轴上，一个车轮就组成了，就可以当车轮来使用了。大权集中就好像车轮中间的车轴，车轴就像各个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8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83—8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③ 《道德经》31章。



道观里的当家、住持、观长和主席等负责人。陈道长认为，道观的大权掌在集体手里，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另外，当家等有职有权，那职权是集体授予的。

其次，他也明确强调了奖惩监督。在今天的道教官观管理中，在执行清规戒律时，仍然要采用赏罚、奖惩的办法。陈道士说到：“评比，这种办法是有用的，因为通过评比，奖励先进，批评落后，启发和调动官观内的道士自觉管理官观事务的积极性，对今后进一步提高道教官观管理水平当然会有所推动。”^①需要指出的是，陈道长指出，这里的奖惩除了精神鼓励的内容以外，还包含一些物质奖励，尽管就其数值而言并不大。但是，效果是显著的。此点就很好地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相结合，很好地体现了当代社会的时代气息。至于说到“监督”，陈道长认为我们道教是十分明白“监督”的重要性的。做道场，“三法师”中就有一名称为“监斋”。监斋者，就是对道场、行仪的道士和施主等方方面面实行监督的意思。此处他也提出了我们应该发扬民主精神。“‘民主’这个词，按我的理解就是以民为主的意思，用社会上常说的，那就是要让老百姓当家作主。以民为主和民为邦本的思想，在中国本是早已有之的。孔家店中有，道家思想中也有。”^②《道德经》说“爱民治国，能无知乎”，^③意思是在爱人民、治国家时，要保持一种博爱而无为之心。《道德经》中还说到：“对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④如果说一个治理国家的人没有私心杂念，以百姓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当然这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10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97—9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③ 《道德经》10章。

④ 《道德经》49章。



个治国之人代表了民众的利益和愿望，他的所作所为就是以民为主和以民为本了。我们要重点指出的是，陈道长对于“民主”这个概念作了一定的发挥，这是很有创新意味的。不同于以往的“民主”，陈道长将它理解为三层含义。

1. 人事管理的民主

“所谓人事管理的民主，主要是官观管理的执事人选要任人惟贤，广开才路，不搞任人唯亲。”^①在选拔执事人员和教职人员时，事前要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并且经过法定程序公平地确定，把认真踏实和扎实肯干的道众选拔出来担当官观的管理工作。

2. 财务和总务活动中的民主

“所谓财务活动的民主，主要是官观财务活动要公开。收入的帐目要公开，支出的帐目要公开。道众的分配所得也要公开。”^②在分配所得方面，要掌握公平的原则，既不能搞平均主义，也不能无依据地扩大差距。不能鞭打快牛，应该明确地奖勤罚懒。一些重大的开支项目以及一些牵涉面很大的分配项目应该经过官观执事班子的充分讨论。这样一种财务管理上的民主可以保证官观财务管理廉洁和节俭，保证道观的发展有个比较稳定的基础。

3. 教务活动的民主

“所谓教务活动的民主，主要是教务活动要公开。教务活动要做什么，以及怎样做等等，都要听取道众的意见以及广大信徒的要求，并且把尽可能多的道众组织到教务活动中来。所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9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10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有这些管理活动的“民主”，其目的就是要发扬宫观内道众和信徒的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有利于调动大家积极参与宫观管理的积极性。”^①套用一句社会上的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扬民主，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在加强道观管理工作中，通过发扬民主，给予道众和信徒对道观的人事、财务、总务和教务等工作以发言权、申述权、辩解权和参与权，并且对于他们的意见充分尊重和重视。如果我们能自觉地利用好这种手段，那么我们道教宫观的各方面的管理工作就只会搞得更好，而不是搞得更糟。陈道长将道教事务中的民主作了详尽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在更好理解的基础之上进行操作。总之，只有本着民主的原则，我们才能在奖惩监督的工作过程中，做到真正的公平公正。

（三）人才选拔

以上陈道长已经讨论了重视管理和健全制度这两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重视管理是宏观调控的话，那么健全制度就是一种微观调控的手段。在这整个体系中，人才起到了一个尤为重要的关键作用。它是这全部工作的承担者，更直接决定了这些工作的好坏、性质和主导方向。陈道长对此也颇有研究，并着重提到了关于人才的选拔。在1992年10月西安召开的“中国道教文化研讨会”上，陈道长曾经就道教文化的当代发展谈过三点意见，其中第一点就是培养人才的问题。在会议上，他说过“当代社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因此，我们要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10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大力注意吸收人才、培养人才、启用人才和留住人才”。^①在那次会议上，他还说过：“道由人显，道教的存在归根结底依靠道教徒的存在。道教的发展也取决于道教徒素质的提高，道教人才的多寡”。^②道教官观管理得好坏也有赖于管理人员素质的提高，因此，为了搞好官观的管理，道教还有个管理人才选拔的问题。这样的人才就是明代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在《道门十规》中说到的“住持领袖”。天师张宇初说：“凡名山福地，靖庐治化，丛林官观，住持之士，或甲乙往还，或本山推举，必得高年耆德，刚方正直之士，言行端庄，问学明博，足为丛林之师表，福地之皈依者为之”。这段话还指出了担当“住持领袖”应该具备的条件，其中“言行端庄”指的是个人仪表修养和社会活动能力，“问学明博”指的是知识才学的水平，“刚方正直”指的是信仰和道德水准，特别是判别是非的能力和锲而不舍的毅力。至于“高年耆德”，我们如果不拘泥于字眼，就可以理解为有较丰富的社会经验，高度的道德文章的水平以及一定的社会声望，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稳健、成熟和有影响的意思。天师张宇初所说的条件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德才兼备的标准。

对于这个标准，现在道教协会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只是在这方面，陈道长同样也提出了自己意见。他认为不仅仅需要有着丰富经验的道士来作领袖，他也联想到了一些选拔到“住持领袖”岗位上的青年道士，他们身上虽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他觉得只要他们坚定道心，严守道戒，他们的经验会逐渐丰

①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8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莲笙：《道风集》（增订本），第8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富起来，他们的才干也逐渐会发挥出来的。他认为我们不能要求选拔出来的青年道士个个十全十美，像他们这些老人一样稳健成熟。另外，他们还要看到这些青年“住持领袖”比起他们当年来说是要成熟得多了，而且将来会更有出息。1985年，他有鉴于现在的青年道士在文化素质、道德修养等方面水平都较低，认为应培养新型的，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有文化，有较多道教知识的青年道士，并且身体力行，起到很好的领导作用。

说完了人才的选拔，陈道长又谈论了人才的淘汰。《道德经》中有云：“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①有选拔就有淘汰，对一个人来说有上任也会有离任，借用一句社会上的话来说，就是“能上能下”、“人才流动”。太上说：“恒也”，就是说，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将来也是如此。道教官观管理的人才也不能固定不动，搞终身制，或者只能上不能下，这是不利于道观管理的进步的。只有让人才能上能下，让人才公平竞争，才是符合天道的。当然人才的上下流动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种是为了更好地培养人才，使人才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熟悉各种管理工作，进一步提高“住持领袖”的道学水平和业务能力。一种是为了保护人才，不使人才在某个岗位做久了，陷进复杂的人事和社会关系中去。俗话说：“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让涉世不深的青年“领袖”在河边、陆地和山间换换环境，湿鞋的可能性也就少一点。还有一种，正如张宇初在《道门十规》中严厉批评过的，“华衣美食，广厦细毡，昧公营私，出入骑乘，呵拥仆御，交接权势，



^① 《道德经》2章。



以致教化不行，源污流浊。甚则耽迷声色，外饰内乖，不畏香火神明，灵坛古迹，私蓄俗眷，秽褻神祇。所辖住持，宜闻于有司，处决下山，不得蒙昧阿私，有坏规法。”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借用社会上的话，如果“住持领袖”，利用手中有限的权力，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违反国法政纪的，绳之以法，违背教义和官观戒规的，我们也必须把他们从“领袖”的位置上淘汰下来，否则无以制约，不能服众。因为我们的道教落在这样的离经叛道的人的手上，必然是“仪范犹乖，纪纲不振”的。天师张宇初提醒后世道流，“苟非道材法器，凡滥收录，或不成材，肆暴为非，罔守戒训，不惟貽玷玄门，又且成败兴废所系。”选拔人才或者淘汰顽劣，事关道教成败兴废的大业，人们不能不严肃对待。

综上所述，陈道长在有关官观管理的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想法，他这些思想的闪光点在我们管理官观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我们为了把官观建成一个更好、更完善的道教场所，可以对陈道长的思想作很大程度的借鉴。值得一提的是，陈道长的思想除了具有很强的理论深度以外，还具有很浓厚的时代气息。他的民主、完善制度等思想都与我国的国情相符，真正做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



后记

这一本书，旨在勾勒出陈莲笙大师八十年学道、弘道的历程，并由此透视当代道教界的发展和文化建树。当初由我提出选题，上海钦赐仰殿列入其文化发展计划，历时近三年，方克完成。现已可杀青。在付印前，稍说几句，以志其始末。

陈莲笙大师，是当代道教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尤其是在正一派之中，年高德昭，极具威望。这不仅是因为他年过九秩，且曾担任过中国道教协会的副会长、顾问，以及上海市道教协会的会长、名誉会长，而根本在于他在几十年的学道、行道、弘道历程中，成绩卓著，学问淹博，思想开明，是道教界内少数有影响的学者之一。我与陈道长交往，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时，我只是对他抱着尊敬的心情，因为他当时已是一位道教界的老人，而其长子耀庭、次子大灿，也都与我有着很好的友谊，自己作为晚辈，当然对他怀着敬仰之意。但对他产生进一步的了解，觉得有必要研究他的事迹和思想，却是在90年代末。盖当时我十分关注当代道教的教义建设，发现当代教义建设的不足，制约了整个道教的发展。而当代道士中关心此一领域并迸出思想火花者，弥足珍贵。历观当代的道教界，总觉得陈莲笙有些与众不同：他经常发表一些有关当代道教思想建设的论文，表现了很高的文化自觉。这位从旧时代走过来的老一



辈道长，却表现出开明、开放的心态，十分难能可贵。所以，便想找一个机会，对这位老道长的事迹和思想作一了解，如果有可能，则作些研究。2005年，上海道教界正在筹办老道长的九十岁生日庆典，撰写陈大师事略的想法油然而生。恰好钦赐仰殿有意组织一套文化丛书，并愿意将此选题列入计划，遂开始了双方的合作，并在三年后形成了本书。

陈莲笙大师一生经历极为丰富，在学道、行道和弘道方面的建树又涉及到诸多的方面。写一写他的事略，似乎很容易，实际动起笔来，却发现并不那么顺当。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许多他年青时候活动的资料都遗失了，现在要想钩沉，非常的不易。另外，陈大师自己虽然曾任过多项道门的领导工作，但处事较为低调，大约是继承了道门恬淡虚无的传统，对于自己的活动，一般不太宣扬，甚至于没有着意留下相关的照片、文字资料。在这段时间里，我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又很繁忙。这些都使得写作断断续续，比预想的时间节点推迟了不少。好在身为教师，有一个好处，是可以帮助学生们帮助做事，既可以加快工作的进程，又可以让他们得到锻炼。为此，我请了安莉霞、李兰二位同学做学术助手，帮忙搜集资料，并按预定的提纲，写出部分初稿，最后由我总其成。当然，其间的统稿乃至重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本书虽然以我的名义出版，却有着她们的劳作在其中。本书是以叙述陈莲笙大师的事迹为主的，但如前面所说，陈老是一位有着自己思想的道教界内的学者，在叙述中，过多谈论其思想的要点和价值，恐怕会使文笔不够顺畅，所以在书后另做了两个附录。一是陈大师自己弘道思想的要义，以“弘道法语”的形式，摘录其论著中的精华语句。二是陈大师弘道思想研究，阐释其有关当代如



何弘道的基本思想。前一个附录，由赵丽娜、朱晓怡做出初稿，后一个附录，由安莉霞、李兰起草，然后由我改定之。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得到了诸多的前辈学者和朋友的支持、鼓励。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大师、著名道教研究专家李养正先生，以及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道教协会副会长丁常云，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史孝进，分别为本书写了序言，上海市道教协会、上海钦赐仰殿的负责人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帮助，上海辞书出版社宗教文化编辑室的陆海龙先生、编辑朱可宁女士，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仔细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特别还要感谢陈大师长子耀庭教授，次子大灿先生。他们为本书提供了许多有用的资料，耀庭兄并为初稿中的若干讹误作了精心订正。

本书凝聚了众多朋友心血，希望她的问世，能为道教文化的研究提供新的富有时代感的资料。

刘仲宇
志于建德花园寓所
2008年5月9日

